

风云初记

孙犁 著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

•

风云初记

孙犁——

FENG YUN

CHU JI

Sun li



孫君

其法有法也

至去年冬，曾作《丙午和信》一稿，其法不多，若生有法，其法二也。

丙午和信

在丙午和信之区，有丙午和信之法，其法如左：一

个字，其在丙午和信时，即此一在丙午和信一在丙午和信，在

其法不致也，如左：一在丙午和信一在丙午和信，其法如左：一

他如左：一在丙午和信一在丙午和信，其法如左：一

其法如左：一在丙午和信一在丙午和信，其法如左：一

—

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，冀中平原大旱。五月，滹沱河底晒干了，热风卷着黄沙，吹干河滩上蔓延生长的红色的水柳。三稜草和别的杂色的小花，在夜间开放，白天就枯焦。农民们说：不要看眼下这么旱，定然是个水涝之年。可是一直到六月初，还没落下透雨，从北平、保定一带回家歇伏的买卖人，把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带到乡村。

河北子午镇的农民，中午躺在村北大堤埝的树荫凉里歇晌。在堤埝拐角一棵大榆树下面，有两个年轻的妇女，对着怀纺线。从她们的长相和穿着上看，全好像姐妹俩，小的十六七岁，大的也不过二十七八。姐姐脸儿有些黄瘦，眉眼带些愁苦；可是，过多的希望，过早的热情，已经在妹妹的神情举动里，充分的流露出来。

她们头顶的树叶纹丝不动，知了叫的焦躁刺耳，

沙沙的粘虫屎，掉到地面上来。

远处有一辆小轿车，在高的矮的、黄的绿的庄稼中间，红色的托泥和车脚一闪一闪。两个乌头大骡子，在中午燥热的太阳光里，甩着尾巴跑着。

两个妇女仄着身子看，姐姐说：

“又有人回家了！”

“我看是不是俺姐夫？”妹妹站起身来。

“你就不想念咱爹？”姐姐说。

“我谁也想，可是想不回来！”妹妹提着脚跟，仔细看了一会，赶紧坐下拧起纺车来，嘟念着说：

“真败兴！那是大班的车，到保府去接少当家的死着回来了。咱的人，一个也不回来，今年不知道能回来一个也不？”

轿车跑到村边，从她们眼前赶进了寨门。大把式老常从前辕跳下来，摇着带红缨的长苗鞭，笑着打了个招呼。少当家的露着一只穿着黑色丝袜子的脚，也从车里探出头来望了她们一眼。她们低着头。

这姐妹两个姓吴，大的叫秋分，小的叫春儿。大的已经出嫁，婆家是五龙堂。

五龙堂是紧靠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，河从西南上滚滚流来，到了这个地方，突然曲敛一下，转了一个死弯。五龙堂的居民，在河流转角的地方，打起高堤，钉上桩木，这是滹沱河有名的一段险堤。

大水好多次冲平了这小小的村庄：或是卷走它所有的一切，旋成一个深坑；或是一滚黄沙，淤平村里最高的房顶。小村庄并没叫大水征服，每逢堤埝出险，一声锣响，全村的男女老少，立时全站到堤埝上来。他们用一切力量和物料堵塞险口，他们摘下门窗，拆下梁木砖瓦，女人们抬来箱柜桌椅，抱来被褥炕席。传说：有一年，一切力量用尽了，一切东西用光了，口子还是堵不住，有五个青年人跳进大流里去，平身躺下，招呼着人们在他们的身上填压泥土，堵塞住水流。

他们救了这一带村庄的生命财产，人民替他们修了一座大庙，就叫五龙堂。年代久了，就成了村庄的名字。

这小村庄站立在平原上，实际是生活在风险的海里。人民的生活很苦，多少年来，人口和住户增加的很少。

每年大水冲了房，不等水撤完，他们就互助着打甃烧砖，刨树拉锯，盖起新房来。房基打的更坚实、墙垒的更厚，房盖的比冲毁的更高。他们的房没有院墙和陪衬，都是孤伶伶的一座北屋，远处看去，就像一座一座的小塔。台阶非常高，从院子走到屋里，好像上楼一样。

秋分的公爹叫高四海，现在有六十年纪了。这一

带村庄喜好乐器，老头儿从光着屁股就学吹大管，不久成了一把好手。他吹起大管，十里以外的行人，就能听到，在滹沱河夜晚航行的船夫们，听着他的大管，会忘记旅程的艰难。他的大管能夺过一台大戏的观众，能使一棚僧道对坛的音乐，像战败的画眉一样，搭翅低头，不敢吱声。

这老人不只是一个音乐家，还是有名的热情人，村庄活动的组织家。

在十年以前，这里曾有一次农民的暴动，暴动从高阳、蠡县开始，各个村庄都打出了红旗，集在田野里开会。红旗是第一次在平原上出现，热情又鲜明。

高四海和他的十八岁的儿子庆山，十七岁刚过门的儿媳秋分全参加了，因为勇敢，庆山成了一个领袖。

可是只有几天的工夫，暴动很快的失败了。一个炎热的日子，暴动的农民退到河堤上来，把红旗插在五龙堂的庙顶。农民作了最后的抵抗，庆山胸部受了伤。到了夜晚，高四海拜托了一个知己，把他和本村一个叫高翔的中学生装在一只小船的底舱，逃了出去。

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时候，送庆山出走的只有两个人。年老的父亲，扳着船舱的小窗户说：

“走吧！出去了哪里也是活路！叫他们等着吧！”

用力帮着推开小船，就回去了。他还要帮着那些农民，那些一起斗争过、现在失败了的同志们，葬埋战死在田野里的难友。

另外送行的是十七岁的女孩子秋分，当父亲和庆山说话的时候，她站在远远的堤坡上，从西山上来的黑云，遮盖住半个天的星星，谁也看不见她。当小船快要开到河心了，她才跑下去，把怀里的一个小包裹，像投梭一样，扔进了小船的窗口。躺在船舱里的庆山，摸到了这个小包包，探身在窗口叫了一声。

秋分没有说话，她只是傍着小船在河边上走，雨过来了，紧密的铜钱大的雨点，打得河水拍拍的响。西北风吹送着小船，一个亮闪，接着一声暴雷。亮闪照的清清楚楚，她卷起裤脚，把带来的一条破口袋，折成一个三角风帽，披在头上，一直遮到大腿，跟着小船跑了十里路。

风雨锤炼着革命的种子，把它深深埋藏在地下，嘱咐它等待来年春天，风云再起的时候……

庆山出去，十年没有音讯，死活不知。和他一块逃出的那个学生，在上海工厂里被捕，去年解到北平来坐狱，才捎来一个口讯，说庆山到江西去了。

高四海只有四亩地，全躺在河滩上，每年闹好了，收点小黑豆。他在堤埝上垒了一座小屋，前面搭了一架凉棚，开茶馆卖大碗面。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渡

口。

秋分擀面，公公拉风箱。老人从村里远远挑来甜水，卖给客人，又求过往的帆船，从正定带些便宜的大砬，这样赚出两口人的吃喝。

秋分在小屋的周围，都种上菜，小屋有个向南开的小窗，晚上把灯放在窗台上，就是船家的指引。她小窗前面栽了一架丝瓜，长大的丝瓜从浓密的叶子里垂下来，打到地面。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莲，叫它们站在河流的旁边，辗转思念着远方的行人……

每年春夏两季，河底干了，摆渡闲了，秋分就告诉公公不要忘记给望日莲和丝瓜浇水，回到子午镇，来帮着妹妹纺线织布。

二

子午镇和五龙堂隔河相望，却不常犯水，村东村北都是好胶泥地，很多种成了水浇园子，一年两三季收成，和五龙堂的白沙碱地旱涝不收的情形，恰恰相反。

子午镇的几家地主都是姓田，田大瞎子（那年暴动，他跟着县里的保卫团追剿农民，打伤了一只眼睛。）在村里号称“大班”，当着村长。他眼下种着三四顷好园子地，雇着四五个大小长工。在正村北有一所大庄基，连场隔院。左边是住宅，前后三截院子，都是这几年里新盖，一色的洋灰灌浆，磨砖对缝，远远望去，就像平地上起了一座恶山。右边是场院，里面是长工屋，牲口棚，磨房碾房，猪圈鸡窝。土墙周围，栽种着白杨、垂柳、桃、杏、香椿，堆垛着陈年的麦秸、秫秸、高粱楂子。五六匹大骡子在树荫凉里拴着，三五个青石大碌碡在场院里滚着。

小做活的芒种和打杂的老温，在柳树下面锄草，切碎的草屑，从铡刀口飞起来，不久就落成大堆，一只毛腿老母鸡在草堆旁边找食，红着脸张慌的叫了几声，丢出一个热蛋，叫碎草掩埋了。

轿车赶到梢门口，老常打了几声焦脆的鞭花，进了场院，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。少当家田耀武拍拍衣裳下来，老常帮着往里院搬行李。芒种放下铡刀跑过来，把牲口卸下，牵到外面井台上去打滚饮水，老温卷着长套。

田耀武的母亲，穿着一身白夏布出来，到车跟前探身看了看，有没有丢下儿子的东西，告诉老温：

“不要摘套，明儿还得去接人家佩钟哩！没见过当媳妇的这么尊贵，不请不接就不回来！”

说着，又到东墙根鸡窝里摸了摸，回头看见芒种牵着牲口进来就问：

“叫你歇晌看着鸡，把蛋都丢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天热！”芒种赶紧说，“它们在窝里卧不住，净去找凉快地方，看也看不住！”

“看你会说！先去打肉，回来村边村沿，绕世界找找去！”田耀武的母亲说着家去了。

一家团聚。田耀武把从北平买来的、日本走私的丝绸衣料拿出来，孝敬父母。又带回一些乡下还没见过的新鲜物件：暖壶、手电棒儿和保险刀。把一部

《六法全书》陈列在条案上。他在北平朝阳大学专学的是法律，在一年级的時候，就习练官场的做派：长袍马褂，丝袜缎鞋，在宿舍里打牌，往公寓里叫窑姐儿。临到毕业，日本人得寸进尺，北平的空气很是紧张，“一二九”以后，同学们更实际起来，有的深入到军队里进行鼓动，有的回到乡下去组织农民。田耀武一贯对这些活动没有兴趣，他积极奔走官场，可也没得攀缘上去，考试完了，只好先回家里来。

父亲安慰他说：

“能巴结上个官儿，自然很好，实在不行哩，咱家里也不是愁吃愁穿，就在家里吧。供给你上学原不过是叫你学会写个呈文状纸，能保住咱这点家业过活就行了！”

晚上，二门以外也有个小小的宴会。老常和老温坐在牲口棚里的短炕上，芒种点着槽头上的煤油灯，提着料斗，给牲口撒上料。老常说：

“芒种！去看看二门上了没有，摸摸要是上了，轿车车底下盛碎皮条的小木箱里有一个瓶子，你去拿来！”

芒种一丢料斗子就跑了出去，提回一瓶酒来，拔开棒子核，仰着脖子喝了一口，递给老温。老常说：

“尝尝我办来的货吧，真正的二锅头！”

“等等！”芒种小声说，“我预备点菜。”

他抓起喂牲口的大料杓，在水桶里涮洗涮洗，把两辆车上的油瓶里的黑油倒了来，又在草堆里摸着几个鸡蛋，在炕洞里支起火来炒熟了，折了几根秫秸尖当筷子。

老常说：

“小小的年纪，瘾头挺大，别喝多了！”

可是每回轮到芒种，他总是大口招呼，不多几口，就到炕头上趴着去了。

“这孩子！”老常叹了一口气。

老温说：

“老常哥，保府热闹吧！”

“我看着很乱腾，人心不安。”老常说。

“看样子，得和日本人打打吧？”

“车站上军队倒是不少，家眷可净往南开。”

“那是不打听！日本人到了什么地方？咱这里要紧不？少当家的怎么说？”老温着急的问。

“他知道什么？”老常笑着说，“他就知道三样：到了保府，还去住了一宿哩！”

“咳，这才是！”芒种一滚爬起来说，“佩钟等了半年，怎么不憋到家就撒了！”

老温说：

“这你就精神了！”

“我看咱们少当家的成不了气候，”老常又叹了

口气，“虽说上的是大学，言谈行事，还不如他媳妇。一家子苦筋拔力，供给着这么个废物！”

“苦什么筋，拔什么力呀？”老温说，“地里有的是大车大车的粮食，铺子里放债有的是利钱，还有油坊花店，怕不够他糟吗？一抽一送，倒不费劲。我们这些人，再加上城里打油轧花的那一帮子，可得一点汗一点血干一整年哩！”

“你看俺们这个，”老温又摩着芒种的头说，“别说大学，连小学也没进过！”

芒种也拍着老温的脊梁说：

“闹的俺老温哥快五十了，连个媳妇毛也摸不上！”

“芒种，来我给你破个谜，”老温笑着，“两根筷子，夹着一根鱼刺儿——是什么？”

“我猜不着。”

“我们两个大光棍加着你这小光棍！”老温说，“咱们这长工屋，也该起个堂号了，就叫光棍堂，要不就挂块匾：五世同光！别说了，安置着睡觉！”说着一抬大腿从炕上跳下去。

芒种露天睡在场院里，地下铺着一领盖垛的席。天晴的很好，刮着小西北风，没有蚊虫，天河从头上斜过去，夜深人静，引导着四面八方的相思。

这孩子，已经到了入睡以前要胡思乱想一阵的

年龄。今年十八岁了，在这个人家已经当了六年小工。他原是春儿的爹吴大印在这里当领青的时候引进来的，那一年大秋上，为多叫半工们吃了一顿稀饭，田大瞎子恼了，又常提秋分的女婿是共产党，吴大印一气辞了活，扯起一件破袍子下了关东，临走把两个女儿托靠给亲家高四海，把芒种托靠给伙计老常。告诉两个女儿，芒种要是缝缝补补，短了鞋啦袜的，帮凑一下。芒种也早起晚睡，抽空给她姐俩担挑子水，做做重力气活。

农村的贫苦的青年，一在劳动上结合，一在吃穿上关心，就是爱情了。

今天，芒种去打水饮牲口，春儿在堤埝上低着头纺线，纺车轮子在她怀里转成一朵花，她的身子歪来歪去。芒种直直的望着，牲口把水喝干了，用嘴把梢桶挑起来，当啷一声，差一点没掉到井里去，春儿回过头来笑了。

芒种望着天河寻找着织女星。他还找着了落在织女身边的、丈夫扔过去的牛勾槽，和牛郎身边织女投过来的梭。他好像看见牛郎沿着天河慌忙追赶，心里怀恨为什么织女要逃亡。他想：什么时候才能制得起一身新人的嫁装，才能雇得起一乘娶亲的花轿？什么时候才能有二三亩大小的一块自己名下的地，和一间自己家里的房？

半夜了，天空滴着露水。在田野里，它滴在拔节生长的高粱棵上，在土墙周围，它滴在发红裂缝的枣儿上，在宽大的场院里，滴在年轻力壮的芒种身上和躺在他身边的大青石碌碡上。

这时候，春儿躺在自己家里炕头上，睡的很香甜，并不知道在这样夜深，会有人想念她。她也听不见身边的姐姐长久的翻身，和梦里的热情的喃喃。养在窗外葫芦架上的一只嫩绿的蝓蝓儿，吸饱了露水，叫的正高兴；葫芦沉重的下垂，遍体生着像婴儿嫩皮上的茸毛，露水穿过茸毛滴落。架上面，一朵宽大的白花，挺着长长的箭，向着天空开放了。蝓蝓儿叫着，慢慢爬到那里去。

三

话虽这么说，田大瞎子还是替儿子张罗。他家和张荫梧沾点亲戚，他写了一封信，叫田耀武到博野杨村去一趟。那时张荫梧管辖着附近几个县，要组织民团，还要“改选”区长，就叫田耀武回到本县本区服务效力。

田大瞎子随着办了几桌酒席，把全区的村长村副请来，吃到半截腰里，把儿子的名片发下去，又叫田耀武敬了酒，他才把请客的意思说明：

“请各位老兄老弟照应照应你们的侄儿！”

那时的村长村副差不多都是田大瞎子一流人，就说：

“不照应他还照应哪个去？可是一件：耀武当了区长也得照应着我们哪！”

田大瞎子说：

“那是。有个大事小情的，总得比别人有个看顾。

张专员说：不定哪天日本人就会过来。这，我们谁也没有办法。国家养着那么些军队，都打不过，你们说我们老百姓可有什么能耐，挡住人家？可是，我们得防备一件：到了那个时候，地面上不安稳，我们就要吃亏，我们是吃过亏的人了。放耀武在区上总好一些。张专员又要组织民团，不久这些公事就要下来了，各村殷实户主，都得出人买枪，这是件风火事儿，区上要没个靠近的人儿，咱们可有很多事不好办哩！”

“今年这么旱，大秋好不了，可哪里有富余钱买枪啊，一杆湖北造就要七八十块大洋哩！”有几个村长村副发起愁来。

“这是张专员委派给耀武的命令，我们也没法驳回。”田大瞎子说，“可是也犯不上为这件事情发愁作难。各位回到村里掂对着办就是了，叫那些肉头厚的主儿买几枝，其余的就摊派给那些小主儿们。可有一件：钱叫他们出，买回枪来，还得拿在我们手里！”

宴会完毕，各村村长村副都说在改选区长的那天，投耀武的票。

天很热，送客出门，田大瞎子就搬一把藤椅，放在梢门洞里，躺着歇凉。

东头有一个叫老蒋的，这人从小游手好闲，专仗抱粗腿吃饭。他每天指望的就是村里出点横祸飞灾：

红白大事，人命官司，失火求雨等等，找些油水。这些日子天旱，农民们早早晚晚好站在村边大堤上望云彩等雨，他就过去：

“老天爷又等着子午镇的好戏看了！”

农民们答腔的很少，他们明白：就是眼下落了透雨，收成也不会好，再加上求雨唱戏花钱，穷人更是难办。

老蒋正自没趣，看见大班的客人们走了，就摇着蒲扇拐到这里来，他放轻脚步走到田大瞎子身边说：

“我说呀，老天爷也瞎眼，这么热天，他还不下场雨叫你老人家凉快凉快！”

田大瞎子眼皮也没抬，只把翘起来的一只挂在大脚趾头上的鞋，摆动摆动。半笑半骂的说：

“滚蛋吧！又跑来喝我的剩酒了！”

“叫我看呀，你还是不会享福。”老蒋说，“大地方不是有了电扇吗，怎么还不叫耀武买一把回来呀？我们也站在旁边，跟着凉快凉快。”

田大瞎子不说话，老蒋就冲着他扇起扇子来。田大瞎子坐起来说：

“算了。你去把管账先生叫来，有点剩酒菜，你们一块吃了吧！”

老蒋跑去把先生叫了来，田大瞎子告诉他们派款买枪的事。

先生抱着大账算盘，老蒋背着钱插，先从尽西头敛起，到了春儿家里。

秋分和春儿正为冬天的棉衣发愁，每天从鸡叫，姐妹两个就坐在院里守着月亮纺线，天热了就挪到土墙头的荫凉里去，拚命的拧着纺车，要在这一集里，把经线全纺出来。一见又要摊派花销，秋分就说：

“大秋都扔了，正南巴北的钱粮还拿不起，哪里的这些外快？”

老蒋说：

“你说这话就有罪，咱村的收成不赖呀！”

“谁家的收成好？”秋分问。

“大班的支谷，下了一亩八斗，你砍我的脑袋！”老蒋说。

“别提他家！”春儿说，“那是大水车的灵验，我们哩，我们这些穷人哩，别说八斗，八升打出来，你砍了我的脑袋！”

“你可有多少地亩呀？”老蒋笑了。

“他地多，就叫他把钱全垫出来呀！”

“人家不是大头！”

“他家不是大头，难道我们倒成了大头？”

“这是阖村的事，我不和你小丫头们争吵，”老蒋说，“你不拿也行，到大众面前说理去！”

“你们是什么大众！”春儿冷笑着，“还不是一个

茅坑里的蛆，一个山沟里的猴！”

管账先生说：

“你这孩子，不要骂人，这次泼钱是买枪，准备着打日本，日本人过来了，五家合使一把菜刀，黑间不许插门，谁好受的了啊？”

“打日本，我拿。”春儿从腰里掏出票来，“这是上集卖了布的钱。我一亩半地，合七毛二分五，给！”说着扔给老蒋。

“这就是咱村的一大害，刺儿头！”老蒋走出来，和管账先生嘟念着。

听说山里的枪枝子弹便宜，老蒋在那边又有个黑道上的朋友，写了封信，田大瞎子派芒种先去打听打听。这孩子吃得苦，受得累，此去西山一百多地，两天一夜，就能赶回来。

芒种轻易不得出门，听说叫他办事，接过信来，戴上一顶破草帽，包上两块饼子就出发了。

这时已是起晌以后，农民们都背上大锄下地去了，走到村边，从篱笆门口望见春儿和秋分，正在葫芦架下面经布，春儿托着线子走跳着，还挂好一边的橛子。芒种想起身上的小褂破了，就走了进来。听见脚步声，春儿转过身来，没有说话。秋分抬头看见，就说：

“起晌了，你倒闲在？”

“我求求你们，”芒种笑着说，“给我对对这褂子！”说着把饼子放下，把褂子脱下来。

“什么要紧的事，你这么急？”春儿停下手来问。

“到山里送封信？”芒种说。

“颠颠跑跑的事，就找着你了？”春儿盯着他说。

“没说吃着人家的饭嘛，就得听人家的支唤。”芒种低着头。

“叫春儿给你缝缝，”秋分说，“她手上带着顶针。”

春儿回到屋里，在针线筐箩里翻了一阵，纫着针走出来，一条长长的白线，贴在她突起的胸脯上，曲卷着一直垂到脚下。她接过褂子来，说：

“这么糟了，衬上点布吧！”

“粗针大线对上点，不露着肉就行了。”芒种说。

春儿不听他，又回到屋里找了一块白布，比了比，衬在底下，密针缝起来，缝好了，用牙轻轻咬了咬，又在手心里平了平，扔给芒种：

“别处破了，这个地方再也破不了啦！”

芒种穿在身上，转身到墙根水瓮那里探头一看，说：

“又干了！我去担挑子水来！”

秋分说：

“一会我和春儿去抬吧，叫你们当家的看见，又

该说你了!”

“这是体己活，他管不着!”芒种说，“我要两三天才能回来哩!”

他担起她们的小梢桶就出去了，担了一挑又一挑，小水瓮里的水波波的漫出来了，又去担了一挑，浇了浇葫芦。

春儿在他背后笑，刚刚给他缝好的褂子，又有一个地方，像小孩子张开了嘴。

“来!再对上几针，”她招呼着芒种，“就穿着缝吧，给你叼上一根草棍儿!”

“叼这个干什么?”芒种说。

“叼上，叼上!要不就会扎着你，要不咱两个就结下冤仇了!”春儿笑着，把一根笤帚苗放在芒种的嘴里。

两个人对面站着，春儿要矮半个头，她提起脚跟，按了芒种的肩膀一下，把针线轻轻穿过去。芒种低着头，紧紧合着嘴。他闻到从春儿小褂领子里发出来的热汗味，他觉得浑身发热，出气也粗起来。春儿抬头望了他一眼，一股红色的浪头，从她的脖颈涌上来，像新涨的河水，一下就掩盖了她的脸面。她慌忙打个结子，扯断了线，背过身去说：

“先凑合着穿两天吧，等我们的布织下来，给你裁件新的!”

四

芒种拿起饼子，连蹦带跳的跑下堤埝去，他头一回听见子午镇村边柳树行子里的小鸟们叫的这样好听。小风从他的身后边吹过来，走在路上，像飞一样。前边有一辆串亲的黄牛车，他追了过去；前边又有一个卖甜瓜的小贩，挑着八股绳去赶集，他也赶过去了。他要追过一切，跑到前边去。有一棵庄稼，倒在大路上，他想：“这么大的穗子，糟蹋了真可惜了儿的！”扶了起来。车道沟里有一个大甩洼：“后面的车过来，一不小心要翻了哩！”把它填平。走到一个村口，一个老汉推着一小车粮食上堤坡，努着全身的力气，推上一半去，又退了下来，他赶上去帮助。到街里，谁家的孩子栽倒了，他扶了起来，哄着去找娘。

当天晚上，他就过了平汉路，在车站上，他看见了灰色的水塔和红绿色的灯，听见了火车叫。一火车一火车的兵马，在他眼前往南开去了，车顶上挤着行

李、女人和孩子。

他走在山地里的石子路上，爬过一个山坡，又一个山坡，一打听道儿，老乡总是往前面山顶上一指说：“翻过这个小梁梁儿就到了，一马平川！”

这里冷的早，山前的草还青着，山后的草就发白了。白色的房顶上，堆着枣儿，黑色的山羊，在山坡石头堆里跳跃着。山道两旁，常常遇见泉水，小小的水泉慢慢冒出水来，像螃蟹吐泡，芒种从没喝过这样甜的水，不断蹲下用手掏起来喝。

尽量抬着脚步走，还不断踢起小石块，不久鞋底磨出窟窿来，石子钻到里面去，芒种想：“回去又该求春儿了！”他捡了几块又圆又滑的紫色小石头装在兜里，平原的孩子们欢喜这些小石头，偶尔才能从田地里拾到一块，说是老鹅从山里衔回的枕头。他预备回去送给女孩子们抓子儿。

中午，他走到一个大镇店，叫做城南庄。村边河滩上有一片杨树，有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大道旁边纳着鞋底儿，卖豆腐和红枣。芒种坐在一块石头上，脱下鞋来休息。

前面是一条大河，叫胭脂河，太阳照在河面上，水流很清，红色的砂石在河底翻动。河对面有唱歌和喊叫的声音。

不久，从山后转出一支队伍来，稀稀拉拉，走的

很不齐整，头上顶着大草帽，上身披着旧棉衣。这队伍挤在河边脱鞋，卷裤子，说笑着飞快的蹒过来，在杨树林子里休息了。芒种问那妇女：

“大嫂子，这是什么军头啊？”

“老红军！”妇女说，“前几天就从这里过去了一帮，别看穿的破烂，打仗可硬哩，听说从江西出来，一直打了二万多里！”

“从江西？”芒种问，“可有咱这边的人吗？”

“没看见，”妇女说，“说话夸得厉害，买卖可公平，对待老百姓可好哩！”

“怎么火车上兵往南开，他们倒往北走哩！”芒种又问。

妇女说：

“那是什么兵，这是什么兵，往南开的是蒋介石的，吃粮不打日本，光知道欺侮老百姓的兵。这才是真心打日本的兵，你听他们唱的歌！”

芒种听了听，那歌是叫老百姓组织起来打日本的。队伍散开，有的靠在树上睡着了，有的跑到河边上去洗脸。有一个大个子黑瘦脸的红军过来，看了看芒种说：

“小鬼！从哪里来呀？看你不像山地里的人。”

“从平地上，”芒种说，“深泽县！”

“深泽？”那红军愣了一下笑了，“深泽什么村

啊？”

芒种听他的口音一下子满带了深泽味儿，就说：“子午镇。老总，听你的口音，也不远。”

“来，我们谈谈！”红军紧拉着芒种的手，到林子边一棵大树下面，替芒种卷了一枝烟，两个人抽着。

“我和你打听一个人，”红军亲热的望着芒种，“你们村西头有个叫吴大印的，你认识吗？”

“怎么不认识呀，”芒种高兴起来，“我们在一个人家做活，我还是他引进去的哩。现在他出外去了，在牡丹江种菜园子。”

“他有一个女儿……”红军说。

“有两个，大的是秋分姐，小的叫春儿。”芒种插上去，“你是哪村的呀，你认识高庆山吗？”

红军的眼睛一亮，停了一下才说：

“认识。他家里的人还都活着吗？”

“怎么能不活着呢？”芒种说，“生活困难点也不算什么。就是想庆山想的厉害，你知道他的准信吧？”

“他也许过来了。”红军笑了一下，“以后能转到家里去看看，也说不定。”

芒种说：

“那可就好了，秋分姐整天想念他，你见着他，务必告诉他回家看望看望。”

红军说：

“你这是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我去给当家的送封信。”

“你们当家的叫什么？”

“田大瞎子。”

“你们村里谁叫这个？”

“就是村北大班里，那年闹暴动，叫红军打伤了眼的。”

“是他！”红军的眼睛里的热情冷了，宽大的眉毛挑动一下，“那些闹暴动的人们，眼下怎么样？”

“那些人有的死了，有的出外去了。”芒种说。

“老百姓的抗日情绪怎么样？”红军又问。

“什么情绪？”

“抗日的心气高不高？”

“高。”芒种说，“我这就是去买枪，回来就操练着打日本。”

“村里是谁的主事？”

“田大瞎子。”

“咳！”红军说，“武器掌握在他们手里，是不会打日本的。你们要组织起来，把枪背在自己肩上。”

他给芒种讲了很多抗日的道理，天气不早，芒种要赶道，红军又送了他一程，分别的时候，芒种说：

“同志，你真能见着庆山吗？”

“能。”红军说，“你告诉他家里人们放心吧，庆

山在外边很好，不久准能家去看看。”说完，就低着头回到树林子里去了。

芒种一路上很高兴，想不到这一趟出差，得着了庆山的准信，回去一告学，她们不定多高兴哩。把信交了，把事情办妥当，第二天就赶回来，路过城南庄，部队不见了，卖豆腐的妇女说连夜又往北开了。

回到子午镇，看见秋分和春儿在堤埝上镶布，芒种老远就合不上嘴，走到跟前小声说：

“秋分姐，家来！我说给你句话。”

“什么事啊，这么偷偷摸摸的？”春儿仰着头问。

“家来，你们全家来！”芒种说着先走了。

到家里，芒种坐在炕沿上说：

“天大的喜事，庆山哥快回来了！”

秋分靠在隔扇门上，问了又问，芒种说了又说。好容易把那个红军的身量、长相、眉眼、口齿，告学明白，秋分哭了起来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芒种着了慌。

“你见着的恐怕就是他！”秋分说，“怎么这样狠心，见着了靠己的人，还不说实话呀！”

春儿抱着线子家来，也斥打芒种：

“你怎么就不知道好好儿叮问叮问？他穿着什么衣裳？”

“衣裳顶破旧。”芒种说。

“什么鞋袜？”

“没穿袜子，我看那也不叫鞋，是用破布条子拧的！”芒种比划着。

“你问那些个干什么？”秋分说，“我看就是他，别人能知道咱这里的事儿那么清楚？”

“他有胡子没有？”春儿还是问。

“一脸黑胡子碴儿。”芒种说。

“我看那不是。”春儿说。

“他离家十几年，你还不叫他长胡子？”秋分说着笑了，她站立不住，就到五龙堂去了。春儿在后边暗笑：姐姐像好了一场大病，今天走的这么轻快。

五

走到五龙堂，秋分把芒种带回来的好消息，告诉了公公，还加上她的猜想。老人说：

“那一定是他。他还不能明说呀，这个地面还是归人家辖管着哩！”

他披上褂子，拿起烟袋来：

“你在家看门，我到村里去转转！”

秋分嘱咐着说：

“不要见人就告学啊，等他真的回来了吧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老人说，“我不是那缺谋少算、眼薄嘴浅的人，我不过是去告诉几个真心实意和咱相好的人，人家也整天惦记着庆山哩！”

直到天黑，高四海还没有回来，秋分把门锁上，也到村里去了。

她到和庆山一块出走、现在北平坐狱的高翔家里去。高翔家里有爹有娘，一个和秋分年岁差不多的

媳妇和一个小女孩。秋分在婆家住的时候，好到他家坐坐，和高翔媳妇说说话儿。这两个女人，并不是什么都能说到一块，高翔的媳妇是从小娇养大的，热爱丈夫，却不明白他为什么净做那些傻事，对于那年暴动，她也不赞成，因为婆家稍微富裕，还跟着吃了一惊。可是，她愿意和秋分说话，她说：

“庆山嫂子，咱两个是一个命儿，”停一会就又说，“我比你还苦！”

那时庆山只是没有准信，至于高翔，在那个年月，就是身边的孩子，也随时能从共产党这三个字联想起杀头来。

公公和婆婆曾经到北平去看望过高翔一次，媳妇也想带着女儿去一趟，公公回来说：高翔不让她去。只是叫她做一身棉衣，因为丈夫带着刑具，这一身棉衣，裁剪得奇怪，做成了，就像是不会系腰带的孩子们穿的。她拿起又放下，好几夜的工夫才把这身棉衣做成。

一针一滴眼泪，把棉花全湿透了。从结婚起，小夫妻的感情很好，新婚不久，丈夫送她到娘家去，路经滹沱河，夏天河里浪头大，小船不安稳，她年轻、胆小、晕船，当着船上很多人，高翔就把她抱在怀里，用手遮着她的眼。封建岁月，远近都当笑话传说起来。

越想过去，就越发难过了。打从高翔坐狱起，她没有畅快的欢笑过，没有穿过新衣裳，一家人过年不挂红灯，中秋不买月饼，一到天黑，就关门睡觉。

这天秋分来到她家里，正是掌灯的时候。窗纸上闪着亮光，十年以来，她第一次听见了高翔媳妇的笑声。

走进屋里，这一家人正围着桌子看一封信哩，谁也没有看见她进来，秋分说：

“什么事，一家子这么高兴？”

高翔的媳妇转脸看见是秋分，笑着说：

“喜事！”

“俺爹从狱里出来了！”爬在桌子上的小女儿望着秋分夸耀。

“你这个爹可是个稀罕！”高翔的媳妇轻轻拍了女儿一下，对秋分说：

“高翔出来了，信上还打听你们的人哩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坐在炕上听听吧！”

秋分只好先把自己的喜讯收起来，坐到炕上去，听她家的喜讯。

其实，这信白天已经念过一次了，吃过晚饭，小孩子要求爷爷再念一次。高翔的父亲把信纸铺在桌子上，把花镜擦了又擦，拿起信纸，前挪挪后退退，像对光一样，弄了半天，才念起来。

高翔的母亲，靠在炕头被垒上，不耐烦的说：

“你看你，真比戏子扮脚还费工夫哩！”

“你落俐，你来！”父亲把信又放在桌子上，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里，“你不知道我上了年纪，眼力不行，又加上你儿子写的这笔字，真不好认，我就怕看这个钢笔信！”

“算了！念吧，念吧！”母亲闭上眼专心听着。小女孩子还要往上挤，用两只小手使劲扯着耳朵。

高翔的信是写给父亲和母亲的，可是不用说秋分，就是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听得出来，有好多言语，是对她的母亲说的。爷爷念着，她看见母亲不断的红脸。

信上写着：

“我出狱后，就兼程赶到延安，现住瓦窑堡，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进行学习，不久就北上抗日。十年以来，奔走患难，总算得到了报偿！”

父亲念到这里停了下来，说：

“延安。这个地名很熟，《水浒传》上——王教头私走延安府，可就是想不起在什么地方来。去，在他那书箱里，找本地图来。”

高翔的媳妇登坡上高，打开多年没动过的、尘土

封盖的丈夫的书箱。翻了半天，找出一本来，递给公公。老人打开一看说：

“这是一本字典。我来吧。”

他找出儿子上中学时候用的一本地图来，找了半天，才在陕西肤施县下面的括弧里找到了延安。又用两个手指头量了量，说：

“你们看：这里是深泽，咱们的家，这里是延安，高翔他们占的地方，距离也就是这么寸数光景，走过来，可得些工夫哩！”

高翔的母亲叹气说：

“在外边十几年，叫人跟着担惊受怕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还不先到家里看看老娘，怎么又跑到那天边子上去了哩！”

父亲说：

“你老不明白：一准是那里，有你儿子更想念的人儿！”

信上也提到庆山，说他可能从江西长征过来，北上抗日了。秋分把芒种带回来的消息说了，一家子替她高兴。老人把信装好，交给儿媳妇，媳妇像捧着金银玉宝一样，递给婆婆，婆婆把它塞到被垒底下去。

小孩子托着腮帮儿望着她母亲说：

“娘，我们去找爹吧！”

“你去吧，你离的家了？”母亲问。

“离的。”小孩子说，“你去不去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”

“你自己去吧。”母亲笑了。

能把孩子送到丈夫的身边也是好的。在她想来：比做衣裳，孩子就是一个小针，能把母亲心里这条长长的线带到那边去，并且连在一起；像一条小沟，使这个洼里的水流进那一个洼；像一只小鸟，从这个枝跳上那个枝，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。

今天夜里，在五龙堂这个小村庄里，至少要有两个女人，难以入睡。

这一天晚上，闷热。秋分回到小屋里，公公还没有回来。小菜虫从窗口飞到屋里来，围着小油灯乱转。坐不到炕上，她抓了一把破蒲扇到堤坡上来。黑夜里，望日莲滴着金黄的花粉，香的闷人。从村庄到这里来的路上，有一星星的火光，不断飞起，秋分知道是公公抽着烟回来了。

春儿吃过晚饭，到姐姐家去看了一下，她替姐姐高兴，盼望着姐夫回来。姐姐不在家，她又一个人回来，过河的时候，天就大黑了。月亮升上来，河滩里一片白，闲在河边的摆渡鼓鼓的底儿向上翻着，等候着秋天的河水来温存。

她还要走过一片白沙岗，一带柳子地。

柔细光滑的柳子，拂着她的手和脸，近处有一只

新蜕皮的蝓蝓儿，叫的真好听。她停下来，轻轻拨动着柳子，走到里边去，想把它捉住。

忽的一个黑影子，从她脚底下跳起来，她叫了一声。

原来是芒种。嘻嘻的笑着说：

“我吃了后晌饭，喂饱了牲口，到菜园子井台上洗了洗脚，站在高处一望，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柳子地里浮游，我想：准是一只大鸟，要在柳子地过夜，我去捉住它。走近了，原来是你的白褂子！”

春儿说：

“你饶吓了人，还编歪词儿！”

“我是说来接接你，四海大伯高兴吧？”

“亲人快回来了，还有不高兴的？明儿还许请请你哩！”春儿说。

“请我什么？”芒种说。

“请你吃大碗面，多加油醋！”春儿笑着说，“看你把我的蝓蝓儿也闹跑了，快回家吧！”

“紧着家去干什么，我要在这里玩一会儿！”芒种说。

“漫天野地，有什么玩儿头？怪害怕的。”春儿说着往前走了。

“等等我呀！”芒种小声叫着，“等等我去捉住这个蝓蝓儿，它又叫哩。”芒种拨着柳子里面去了，听

见蝓蝓儿的叫声，春儿也跟了进去。

芒种紧紧拉住她的手，春儿急的说不出话来，用力摆脱，倒在柳子棵的下面。

密密的柳子掩盖着，蒸晒一天的沙土，夜晚来，松软发热，到处是突起的大蚂蚁窝，黄色的蚂蚁，夜间还在辛勤的工作着，爬到春儿的身上，吸食甜蜜的汗。

最后，春儿哭了，她说：

“这算是干什么？你有什么话就说吧！”

芒种说：

“听见庆山哥的消息，大家都在高兴。我是问问你，我们能不能成了夫妻……”

春儿低着头，用手抓着土。她刨了一个深坑，叫湿土冰着滚热的手。半天工夫，她说：

“成不了，你养活不起我。”

芒种说：

“要是庆山哥回来了呢？假如我也有了出头之日……”

“那我们就指望着那一天吧！”春儿说，“我又没有七十八老，着什么急哩！”

六

春儿回到家里，月亮已经照满了院，她开开屋里门，上到炕上去，坐在窗台跟前，很久躺不下。小白褂湿透了，带着柳子地里的泥土和揉碎的小草的味道。月亮从葫芦的枝叶里，从窗户的棧格里照进来，落在丰满的胸脯上，心口还在突突的跳动。

她感到有些后怕，又有些不满足。她仄着耳朵听着，远远的田野，有起风的声音。

她出来，西北角上有一块黑云，涌的很快，不久，那一面的星星和树木，就都掩盖不见了。干燥的田野里，腾起一层雾，一切的庄稼树木、小草和野花，都在抖擞，热情的欢迎这天时的变化。

半夜里下起大雨来，雨是那样暴，一下子就天地相连。远远的河滩里，有一种发闷的声音，就像老牛的吼叫。

今年芒种还没有给她们抹房顶，小屋漏了，叮叮

当当，到处是水，春儿只好把所有的饭碗、菜盆，都摆在炕上承接着，头上顶了一个锅盖，在屋里转来转去。

堤埝周围，不知道从哪里钻出了这么多的蛤蟆，一唱一和，叫成了一个声音，要把世界抬了起来。春儿一个人有些胆小，她冒着雨跑到堤埝上去，四下里白茫茫的一片，有一只野兔，张慌的跑到堤上来，在春儿的脚下，打了一个跟头，奔着村里跑去了。

“看样子要发大水了。”春儿往家里跑着想。

第二天，雨住天晴，大河里的水下来了，北面也开了口子，大水围了子午镇，人们整天整夜，敲锣打鼓，守着堤埝。开始听见了隆隆的声音，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占了保定。大水也阻拦不住那些失去家乡逃难的人们，像蝗虫一样，一普面子过来了。子午镇的人们，每天吃过饭就站在堤埝上看这个。

那些逃难的人，近些的包括保定、高阳，远些的从关外、冀东走来。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，越走越少，从这些人的行囊包裹、面色和鞋脚上，就可以判定他们道路的远近，离家日子的长短。远道逃来的人，脚磨破了，又在泥水里浸肿了，提着一根青秫秸，试探着水的深浅，一步一步挪到堤埝跟前来。他们的脸焦黑，头发上落满高粱花，已经完全没有力量，央告站在堤坡上的人拉他们一把。

有一个年轻的女人，把一个小孩子背在背上，手里还拉着一个。孩子不断跌倒在泥水里，到了堤埝边上，她向春儿伸伸手：

“大姑，来把我们这孩子接上去！”

春儿把她娘儿们扶了上来，坐在堤埝上，一群妇女围上来，春儿跑回家去，拿些饽饽来，给两个孩子吃着，那个女人说：

“谢谢大姑。我们也是有家有业的人啊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那个地方。”

春儿问：

“你们家是哪呀？”

“关外。当时指望逃到关里，谁知道日本人又赶过来，逃的还不如他们占的快，你们说，跑到哪里是一站呀？”

“孩子他爹哩？”春儿问。

“走到京东就折磨死了。”女人擦着泪。

“日本人到了什么地方？”人们问。

女人说：

“谁知道啊，昨几个我们宿在高阳，那里还是好好儿的，就像你们现在一样，可是今天早晨一起来，那里的人们也就跟着我们一块儿逃起来了。”

人们都不言语了，那个女人叫小孩子吃了吃奶，就又沿着堤埝，跟着逃难的大流走了。

天晴的很好，铺天盖地得水，绕着村子往东流。农民们在水里砍回早熟的庄稼，放在堤埝上，晒在房顶上。

天空有一种嗡嗡的声音，起先就像一只马蝇在叫。声音渐渐大了，远远的天边上出现一只鹰。接着显出一排飞机，冲着这里飞来了。农民们指划着：

“看，飞艇，三架，五架！”

他们像看见稀罕物件一样，屋里的跑到院里来，院里的上到房顶上去。小孩子们成群结队的在堤埝上跑着，拍着巴掌跳跃着。

逃难的女人回过头来说：

“乡亲们，不要看了，快躲躲吧，那是日本人的飞机，要扔炸弹哩！”

没有人听她，有些妇女，还大声喊叫她们的姐妹们，快放下针线出来看：

“快些，快些，要不就过去了！”

飞机没有过去，在她们的头顶仄着翅膀，转着圈子，她们又喊：

“飞鸡，要下蛋了，你看着急找窝哩！”

轰！轰！飞机扫射着，丢了几个炸弹，人们才乱跑乱钻起来，两个人炸死在堤埝上，一头骡子炸飞了。

飞机沿着河口扫射，那里正有一船难民过河。河

水很大，流的又急，船上一乱，摆渡整个翻到水里去。大人孩子在涌来涌去的大浪头中间，浮起来又淹没下去，一片喊救人的声音。

日本人的飞机扫射着，轰炸着，河里的水带着血色飞溅起来。

五龙堂能凫水的人全跳到水里去打捞难民。高四海老头子脱的光光的，拍打着浪头，追赶一个顺流而下的小孩子。他一个猛子扎了一里多远，冒出头来，抓住了小孩子的腿，抱到岸上来。他在搭救出来的水淋淋的难民中间走着喊：

“谁是孩子的娘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，没有主吗？”

有的人说：

“你老人家遮盖上点吧，这里净是女人们！”

高四海说：

“别放他妈的屁了，什么时候，还有这么些讲究！有理可就去和日本人讲呀！”

他找不到小孩子的娘，把孩子嘴朝下放在河滩上，又跳到水里去了，他专门打捞着女人，打捞上一个来就问：

“别哭，快吐吐水，你的小孩我给你打捞上来了！”

当女人摇头说不是她的小孩的时候，他就又跳进水里去了。

一直打捞到天黑，有很多人是叫大水淹没死亡了。人们点着一堆堆的柴火，烘烤那些打捞上来的人们。高四海穿上衣服，逢人就打听小孩的母亲。有人说：这是从关外逃来的那个黑脸的年轻的女人的孩子，她恐怕是在水里炸伤了，没有力量浮起来淹死了，还有她那个大些的孩子。高四海听了，叫过秋分来说：

“抱着这孩子到有奶的人家吃吃去，他娘死了，我们收养着吧！”

秋分说：

“这个年月，收养这个干什么呀？”

“你不抱他，我就抱他去，”高四海说，眼里汪着热泪，“这年月，这年月，还哪里的这些废话呀！”

夜晚，逃难的人们，就在熄灭的柴火堆旁边睡下了，横倒竖卧，河水汹涌的流着，冲刷着河岸，不断有土块滩裂的隆隆的声音。月光照着没边的白茫茫大水，和在水中颤抖的趴倒的庄稼。远近的村庄，担着无比的惊惶和恐怖，焦急和无依的痛苦，长久不能安眠。在高四海的小屋里，发出小孩子的撕裂喉咙的哭声。

“日本！日本！”在各个村落，从每一个小窗口里，都能听到，人们在睡梦里，用牙齿咬嚼着这两个字。

七

前些日子，子午镇也曾买回几枝枪来。田大瞎子自己带一枝八音子，把一枝盒子交给田耀武，有两枝大枪叫村里几个富农地主子弟背着，每天早晨起来，在十字街口集合出操，田耀武是指挥。这些子弟对出操跑步没有兴趣，又怕以后真的挑兵，总是等到巳牌时还到不齐，随便报报数也就散了。并且，指挥虽然是大学毕业，也受过暑期军训，对于操法口令却非常生疏。自从那天，好容易分做前后两行，他喊：

“前排不动，后排向前五步走！”

以致后排的人顶了前排的屁股，田耀武在全村老百姓面前羞了个大红脸，也就懒的再集合这些人了。

这些子弟们对枪还是有兴趣的，他们在夜晚背上枪枝去串女人门子，对相好的夸耀，说他不久就是一个官儿了。田耀武因为自己的媳妇一直没有回来，

和老蒋的一个女孩叫俗儿的交接上了，每天晚上就住在那里。

俗儿是老蒋的第三个女孩。两个姐姐全出嫁了，长的也都平常；唯独这个老三，从小就显出是全村的一个人尖儿。十五六上就风流开了，在集上庙上，吃饭不用还帐，买布不用花钱。今年才十九岁，把屋里拾掇的干干净净，糊上雪白的窗纸，铺上大红的被褥。这天前半夜田耀武又来了，把盒子放在炕沿上吓唬她说：

“小心着！你要再和别人好，这个玩意可不饶你！”

俗儿笑着说：

“你觉得我怕那个吗？我摸过的比你见过的还多哩！你瞎背着，会使吗？你能这样——”她说着一只手抓起盒子来，抬起穿着红裤衩的大腿，只一擦就顶上了子弹，对准田耀武。田耀武赶紧躲到炕头里面去说：

“别闹，别闹！看走了火打着人。”

俗儿关上保险，把枪放在桌子上，说：

“你用不着拿这个唬我们，我们不怕这个。你这样说：你再和别人好，我就不给你钱花了——那我就没有话说了。”

田耀武说：

“别废话了，你愿意和谁好就和谁好，我也快走了。”

“你到哪里去？”俗儿把灯挑亮，仄到炕上来。

“到南边做官儿去。”

“这个东西也带走吗？”俗儿问，她指指放在桌子上的枪。

“带着，道路上不平静。”田耀武说。

“你们有钱的人，哪里也能去，你也带我去吧，给你搓搓洗洗的。”俗儿笑着说。

田耀武只是笑了一下。俗儿说：

“和你说着玩儿哩，我跟你去干什么？我人穷命苦，活该受罪，日本人来了再说他来了的，在劫的难逃，天塌了还有地接着呢！可是，你这趟出去，盘川脚给，也得花不少的钱吧？”

田耀武说：

“家里有些现洋，老头子全埋起来了，我还得到城里铺子里去拿钱。”

“穷家还富路哩，何况你们是有钱的主儿，”俗儿说，“哪天走，规定了日子没有？我还得给你送送行哩！”

“不要你送行，”田耀武说，“快脱衣裳睡觉吧，什么时候走再告诉你！”

俗儿慢慢脱着衣服，又问：

“路上不平安，你有个伴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”田耀武说，“平汉路不通了，叫老常送我到濮阳，再从那里坐火车。”

“也得在五龙堂过河吧？”俗儿问。

“嗯。”田耀武答应着把灯吹灭了。

半夜里，村里住了兵，人们乱了起来，田大瞎子派芒种把田耀武从热被窝里叫走了。俗儿刚刚合上眼，就听见有人轻轻敲打着窗棂说：

“走了吗？”

“走了。”俗儿说。

“问清楚了没有？”

“问清楚了：有枪有钱，老常送他，在五龙堂过河。”

“日期哩？”

“没有定准。”俗儿说，“你每天在河口上留点意就是了。得了便宜，可别忘了我。”

“你的大功一件。”窗外的人压着嗓子笑着，“给你买件花褂。”

“你还进来睡不？”俗儿撒着娇问。

“你叫我就热锅吗，他妈的！”那个人说着，爬上房去走了。

村里住的是骑兵，起初人们以为是日本，不敢开

门，军队砸开了门子，才知道是五十三军。马跑得四蹄子流水，披着鞍子就都在街里卧倒了。村公所赶紧预备吃喝草料，军队绕家串游，乱放枪，一条狗在街上跑，一枪打死。田大瞎子把营长请到自己家里，好酒好菜应酬着，有兵闯进来，他就出来说：

“老总别闹，你们官长在这里！”

“什么妈拉巴子官长，”那些兵用枪托子顿着田大瞎子的胸脯，“你叫他出来认认我们！是官长就该领我们和日本子打仗，王八蛋狗命的就会领着我们跑，把马都快跑死了，还是官长哪！”

军队乱夺乱抢一阵，不到鸡叫就又下命令往南开，那些军队，大声骂着街，爬上马去，歪歪斜斜的跑走了。

“我看不行了，”田大瞎子把耀武叫到屋里说，“你先把你那长头发去了吧！”

“这头发要什么紧？”田耀武不大高兴。

“什么要紧？”田大瞎子大声吆喝，“你的命要紧！日本人就是讨厌念书的学生，光凭我可怕什么呀？”

母亲也劝，把老常叫来，拿把剃头刀子把田耀武的分头刮掉，箍上了一块西湖毛巾，田大瞎子说：

“我看那么鲜亮的毛巾也扎眼。早些吃点饭，到城里去一趟！”

田耀武光着头往街上一走，大大增加了子午镇

村民的恐日情绪，农民们偷偷说：

“怎么区长把羊头也去了？”

“怕日本。”

“剃光头就不要紧了？我们可全是光头。”

“我看是鸡巴一样，日本人不管你有毛没毛！”

田耀武到铺子里支了几百块钱，到县政府去转了一下，县政府的牌子也摘了，大堂的正门堵起来，一个顶事的人也不见，转了半天，才遇见一个认识的听差，说县长和科长们半夜里就雇上大车南下了，枪枝钱粮全带走了。田耀武赶紧回到家里，匆匆忙忙打整了个包裹就要走。

他母亲说：

“把咱那文书匣子，你也带出去吧！”

田大瞎子说：

“地亩搬不动，拿出那个去做什么使，还是埋起来，反正我在家里守着它！”

又把老常叫来，嘱咐了几句。老常急忙回到长工屋里拿双替换的鞋。老温和芒种全在那里心神不安的等着，老温说：

“老常哥，你就和少当家的说说，叫他把我也带出去吧！”

“你出去干什么？”老常说。

“到哪里也是实力气吃饭呗，总比在家里叫日本

人杀了好啊！”老温说。

芒种也说：

“求求他也把我带上！”

老常说：

“谁也别想。该着怎样就怎样吧，别看叫我跟着，用不着了，也就叫我回来了，要不我就多带上一双鞋？咱们就是擦屁股瓦，用的时候抓起来，用过就丢了。跟着他干什么去，他肯管你饭吃？”

等到天黑，田耀武才和老常从家里出来，父亲和母亲怕叫人看见，也没有送他。他们从村边蹚着水，抄着小道，并没有遇见一个人。到了五龙堂河口，老常先到头里去，招呼一声摆渡。

摆渡靠在对岸，上边好像没有人。老常用两只手卷成喇叭，大声喊叫，在水雾茫茫里，好半天才听见有人答应：

“听见了。”

田耀武和老常站在河边等着，河水落了些，水流还是很大，小船从上游下来，像漂着的一片树叶。船靠了岸，船上只有两三个人，黑影里跳下一个女人来，和船夫们打趣着：

“劳你们的大驾了，我也不掏船钱了！”

船夫们笑着说：

“我们候了你吧，回头再去上你的船！”

“扯蛋！没一个好东西！”女人骂着上了岸，望了田耀武一眼，说：

“这不是田区长吗？”

田耀武早就听见是俗儿，冷冷说了一句：

“我到五龙堂去有点公事。”

“有什么公事啊？”俗儿笑着，“县长全跑了，你这区长还不交代了吗？”

田耀武顾不得和她搅缠，就催着老常上船，老常上去说：

“今天净是谁们呀，怎么听口音都生呼呼的。”

小船开动了，船夫们一句话也没说，把舵的人背着身子，眼望着滚滚的河水，留恋着俗儿的模糊的影子。很快到了对岸，田耀武先跳下去，就要掏船钱。这时那个把舵的说了话：

“不要船钱了，把你带的枪留下来！”

“为什么给你们枪？”田耀武吃了一惊。

“枪是老百姓掏钱买来打日本的，你带着上哪里去？”把舵的跳下来，就拧住了田耀武的胳膊。

“你们这不是明抢明夺吗？”田耀武挣扎着。

“眼下很难说清是谁抢谁的了，县政府的八辆大车，全叫我们留下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不想走旱道，就到河里去。”说着就把田耀武悬空举起来。

“我给，我给。”田耀武把枪摘下来。

“子弹，五十粒。”掌舵的人又说。

“枪给你们了，我留着子弹干么。”田耀武递过去说。

“钱。”掌舵的人又说。

“这是我的路费。”田耀武说，“你们拿了去我怎么走路呀？”

“你用不了那么多。给你留下点，花到濮阳。”

过来几个人把他搜了，丢了摆渡走了。掌舵的人在水皮上试着新得来的枪，连发一排子弹。

“哪来的这么一班强盗？”田耀武哆哆嗦嗦的说。

“我听着像和俗儿相好的高疤。我们还走不走？”老常说。

“不走怎么办？”田耀武说：“这个地面我更不能呆了，钱也不多了，送我一程，你就回去吧。”

八

自从大军南撤，县长逃走，子午镇的老百姓只好听天由命，庄稼烂在地里不愿去收拾，村庄里成立了很多小牌局。从安国长仕庙上来了一个道士，住在老蒋家里，设黑坛，闹神闹鬼，招了一群妇女来整天整夜磕头。

传说日本已经到了定县。县城里由一个绅士，一个盐店掌柜的，一个药铺先生组成维持会，各村的村长就是分会长，预备八月十五就欢迎日本人进城。田大瞎子领回红布白布，叫老蒋派下去做太阳旗，还要在地亩里派款收回布钱！

又是从西头派起，老蒋拿着一块白布一块红布告诉春儿：

“把红布剪成圆的，贴在白布上，就像摊膏药一样。”

“我不做这个，”春儿说，“你愿意欢迎，就叫你

们俗儿去做呀！”

老蒋说：

“我们自然要做一个，还得做一面漂亮的，挂在大门上。日本人过来了，没有这个旗儿，可要杀个鸡狗不留，你合计合计吧！”

“不用合计，我不做。”春儿扭头出去了。她拿了一把小锄，又抓了一把油菜子装在口袋里，到她那块地里去。

前半月，县里曾经派人下来压着，挖了一条长长的战壕，说是军队要在这里和日本打仗。战壕的工事很大，挖下一丈多深的沟，上面棚上树木苇席，盖上几尺厚的土，隔几丈远，还有一个指挥部。

那些日子正下连阴雨，地里的庄稼也待收拾，农民们心气很高，每天在大雨里淋着，在水里泡着，出差挖沟。战壕是一条直线，遇到谁家的地，就连快熟的庄稼挖去，春儿这一亩半地，种的支谷，身手长的全很好，挖了多一半，地头上一棵修整得很好的小柳树，也刨下来盖了顶棚，别人替她心痛，芒种挖沟回来告诉她，春儿说：

“挖就挖了吧，只要打败了日本，叫我拿出什么去也行。”

现在，战壕顶上铺盖的树枝还发着绿，泥土还发着松，春儿用小锄平了平，在上面撒上了晚熟的菜

种。有一只苍鹰在她头顶盘旋着。

撒完菜种，一个人坐在战壕上想：“假如在这里狠狠打一仗，还用着害怕日本人过来？”

近处的庄稼，都齐着水皮收割了，矮小的就烂在泥水里。远处有几棵晚熟的高粱，在晚风里摇着艳红的穗子。有一个人，一步一拐的走过来。春儿渐渐看出是一个逃兵，把枪横在脖子上，手里拄了一根棍，春儿赶紧藏在树枝后面，逃兵已经看见她，奔着这里来了，春儿害怕，抓紧手里的小锄。等到看清这个逃兵又饥又渴，没有一丝力气，才胆壮起来，直着身子问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不用怕，大姑。”逃兵说着，艰难的坐下来，他的脚肿得像吹了起来，“我跟你耍些吃喝。”

“你不会到村里去要？”春儿说。

“我不敢进村，老百姓恨透了我们，恨我们不打日本，还到处抢夺，像我这样孤身一个，他们会把我活埋了！”逃兵说。

“为什么你们不打日本呀？”春儿说。

“大姑，是我们不愿意打？那真冤枉死人。你想想我们这些当兵的都是东省人，家叫日本人占了，还有不想打仗的？我们做不得主，我们正在前线顶着，后边就下命令撤了，也不管我们死活，我们才溃退下

来。”

“说得好听。”春儿撇着嘴，“背着枪不打仗，有吃喝也不给！”

“你家去给我拿一点。”逃兵把枪摘了下来，“我愿意把这枝枪给你留下，我把它卖掉也能换几十块大洋，这是国家的东西。留给你们打日本吧！”

“我们一个女孩儿家，怎么打日本？”春儿笑着说。

“总归是有人要打的，我们那里就有了抗日联军，我也要想法投奔他们去了。”

春儿看了看他那枝枪，低头想了一会儿说：

“你在这里等等，我家去给你拿些吃喝去。”

逃兵说：

“咱们都是中国人，你行好就行到底吧，家里有男人穿不着的破衣烂裳，拿给我两件，我好换了走路。”

春儿点点头，逃兵又说：

“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呀，你们这一带难缠，叫他们知道，我就别想活了。”

春儿说：

“你放心吧！”

春儿回到家里，找了芒种来，偷偷告诉他有这么件儿事，问问他可行不可行。

芒种说：

“行了，这个年头，咱们有枝枪也仗仗胆儿，你拿着东西前边去，我在远处看着，免得他疑心。”

春儿找出她爹的一身破裤褂，又包上几个饼子和一些咸菜，就去了。逃兵把枪枝给了她，换上便衣，就绕着村边走了。等到天黑，春儿才把枪拿回家来。

芒种说：

“今年冬天活不多，地面上又乱腾，田大瞎子装蒜装穷，打算不用我了。我也不想再当奴才了，咱们有了一枝枪，我背着它参加了高疤的队伍吧！”

春儿说：

“先别忙，他的行为不正，你准知道他能成事？要是俺姐夫过来了，不用说，我就叫你背着走。”

她把枪紧紧藏了。

九

高疤以前是这一带有名的大贼，以门窗不动能盗走大骡子出名。自从在城南地面截下了县政府的八辆大车，收了南逃官员们的枪枝，又接连在五龙堂河口卡了几伙逃兵，就自称团长，委了几个连长，到各村镇吊打村长富户，把埋藏了的枪枝起出来，有的主儿舍不得枪枝，叫子弟背着，参加了这个队伍，在冀中说起来，就有了很多“跟着枪出来的”兵士。每天在子午镇大街二丰馆大吃大喝，夜晚就住在俗儿家里，过了些时，人马越多声势更大，就向俗儿提出来：要正式娶她。

各村送了喜幛来，挂满了老蒋的屋子院子，一直挂到大街上来。八月十五这天过事，定了两抬官轿，两抬花轿，前后几十匹顶马，后面跟随着一个营的步兵。顶新奇的是不放花炮，一路上连放排子枪，闹的这样红火的排场，没人敢看，路过哪村，哪村关门闭

户，路上断绝了行人，子弹皮撒了满道满街。

这一天，老蒋穿戴很体面，走出转进，招呼着各村来送礼的人，饭庄上送来几桌酒席，送礼的站不住脚，放下东西就惊惊慌慌的走了，可就便宜了他，喝了个醉里糊涂。

只有村里管账的先生陪他，晚上，新女婿睡了觉，两个人又喝了一场，老蒋说：

“也不知道是我哪块地里的风水，竟出了个女婿团长。”

管账先生说：

“这叫时来运转，这还不算到头哩，团长升旅长，旅长升师长，你这老爷子是当上了。”

“人家俗儿，”老蒋像是说别人家的孩子，“算是有眼力，你说，从十五六上，说媒的没离过门儿，她就是一个全不如意。到底看上了高团长。你说高团长的福气到底在哪个地方？”

管账先生说：

“我看就在那块疤上，不分冬夏阴晴，都在发红发亮，更加上有胆气，有智谋，遇见这个时候，自然就升发起来。”

两个人正说着，田大瞎子绊绊坷坷走了进来，老蒋赶紧让座说：

“来，村长，上坐上坐。从前我净是吃喝你的，今

天算我还个席儿。”

“我不喝酒，”田大瞎子愁眉不展的说，“我是来向你托个人情。你什么时候背私间和高团长讲一声，就说我请他到舍下吃个便饭。”

“不用了，”老蒋说，“咱们又不系外，你费那个事干什么？”

“一定请他去，你们两位陪客。”田大瞎子说，“自从张专员南边去了，咱们就连个依靠也没有了，幸亏和高团长结了亲，这地面儿上的事，总得请他多照看着点。”

“那有什么，”老蒋一口应承，“自己的嫡亲女婿，还不是我说怎样他就得怎样。”

过了两天，在子午镇的十字街口，出现了一张盖着大红关防的布告，有三四个月不见官方的告示了，凡是认字的都围上来看。

出告示的是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和政治部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，武装抗日，司令员是吕正操。

有人从高阳回来，说在城门洞看见了真正的红军，胳膊上带着红五星。芒种就跑去告诉秋分说：

“他们真的过来了，高阳离咱这里不远，你自己去看看，不要再错过了。”

秋分愿意去一趟，就收拾着找伴动身。

这几天，高疤心里不大痛快，他派手下人到高阳

打听一下，听说吕正操委派了各支队的司令，正整编各地杂牌的队伍，又听说红军纪律很严，官兵一致吃小米，不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，当官的也要受训学习，团里还设政治委员。自己底子不正，怕受管束，心里很是彷徨不定。

夜晚对俗儿一讲，俗儿笑着说：

“这有什么难处，你去领个委任不就完了吗？”

“谁知道他委你一个什么呀！”高疤说，“素日和他们没有联络，不定那天他来缴了你的枪哩！”

“我和他们倒有点关系。”俗儿抿着嘴。

“你认识吕司令？”高疤笑着问。

“吕司令我倒不认识，”俗儿说，“我认识的这个人资格也不嫩，听说在红军里面是个大头儿。”

“简断截说是谁吧！”高疤喊着。

“就是五龙堂的高庆山。现在，高阳不是驻的红军吗，你到那里去说，当年曾经和高庆山一块闹过事，也是红军底子，这牌子多吃香，管保委你个司令。”

高疤一想，虽说把不定，倒也是条门路，就说：

“咱们和他家素日没有来往，空口白话，人家也许不信哩！”

“这好办。”俗儿说，“我去给你拉关系。”

说着就出溜下炕来，到了春儿家里，一听说秋分

正要找高庆山去，俗儿可就高兴极了，忙说：

“秋分姐！路上不平安，离高阳城又这么远，你走着去，多么不方便？我们那个也正要到高阳会吕司令去，你就跟他一块去吧！路上前呼后拥，有人保护着你，多么威风？再不就叫他们备上一匹走马，脚手不沾地，就送你到了高阳城。到了那里，见了俺庆山姐夫，夫妻相会，真是一出《武家坡》。这些年，你受苦受难，当男变女，可不容易！别人不知道，我可眼见来哩。见了俺庆山姐夫，二话别说，先跟他要身好衣裳换了，他做着那么大官儿，一呼百应，要什么有什么。”

一场话说的秋分懵头转向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春儿说：

“我看还是自己走着去吧，大脚五手的，又不是没出过门。”

“嘻，我那妹子，”俗儿拍打着春儿的肩膀头说，“你年纪小，知道事儿少，咱姐姐到了那里就是太太，有多少人要来请，有多少人要来瞧？步下碾了去，多么不好看，咱要没有，也说不上，要着饭千里寻夫的多着呢，可是谁叫咱有这么现成的大走马哩！骑上去，像坐花轿，一点也不颠，那天我还骑了一趟哩！”

不容分说，拿了秋分的小包袱就先走了，见了高疤就说：

“你看怎么样，比算卦还灵哩，人家正要找男人去，你就和她一块去吧！”

高疤派人备了一匹花马叫秋分骑着，还叫一个兵在旁边牵着。

“你把衣裳也换换，”俗儿又对高疤说，“看你花丽狐哨的，红军不稀罕这个！”

高疤脱了绸缎衣服，穿了一身卡来的军装，把盒子炮上的大红丝线穗子也摘了去。军队身上的红红绿绿的东西，也减退了减退。他穿上俗儿早给他打好的一双草鞋：是雪白毛线织成，前面顶着一个大红绒球儿。说是红军那里兴这个。

带着一连人，奔着高阳去了。

路过附近几个村庄，那些村长村副们又在街口上摆下茶果桌子，站立在两厢恭身施礼，欢迎高团长的队伍。高疤一见就恼了，骂：

“混蛋！谁叫你们又弄这个，以后免了！”

村长村副们闹不清怎么回事，赶紧指挥着人们把桌子抬走，又看见队伍里有个骑马的妇道，以为是高疤霸占的谁家的妻女！

十

秋分没骑过牲口，一路上铲的两腿生痛，出了浑身大汗，队伍走的又快，也不歇晌打尖，心里抱怨说：

“知道这样不自在，还不如听着春儿自己个走来哩！”

又猜想：

“他别把我拐带走了啊！”

一路上，她只是觉着道儿远，天快黑下来，才到了高阳，离着城门还有老远，就出来一队兵，枪枝服装都很整齐，臂上果然挂着小红星儿。问清了原由，叫高疤的队伍在城外扎住，只叫他一个人进城。高疤说：

“这妇女是来找丈夫的，也得让她进去。”

讲说了半天，城里的兵才答应了，前后围随着他们进了城门。街上很热闹，买卖家都点上灯了，饭铺里刀杓乱响，街上来来往往的净是队伍，有的军装，

有的便衣，有的便衣军帽，盒子枪都张着嘴儿，到处是抗日的布告、标语和唱歌的声音。

先到了司令部，把高疤带进去，把秋分带到政治部来。走进一家很深的宅子，秋分不断在石头台阶上失足绊脚，正房大厅里摆着几张方桌，墙上也满贴着标语、地图，挂着枪枝弹药。几个穿灰色军装的人正围着桌子开会，见她进去，让她坐下，一个兵笑着问：

“你是从深泽来的？”

“是。”秋分说，“我来找一个人，五龙堂的高庆山。”

“高庆山？”那个人沉吟了一下，“他参加过那年的暴动吗？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们当家的，”秋分低着头说，“那年我们一块参加了的。”

“这里有你们一个老乡，也是姓高，”那个人笑着说，“叫他来看看是不是。小鬼，去请民运部高部长过来，捎着打盆洗脸水，告诉厨房预备一个客人的饭！”

秋分洗完脸，一大盆小米干饭，一大盆白菜熬肉也端上来了，同志们给她盛上，秋分早就饿了，却吃不下，她的心里怦怦跳动，整个身子听着院里的响声。同志们又问：

“你们那一带有群众基础，现在全动员起来了

吗？高疤的队伍怎么样？”

秋分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说：

“土匪性不退！”

人们全笑了，说：

“不要紧。这叫春雨落地，草苗一块儿长，广大人民的抗日要求是很高的。明天高部长到那里去，整理整理就好了。”

院里有脚步声，屋里的人们说：高部长来了。秋分赶紧站起身来望着，进来的是个小个子，戴着近视眼镜，学生模样，进门就问：五龙堂的人在哪里？秋分愣了一下，仔细一看，才笑着说：

“这是高翔。你什么时候回来了？”

高翔走到秋分跟前，凑近她的脸认了一会，高兴的跳起来说：“秋分嫂子！我一猜就是你们。”接着又对同志们说：“来，我给你们介绍，高庆山同志的爱人，农民暴动时期的女战士。”

“怎么一猜就是我，就不许你媳妇来看你？”秋分说。

“你来她来是一样！”高翔笑着说，“你今天不要失望，见着我和见着庆山哥哥也是一样！”

“到底你知道他的准信不？”秋分问。

“一准是过来了。”高翔说，“在延安我就听说他北上了，到了晋察冀，在一张战报上还见到了他的名

字，我已经给组织部留下话，叫他和我们联络，不久就会知道他在哪里了！”

这时又进来一个女的，穿着海蓝旗袍，披着一件灰色棉军衣，望着高翔，娇声嫩语的说：

“高部长，你还不走？人都到齐了，就等你讲话哩！”

说完就笑着转身走了，秋分看准了是大班的媳妇李佩钟。

“好，我就来。”高翔说，“秋分嫂子也去看一看吧，高阳城里的妇女大会，比咱们十年前开的那些会还人多，还热闹哩！”

参加了大会回来，已经多半夜，秋分直到天明没有合上眼，很多过去的事情，过去的心境和话语，又在眼前活了起来。看来很多地方和十年以前的情形相同，也有很多地方不大一样。领导开会的、讲话的、喊口号的还是小个子高翔，他真像一只腾空飞起的鸟儿，总在招呼着别人跟着他飞。十年监狱，没有挫败了这个年轻人，他变的更老成更能干了。十年的战争的艰苦，也不会磨灭了庆山的青春和热情吧？

为什么田大瞎子的儿媳妇李佩钟也在这里？看样子高翔和她很亲近，难道他们在外边，守着这些年轻女人，就会忘记了家里吗？

第二天清早，她就同高翔和李佩钟上了一辆大

汽车，回深泽来。她们路过蠡县、博野、安国三个县城和无数的村镇，看到：从广大的农民心底发出的、激昂的抗日自卫的情绪，正在平原的城镇、村庄、田野上奔流，高翔到一处，就受到一处的热烈的欢迎。

汽车在长久失修的公路上颠簸不停，李佩钟迎着风，唱了一路的歌儿。秋分感到在分担了十年的痛苦以后，今天才分担到了斗争的光荣。她甚至没有想到：在今后的抗日战争里，她还要经历残酷的考验和忍受长期的艰难。

黄昏的时候，她们到了子午镇。秋分一下车，就有人悄悄告诉她：

“庆山回来了，现在五龙堂；你们坐汽车，他赶回来了一群羊！”

秋分没站稳脚，就奔到河口上来。船上的人和她开玩笑说：

“不回来，你整天等，整宿盼；一下子回来了，你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！”

在船上，秋分就看见在她们小屋门口，围着一群人。在快要下山的，明静又带些红色的太阳光里，有一个高高的个儿，穿一身山地里浅蓝裤褂的人，站在门前，和乡亲们说笑。她凭着夫妻间难言的感觉，立时就认出那是自己的一别十年的亲人。

她从船上跳下来，腿脚全有些发软，忽然一阵心

酸，倒想坐在河滩上嚎啕大哭一场。

人们冲着她招手、喊叫，丈夫也转过身来望着她，秋分红着脸爬上堤坡。

在平原痛苦无依、人民心慌没主的时候，他们回到家乡来了。

十一

秋分爬上堤坡，乡亲们见她来了，说笑着走散了，庆山望着她笑了笑，也转身进小屋里去。公公从河滩里背回一捆青草，撒给那几只卧在小南窗下面休息的山羊。秋分笑着问：

“出去了十几年，这是发财回来了？”

高四海摸着一只大公羊的牝角说：

“发财不发财，我还没顾着问他；反正弄了一群这个来，也就有我一冬天的活儿了。你也还没有吃饭吧？快到屋里和他一块儿做点吃的。”

秋分走进屋里来，好像十年以前下了花轿，刚刚登上这家的门限。她觉得这小屋变得和往日不同，忽然又光亮又暖和了。自己的丈夫，那个高个儿，正坐在炕沿上望着她，她忍不住热泪，赶快走到锅台那里点火去了。她家烧的是煤，埋在热灰下面的火种并没有熄灭，她的手一触风箱把，炉灶里立时就冒起青

烟，腾起火苗儿的红光来。望着旺盛的火，秋分的心安静下来。她把瓦罐里的白面全倒出，用全身的力量揉和了，细心切成面条儿，把所有的油盐酱醋当了佐料。水开了，她揭开锅盖，滚腾的水纷纷窜了出来，秋分两手捧着又细又长、好像永远扯不断的面条儿，下到锅里去。

忽然，在炕角里，有一个小娃子尖声哭叫了起来。高庆山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一个不到两生日的孩子睡醒了，抓手揪脚的哭着。

“唔！这是哪里来的？”庆山立起身来，望着秋分。

“哪里来的？”秋分笑着说，“远道来的。你不用多心吧，这是今年热天，一个从关东逃难来的女人，在河口上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，咱爹叫把这孩子收养下来。要不，你哪里有这么现成的儿子哩！”

庆山笑了，他把孩子抱了起来，好像是抱起了他的多灾多难的祖国，他的眼角潮湿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高翔赶来了，两个老同志见面，拉着手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庆山从里边衣袋里，掏出一封信，交给高翔说：

“这是我的介绍信，组织上叫我交你的，还怕路上不好走，叫我换了一身便衣，赶上一群山羊。路上什么事也没有，没想到和你碰的又这样巧。”

高翔看完了信说：

“你来的正好。在军事上，我既没有经验，新近遇到的情况又很复杂。你先不用到高阳去，就帮我在这里完成一个任务吧！”

庆山正要问什么任务，高翔的爹领着小女孩来看儿子了。秋分拉着小女孩问：

“你找谁来了？”

小女孩慢腾腾的说：

“俺爹！”

秋分指着高翔，小女孩没想到她的爹竟是一个完全面生的人，不敢走过去，高翔过来把她抱起，秋分又逗她：

“谁叫你来找爹？”

小女孩笑着说：

“俺娘！”

引的人们全笑了。庆山对高翔说：

“我好像从没见过她，长的这样高了！”

秋分说：

“你哪里见过她，你们走的时候，她娘刚刚坐了月子！”

“要不大人就老的快，”高四海笑着说，“生叫这些孩子往上顶的！”

高翔说：

“我看就是秋分嫂子不显老，还是我们离开时那

个样儿。”

秋分笑着说：

“那是你近视眼的过，我老了你也看不见。你不要拿我取笑儿吧，你们要再晚回来几年，我还会成了白毛老婆子哩，那可没的怨！”

“你这话真能叫英雄气短！”高翔拍拍怀里的孩子，放在地下，笑着说，“要不说，干革命的人不要轻易回家哩，没有好处，临走时总得带着点负担。”

“你们这还算轻易回家呀？”秋分问。

“不和你辩论，”高翔笑着说，“我马上要和庆山哥谈谈这里的情况，开展工作，你们先到外边去玩一会儿。”

高四海、高翔的父亲抱着孩子出去了，秋分噘着嘴说：

“我听听也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，”高翔说，“我们还没正式接上关系哩，分别了十年，回头我还得考察考察你的历史！”

“等着你考察！”秋分给他们点着灯，就扭身走了。

他两个在屋里谈着，秋分他们就坐在堤坡上等着，天上出着星星，高翔的小女孩指着：

“又出来一颗，爷爷，那边又出来了一颗！”

一直等到满天的星斗出全了，他们还没有谈完。

高翔的父亲对高四海说：

“你说盼儿子有什么用，盼的他们回来，倒把我们赶到漫天野地里来了。”

高四海抽着烟没有说话，大烟锅里的火星飞扬到河滩里去。儿子回来，老人高兴，心里也有些沉重。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又聚在一起商议着闹事了。那些狂热，那些斗争、流血的景象和牺牲了的伙伴的声音、面貌，一时又都在老人的眼前，在晚秋田野里浮现出来，旋转起来。老人有些激动，也感到深深的痛苦。自从儿子出走，斗争失败，这十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？当爹娘的，当妻子的是怎样熬过了这十年的白天和黑夜啊？再闹起来！那次是和地面上的土豪劣绅，这次是和日本。人家的兵强马壮，占了中国这么大的地面，国家的军队全叫人家赶的飞天落地，就凭老百姓这点土枪土炮，能够战胜敌人？他思想着，身边的草上已经汪着深夜的露水，高翔的小女孩打着呵欠躺在她爷爷的怀里睡着了。

最后还是秋分等的不耐烦，跑到屋里去说：

“高翔，快家去吧，俺们没有这么些油叫你熬，天快发亮了！你媳妇也来了，家里安好被窝等你哩！”

“这些妇女没有原则！”高翔笑着站起来，“好吧，明天再谈吧，你赶了几十里地的羊，也该休息休息了，看样子，我再不走，秋分嫂子就要用擀面杖把我

轰出去了!”

高翔一家子在黑影里走了，高四海把几只羊牵进小屋来，披上自己的破棉袍子说：

“我到街里找个宿去。”

“爹!”庆山站起来说，“我们一家子再说会儿话吧!”

老人说：

“家来了，有多少话明儿说不了，我困了，你们插门吧!”

十二

春儿听说姐夫回来了，欢喜的多半夜没睡着。一清早起来，看见芒种在井台上挑水，就叫他放下梢到她这儿来一下。她在家里，舀了一盆热水洗了洗脸，坐在窗台前，用母亲留下的一面破碎的小镜照着梳光了头。找出一件新织的花袄袄穿上了。芒种进来，她说：

“俺姐夫回来了，你和我去看看他！”

芒种笑着说：

“常说参儿不见辰儿，姐夫不见小姨儿，你该藏起来才是，倒跑去看他？”

春儿说：

“我这个姐夫和别人不一样。人家是个红军，不讲究这一套老理儿。再说，我是为了你呀！”

芒种问：

“为我什么？”

春儿笑着说：

“你就背上咱们的枪，我带你去，替你报个名儿，在他手下当个兵，有我这面子，总得对你有个看待。”

芒种咧嘴说：

“美的你！你姐夫是什么官儿，他出去了十几年，嚷的名声倒不小，到头来，一个护兵也不带，只是赶回来了一群羊，你还不觉寒伧哩！你看人家高翔，坐着大汽车，一群特务员，在子午镇大街一站，人山人海，围着里七层外八层，多么抖劲？我要当兵，也要到人家那里挂号去，难道当了半辈子小长活，又去跟他放羊？”

春儿说：

“去！你别这么眼皮子薄，嫌贫爱富的！你看过《喜荣归》没有，中了状元，还装扮成要饭的花子哩？越是有根底的人越是这样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咱两个，谁嫌贫爱富？”芒种巴嗒着嘴儿说，“那天在柳子地里，你说的什么话，忘了吗？就听你的话，把枪拿出来吧！”

春儿从炕洞里把那枝逃兵留下的枪扯出来，擦去了上面的尘土，放在炕上，芒种抓起来，春儿说：

“你先别动！”回身在破柜里拿出一件新褂子说：“我给你做了一件新衣裳，你穿穿合适不合适？”

芒种高兴的穿在身上，春儿前前后后围着看了又看说：

“好了，背上枪吧！”

芒种背上枪，面对着春儿，挺直了身子。春儿又在枪口上拴了一条小红布，锁上门，两个人走到街上来。芒种说：

“我把梢送回去，到当家的那里一下，告诉他我不干了，我当兵去了！”

春儿说：

“忙什么，先给他放着，没人挑水，他就不用吃饭！报上名回来再辞活也不晚！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在街上一走，一群小孩子跟着，跑着跳着，扯扯芒种的褂子，又拉拉他的枪，农民们说：

“芒种这是吃大锅饭去吗？”

芒种笑着说：

“打日本去！”

妇女们问：

“春儿干什么也穿的这么新鲜？”

春儿笑着说：

“我这是去送当兵的！”

“哈！你这可是头一份！”妇女们欢笑着。

到了五龙堂，高庆山和芒种在山里原是见过一面的，秋分又说了说芒种的出身历史，和她们家的关系，春儿说了说这枝枪的来历，高翔说正愁没个可靠

的人哩，就叫芒种给庆山当个通讯员，又派人去取了两套新军装来，叫他们两个穿戴好，说这样才能压住今天的场儿，就忙着一同参加整编高疤的队伍的大会去了。

整编这一带杂牌队伍的大会，在滹沱河一片广漠的沙滩上召开。事先，县里的动员会，就派人下来，把附近最好的棚匠们组织起来，拉来杉篙苇席，面对着河流，精扎细做，搭了一座威风高大的阅兵台。

这天，从早晨起来就刮大风。阵阵的白沙，打着人们的脸，台前那条宽大的横幅标语，吹得鼓胀了起来，和河里的水浪，一同拍拍作响。标语上写着：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！”

参加整编的队伍有子午镇高疤的一个团，角丘镇李锁的一个团和马店镇张大秋的一个团。三个团长穿的整整齐齐，站在台上，调动着自己的队伍。

这些队伍挤挤撞撞，怎样也调动不开，简直是越调越乱，最后争吵起来，还有几枝枪走了火。三个团长在台上跳着脚乱骂，要枪毙那走火的人，可又查不出来。快晌午了，主持大会的高翔，请高庆山帮着把队伍调动一下，高庆山和三个团长商量，把营长们叫到台前，然后叫他们把队伍各自带开，再按着名字往场子里指定的地方带，才慢慢把会场稳定下来。

五颜六色的队伍，刚刚都抱着枪坐下，在会场周

围，又来了很多小摊贩。自从各村成立起队伍，平地一声雷，增加了很多小买卖。什么馅饼锅，包子房，熏鸡柜子，豆腐脑棚子，专卖这些队伍，赚了一阵子好钱。今天听说三个团都在这里集合，又搭棚又开会，就都跟了来，抢占地势，刀杓乱响，一片叫卖声。一闻见香味，军队就又动乱起来，出去买烧饼吃。高庆山又派芒种去劝说了一阵，小买卖们才走散了。

第一个讲话的是高翔，高疤先叉着腿站在台边上介绍说：

“弟兄们，这是吕司令的代表高委员，拍手！”

台下乱鼓起掌来，高翔说：

“同志们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国土，杀害我们的人民，现在遇到我们家门上来了！日本人要灭亡我们的国家，叫我们给他当奴隶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打狗日的！”台下乱嚷。

高翔喊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台下跟着他呼喊，狂风吹送着，河流奔腾着，高翔说：

“我们要保卫祖国，保卫家乡，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。同志们，你们是抗日的英雄好汉，你们看到敌人来了，并没有逃跑，也没有投降，你们背起枪来，反抗侵略者，你们是光荣的，祖国和人民尊敬你们！我代表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政治部向你们致

敬！”

台下欢笑着，队伍变得安静起来，高翔接着说：

“我们的同志，参加抗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：有的过去为生活压迫，夜聚明散，成了黑道儿上的朋友；有的是富家子，跟着枪出来的；有的是见今年年头不好，冬天不好过，出来混大锅饭吃的。今后，战争就要考验我们，谁也不能投机取巧。我们要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，整编成有组织、有领导、有纪律的抗日部队！”

随后，高翔宣布了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，和一些官兵关系、军民关系的重要原则。接着说：

“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光荣的战争，我们一定能够胜利。我们不怕日本的武器好，只怕我们不齐心，不要看日本占领了几座城池，我们要在它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，建立抗日根据地！有枪的出枪，有钱的出钱，有人的出人，男女老少，一齐动员起来，破坏敌人的交通，扰乱敌人的后方。同志们！祖国仰仗我们，人民依靠我们，我们要勇敢的担负起解放祖国的任务，我们战争的目的是：驱逐日本帝国主义，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！”

最后，高翔宣布了司令部的命令，整编三个团为人民自卫军第七支队，委任高庆山为支队长，高翔为政治委员。

十三

田大瞎子这几天，整天躺在炕上，茶饭无心。那天听见汽车叫，他以为是日本人来了，抓起小太阳旗儿就往街上跑，唯恐欢迎的迟了。到街上一看，竟是自己的儿妇，披着军装，跟着共产党高翔回来了，他赶紧把小旗一卷，挟在胳膊底下，低头回家。从此就没有起炕，他的女人见他愁眉不展，怕闷出病来，就劝他到外边转转，到相好的人家走动走动，田大瞎子斥打她说：

“你不要管我！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？连自己的亲儿妇都跟了他们，我还有脸出门见人！”

“提那个不要脸的东西干什么？”他的女人咬着牙说，“只当她死了，耀武回来我二话不说，就叫他写休书散了她！”

“这不用你操心！”田大瞎子说，“等不到你儿子回来，她就不是你家的人了！”

风沙吹打着新糊的窗纸，河滩里开大会的声音，一阵一阵的扑到屋里来。田大瞎子说：

“他们又要造反，去！把大门插上，我懒得听这种声音！”

他的女人刚要爬下炕来去插门，小做活的芒种，穿着一身新军装，背着一枝大枪进来了，直家的立在正当屋。田大瞎子的女人又爬回去了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田大瞎子直起身来，唬着脸问。

“当家的！”芒种笑着说，“我不给你干了，我报上名当兵了！”

“唉！”田大瞎子吃了一惊，着急的说，“你这孩子，你怎么事先也不说一声儿！”

“怎么又怪我？”芒种说，“你不是早就说，今年冬里活儿少，人多用不开，叫我想别的活路儿吗！”

“我是叫你找个安分守己的事由儿，”田大瞎子挤着那一只失去光明的眼，“谁叫你跟他们胡闹去？他们净是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？会有什么好下场，说不定哪天日本人过来了，弄个风毛五散斩尽杀绝哩！你是个正经受苦的孩子，听我的话，把衣裳扒下来，把枪还了他们去！我天大困难，也养得起你。咱们东伙一场，平日我又看你这小人儿本分，我才这样劝你，要是别人，我管他死活哩！”

芒种正在高兴头上，听田大瞎子这样一说，女当家的也帮着腔儿，脸色和口气儿又是这么亲热，心里就有点拿不定主意，慢吞吞的说：

“那怎么行哩，我已经报上名了，谁也看见我背上枪了！”

田大瞎子说：

“那怕什么，你就说当家的不让你干这个！”紧接着又摆手，“不要这么说！你还是说你自己不乐意！”

“我乐意！”芒种的心定下来，“我不听你们的话，死活是我自己找的，也不用你们心痛，把我的活钱算一算吧！”

田大瞎子的脸一下子焦黄了，大声说：

“你怎么敢不听话！你不听我的话，我一个大也不给你！”

芒种也火了，说：

“收起你那大气儿来吧，不给我活钱，看你敢！”扶了扶肩上的枪，一摔风帘走了。

女当家的张了张嘴说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，这不是反了吗？”

田大瞎子冲着她喊叫：

“这你才知道啊！”

芒种从里院出来，到了牲口棚。老常刚刚耕地回来，蹲在门口擦犁杖，老温在屋里给牲口拌草，一见

芒种这身打扮，就都笑着说：

“好孩子，有出息，说干就干！”

芒种也笑着说：

“我来和你们辞个行儿。咱们就了几年伴，多亏你们照看我，教导我。”

老常说：

“教导了你什么，教导你出傻力气受苦罢了，从今以后，你算跳出去了，有了好事由儿，别忘了我们就行了。”

老温说：

“芒种，听我说两句：咱们兄弟两个，这几年黑间白日在一块，虽说没有大不对辙儿，也有个不断的小狗龇牙儿。这些小过节，我想你也不会记在心里，这不是你就要走了，没有别的，咱弟兄们得再喝两盅儿。”

老常说：

“不要叫他喝酒了。家家有规矩，铺铺有铺规，军有军规，既然干了这个，就好性干，不要跟坏人学，要跟好人学，吃苦在前，享受靠后，出心要正，做事要稳，不眼馋，不话多，不爱惜小便宜，不欺侮老百姓。芒种：你记着我这几句话吧！”

老温笑着说：

“你这都是家常老理儿，军队上不一定用得着。”

芒种说：

“用得着，我都记在心里了。”

他觉得两眼发酸，就滴了几滴眼泪。老常说：

“走吧，别耽误着了！”

芒种又拿起笤帚来，给他们扫了扫屋子，扫了扫炕，挑起水梢到井台上打回一担水，老温赶紧拦着说：

“快走，这些事儿留着能干吧！”

芒种在长工屋牲口棚里转了几转，在场院里站了一下，望了望紧闭的二门，才和老伙计们珍重告别，走出了田大瞎子的庄院。

这是一九三七年的初冬：四野肃杀。一个十八岁的农民，开始跨到自由的天地里来。留在他身后的，是长年吃不饱穿不暖的血汗生活，是到老来，没有屋子也没有地、像一只衰老的牲口一样，叫人家扔了出来的命运。从这一天起，他成了人民的战士，他要和祖国一块儿经历这一段艰苦的、光荣的时期。

芒种想念着，走到秋儿家里来。篱笆门虚掩着，他轻轻推开，又把它关好。太阳照满了院子，葫芦的枝叶干黄了，一只肥大光亮的葫芦结成了。架下面，一只雪花毛的红冠子大公鸡翻起发光放彩的翎毛，哽哽的叫着，把远处的一只麻丽肥母鸡招了来，用自己的尖嘴整理润饰着她的羽毛。

有一个红红的脸，在窗上的小玻璃后面一贴，就不见了，芒种知道春儿在家里。他推门进去，到了里间，看见她正低着头，面对着窗台做活哩。

“做什么哩？”芒种问。

“再给你做双鞋！”春儿说着转过头来，“换上二尺半了，真像个大兵了！我给做的那褂子哩？”

“这不是套在里面，还做鞋干什么，队上什么也发！”芒种说。

“发了吗？”春儿说，“我先做好你穿上，要不，穿着这么新鲜衣裳，下面露着脚趾头，多不好看！”

“怎么看着你不高兴？”芒种坐在炕沿上，靠着隔扇门。对面墙上有四张旧日买的木刻涂色的年画儿，是全本《薛仁贵征东》，他望着别窑那一节。

春儿没有说话，眼圈儿有些红了。芒种说：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舍不得你这枪吗？我还给你放下，当了兵，不愁没枪使！”

“放屁！”春儿笑了，“你这就走了，我不知道还能和你见面不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见面，我又走的不远，无非在家门子上转游。”芒种说。

春儿说：

“那可不敢定，一步一步你就离我们远了，你没见庆山，他一出去就是十年！”

“我哪里能比他!”芒种说,“我这一辈子能成了他那样,就是死了也不冤。你没见今天大会上哩,人家真有两下子!”

“你得跟他学,”春儿说,“还要比他好,别叫姐姐笑话我们!”

“我记着你的话!”芒种说。

“你出去长久了,”春儿低着头说,“别忘了我。做了官儿,也别变心!”

芒种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,急的胀红了脸,说:“你净说些没踪没影儿的话!我怎能变心哩!”

“有什么凭据?春儿抬起头来,红着脸,眼里有那样一种光芒,能使铁打的人儿也软下来。芒种说:

“什么凭据?我得给你立个字儿吗?”

“不用。”春儿笑了,“那天你在柳子地里拉拉扯扯,要干什么呀?”说完就用手掩着脸哭了。

芒种呆了,想了半天,才明白过来,他过去把春儿的头轻轻抱起来,把嘴放在她的脸上。

“好了!”春儿把他推起来,“就这样。你走吧,我反正是你的人了!”

芒种从春儿家出来,追赶队伍去。这年轻人,本来是任什么牵挂都没有的,现在觉到有一种热烈的东西,鼓荡着他的血液,对一个这样可亲爱的人,负起了一种必要报答的恩情。

这以后，在战争和革命的锻炼里，这孩子渐渐知道什么是精神的世界。尽管他长年只有脚下一双鞋和一身粗布衣裳，一枝短短的铅笔和一个小小的白纸本，他的思想的光辉却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坚强。他坚持了连续十几年的、不分昼夜的艰苦战斗。在祖国广漠的幅员上，忍受了风霜雨露、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。在历次的站斗受伤、开荒生产、学习文化里，他督促自己，表现了雇农出身、青年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。在他的眼前只有一面旗帜和一个声音，飘展和召唤。祖国的光荣独立，个人的革命功绩，和来自农村的少女的爱情，周转充实着这个青年人的心。

十四

实际上，高翔只是挂了个政委的空名，开过大会的第二天，就回高阳去了。把这个新成立的支队的全部工作，留给高庆山，还要他负起整个县的地方责任来，留下李佩钟，做个助手，主要是叫她管动员会的事。

支队部就设在县城，过去公安局的大院里。从国民党官员警察逃跑了，这个以前十分森严威武的机关，就只剩不了一个大空院。不用说屋子里没有了桌椅陈设，就是墙院门窗也有了不小缺欠；院子里扔着很多烂砖头。头一天，高庆山带着芒种到三个团部巡视了回来，坐没坐处，立没立处，到晚上，动员会的人员才慢腾腾送来两条破被子，把门窗用草堵塞了堵塞。

高庆山心里事情很多很杂乱，倒没感觉什么，芒种这孩子却有点失望。他想，听了春儿的话，不跟高

翔坐汽车上高阳，倒跟他来住冷店，真真有点倒霉，夜里睡在这个破炕上，看来并不比他那长工屋里舒服。这哪里叫改善了生活哩？铺上一条棉被，又潮又有气味，半天睡不着。

这样晚了，高庆山还没有睡觉的意思。他守着小油灯，倒坐在炕沿上，想了一阵，又掏出小本子来记了一阵。看他记完了，芒种探着身子说：

“支队长，眼下就立冬了，夜里很冷，这个地方没法住。我们还是回五龙堂家去，大被子热炕睡一宿吧！”

高庆山望着他笑了笑说：

“怎么？头一天出来，就想家了？”

“我不是想家！家里也没什么好想的。”芒种说，“我们为什么受这个罪，今儿个，你横竖都看见了，高疤他们住的什么院子，占的什么屋子？铺的什么，盖的什么？他那里高到天上不过是个团部，难道我们这支队部的铺盖倒不如他！”

“不要和他们比。”高庆山说，“革命的头一招儿，就是学习吃苦，眼下还没打仗，像我们长征的时候，哪里去找这么条平整宽敞的大炕哩！”

芒种听不进去，翻了个身，脸冲里睡去了。高庆山把余下的一条被子给他盖在身上，芒种迷糊着眼说：

“你不盖？”

“我不冷，”高庆山说，“我总有十年不盖被子睡觉了。还有你这枪，不能这么随便乱扔啊，来，抬抬脑袋，枕着它！明天有了工夫，我教你射击瞄准！”

芒种在睡梦里嘟念：

“这个硬梆梆的怎么枕呀，指望背上枪来享福，知道一样受苦，还不如在地里拿锄把镰把哩！”

随后就呼呼的睡着了。高庆山到院里转了一下，搬进两块砖头，放在头起，刚刚要吹灯休息，听见院里有人走到窗台跟前说：

“高支队长睡下了吗？”

是个女人的声音，随着在窗户的破口，露出半边俊俏脸来，高庆山看出是李佩钟，就说：

“还没有睡。有事情吗，李同志？”

“我到你这里看看，”李佩钟笑着走进屋里来，她穿着一身新军装，没戴帽子，黑滑修整的头发齐着肩头，有一枝新皮套的手枪，随随便便挂在左肩上，就像女学生放学回来的书包一样。她四下里一瞅说：

“炕上那是谁？”

“通讯员。”高庆山说，“你看，这里也没个坐的地方！”

“你这里和我那里又不一样！”李佩钟笑着说，“你这里像个大破庙，我那个动员会，简直是个戏台

下处，出来进去，乱成一团。这里的工作，为什么这样落后呀，比起高阳来，可就差远了！高翔同志撂下就走，也不替我们解决困难。走，我们到电话局去给他打个电话！告诉他，我们连个坐立的地方也没有，真真，这怎么叫人开展工作呀！”

“这样深更半夜，不要去打扰他吧！”高庆山说，“他那里的工作更忙。”

“你说对了，他真是个忙人！”李佩钟笑着说，“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大红人儿！他没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土包子们，只知道懵着头动员群众，动员武装，见不到文件也得不到指示，他一来把在延安学习的，耳闻眼见的，特别是毛主席最近的谈话和讲演，抗日战争的方针和目的，战略和战术，给大家讲了几天几夜，我们的心里才亮堂起来，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。他忙的很，到处请他讲演，到处总有一群人跟在他后边，请他解决问题。高翔同志又有精力，又有口才，资格又老，历史又光荣，又是新从革命的圣地、毛主席的身边来的，我们对他真有说不出的尊敬。他还给我们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，提到了你，高支队长！你的历史更光荣，你给我讲个长征的故事吧，你亲身经历了的，一定更动人！”

高庆山笑了笑说：

“十年的工夫，不是行军，就是作战。走的道儿

多，经历的困苦艰难也多，可是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讲起。总的说起来，一个革命干部，要能在任何危险困难的关头，不失去对革命的信心，能坚定自己，坚持工作，取得胜利，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！”

“你不对我好性讲，”李佩钟微微突了突嘴唇说，“你具体的讲一段最精彩的！要不，你就教我一个新歌儿！”

这时睡在炕上的芒种，说起梦话来，叫老温喂牲口，喊老常哥套车。李佩钟听了听说：

“我认识他，这是我们家的小做活的。”

高庆山说：

“你给我讲讲你怎样参加的抗日工作吧，子午镇，你们那个家庭……”

“那不是我的家。”李佩钟的脸红了一下，“我和田家结婚，是我父亲做的主。”

“听说你们当家的跑到南边去了，”高庆山说，“你能自己留在敌后，这决心是很好的。”

“高支队长！”李佩钟说，“不要再提他。你是我的领导人，我愿意和你说说我的出身历史。我娘家是这城里后街李家。”

“也是咱们县里有名的大户。”高庆山说。

“我也不是李家的正枝正脉。”李佩钟的脸更红了，“我父亲从前弄着一台戏，我母亲在班里唱青衣，

叫他霸占了，生了我。因为和田家是朋友，就给我定了亲。不管怎样吧，我现在总算从这两个家庭里跳出来了。”

“这是很应该的，”高庆山说，“有很多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，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工作。‘七七’以前，你就参加革命活动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李佩钟说，“从我考进师范，在课堂上作了一篇文章，国文老师给我批了一个好批儿，我就喜爱起文学来，后来看了很多文艺书，对革命有了些认识。可是我胆小，并没敢参加什么革命行动。抗日运动，对我是一个大提示，大帮助，它把像我这样脆弱的人，也卷进来了。我先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，后来，又在高阳的政治训练班毕了业。”

“抗日运动是一个革命高潮。”高庆山说，“我们要在这次战争里一同经受考验，来证明我们的志向和勇气。”

“我想，和高支队长在一块工作，我会学习到好的东西，主要是你的光荣的革命传统。”李佩钟激动的说，“我希望你像高翔同志那样，热心的教导我吧！”

“我明天和你去把动员会的工作整顿整顿，不要什么事都去找高翔，”高庆山笑了一下说，“他既然把这里的工作委托给我们，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！”

放在炕角上的小油灯细碎的爆着烛花，屋里的光亮，都是从破纸窗照进来的月色。在城墙根那里，有高亢的雄鸡叫明的声音，李佩钟说：

“你睡吧，你没有盖的东西，我到家里给你拿两条被子来吧！”

“你刚说和家庭脱离，就又要去拿他们的被子！”高庆山笑着说。

“这里是我娘家。”李佩钟也笑了，“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，动员他们两床被子，不算什么！”

高庆山说不用，李佩钟就小声唱着歌儿走了。

十五

第二天，高庆山很早起来，到大院里散了一会步，把烂砖头往旁边拾了拾，才在窗口把芒种叫醒。芒种穿好衣服就跑出来，高庆山说：

“你那枪哩！”

“可不是，又忘记它了！”芒种笑着跑到屋里去，把枪背出来说，“背不惯这个玩意儿。要是在家里，早起下地，小镰小锄什么的，再也忘不了，早掖在腰里了。”

高庆山在烂砖上揭起一块白灰，在对面影壁上画了几个圆圈圈儿，拿过枪来，给芒种做了个姿势，告诉他标尺、准星的作用，上退子弹、射击的动作，说：

“每天，早晨起来，就练习瞄准；晚上，学习文化。把心用在这两方面，不要老惦记着喂牲口打水的了！”

芒种练了一会，说：

“打水？谁知道这里的井在哪儿，早晨起来连点洗脸水也没有！”

高庆山说：

“我们到动员会去吧！”

高庆山走在前面，芒种背着枪跟在后边。今天是城里大集，街上已经有很多人。高庆山随随便便的走，在人群里挤挤插插，停停站站，让着道儿。芒种觉得他这个上级，实在不够威风，如果是高疤，前边的人，老远看见，早闪成一条胡同了。他不愿遇见子午镇赶集的乡亲，叫他们看见这有多么不带劲呀？

动员会在旧教育局。这样早，这里就开饭了。院子里摆满了方桌板凳，桌子上摆满了蓝花粗磁碗和新拆封的红竹木筷。两大柜子卷子放在院当中，腾腾冒着热气，在厨房的门口，挤进挤出的，净是端着饭碗的人。李佩钟也早起来了，梳洗的整整齐齐，站在正厅的高台阶上，紧皱着眉头。看见高庆山来了，就跑过去小声笑着说：

“你看这场面，不像是放粥？都是赶来吃动员饭的，谁也认不清净是哪村的。”

“这就好，”高庆山说，“能跑来吃这碗饭，就是有抗日的心思。现在，主要的是要领导，要分配给他们工作！”

“什么工作呀？”李佩钟说，“放下饭碗一擦嘴就走了，你看那个，不是？”

高庆山看见有几个人吃完饭，把饭碗一推，就拍拍打打，说说笑笑出门赶集去了。他说：

“这里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工作制度来。我们到屋里研究一下吧！”

李佩钟领着高庆山到大厅里去，回头对芒种笑着说：

“你也去吃个热馒头吧，家里吃三顿饭惯了，恐怕早就饿了！”

等他们进屋，芒种就到大柜子那里抓了三个热卷子，在手里托着，蹲在台阶上吃，太阳晒的很暖和。他猛一抬头，看见大门口有个人影儿一闪，很像是春儿。跑到门外一看，春儿提着一个小包袱，躲在石头狮子后面，穿着一身新衣裳，在路上刮了一头发尘土。芒种忙说：

“你来赶集了？”

“我给你送了鞋来！”春儿小声说，“捎着看看城里抗日的热闹！”

“还没吃早晨饭吧？”芒种把手里的卷子递给她一个说，快到里面吃点去！”

“俺不去，人家叫吃呀？”春儿笑着说。

“谁也能吃，这是咱们动员会的饭！”

芒种把她拉了进来，春儿说：

“等等，还有一个人哩！来吧，变吉哥！”

那边站着一个人高个穿长袍的中年人，举止很斯文。春儿对芒种说：

“你认识不？他是五龙堂的，又会吹笛儿，又会画画儿，来找俺姐夫谋事儿的！”

芒种带他们进来，在一张方桌旁边坐了，春儿看着出来进去的人，扭着身子红着脸，局促不安。芒种到厨房里说：

“大师傅，再来两碗菜汤，支队长来了两个客人！”

满头大汗的厨师傅，一看芒种全副武装，就说：

“端吧，同志，大锅里有的是！不用提队长不队长，咱们这个地势，不管是谁，进门就有一份口粮！”

芒种满满的盛了两碗菜，又抓了一堆卷子，叫他们吃着，真像招待客人一样。春儿很高兴，说：

“怎么样？还是抗日好吧，要不，你哪里整天吃白卷子去！”

芒种笑着说：

“这里饭食儿倒不错，就是晚上睡觉，炕有点凉！”

春儿说：

“你务必和俺姐夫说说，也给这个哥找个事儿！”

“那好办，”芒种满口答应，“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！”

“要不然我也不来，”叫变吉的那个人慢慢的说，“我是觉着有些专长，埋没了太可惜，在国家用人的时候，我应该贡献出来！”

他说着站起来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卷儿，在方桌上打开。那是四张水墨画儿，他小心的按住四角，给芒种看，请芒种指导。芒种翻着看了一遍，说：

“这画儿很好，画的很细致，再有点颜色就更好了。可是，这个玩意也能抗日吗？”

“怎么不能抗日？”叫变吉的红了脸，“这是宣传工作！”

芒种赶紧说：

“我不懂这个，那不是支队长来了，叫他看看！”

高庆山从大厅里走出来，李佩钟拿着一个红皮纸本子，笑着跟在后面。春儿小声问芒种：

“那不是田大瞎子的儿媳妇吗，她不是跟着高翔？怎么又和我姐夫到了一块儿？”

芒种还没顾的答话，那个叫变吉的拿起画儿迎上去了，他说：

“你还认得我不，庆山？”

高庆山很快的打量一眼，就笑着说：

“为什么不认识，你是变吉哥！”

“我打算你早把我忘记了，”变吉很高兴的说，“你的眼力真好！”

“是来闲赶集，还是有事？”高庆山拉他坐下。

“没事谁跑十八里地赶集，我是来找你。”变吉说着又把画儿打开，“我有这么点手艺儿，看你这里用得着不？”

高庆山仔细的把四幅画儿看过说：

“你的画比从前更进步了，抗日工作需要美术人材。你以后不要再画这些虫儿鸟儿，要画些抗日的故事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变吉说，“我是先叫你看看，我能画这个，也就能画别的，比如漫画，我正在研究漫画。”

他说着从怀里又掏出一个小画卷，上面画着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大胖子，撅着屁股，另有一个瘦小的老头儿，仰着脖子，蹲在下面。

芒种一见就拍着手跳了起来，说：“这张好，这张像，这画的是田大瞎子和老蒋。这不是今年热天子午镇街上的黑贴儿？敢情是你画的！”

李佩钟看了一眼，就拉着春儿到一边说组织妇女救国会的事儿去了。

“这几年，你怎样过日子呀？”高庆山仔细的给他卷着画儿问。

“从你走了，我就又当起画匠来。”变吉说，“这些年修庙的少了，我就给人家画个影壁，画个门窗明星，年节画个灯笼吊挂，整年像个要饭的花子似的。那天听说你回来了，我就到堤上去，谁知你又走了。我想你做了大官儿，早该把我们这些穷棒棒们忘到脖子后头去了哩！”

“你说的哪里话，”高庆山笑着说，“我怎么能把一块斗争过、一块共过生死患难的同志们忘记了哩？”

“没忘记呀？”变吉站起来大声说，“你等等，外边还有人！”

“还有什么人呀？”高庆山问。

变吉说：

“咱那一片的，十年前的老人儿们，都来了。叫我打个前探，他们都在西关高家店里等信哩，我去叫他们！”

高庆山笑着说：

“他们远道走来，我和你去看他们吧！”

两个人说着走到街上，芒种跟在后面，春儿也追上来了。正是晌午的热闹集，他们挤了半天，才出了西门，到了高家店，在正客房大草帘子门前的太阳地里，站着一大群穿黑蓝粗布短裤袄的老乡亲们。

这里边，有些年纪大些，是高庆山认识的，有些

年岁小的，他一时记不起名字来。十年前在一家长工屋里，暴动的农民集合的情形，在他眼前连续闪动。他上去，和他们拉着手，问着好儿。

那些人围着他说：

“我们以为你的衙门口儿大，不好进去，看起来还是老样子，倒跑来看我们！”

又说：

“当了支队长，怎么还是这么寒苦，连个大氅也不穿？就这么一个跟着的人？你下命令吧，我们来给你当护兵卫队，走到哪里，保险没闪失！”

高庆山说：

“还是和咱们那时候一样，不为的势派，是为的打日本。我盼望乡亲们还和从前一样勇敢，赶快组织起来！”

“是得组织起来！”人们大声嚷嚷，“可是，得你来领导，别人领导，不随心，我们不干！”

“就是我领导呀！”高庆山笑着说。

“那行！”人们说，“我们就是信服你！”

高庆山说：

“眼下就要组织工农妇青抗日救国的团体，你们回到村子里，先把农会组织起来！”

“我们早就串通好了，三十亩地以下的都参加。”人们说。

“不要限定三十亩，”高庆山说，“组织面还要大一些，能抗日的都争取进来，现在是统一战线。”

“我们都推四海大伯当主任，”人们说，“可是他老人家不愿意。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步田地，他倒不积极了，咱村的人们都盼你回去一趟，演讲演讲，叫我们明白明白，也动员动员你父亲！”

高庆山答应有时间回去一下，人们就走了，高庆山和芒种把他们送了老远。

十六

五龙堂的人们正筹备农会，子午镇却先把妇女救国会成立起来了。县里来的委员李佩钟，把全村的妇女召集在十字街口，给人们讲了讲妇救会的任务，说目前的工作就是赶做军鞋军袜。讲完了话，她把春儿找到跟前，叫她也说几句，春儿红着脸死也不肯说。高疤新娶的媳妇俗儿，正一挤一挤的站在人群头里，看见春儿害羞，就走上去说：

“她大闺女脸皮薄，我说几句！”

她学着李佩钟的话口说了几句，下面的妇女们都拍着巴掌说：

“还是人家这个！脸皮又厚，嘴也上的来，这年头就是这号人办事，举她！”

接着就把俗儿选成子午镇的妇救会主任，春儿是一个委员。

俗儿开展工作很快，开过了会，下午她就叫着春

儿分派各户做鞋，又把村里管账先生叫来，抱着算盘跟着她们。

俗儿走在头里，她说：

“先从哪家派起哩？”

管账先生说：

“按以前的旧例，派粮派款，都是先从西头小户起头，就是春儿家。”

春儿说：

“去年的皇历，今年不能使了。从脚下起，就得变个样儿！”

“我也是那么说，”管账先生笑着说，“从前旧势派，净是咱们小门小户的吃亏受累，眼下世道变了，你们说先从哪家派起吧！”

“我说先从田大瞎子家，”春儿说，“他家是全村首户，按合理负担，也该领个头儿。你们敢去不敢去？”

“怎么是个不敢呀？”俗儿说，“他是老虎托生啊，还是家里养着慎人猫？走！”说着，冲冲的向前走去。

俗儿领着头，春儿在中间，管账先生磨蹭在后面，转了一个弯，快到田大瞎子家梢门口的时候，他在墙角那里站住了。俗儿回过头来说：

“走啊，你怎么了？”

管账先生嘴里像含着一个热鸡蛋，慢吞吞的说：

“你们先进去，我抽着锅烟。你看，火镰石头不好使唤！光冒火，落不到绒子上！”

俗儿鼓了鼓嘴进去了。迈过了高大的梢门限，春儿觉得心里有点发怯。从前，她很少来到这个人家，就是有时到他家场院，摘东借西，使个碾啦磨的，没有点人情脸面，也不敢轻易张嘴。逢年过节，她这穷人家的女儿，不过是远远看看这大户人家门前挑起的红灯，和出来进去穿绸挂缎的人们的后影儿罢了。她紧跟在俗儿的后边问：

“他家的狗拴着没有？”

“管他拴着不拴着，它咬着我了，叫他养我一冬天！”俗儿说着走上二门，一看见里院影壁下面卧着的大黑狗，就两手一拉，光当把二门倒关了起来，用全身的力量揪住两个铜门环儿！春儿吓的后退一步。

“开门！”俗儿颤抖着声音喊。

院里的大黑狗跳着咬叫起来，铁链子簧簧响着，一只大雄鹅也嘎啦嘎啦在深宅大院里叫起来。半天的工夫，才听见田大瞎子的老婆慢腾腾走出来，站在过道里阴阳怪气的说：

“谁呀？这是。”

“我们！”俗儿说。

“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“你先把你家那狗看住！”俗儿喊叫，“进去了再

说。”

“进来吧，它不咬人！”

俗儿松了手把门推开，田大瞎子的老婆，迎门站着。她又矮又胖，浑身的肉，像发好的白面团儿，两只小手向外翻着，就像胖胖的鸭掌。她原身不动看了春儿一眼，说：

“你们有什么事儿呀？”

俗儿说：

“到你们屋里说去，这么冷天叫我们站在这里呀？”

“俺们当家的不大舒服，刚盖上被子见汗，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就在这里说吧！”

春儿说：

“也没有什么别的事，就是派你们做几双鞋！”

“给什么人做鞋呀，这么高贵？劳动着你们分派？”田大瞎子的老婆说，“我们家可没人做活！”

“给抗日战士做的，没人做活你就雇人做去！”俗儿说。

“什么叫抗日战士呀？”田大瞎子的老婆笑着说，“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可没听说过这个新词儿。抗日战士是你们的什么人儿呀，他们穿鞋，叫你们这大姑娘小媳妇的来出头找人！”

“你别说这些没盐没酱的淡话，我们这是公事！”

俗儿和她吵起来。

“俺们这个人家，可不和你们这些人斗嘴斗舌！”田大瞎子的老婆后退一步说，“该俺们做几双呀？”

“按合理负担，”春儿说着，回头问管账先生，“他家有多少地？”

管账先生正背着脸在梢门洞里抽烟，听见问他，才跑上来，先冲着田大瞎子的老婆笑了笑说：

“老内当家的！大先生的病好些了吗？啊！他家三顷二十亩地，”他拨着怀里的算盘，“一共是该交七双！唉，这么摊派，数目叫大一点儿！”

“七双！”田大瞎子的老婆的两只眼暴了出来，“你们安的什么心，我们家开着鞋帽铺哩吗？你们打听打听，几辈子的工夫了，我们这个门户，什么时候成了大头？”

“谁叫你家种那么多地呀？我倒想多做几双，有吗？”春儿说，“这是抗日，谁也不能有话说！”

“抗日？”田大瞎子的老婆一下子掌握了这个名词的讲法，“这么说，我们家还有抗日的哩，俺的儿媳妇还是县里的委员哩！不叫她来，就有了你们？她穿的鞋脚，我不跟你们要就是了，你们倒来派我一大堆！”

“你别说那个！”俗儿说，“有抗日的就不做？我的男人还是个团长哩，我就不做了？”

“别提你吧！”田大瞎子的老婆拍着手说，“我听了倒牙！”

“你放屁！”俗儿跳着一只脚骂开了。

“你放屁！千人骑万人压，勾引坏了我的儿子，花了俺家不知道多少丢脸卖屎钱的臭娘儿们！你给我滚出去，你站脏了我的院子！”田大瞎子的老婆也嗬嗬的走动着骂起来。

“我顶死你个老杂种！”俗儿后退一步，把头一低，就拱过去。田大瞎子的老婆赶紧把两只小脚一叉，没有站稳，就来了个后仰，在高门限上一翻，滚到门道里去了。俗儿赶到里面又顶上，她的脑袋撞在这个肥胖的妇女的肚子上，像顶着一包棉花。

田大瞎子不能再装病，披着一件袍子从正房跑出来，大声吆喝：

“反了！找上门来打人，好！到县里去告她们，我田家还有个媳妇哩！”

随手就撒开了大黑狗，俗儿跳起来，乱着头发跑出来，春儿也跟着跑出来，大黑狗一直追到街上，差一点没叼住她的裤子。

“走！”俗儿在街上扬着两只手喊叫，“田大瞎子，我们手拉手儿到县里！我不告你别的，我就告你个破坏合理负担！”

看热闹的人们，站满了街，都说：

“这倒有个看头，看看谁告下谁来吧，一头是针尖儿，一头是麦芒儿！”

十七

结果，闹了半天，谁也没有去告谁。俗儿的爹老蒋听见街上吵吵，放下酒壶跑出来，骂了俗儿几句，俗儿不听他，和他一对一句的骂。老蒋没法，就跑过去劝田大瞎子：

“村长，别和她小人儿们一样，看在我们的交情上！”

“我还是什么村长呀！”田大瞎子跺着脚说，“我鸡狗不如！”

“到什么时候，你老人家也是一村之长，”老蒋推着田大瞎子往回走，“别人不尊服你，我尊服你！”

田大瞎子叹了一口气，也就顺坡下驴，歪歪斜斜的家去了。他心里明白：到县里去，吉凶未卜。虽说自家的儿媳妇是个委员，可也不见得就和他一个鼻孔出气儿。现在全县的大拿是高庆山，那明明是他十年以前的活对头。更要紧的是，俗儿的男人是高疤，

眼下是个团长，这家伙，心毒手黑，不能得罪他。想来想去，不免又想到张阴梧亲家在时，自己在地面上的威风；儿子走了这些日子，也不知道在南边弄上了个事由儿没有。莫非真的就从此大势已去，江山难保吗？他低下头去。

老蒋把他扶到家里，坐在炕上，劝说：

“村长，不要这样。我回到家里，得好好把那小妮子教训教训。她人大心大，眼里连我也没有了。等我们姑爷回来，我叫他管管她吧！”

田大瞎子一猛抬起头来说：

“真的哩！那天我求你请高团长，有空到舍下坐坐，你对他说了没有啊？”

“说了，早就说过了！”老蒋说，“他也答应了，就赶上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个高庆山，当了什么支队长，半路里添了个婆婆，调到城关，他什么也不能自由了！”

田大瞎子眨巴着眼说：

“说也怪，高团长平日那样心高志大，怎么就服他们的辖管？队伍是谁带起来，还不是他一人的功劳？高庆山是什么人？原不过是五龙堂堤坡上的一个野小子，那年闯祸逃跑，不知道在哪里要了几年饭回来，冒充红军，既不烧柴，又不下米，人家做熟了饭，端碗就盛，也不嫌个寒伧？要是我啊，说下黄天表来，

也不叫他们收编，动硬的，自己有枪有人，拉到哪里，也有官儿做，反受这帮穷小子们宰制？我说老蒋！咱们多年不错，你的亲戚，就是我的亲戚，你好了，我也能沾光。等高团长回来，你该把这理儿和他念叨念叨。也不要说是我说的，免的传出去外人生疑！”

老蒋深感知己，又劝说了老内当家一番，告辞走出。田大瞎子送出来又说：

“家去，也不要和俗儿闹，我不和她一样见识，她不过是受了那些人们的愚弄！西头吴大印家那个小闺女叫春儿的，我早就看着不是正经货，十七到八了，老是和我们小做活的芒种勾勾搭搭，结果叫她给挑着当了兵！”

俗儿的状也没有告成功。她走到村边，正迎上高疤骑着一匹大红马，从城里回来，后面有七八匹马围随着他跑着，就像顺风飞来的一窝蜂。高疤气色不好，看见俗儿也没说话，只把手里的马鞭子一摆，就在她身边窜了过去。一个特务员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两手一卡俗儿的腰，抡起来放在马鞍上，手拉着缰绳，跟着高疤的马屁股，跑回村里去了。

一见高疤回来了，子午镇街上的人们，吃了一惊：俗儿会拘魂念咒，怎么来的这样凑急？这一下子该着田大瞎子受受了。

高疤在俗儿家院里下马，俗儿把他侍候到炕上。

特务员们把马交给老乡去遛去饮，都到街上二丰馆去喝酒，街上的妇女儿童，也都躲回家去了。

高疤靠在大红被垒上，用马鞭子敲打着裤脚上的尘土，气昂昂的一句话也不说。俗儿小心问：

“你怎么了呀？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”

高疤把眼眉一拧说：

“怎么啦？不许我回来？”

俗儿轻轻推他一下说：

“你看，谁敢不叫你回来啊？”

听见姑爷回来，老蒋忙着屋里来，看势头不对，也只好坐在对面小凳上搭讪着抽烟，过了一会，高疤问他：

“长仕庙来的那个道士走了没有？”

老蒋说：

“还没走，在咱那小西屋里给一个女人治病哩！”

“什么病？”高疤随便的问。

“肚里的病，”老蒋说，“正在那里揉哩。干么你找他？”

“叫他来！”高疤说，“叫他给我摇一个卦！”

老蒋去把道士领进屋里来，道士有五十多岁，大个头，胖胖的脸上，像涂着一层红油彩，见了高疤先弯身问好。高疤说：

“听说你很灵验，你给我摇一卦，看我今年的运

气到底怎么样？”

道士说：

“我这卦不摇，你写两个字儿吧！”

“你不知道我不识字是怎么的！”高疤大声说。

“啊！那你随便说两个字儿就行了。”道士赶紧笑着说。

“受训！”高疤像吐出什么咬不动的东西一样狠狠的说。

“啊，受训！”道士闭上眼睛，“就是受训教的那个训呀？”

“什么他妈的受训教？”高疤恼了，“我教训别人行了，别人谁敢教训我？”

“这两个字儿很好，高团长！”道士睁开眼睛笑着说，“主你官运亨通！不到年底，有升师长的命儿哩！”

老蒋也在一旁陪着笑儿，高疤把头一扭说：

“亨通鸡巴！去你的吧！”

道士刚要退出，高疤转过脸来问：

“你看这地面上要落个什么结果？”

道士想了一想说：

“大乱之年，平安不了。”

“你看这些队伍能存站的住吗？”高疤又问。

“有你老人家在里边，怎么能存站不住哩？”道士

说。

“我不是他们里边的人！”高疤说，“你看日本人能站得住不？”

道士看着高疤的气色说：

“日本人灭亡中国，是活该有这么一劫！这一带的人，免不了血光之灾。吕正操、高庆山这些人，成不了气候，只能给老百姓招灾惹祸！有见识的人，得早些找自己的明路儿走！”

高疤低头不语。老蒋乘机把田大瞎子那段话也说了。俗儿抢过来说：

“我不爱听！什么王八狗彘的话，一到你耳朵里，就成了圣旨。田大瞎子的话也听得？他是什么人，他早足着劲儿当汉奸哩。去你们的吧，天不早了，我们要睡觉了！”

高疤又叫住道士问：

“你这样大年纪，怎么养的这么好，老是红光满面的，有什么秘方儿吗？”

道士说：

“没什么秘方儿，不过是从小童子身儿修行的罢了！”

“你别打算我不知道，”俗儿笑着说，“整天价揉搓娘儿们的肚子，你还修行哩！”

道士红着脸走出，老蒋唉唉了两声，也跟出去

了。

俗儿点灯铺炕，侍候高疤睡觉。她上身穿着一件小红袄，下身穿着宽腿黑棉裤。爬在炕上，给高疤扒下袜子来，笑着说：

“骑了一天牲口，怪累了吧，这么不高兴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”

高疤说：

“司令部的命令，叫我去受训学习，你说叫人生气不生气？”

“什么叫受训学习？”俗儿问。

“说的好听：军事政治一大套。我看，不过是过河拆桥要把我踢磨出去！”

“就你一个人，还是别人也去？”

“人多了。成立一个军事队，一个政治队，还说是带职学习，学习得好，还可以高升。”

“那也不错，去学学怕什么？”

“你摸清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？我怕到那里把枪一下，毙了哩，前不久，高阳那里就毙了一个土匪头儿！”

“我想不会那样，”俗儿笑着说，“那天，高翔讲的很好。”

“不要光听他讲，”高疤说，“咱们底子不正，近来到高庆山那里反映我的，想也少不了。就往好里说

吧，叫你学习，把你送到山沟里，吃砂子米睡凉炕，跑步爬山，站岗勤务，我白干了这些日子团长，又去受那个？”

“不受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，”俗儿又说，“你从小不也是受苦出身？你看人家高庆山，说起来受的那苦更多哩！”

“高庆山这个人，我摸不透！”高疤说，“按说，对待咱们也不错，就是脾气儿古怪。这些日子净叫我们开会，我、李锁、张大秋，谁后面也是跟着十几个人，他就只有一个小做活的，背着一枝破枪。那天我们三个团长议合了一下，说支队长走动起来，不够体面，和我们在一块，我们人多他人少，也不合人情。我们决定：一人送他两匹马，两个特务员，两把盒子。谁知给他送去了，他不收，还劝我们把勤杂人员减少减少，按编制先把政治工作人员配备起来。你看，这些共产党，有福也不知道享，生成受罪的命，和他们在一块干，有什么指望？”

“你打算怎么样呢？”俗儿皱着眉问。

“今儿个接到命令，叫文书给我念了一下，没听完，我就拉起马家来了！我不去学习，他们逼急了我，我不定把队伍拉到哪里去哩！”高疤说。

“我劝你不要那样。”俗儿拍着高疤的腿说，“别人能学习，你就不能去？再说学点能耐，认识个字儿

也好啊!”

“认识字儿有鸡巴用?”高疤说,“我要有念书的命,从小就不干那个了!有胆打日本就算了,还要学什么习!”

俗儿说:

“你不去学习也好,要和人家好好商量。不要胡思乱想,人家跟你出来,都为的打日本,落个好名贴儿,你能把队伍拉到哪里去啊,跟着蒋介石往南边逃,还是投日本当汉奸?这两条道儿我看都走不得。”

“那就脱衣裳睡觉!”高疤喊,“天大的事儿,明天再说!”

十八

高翔用电话通知高庆山，叫他好好掌握部队，进行战事动员和教育。

高庆山召集团长和干部们开会，竟没有高疤，李锁说他昨天没请假就回子午镇去了，怕是不愿意学习。高庆山考虑了一下，开完会，带着芒种，骑着自行车到子午镇一带乡下来。

一路的白沙土道，很是好走。小道两旁的菜园子，白菜砍光了，残留着一些烂菜叶。水井闲着，瓜蔓叫霜打干，几个鲜红肥大的倭瓜，披着白霜，躺在田埂上的阳光里。

很快望见了五龙堂的南街口。在村头高高的堤头上，东边坐着一个妇女纺线，西边站着一个妇女纳鞋底儿，人民自卫，这是平原上新建立起来的岗哨。

这两个妇女在太阳地里，做着活儿站岗，都在年轻。纳鞋底儿的望见远远来了两个骑车的军人，就

说：

“喂，来了两个兵！”

纺线的妇女低着头说：

“过来了就查他们，嚷什么？”

“怎么个查法？”纳鞋底的女人说，“当兵的，人家叫查呀，查恼了哩？”

“查恼了他也不敢怎样，”纺线的妇女笑着说，“这是上级布置下来的公事。”

“他要恼了我就说，”纳鞋底儿的笑着说，“我就一指你说：这是支队长的媳妇，你敢恼！”

“你不要提我吧，”纺线的说，“你提高翔，他的名声更大！”

两个人逗着笑儿，两辆车子过来了，纳鞋底儿的看出是高庆山，就笑着说：

“你看，说张飞张飞就到，快家去烧火做饭吧！”

纺线的正是秋分，停下纺车一看是高庆山和芒种，就又低下头去纺，正经的说：

“你说的哪里话：他来了我就能放弃岗位吗？”

“真坚决！”高翔的媳妇说。

看见是她们，高庆山跳下车子来，说：

“你们两个做伴站岗呀？”

高翔的媳妇说：

“嗯。拿出来！”

“拿出什么来？”高庆山问。

“拿出通行证来！”高翔的媳妇绷着脸儿说，“怎么你这上级，倒不服从命令！”

“啊！”高庆山赶紧问身后的芒种，“带着通行证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芒种笑着说。

“以后出门结记着开，”高庆山说，“这次是我疏忽忘记了。”

“下次再没有，就不让你进村！你们布置的，你们倒不遵守！找个熟人儿给你做证明吧！”高翔的媳妇说笑着，指一指秋分。

高庆山笑着推车走进街里，芒种回过头来说：

“你们就是这一套！”

“我们是哪一套？你说！”高翔的媳妇问。

芒种笑着说：

“你们站岗，不查别人，专查我们。看见穿军装的呀，挂背包的呀，你们就查问得紧了；要是老百姓打扮，你们连头也不抬，还怕耽误做活哩！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高翔的媳妇又问。

“你们怕漏了岗，挨罚！”芒种说，“还有丢人的哩，人家不管拿出张什么纸儿，只要有块红记儿就哄了你们，你们还事儿也似的，翻来覆去的拿着看哩，其实和我一样，大字不识！”

“去你的吧，老婆儿们才那样哩！”秋分笑着说，又看高庆山，“用我家去给你们烧水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高庆山回头说，“好心站岗吧，你们不识字，赶紧成立识字班！”

五龙堂村儿不大，高庆山一进南口，连站在北口的人都看见了。正是吃早晨饭的时候，全村的男女老少，都跑到街上来：一手端着一大碗山芋白菜粥，一手攥着一块红高粱糝饼子，这就是农民冬天的好饭食。高庆山向那些年纪大的说：

“大伯，大娘，结实呀？”

“结实。受苦的命儿，有个死呀？”老头老婆儿们笑着说，“你们看，庆山这孩子多礼性，他要不叫我，我可不敢认他！怎么这孩子老不大胖呀？太操心呀！”

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就只冲着高庆山笑，高庆山一个个的问他们：参加自卫队了吗？会打枪了吗？小媳妇们站在婆婆的背后面，提着脚跟瞧。高庆山抱起一个小孩子放在车上推着，走一截就换一个，年轻的母亲们都高兴的说：

“快下来！叫你叔叔歇歇！”

老年人们又叹息着说：

“唉！真是共产党能教导人呀，你们看这些行事和言谈。庆山小的时候，多淘气，净好坐在树老刮把里往下拉屎！怎么样啊，庆山，日本鬼子过来了吗？”

高庆山说：

“不要紧。过来就打他，不能叫他站住！”

“可得打呀！”老婆儿们说，“你大伯大娘的老命都交靠的你了啊，孩子！”

“大家组织起来一块打！”高庆山说。他一路走着，宣传着，动员着，使得五龙堂全村的人，心里又亮堂，又快乐。

他出了北口，上了堤坡，看见了他家的小屋。小屋在冬天早晨的太阳光里，抹着橘子的黄色。高四海正要赶羊到河滩里去，看见儿子来了，就站在门口，打火抽着一锅烟。

把车子靠在小屋前面，芒种跑过去，摸着羊说：“肥多了，你净喂它们什么呀，大伯？”

“喂什么，放它们吃草罢咧，”老人说，“这一带，哪里有好草，我都摸得清，冬天又没事儿，一出去就是一天！”

“村里的农会组织起来没有？”高庆山问。

“正在写名儿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们推我当什么主任，我说叫别人干吧！”

“大家既是推你，你就担任嘛！”高庆山笑着说。

“那不叫人家说我是凭着儿子的威风？”老人说，“我看你们也不一定能成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高庆山问。

“你们的家伙不行！”老人说，“只就眼前的东西来说，日本人有飞机大炮，你们就只有一些坏枪和土造。”

“只要打起来，我们就什么也会有了，”高庆山说，“红军的历史就是这样，起先什么也没有，越打人越多，武器也越好，地面也越大。打仗，就是革命发家的本钱。不要只看见日本人的飞机大炮，除去这个，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他们是在侵略中国。历史上，没有一个侵略者能在别人的国家土地上，长久站住脚的。他们都是凶猛的攻进来，凄惨的败回去，侵略行为，是一种天大的罪恶。日本，现在正做着甜梦，等我们打的他醒过来，他会来不及后悔他眼前命运的悲惨！我们的部队，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，打走进门的强盗，我们的战士们都是勇敢的，会夺取敌人的武器，武装自己。”

“不提武器，你们的人也不行。”老人说，“十年前那回，你记的，人马多么整齐！现在哩，不用说队伍里乱七八糟，就按地方上说吧，子午镇的妇救会主任是高疤的媳妇俗儿！春儿和她搭伙计，还当她们的下手，我已经告诉秋分，叫她说给春儿一声，不和这些烂货在一块工作，她干，我们就不干，日子长了，还洗不出好歹人来了哩！”

“不能那么宗派，”高庆山说，“革命会把一些人

变好的，没有天生的坏人。”

芒种笑着说：

“大伯不愿意干就叫他老人家歇歇吧，老老搭搭的了，管起事儿来，也不见得行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，芒种？”老人一拧脖子红着脸说，“你说我老了？我看我一点儿也不老！你这小人家，敢和我这老人家比试比试？是文是武，动手劲还是动心劲？做庄稼活，我不让你一锄一镰，论打枪，你才几天，毛胎孩子，我闭着眼也比你瞄的准！”

“那为什么一提日本人，你就那么胆小，连个农会主任也不敢承当哩？”芒种背着脸偷偷笑着说。

“我怕日本人？”老人说，“等他们过来叫你看看吧！我不敢当农会主任？这不是说，五龙堂的农会要不是我领导，那才怪哩！”

秋分回来了，怀里抱着纺车，上堤坡就问：

“到家也不进屋，吵什么哩？”

“说笑着玩儿哩，”高庆山说，“怎么，下岗了？”

“到了钟点儿了！”秋分笑着说。

“什么钟点儿？”高庆山问。

“东房凉儿，”秋分说着推开门，“一家站二尺！快屋里去吧。”

“我还要到子午镇去！”高庆山推起车子来，芒种在堤坡上翘起一条腿，先飞下去了。秋分送了几步，

小声问：

“晚上你家来睡觉吗？”

“不回来了，”高庆山说，“情况紧一点，工作很忙。”

十九

高庆山和芒种奔子午镇来，子午镇的街上，除了集日，就冷冷清清。高疤的几个特务员正在二丰馆门前吵嚷，一见高庆山过来，“喂！支队长！”吹一声口哨都溜到里边去了。等高庆山走过去，又一个个跑出来，小声叫住芒种：

“伙计，一会儿上这里来呀！有酒有菜。”

芒种笑了笑，就领着高庆山奔俗儿家去了。俗儿家在西头路北一条小胡同里，白板门儿大开着。芒种先进去，望着窗户喊：

“高团长在这里吗？”

她家的窗户顶漂亮，新糊的雪白粉连纸，中间用狗牙的红纸，镶着明亮的玻璃。俗儿在玻璃里一张，就出溜下炕跑了出来，她的小红袄儿松开脖项里的钮扣，绣花鞋没提上后跟儿，盯了高庆山有抽半锅烟的工夫，就张开红嘴唇儿笑了：

“支队长呀！你可轻易不来。快到屋里，车子就靠在那里吧，没人敢动！”

高庆山站在那里说：

“高团长哩？”

“不在家。”俗儿说，“你们先屋里坐坐，有现成的热水，擦擦脸，喝碗茶。你看身上这土！”她说说着跑回屋里拿出一把红绸结成的掸子来，拍打着芒种的身前身后。小声笑着问：“这还是春儿给你做的那双鞋？好模样儿，好活计儿，你回头不去看看她？”说的芒种红了脸。

推脱不过，高庆山只好跟她到屋里去。这房间，和外面土墙草顶的宅院，十分不相称。它明亮，温暖，充满女人头油香粉的气味。这个环境，对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高庆山，非常生疏，他坐不下去，像叫毒气熏着。

俗儿热心的，忙茶又忙水，还要烙饼炒鸡蛋。高庆山说：

“都不用，你把高团长请来吧，有些事情和他谈谈，我们就回去了。”

俗儿说：

“他要是上别人家去，我早就给你去叫了，子午镇这条街，还有我去不到的地方？可巧我刚和这家人吵了一架。”

“是谁家？”芒种问。

“对了，”俗儿说，“你去吧，他就在你们当家的田大瞎子那里！”

“他到那里去干什么？”芒种问。

“谁知道？”俗儿拍拍手说，“田大瞎子那个白眼狼，左一趟右一趟，请高疤到他家坐坐，我不让去。今天他家来一个什么客，又叫俺那糊涂爹来说，死乞白赖的拉他去了。”

“什么客，从什么地方来的？”高庆山一直留神听着，仰着脸问。

“气得我也没顾着问。”俗儿说，“芒种，你快去叫他吧！”

芒种望望高庆山。高庆山想了一想说：

“不要去叫。我们先到别处转转，等一会再回来吧！”

俗儿说：

“晌午的时候，你们务必回来！”

从小胡同穿出去，就是村北野外，高庆山低头走着，他的脚步有些沉重，迎着北风走了老远一截路，才回过头来说：

“芒种！我考考你，你说田大瞎子叫高疤去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
芒种说：

“反正没好事！”

高庆山说：

“这个村庄，有人暗里和我们斗法。田大瞎子是拉拢高疤，今天这一顿饭，轻着是进行离间，重着是要煽动高疤叛乱！”

“那我们怎么办哩？”芒种问。

“我们要估计到这个情况。我不叫你出面去找高疤，那样做，会更坏事。对高疤我们还是要争取教育的，在子午镇这个环境里，他就会坏到底。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芒种笑着说，“整天躺在俗儿那个小暖洞里，再受着点反革命的挑拨，谁还有心思革命呀？”

高庆山也笑了。他更喜爱眼前这个孩子了，这孩子，经过党的教育和本身的战斗经历，会成为一个亲近可靠的助手。他说：

“我们到地里去吧，和那些做活的老乡们谈谈！”

“那我们就找老常去，那边使着两个大骡子耕地的就是他！”芒种说。

正北不远，有一个中年以上，穿蓝粗布短袄，腰里系着褡包的农民，一手扶着犁把，向外倾斜着身子，断续的吆喝着牲口。两匹大骡子并排走着，明亮的铧板上翻起的潮湿的泥土，齐整的像春天小河的浪头，雕匠刻出的纹路。芒种说：

“老常真是一把好手，耕出地来，比墨线打着还直！”

“可惜是给地主做活！”高庆山说。

“老常哥！”芒种喊了一声，“我们在地头上等你！”

把手里的缰绳轻轻一顿，老常站住了。随后就轰着牲口耕到地头，回过来，按好犁杖，拉着芒种坐在地边上的小柳树下面。

“这是我们支队长！”芒种给他指引着。

“那些年见过，”老常笑着说，“方圆左近的人，谁不知道他？”

高庆山过去扶着犁杖说：

“老常哥，我给你耕一遭吧？”

老常说：

“我知道你也是庄稼人出身，可是这牲口不老实，有点认生人！”

“不要紧！”高庆山笑着拾起缰绳，扶正犁把，吆喝了一声。这是农民的声音，牲口顺从的走下去了，高庆山回头笑了笑。老常说：

“真有两下子，没怨能带兵打仗哩！”

耕了一遭地回来，高庆山也和他们坐在一块，说：

“子午镇有多少长工呀？”

“大二三班，一共有十六七个哩！”老常抽着烟说。

“你们该组织一个工会。”

“该是该，”老常说，“就是没人领头操扯哩！”

“你就领头呀！”

“我？”老常笑了笑，“哪里有工夫呀？吃人家的饭，连睡觉的工夫都是人家的！再说，当家的也不让你去掺合那个呀！”

“这不是当家的事，他管不着。”高庆山说，“把工会组织起来，我们工人就团结的紧了，学习点文化，脑筋也就开通了，我们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决力量，我们要参加村里的工作，有能力还可以当村长哩！”

“当村长？”老常笑了，“咱可干不了。自古以来，哪有长工当村长的？把吃喝改善改善，多挣点工钱，少干些下三烂子活儿，就心满意足了！”

“在工作和战争里锻炼。”高庆山说，“把日本打出去，局面大了，省长县长，也会叫我们当的！”

“好，我回去串通串通。”老常说着站起来，“我不陪你们坐着了，叫当家的看见了，不好。”

回到俗儿家里，高疤已经回来，喝醉了，倒在炕上，没法正经的谈问题。高庆山对他说：希望他赶紧回去，什么事情也可以商量，就和芒种推车子出来。

俗儿拦不住，送到大门以外，抓住高庆山的车子把说：

“支队长，我问问你：为什么一定叫高疤去学习呀？”

高庆山说：

“有机会学习，是顶好的事。在我们部队里，上上下下都要学习。他不抓紧学习，过些日子，下级学习好了浮上来，他就得沉下去。学习，是为工作，也是为他好呀！”

“他想不通。”俗儿说，“等他回去了，你这上级该多教导教导他！”

芒种插进来说：

“还是你晚上多教导教导他吧。对于高团长来说，你的话，恐怕比上级还有劲儿哩！”

“你这小嘎子！”俗儿笑着撒开手。

走到河口上，春儿又在后面追来了：

“姐夫，姐夫，停一停！”

高庆山停下车子，回过头来问：

“你这是慌慌张张干什么呀？”

“我来送送你，”春儿喘着气说，“怎么到了子午镇，也不上俺家去呀？”

“你不是来送我。”高庆山笑着说。

“你看你！”春儿笑了，“不是来送你，是来送谁

呀？有要紧的事情和你商量：我们妇救会派了田大瞎子七双鞋，他不交，叫狗追我们。这还不算，他女人今儿个又放出大话来，说高疤和他家相好，文班里有人，武班里也有人，就是不怕我们这帮穷闺女！你说，到时候，他不交鞋怎么办？”

“到时候不交，你就到县政府告他！”高庆山坚决的说，“我看出来了：不把这封建脑袋往矮里按按，这村子的抗日工作，不能抬头！”

“你算说对了，”春儿说，“人们还是看风色，望着田大瞎子这个纛旗儿倒不倒哩！姐夫，我们去告他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呀！”

“不是我给你做主，”高庆山说，“是革命的时代给你做主！”

二十

这些日子，冀中平原的形势，紧张起来。日本人顺利的爬过黄河以后，感觉到有一种力量，在它的脚踝上，狠狠插上一刀，并且割向它的心腹。起先，它没把吕正操这个名字放在眼里。这个年轻的团长，在整个国民党军队溃退南逃的时候，在大清河岸，抗命反击了日本帝国主义。这场挺身反抗的战争，扫除了在军民之间广泛流行的恐日情绪。部队损失了一半，青年将领并没有失望，他和地方上共产党组织的武装结合起来，在平原上坚定的站住，建立了一个光荣的根据地。当日本人明了吕正操竟是一个共产党的时候，才深深恐慌起来，它布置向冀中平原进攻，沿平汉线增加了部署，在北线，进占了河间，威胁着高阳。

冀中人民热情支援抗日的部队，农民们做的鞋都交上来了。春儿一双一双的检验，有的布料和针工

好一些，有的使块旧布用锅底的黑烟子染了一下，在鞋底儿里衬些草纸。可是，这些青年妇女们都很高兴，她们这是第一次给卫国保家的战士们做的针工。她们第一次给家庭以外的人做活，这些人穿上她们的针线，在战场上抗击进犯乡土的敌人。她们在夜晚丈夫和孩子睡下以后，掌起灯来做到鸡叫。她们在货郎担上选择顶好的鞋面，并且告诉掌柜：这不是给自己的丈夫做，也不是给自己的孩子做，是给抗日的军队做的。她们手里扬着鞋面回家，就像举起小小的一面坚决抗日的旗帜。所有的人望着她们，她们自己觉到了荣耀，在众人心中引起了钦佩。

做好鞋，她们手托着送到春儿家里，活路差些的就叫自己的婆婆代替送了来。春儿称赞了这些年轻的伙伴们，也拿出自己做的一双，请她们批评提意见。自然那是全村拔尖的顶漂亮顶坚实的一双。妇女们都说：

“送到军队上，谁挑了春儿这一双，谁算有福了。该把你的名字写上呀！”

“我的名字在鞋底儿上！”春儿说，“穿在脚上，一步一个印儿。”她翻过鞋底来，在那中间空心的地方，突出的绣着她的名字。这个女孩儿的名字，随着战争的脚步，在祖国这一片光荣的土地上，留下鲜明的痕迹和使人兴奋的影响。

就还差田大瞎子家的七双。春儿找了俗儿去，要一同去催，俗儿这两天下积极了。俗儿有时顾前不顾后，很能陷阵冲锋，可是她的思想感情变动的太厉害。高疤倒是回城里去了，那天吃了田大瞎子一顿饭，回来对俗儿说：

“你不要当她们的枪使，日本人占了河间，高阳不知道能不能存站的住。我们和春儿不一样，她们是和高庆山睡一条炕的人儿，自然一心保国，我们得留一只后手，不要再得罪田大瞎子！”

今天早晨，又听见日本人进攻的炮响，俗儿有点害怕。这些日子，她和春儿也闹不团结。她看见村里的年轻妇女们，都向着春儿，对于她，不过是眼面前的怕情，她知道自己在众人眼里的地位。当春儿叫她一块到田大瞎子家里催鞋，她说：

“我这主任还想推出去哩！上回我出了阵，这回该你试试了。享好名儿不是一个人的事，得罪人也不能只我一个人！”

老蒋也走过来，对着春儿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：

“谁有工夫，谁是满街腿，谁就一个人跑去，来回上我们家来干什么？俺们俗儿不去干那瞎踹子勾当，从有了妇女会，我们家里就没得安生过，门限子也叫你们给踢破了！”

真把春儿气坏了，她说：

“你家的门限，是我踢破？我看是那些有钱有脸的大汉子们！”

“春儿大妹子！”俗儿接过来，说，“打人别打脸，骂人别揭短。谁不知道我们，我们脏，我们自己兜着，沾不到你的身上去！我们不管怎样，还没有陪着工夫陪着布，给小做活的做衣裳做鞋，偷偷送到城里去哩！住在一个村里，我又没戴着捂眼儿，谁做的事情谁不知道？别在俺们家里充好人来了！”

气的春儿抱着一捆鞋，哭着出来。可是她没有绝望，正和整个民族进行的光荣努力一样，她忍受着痛苦，坚持庄严的工作。她挺直身子，一个人进入了田大瞎子的庄宅。

外院里，只有老温正在起大猪圈里的粪，满院子的臭气。看见春儿今天大不像往常，老温停下铁锨，探出头来说：

“春儿，干什么呀？”

“来收他家的鞋！”春儿说。

“你们那主任俗儿呢？”老温笑着说，“怎么今天不出马？”

“人家妥协了，”春儿说，“以后，没眼的瞎子也不能举她！没干三天半，听见树叶儿响，就低脑袋转弯！她不来，我自己来。”

“我劝你回去，”老温小声说，“他家连个鞋毛儿也没做，你跟他要，保险得捣起乱来！”

春儿说：

“不做不行。人家战士们撇家撂活，上前线打仗去，我们这么点责任都不负？叫那些人光着脚打仗呀？”

“我还是劝你回去。”老温扒着猪圈沿儿说，“你不同俗儿，她是一个破罐子，属卖炸馓子的，带着一身油，只许别人怕她，她可不怕别人。你不行，从小本分家的女儿，骂骂咋咋你张不开嘴儿，动手打架，你伸不出手来，就会哭！我们当家的，男的是一只虎，女的是一只母老虎，他们会欺侮你！”

“我不怕，看看他们能把我吃了？”春儿一步登上二门的台阶。

正赶的田大瞎子送出他的客人来。这客人像一个退休的官员，又像一个跑合的商人。他从敌人占据的保定来，那天请高疤吃饭，陪的就是他。望见春儿，田大瞎子把眼一翻说：

“又来干什么？”

“来拿鞋！”春儿站住说。

“什么鞋？”客人问。

春儿说：

“给抗日战士做的鞋！”

“你看，”那个客人对着田大瞎子一笑，“这么大的闺女，不坐在炕头上纺线，要不就到野地里拾柴火去，她也跟着抗日抗日！日本那么好抗？你能抗住飞机大炮？日本就快过来了！”

“日本过来，有人打它！”春儿说，“你这是干什么，你不愿意叫我们抗日吗？”

“我是为你好，”客人嘻嘻的笑着说，“一个庄稼人，谁过来了不是做活吃饭，谁来了不是出差纳粮？不要听那些学生们胡说八道，整天价花着爷娘不心痛的钱，不好生念书，抗日，抗日，我说吧，日本人进攻中国，都是他们招惹来的是非！”

“听你的口气，像是个汉奸！”春儿狠狠的说。

“野闺女！”田大瞎子推了春儿个后仰说，“你敢骂我的客！”

春儿爬起来，哭着喊：

“你们怕人骂汉奸，就别放那些汉奸屁呀！”

田大瞎子追过来，还要动手。老温用起粪叉一拄，跳出了粪坑。他穿的很单薄，带着两鞋泥粪，跑过来一把拦住说：

“当家的，你别打人啊！人家是个女孩子，才有多么大？这说的下理去吗？”

田大瞎子大声叫：

“你一个臭做活的，敢来管当家的事！快给我跳

下猪圈起粪去！”

“好，出力气做活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我们倒臭了？”老温说，“从今天起，看看在大众面前，臭不可闻的，到底是谁吧？”

“真他妈的是五鬼闹宅，”田大瞎子说，“你也反了，你不要只看见城里那么一班人，你听见炮响了没有？”

“没听见。”老温说，“我们不盼望外国人，我们不想当汉奸！”

“你给我滚蛋！”田大瞎子飞起一条腿，正踢在老温的小肚子上。老温抱着肚子，爬在地上，哼哼着喊叫：

“春儿，去到县里告他！”

春儿答应着走了。田大瞎子说：

“看见你们那群毛毛官儿了，走，我和你们去当堂对质！老常，套车！”

老常正在村北近处耕地哩，听见家里吵嚷，丢下犁杖跑了来，一看见老温爬在地下打滚，就过去扶了起来。田大瞎子叫套车，他说：

“我们不干了！你自己套吧！”

“好！”田大瞎子说，“天下缺少的是金银，做活的有的是，你们马上离开我这院子！”

老常扶着老温到别人家去。田大瞎子从槽上牵

出牲口来，怎样也套不到车上，客人帮着他，好容易把骡子塞进了车辕，忘了结肚带。田大瞎子一抓鞭把，牲口窜了套，惊了车，差一点没把他轧住。车在梢门限上撞翻，墙角塌了一大块，骡子向野地里跑去了。

“我走着去！”田大瞎子把鞭子往地下一扔，说。

田大瞎子这回敢去告状，是因为听见了日本进攻抗日人民的炮响。是因为高疤曾经在他家吃了一顿饭，也有点仗持他的儿媳妇新近又升了县政指导员。他要在来客面前显显他的威风，做他恢复政权、重新统治人民的本钱。

田大瞎子一脚踢成了子午镇好久组织不起来的工人抗日救国会。全村十七个长工听见消息，都跑到老温的床前，立时写上了名字，按上手印，选举老常当他们的主任。叫他去追赶春儿，一同进城。

他们三个人走在通向城里的路上，春儿在最前边。现在是立冬前后，快晌午了，太阳融化着大道两边树枝上的霜花，不断的滴落在她的头上。今天，遍地是部队，各地的人民自卫军，正奉命向前方转移。西北方向，腾起滚滚的黄土。冀中人民组成的部队，在家乡的冬天的早晨，披带着呼吸和热汗凝冻成的霜雪，庄严前进。在田野工作和在道路上行走的农民，都停下来望着他们，在村庄的入口，男女拥挤着，

在房沿草垛上，有雄鸡接连的热情的长鸣。这是平原伟大战争的开始，坚决打击进犯的敌人，民族愤怒沉重的向前滚动了，它的每一个儿女，都激动的跑来，伸手在牵引上，加上自己的一把力量。

二十一

在路上，老常步眼大，不久就越过了田大瞎子，看看追上了春儿。

春儿走的很暖和了，脊背上出了些汗。东瞅西看，她两只眼睛不够使唤。到处是我们的队伍，她望着在队伍的上空，紧连着他们的新军帽腾起的尘土，汗水蒸成的雾。她望着接连翻起的脚步，穿的是她们妇女做的鞋袜，战士的脚印像叫一条长线穿起。她自己也觉得脚下轻松，身上有了力气，跟着他们前进。心，飞到他们那里去了，开赴前线的，不知道有芒种没有？

老常叫住了她，说：

“没怨说这会的姑娘们好，走起路来像风胡轱，叫我好赶。”

“你来干什么，”春儿把眼睛收回来说，“走在前头，给你们当家的鸣锣开道吗？”

“想的他！”老常笑着说，“我和他散了，咱们是一条线儿上的人。我是子午镇的工会主任，帮你去打官司。”

“什么时候选的你？”春儿笑了。

“这才叫走马上任。”老常说，“刚刚开过会，我连行头也没换，就追上你来了。他们说你小女嫩妇，嘴头心劲上，全不是那老狼的对手。”

“有你去，自然更好，就是我一个人也不会把官司打输！”春儿说。

“我站在一边给你仗胆儿，”老常说着叹口气，“不用说你，就连你爹，一辈子敢和谁强过一句嘴？就不用提打官司了。上城下界，是人家大地户的能耐，从小时，俺爹就教导我：饿死别做贼，屈死不告状。衙门口是好进的吗？可是啊，春儿你带着个钱没有？”

“带钱干什么使？”春儿说，“又不置办东西。”

“打官司的花销呀！”老常说，“没钱你连门也进不去！”

“不用花钱，”春儿说，“一去就找俺姐夫！”

“对了。”老常笑着说，“光想着钱，连他也忘了。我们还怕什么？这成了一面词儿的官司，准赢不输！”说着从搭包上解下烟袋来就打火抽烟。

“什么一面词儿呀？我们是满有理的事！”春儿批评他。

“对！对！”老常随口答应着，只顾低着头打火。他的火石那样老，周围的棱角全打光，简直成了小孩们弹的球儿。他用两个粗大鼓胀的手指头捏着，用破火镰拍拍的凿着，看不见一丝火星儿。他转动着火石，耐心的打着，一边和春儿说着话儿。走了十几里路，过了好几个村庄，他的火还没有打着。到了西城门口，他才把火石收起来，把装好的一袋烟又倒回破荷包里，这就算过了烟瘾。

春儿先到的动员会，动员会的人说，高支队长正在给军队讲话，春儿想芒种一定也不闲在，就说：

“我们是来打官司！”

动员会的人问了问她是哪村的人，就说：

“打官司你到县政府。党政军民，各有系统。县政指导员是你们老乡，又是个妇女同志，她叫李佩钟。”

春儿出来和老常说，老常一咧嘴：

“那怎么行？她是大瞎子的儿媳，还有不向着公公、反向着我们的道理，我看这一趟白来了！”

“既是来了，就得试试，空手回去，不显着我们草鸡？”春儿说，“什么儿媳妇公公，是人就得说真理，她既是干部，吃着人民的小米，难道还能往歪里断？”

她一路打听往县政府来，穿过一条小胡同，到了跑马场，再往北一拐，就看见县政府的大堂了。

县政府门前也是一片破砖乱瓦，从国民党官员仓皇南逃，还没有人收拾过。人民自卫军成立以后，忙的是动员会和团体的事，政权是新近才建立。上级委任了李佩钟当县政指导员，她觉得动员会的事，刚刚有了些头绪，自己也熟练了，又叫她做这个开天辟地的差事，很闹了几天情绪。上级说：“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。”又说：“为了妇女参政，我们斗争多少年，今天怎么能说不干？再说，县政指导员就等于县长，妇女当县长，不用说在历史上没有，就在根据地，李同志也是头一份呀！”她才笑着答应，说干一干试试，不行再要求调动。昨天才搬到这个大空院里来。

她喜欢干净，把自己住的房子，上上下下扫了又扫。县政府有一个老差人，看见她亲自动手，赶紧跑了来，说：“快放下笤帚，让我来扫。你这样做叫老百姓看见，有失官体！”

李佩钟笑了笑，她在院里转了转，看见门台上有一盆冬天结红果的花，日久没人照顾，干冻的半死。她捧了进来，放在向阳的窗台上，叫老差人弄些水来浇了浇。老差人说：

“看你这样雅静，就是大家主出身。你当家的，原先不过是一个区长，现在你倒当了县长，真是妇女提高！”

李佩钟皱了皱眉说：

“你去找一张大红纸，再拿笔墨来。”

老差人说：

“我一看你就是个文墨人，听说咱们的支队长，也不过是个拿锄把的出身，全县的干部，就属你程度高！”

“快去拿吧！”李佩钟说。

老差人说：

“那得你批条子，到庶务科去领。”

“什么庶务科呀？”李佩钟跺着脚说，“你看不见就我一个人，你先到动员会去借！”

等到老差人把笔墨纸张拿来，已经正晌午了，天气很暖和。老差人替女县长研墨铺纸，李佩钟在房子里来回的走。她那嫩白的脸上，泛起一层红的颜色。站立在窗前，阳光照着她的早已成熟的胸脯。曾经有婚姻的痛苦，沾染了这青春的标志。现在，丰满的胸怀要关心人间的一切，她要用革命的工作，充实自己的幻想和热情。她用带来的一把小剪，修理花树的枯枝，她看见有一股嫩绿的浆液，在表皮里流露，细心培养，她想等不到春天，它就会发芽。

她弯着身子，在一张红纸上，写了“人民政府”四个楷体大字。

老差人笑着说：

“这四个字儿和我有缘，我全认识。政府就是县政府的意思，和人民连起来，那意思是说：老百姓的父母官吗？”

“唉！你把意思反了。”李佩钟说，“人民政府就是替老百姓办事的政府。”

“什么政府不是替老百姓办事？”老差人说，“不替老百姓办事，发谁的财呀？”

“分别就在这上面。”李佩钟把红纸拉到阳光下面晒着，“过去的政府是封建阶级当权作主，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块石头；现在的政府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压迫，人民自己起来，当权作主。”

“我还是有点不明白！”老差人说。

“等我审判案件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！”李佩钟说，“你打浆糊来，我们去把它贴上。”

老差人又到动员会领了面，打好了一大盆浆糊，和县长抬着这张大红纸，走到大堂上来。这四个大字，在老差人手里，分量很重，他不知道究竟从这一任县长手里，要有什么新出的规程。

李佩钟，跳到大堂的桌案上去，这种灵便，使老差人吃了一惊。她在那块旧的匾额上面，重重的抹上了一层浆糊，把一大群麻雀从匾额后面的窠巢里轰出来，老差人叫她别迷了眼。她仔细的把红纸贴在上面，老差人一手扶着桌案，一手比划着，好叫她摆得

更端正。贴好了，李佩钟站在桌案上，端详着她写的这四个大字，心里一时激动，眼眶充满了热泪。

这是神圣的理想。鲜红的匾额，映照得大堂明亮，一直照过跑马场，照到野外去，在那里，高庆山正给四千个战士讲话，口号声不断的传来。走在街道上的人，一眼就可以看见这四个字。这四个字，实现了多少年多少人的斗争的愿望。为了这个愿望，他们前后的献出了青春的生命，亲人为他们曾经把眼泪流干。

二十二

老差人看见女县长流出眼泪来，惊慌的说：

“上任的大好日子，这是为了什么？有过什么冤屈吗？这个地方，别看它方圆不到三丈，屈枉的好人可不少。我在这里干了快一辈子，什么事情都从我眼里经过。今后不会有那种事了，你刚才的话我也明白了。”

“正是这个道理。”李佩钟说着从桌子上跳下来。

“十年前，”老差人又说，“县里抓来好些共产党，就是在你们那一带闹事的农民，杀了好几个，其中有个孩子，是高级小学的学生，每逢我带他的爹娘去给他送饭，爹娘哭的天昏地暗，我总没见过他皱过一下眉毛，胆气真正，有空还向我宣传共产党的好处。他出斩的那天，我不敢见他，我请了几天假，害了一场大病。”

“我就是为那些人掉泪。”李佩钟整整衣服和头

发说，“我们进去吧！”

“县长，有人来打官司！”老差人低声叫，“你快进去，等着击鼓升堂。”

李佩钟往外一看，一个女孩子走进来，后面跟着一个中年的农民，都很眼熟。原来是春儿和婆家的领青长工老常。

她跑上去；拉住春儿的手说：

“进城干什么，妇救会的事儿吗？”

“我们来打官司，”春儿说，“告的就是你公公！”

李佩钟的脸上发烧，老差人给她搬来一张破椅子，放在审判桌案的后面，她摇了摇头，问：

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派了他军鞋他不做，我去催，他推了我一个跟头，还踢伤了工人老温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春儿说。

老常说：

“我就是证人。”

“他是咱村新选的工会主任，他什么也见来着。”春儿说，“你公公也来了，就在后面。”

“喂，这位小姑娘，”老差人招呼着春儿，“你是来打官司，又不是在炕头上学舌儿，什么你公公你公公的，被告没有名姓吗？”

“我们不知道他的学名儿叫什么，那不是他来了！”春儿向后一指。

田大瞎子到了。他从小没有走过远道，十八里的路程，出了浑身大汗。他穿的又厚，皮袍子和大棉靴上，满是尘土。他喘着气，四下里找外收发，可是一个熟人也看不见，上前一步，才看见他的儿媳和对头冤家们。他面对着正堂站住，大声说。

“现在打官司，还用递状纸不用？”

看见公公，李佩钟心里慌乱了一阵，她后退一步，坐到椅子上，掏出了笔记本，说：

“不用状纸，两方面当场谈谈吧！”

“两方面？哪两方面？”田大瞎子问。

“原告被告两方面！”李佩钟说。

“谁是被告？”田大瞎子又问。

“你是被告，你为什么推倒抗日干部，并且伤害工人？”李佩钟红着脸问。

“好，你竟审问起你的公爹来了！”田大瞎子冷笑一声。

“这是政府，我在执行工作。”李佩钟说，“不要拉扯私人的事情。”

“政府？”田大瞎子说，“这个地方，我来过不知道有多少次，道儿也磨明了，从没见过像你们这破庙一样的政府。”

“我们都还没见过。”李佩钟像在小组会上批驳别人的意见一样，“你看见上面这四个字儿吗，这是

人民政权的时代！”

田大瞎子死顽固，从来不看新出的报纸，对这些新词儿一窍不通，不知道怎样回答。这时不知谁传出去的消息，大堂上围满了人，来看新鲜儿，高庆山讲完了话，也赶来站在人群里看，芒种挤到前面，两只眼睛盯着春儿，使得春儿低头不好，抬头也不好，红着脸直直的站着。可是她觉得胆壮了，她问：

“李同志，我们这官司要落个什么结果呢？”

田大瞎子的脸一红一白，他觉得在大众面前，丢了祖宗八代的体面。他要逞强，他说：

“不能结案，我还没有说话哩！”

李佩钟说，

“准许你悦。是村里派了你做军鞋，你到时不交吗？”

“我没交。”田大瞎子说，“为什么派我那么多？”

“这是合理负担，上级的指示。”春儿迎上去。

“合理？”田大瞎子说，“你们都觉着合理，就是我觉得不合理。”

这是一句老实话，李佩钟听了差点没笑出来。她瞟了高庆山一眼，看见他在那里严肃的站着，静静的听着，她又镇下脸来问：

“是你踢伤了长工老温吗？”

“那是因为他多事，一个做活的哪能干涉当家

的？”田大瞎子说。

“你动手打人，他就有权干涉，做活的并不比当家的低下。”

李佩钟说，“你推倒了春儿吗？”

“那是因为她骂了我的客人！”

“什么客人？哪里来的？有通行证没有？”李佩钟紧跟着问。

田大瞎子沉了一下，说：

“你这叫审官司吗？你这是宣传。你专门给他们评理，他们是你的亲人，我连外人都不如！”

看热闹的人们，全望着李佩钟，李佩钟站立起来，说：

“既然都是事实，你也承认，我就判决了：不遵守抗日法令，破坏合理负担，罚你加倍做鞋。推倒干部，踢伤工人，是严重的犯罪行为，你回村要在群众面前，向春儿和向受伤的工人陪不是。你要负担工人一切医药费用。工人伤好了，只许他不干，不许你不雇，还要保证今后不再有这样的行为发生！”李佩钟宣判完毕，转身问春儿：

“这样判决你们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意见倒没什么意见了，”春儿说，“只是受伤工人的吃食上头，坏的他吃不下，好的我们又没有。被告回到村里，要逢集称上几斤点心，买些鸡子儿挂面

什么的送过去，这才算合理。我就这么点，看看俺村的工会主任还有什么意见？”她回头看看老常。

老常赶紧摇了摇头。田大瞎子说：

“像你说的，我还得买点干鲜果品，冰糖白糖哩！聘闺女娶媳妇，我也没有这么势派过！”

“势派势派吧，从前你拿着工人不当人看待，好东西都自己吃了，你既然愿意多送点东西，我们赞成！”老常的庄稼火上来，也气愤愤的说了一套。

“就像春儿说的那样办。”李佩钟说着退了堂。

人们哄哄嚷嚷的走出来，议论着这件事儿。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抬起杠来。老年人说：

“我看这女县长有点过份，栽了你公公，你脸上也不好看呀！”

年轻人说：

“你看的是歪理，当堂不让父，王子犯法还一律同罪呢，做官最要紧的是不徇私情儿。”

二十三

李佩钟送走春儿，回到自己屋里来，兴奋的坐不下，走动着唱起歌儿来。不多一会，高庆山来了，她赶紧止住，笑着问：

“高同志，我处理的问题怎么样，站的稳立场吗？请你不客气的提些意见。”

高庆山笑着说：

“处理的不错，群众看来也很满意，春儿她们也会满意的，在今天，这样判决也就可以了。谈到立场，我们还有机会经历一些锻炼哩。你想：田大瞎子踢伤了工人，我们只是判他道歉和负担一些费用。假如在旧政权的统治下面，一个工人踢伤了田大瞎子，他们该怎样判这个工人的罪呢，恐怕要重得多吧？”

他望着李佩钟，李佩钟一愣，着急的说：

“叫你说，我还袒护了他哩！”

“你没有袒护。我知道你倒是存心要左一些的。”

高庆山说，“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，是长期的事情。你的判决有积极的影响，它已经使劳动人民抬头，这个判决会很快的在各村流传，使我们的动员工作更加顺利。不要谈这个了，我要和你讨论一件工作。”

“我想休息休息，”李佩钟没精打采的说，“可是你说吧！”

“今天夜里，我要带队伍到前方去。”高庆山说，“这次打仗，是看机会消灭一股敌人，增加人民抗日的信心，兴奋抗日的情绪，另外就是掩护我们的首脑机关顺利转移，司令部可能到咱们县里来。留给你的工作是积极动员老百姓破路，更重要的一件是准备把这县城拆除！”

“破路可以，为什么要拆城？”李佩钟问。

高庆山说：

“我们不能固守着城池作战，我们要高度的分散和机动。敌人可能占领县城，我们把城拆除，使它没有屏障，我们好进行袭击。”

李佩钟说：

“还没有打仗，我们就准备放弃县城？这几个月的工作不是白做了？”

“工作怎么会白做呢？”高庆山说，“我们初步完成了战争的动员，人民有了抗日的要求和组织。我们放弃的是城池，并不放弃人民，打起仗来，我们和人

民结合的就更密切了，更血肉相连，更能进一步组织和动员。我们要有胆量和信心，不能张慌失措，要组织群众的力量，巩固他们的战斗热情，使人民的生活，渐渐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。”

李佩钟说：

“破路还容易，这样高的城墙怎么个拆法，砖拉到哪里？土放在哪里？我的老天，三年的工夫也拆不完呀，哪里找那么些人呢？”

高庆山说：

“修这城的时候，恐怕更费力，可是人民到底把它修成了，为什么现在就没有力量把它拆掉？好好动员群众，还要进行说服解释，不然全县的群众会反对，他们认为这是破除风水。说通了以后，砖呀，土呀，群众都有办法解决。动工的时候，村中出差要公平，各村负担的尺丈要合理，县里要解决民工吃饭喝水住房的困难。”

“你留给我们工作太多，我一想到那几千年的老厚老高的城墙就头晕。”李佩钟笑着说。

高庆山说：

“又不动脑筋想办法，又不找群众商量着解决，那心里就只有叫困难堵塞了。这是战略任务，一定要完成！你计划计划吧，我要回去吃饭了！”

“你不要走，”李佩钟跳前一步用手拦住他，“晚

上你就出发了，今天下午我请你。”

“请我吃什么呀？”高庆山说。

“请你吃十字街路北的羊肉饺子，好不好？”李佩钟说，“我知道你不愿进馆子吃饭，咱们叫他煮好了送来，就在我这屋里吃。我叫老头儿要去，你可不许走！”

李佩钟跑了出去，高庆山在屋子里溜达着，他看见了放在南窗台上的那盆花儿。

等李佩钟回来，他说：

“同志，真是小姐脾气，还有时间养花儿呀？”

李佩钟说：

“那是刚才一时高兴弄的，现在叫你给压上了一大堆工作，什么心情也没有了。”

高庆山说：

“正在打仗吗，枪炮砰拍响，花儿朵儿的就不时兴了。我并不反对文化生活，有时间唱唱歌儿，吹吹口琴还是有意思，李同志在这方面很有天才。”

“地才！”李佩钟笑了，“豁着嗓子瞎喊罢了！”

“现在我欢迎你来一个吧！”高庆山笑着鼓起掌来。

“我不！”李佩钟笑着扭了扭身子，“两个人有什么唱头？”

“两个人听的清楚。”高庆山说，又接连鼓掌。

李佩钟背过身去，刚唱了一句，送饺子的就来了，赶紧红着脸停止。她坐在对面，照顾着高庆山吃饭，她拨拨拣拣，推推让让，叫高庆山吃饱。

她笑着说：

“自从上级给我们提了意见，不再吃大柜的卷子和大锅的猪肉，一下改变的过了劲儿，顿顿小米干饭，不是夹生，就是糊爆。看见你盛饭的时候一皱眉，大师傅和管理员还说你不能艰苦，享乐腐化，思想意识成问题，气都把你气饱了。还有那白菜汤，连把盐也懒的放，用杓子一搅，菜叶儿一个赶着一个跑，哪里是吃饭，简直是捞鱼。”

她自己吃的很慢很少，那样小的饺子，要咬好几口，嘴张的比饺子尖儿还小一些。高庆山是一口一个，顿时吃了一头大汗。李佩钟把自己的干净手巾送过去，带着一股香味，高庆山不好意思大擦，抹抹嘴就放下了。

吃完饭，李佩钟低着头，收拾了碗筷。她坐在床上，好久没说话。把头靠在那厚厚的松软的干净整齐的花布被子上。

高庆山站起来说：

“时间不早了，我该走了，这顿饺子真香！谢谢你请客吧！”

“你不批评我就行了，还谢什么呢？”李佩钟说，

“等一等再走，我有句话儿问你。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？”她说完就笑着闭上了眼睛。

“哪里的话！”高庆山说，“文化是宝贝，一个人有文化，就是有了很好的革命工作的条件。我小时没得上学念书，在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，想起来是很大的损失，遇到知识分子，我从心里尊敬他们，觉得只有他们才是幸福，哪里谈得上讨厌呢？自然知识分子也有些缺点，为了使自己的文化真正有用，应该注意克服。”

“高同志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”李佩钟说。

“什么问题？”高庆山问。

“我的婚姻问题，”李佩钟坐起来，“我想和田家离婚，你看可以吗？”

“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”高庆山说，“我很难给你提意见。可是我相信在革命过程里，你会解脱了这种苦恼，完全愉快起来。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、不能长期负担的问题。”

“你同意我离婚？”李佩钟笑着问。

高庆山点点头，走了出来，在大院里，他吸了一口冷气，整了整军装。

李佩钟送他到大堂上，又叫住了他，说：

“你抬头看看我写的这四个字儿怎么样？”

高庆山回转身看了看，说：

“字写得不错，不见这块匾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个作家哩。不过，现在上级没这样提，我们还是叫抗日县政府吧！”

二十四

黄昏时候，李佩钟站在十字路口，送走那些出征的战士，他们是第一次去作战，一个紧跟一个，急急的走着，举手向女县长告别。高庆山在最后拉着一匹马，沉静走着。李佩钟望着他走尽了东大街，走出了东城门，才转身回到了县政府。夜晚，她一个人在这大院落里，在南窗台点起一支红蜡烛。她好像听见了寒风里夜晚行军的脚步，霜雪在他们的面前飞搅，骑在马上将军，也不会想到爱情。她振作自己，在一张纸上，描画拆城破路的计划。

她一个人在夜晚工作，在这样的夜晚，有的母亲正在拍哄着怀里的孩子，有的妻子，正把头靠近她的丈夫。很长时间，李佩钟心里不能安定，拿起笔来又放下。她听着院里的一棵老槐树发出的冬天的风的响声，她把想念引到那走在征途上的人们，她必定拿他们做自己的榜样。眼望着蜡烛的火苗，女人的青春

的一种苦恼，时时刻刻在心里腾起，她努力把它的克服，像春雨打掉浮在天空的尘埃。

她在一张从学校带出来的图画纸上，设计着农民破路的图样。她用修的尖尖的铅笔，细心的描画，好像一个女学生在宿舍里，抱着竹绷子做绣工。

现在是严冬腊月，冰雪封冻着平原，从她们这一代青年起，今后经历的冬天，都要是残酷战斗的季节。她想，不过几天，农民们就要抱着火热的心肠，背着大镐铁铲，破路拆城，用一切力量，阻止进犯的敌人。这是历史的工程，她竟是一个设计人。在工作里，她忘记自己的痛苦，充满了高尚的希望。

隔着五尺砖墙，县政府的东邻，是一个小印刷厂。半夜里，那架人摇的机器，正在哗哗的响动，工人们印刷着动员会编的抗日小报纸。李佩钟想：等她把图样设计好，再加上一个说明，可以在小报上登载。

机器的响声停止了，接着是工人們的嘈杂。不久，那个印刷厂的负责人，细高个子秃头顶的老崔，跳墙跑到她的屋里来。

“你们出了什么事？”李佩钟停下工作转身问，“半夜三更跑来做什么？”

“李同志，你这里该安一个岗，”秃头老崔说，“这么大院子，一个人就不害怕？”

“一忙，什么也就忘了。”李佩钟笑着说。

“我是来问问你，有这么一件东西没有？”秃头老崔用手比划着，“我们那机器上有一块呢子，老朽的不能用了，没有它机器就不能转动，报就出不来，宣传工作就完不成任务，这是抗战工作的重大损失！找这么一小块呢子，要在北京天津，像烂纸一样，到处可以捡到，可是在这个小小的县城，真比讨换金刚钻还费劲，有钱哪里去买？我想了半天，满城里就许你有这个东西，因为你上过洋学！”

“什么呢子？”他说了那么多，李佩钟并没有听明白。

“就是做衣服用的那个毛呢！”秃头老崔说。

“毛呢衣服可以不可以？”李佩钟说着站起来，从床底下扯出一个包袱打开，抖出一件大红的毛呢外氅来。

“真算我走运！”秃头老崔拍着巴掌说，“画眉张变戏法，假神仙的倒搬运，也来不了这么快！太好了。只是这不可惜了儿的吗，这是十成新的衣裳呀，就算是你大方，我也下不得手把它割成碎块，去裹那油黑的滚子呀！你再找块别的吧，最好是布头布尾！”

“别的没有，就只这件。”李佩钟笑着说，“你就是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既是用着它，就算没糟蹋，有什么可惜的？再说，放着我也不穿，还不是叫虫儿咬了？

快拿去吧，别假张支了！”她把衣服扔在秃头老崔的怀里。

秃头老崔赶紧接住，还翻过来翻过去用手摸着，赞叹的说：

“真是抗日高于一切，这身衣裳，拿到北京，也能换五袋洋面！”

李佩钟说：

“这个时候，你还是面儿面儿的，别叫面儿糊涂了你的心。这是我结婚那年做的，结过婚不顺当，也就没穿过，抗战了，大家全是粗布棉衣，谁还穿这个！我是拿来夜晚压风的。”

“那我回头给你送一条棉被来。”秃头老崔说，“用不了这么多，有一个袖子也就够了，太可惜！”

“你扯去一个袖子，我留着它还做什么用？全拿去吧，你放着使个长远！”李佩钟说着，就去画她的图样。

“你这样热心，我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。”秃头老崔怀抱着大衣恭敬的说，“我要代表我们工厂，代表抗日小报广大的读者群众，向你致谢：因为李同志的模范行为，我们的机器就又转动起来了。”

秃头老崔走了以后，李佩钟的图样画成了，她计划：在全县的纵横的车行大道的两旁，每隔五尺，刨一个壕坑，长度，五尺；宽深，三尺。她想，这样就

可以使敌人的汽车寸步难行。

她放下铅笔，细心的看着自己的工作成绩，蜡烛着过了一半，火苗跳动。她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下，身上感到一种像叫亲人抚摸的轻轻的舒快。睁开眼睛，从窗纸的小破口，她看见有一个很大的流星斜过天空坠落了，像泻下了一滩水银，照着全院明亮。

二十五

破路的图样发布下去，已经靠近年节。平原上这一个年节，已下了人民生活心情的重大变化。一过腊月初十，就到处听见婴儿聘妇的花炮，为了使爹娘松心，许多女孩子提前出嫁了。媒婆们忙了一阵，很多平日难以成就的婚姻，三言两句就说妥了，女家的挑拣儿很少。有的丈夫不在家，娘家一定要娶，就由小姑子顶替着拜了天地。

敌人的烧杀奸淫的事实，威胁着平原的人民。在铁路两旁，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们，新年前几天，换身干净衣裳，就由父亲领着送到了婆家去。在根据地，爹娘们还想叫女儿抢着坐坐花轿，唢呐和锣鼓，从夜晚一直吹响到天明。可是，因为敌人的马蹄、汽车和坦克，在平原的边缘，在冰冻的麦苗地里践踏倾轧，就使得在大道上奔跑的迎亲车辆，进村的喜炮，街头的吹唱，都带上了十分痛苦的性质。

在这种情形下面，破路的动员，简直是一呼百应。谁家有临大道的地，都按上级说的尺寸，去打冻刨坑。早晨，太阳照耀着小麦上的霜雪，道路上就挤满了抡镐扶铲的农民。

老温的伤养好以后，又回到田大瞎子家里做工，经人们说合，老常也回来了，还担任着村里的工会主任。田大瞎子的女儿，坐了月子，婆家报了喜来，田大瞎子的老婆忙着打整礼物，白面挂面，包子卷子，满满装了四个食盒，叫老常担了去送。老常进来说：

“今儿个上级布置挖沟，我去不了。”

田大瞎子的老婆一沉脸说：

“你看你这做活的！是我们出钱雇的你呀，还是你那上级？吃的拿的都是从我们这里出，你那上级，连四两烟叶儿，我看也没给你称过。怎么你这么向他们，到底是哪头儿炕热呀？”

老常说：

“挖沟是国家的事，是大伙的事，自然要走在头里。你们家临道的地亩又多，我不去挖，你们自己去挖吗？”

田大瞎子的老婆一撇嘴儿说：

“你什么时候见我摸过铁铲，铁铲把儿是方的圆的，我还不知道哩！挖个坑儿壕儿，就能挡住日本？我看你是穷命催的，有福不享，你担着食盒去了，保

险有二两喜酒儿喝，不强如这么冷风儿削气的去抡大镐？”

“叫当家的担了送去吧，我们得去挖沟！”老常说。

“他什么时候挑过东西？”田大瞎子的老婆说，“亲家门口，能叫他去丢这个人！”

“挑挑东西，怎么就算丢人哩？那我们有多少人，也早丢光了！”老常说，“要不，他就得去挖沟！”

“喝！”田大瞎子的女人说，“做活的倒支使起当家的来了！”

“我是你家的做活的，”老常说，“可我也是村里的一个干部。分配你们一点儿抗日的工作，你们也不要推辞。你们掂量掂量吧，是担食盒去送礼呢，还是去出差挖沟。”

田大瞎子的老婆，进到里间商量，田大瞎子虽说满不高兴，还是选择了挑担的任务，他以为这总比挖沟轻闲些。老常背起铁铲到街上集合人去了。

田大瞎子的老婆给丈夫拾掇齐整，捆好绳儿，插好扁担。田大瞎子挑了起来，并不感觉沉重。他走出屋门，下了台阶，走到过道里，又折了回来，他走不出大门。他挑着食盒在院子里转游起来，像在戏台上走场儿一样。他的老婆说：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天气不早了，过午再到人家那

里，还像个周礼的样儿吗？”

“这不是给人家玩猴儿！”田大瞎子说，“坐月子也不看个时候，我不去，你的女儿你去吧！”

他生了气，把扁担儿一顿，食盒的绳儿没有捆好，盖儿掀开了，雪白的包子卷子满院里乱滚起来。

他的老婆追赶着馒头，一个一个拾起来，吹吹土，装在盒里，央告他：

“你还是辛苦一趟吧，我出去看看，趁没人的时候，你往村外走！”

“满地是挖沟的，我能飞着过去？”田大瞎子喊，“我去换做活的回来吧！”

田大瞎子说着到地里去了，看见老温，抡着大镐，正刨的有劲儿。他走过去，看了看说：

“我这是留麦，怎么能一块一块的挖了去，你不想叫我吃麦子了吗？”

“这儿有尺寸！”老温说。

“官家的事儿，不过是水过地皮湿，卖个眼前俏就算了！”田大瞎子说。

“不能那么办！”老温说，“回头县长还要来检查哩，不够尺寸要受批评！”

“你回家去送礼吧！”田大瞎子接过铁铲来，把老温打发走。他把已经刨好的坑，填了靠里面一半，再

往大道上伸展，这样，他可以保存自己的地，把大道赶到对面的地邻。田大瞎子是赶种人家土地的能手。冀中乡俗，两家地邻的边界上，插栽一棵小桑树，名叫桑坡儿。每逢春天耕地，他总得嘱咐做活的，把桑坡儿往外赶赶，他亲自站在地头上去监督，叫牲口拚命往外撇，犁杖碰在桑树根上，打破几块铧子，他也不心痛，反正得侵占别人的一垄半垄的地。田大瞎子家地边上的小桑树，永远不得茂盛，总是靠他家的半边死，靠人家的半边活。弄得这一带的孩子们，春天养个蚕儿玩，也没有桑叶吃，只好上树去摘榆叶儿。

对面地邻，挖沟的也是一个老人。这老人的头发半秃半白，用全身的力量挖掘着。他的地是一块窄窄长长的条道地，满共不过五个垄儿宽，他临着道沿儿，一并排连挖十二个大沟，差不多全部牺牲了自己的小麦。他的沟挖得深，铲得平，边缘上培起高高的土墙，像一带城墙的垛口。他正跳在第十二个沟里，弯着腰，扔出黑湿的土块，他全身冒汗，汗气从沟里升起，围绕在他的头顶，就像云雾笼罩着山峰。

这老人是高四海。

听见田大瞎子说话，他直起腰来喘了口气，看见田大瞎子填沟赶道，他按下气说：

“田大先生，你们读书识字，也多年办公，告诉我什么叫人的良心呢？”

田大瞎子扶着铁铲柄儿翻眼看着他说：

“你问我这个干什么？”

高四海说：

“日本人侵占我们的地面，我们费这么大力气破路挖沟，还怕挡不住他！像你这样，把挖好的沟又填了，这不是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诚心欢迎日本，惟恐它过来的不顺畅吗？”

田大瞎子狡赖说：

“你看，把沟挖在大道上，不更顶事儿？”

这时从北面过来了两抬花轿，后面紧跑着几辆大车。赶车的鞭打着牲口，在田大瞎子的地头上碰上沟，差一点儿没把送女客翻下来。吹鼓手告诉高四海说：北边的风声不好，有人看见日本的马匹。

高四海对田大瞎子说：

“看！你这不是挡日本，你这是阻挡自己人的进路。你的地里，留下了空子，日本人要是从这里进来。祸害了咱这一带，你要负责任！”

“我怎么能负这个责任哩？”田大瞎子一背铁铲回家去了。

“什么也不肯牺牲的人，这年月就只有当汉奸的路。一当汉奸，他就什么也出卖了，连那点儿良心！”高四海又挖起沟来，他面对着挖掘得深深的土地讲话。

二十六

春儿背着一把明亮的长柄小镐，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汗和头发上的土，笑着站在高四海的身边：

“大伯！还不收工吗？”

“就完了。”高四海扔出最后一铲土，从坑里跳出来。已经是吃晌午饭的时候，挖沟的人们，前前后后的回家吃饭去了。四周围的村庄，叫中午的太阳光照着，好像浮在水里。风从北边吹过来，能听见敌人汽车吼叫的声音，这声音在老人和春儿的心中，引起每年夏季听见滹沱河水暴涨的感觉。

老人转身往村里走，春儿跟在后面。看看大道两旁的沟差不多全挖成了，老人说：

“春儿，你今年十几岁了。”

“过了年就十九了。”春儿在后边答应。

“该说个婆婆家了。”老人说着，并不回头。

春儿没有答言。过了一会她才说：

“大伯，你看明年的麦子收成好不好？”

“今年雨水大，麦苗儿长得密，只要不闹黄疸，收成就错不了。”老人说，“你是想多打点儿麦子，置买陪送吗？”

“不是！”春儿笑着说。

“我家去和你姐姐商量商量，有对事儿的给你说个婆家。”老人说，“你看不见这几天常过花轿吗？”

“我不寻婆家。”春儿说，“寻婆家干什么呀？”

“寻了婆家，就有了主儿，”老人说，“你从小没了娘，爹又远出在外，眼下兵荒马乱，免得我和你姐姐牵挂着你。”

“叫大伯一说，”春儿笑着，“我这么大了，还是没有主儿的人呢！”

“可不是么！”老人说，“没有个依靠呀。人总得有个亲人，知冷知热的人。比方说，你在地里挖了半天沟，回到家里，一摸炕席是凉的，一掀锅盖是空的，多么累了还得自己去挑水抱柴点火。要是有了主儿哩，进门就有个知心话儿，有个笑模样儿等着，身上有多么累，也就松快了，心里有什么抱屈的事儿，也就痛快了。再遇见有个灾枝病叶，更得用人。这说的是平时，遇见现在这个年月，一个闺女家就更难。寻个主儿，就是颠颠跑跑，躲躲藏藏，也有个人照管，有个人保护呀！”

“我看不准顶事，”春儿笑着说，“日本人一来，光是跑，有男人也是白搭。赤手空拳，谁也救护不了谁，光是碍手碍脚，还不如一个单身人儿俐落哩。除非寻一个背枪的……”

“背枪的，就是八路军哪，”老人回头笑了笑，“我不赞成。”

“你老人家怎么倒不赞成哩？”春儿说，“俺姐夫不是一个？”

“八路军好，坚决打日本，更得人心。”老人说，“寻婆家找主儿，顶好还是不找他们！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春儿问。

“这些人呀，是革命不顾家的！”老人叹了一口气，“你没看见你姐姐吗，结婚十几年，和庆山在一块的日子有多少？左算右算，满共也不过十几天。她倒是说什么也不说，我知道孩子们心里有苦处。我不愿意你再和她一样。不知道你姐姐和你私下里提说过这些事情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春儿说，“我虽说年纪小，可也明白这点儿道理，我想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两全，都顾起家来，都躲在炕头儿上，我们还有什么依靠，还有什么指望？大伯记得今年六月发大水的时候，从东三省逃来的那个女人吧？那倒是有家有主，有丈夫也有孩子，落得怎样？还不是丈夫死在逃难的路上，自己叫

日本炸死在我们河里，孩子留在别人家里！那都是没有人去打仗的过，现在我们有了队伍，只有他们才能保护我！”

“这样说，你是一定要寻一个八路军了！”老人笑着说，“有个心里的人没有啊？”

春儿正要说话，他们已经走到岔道口上，往南去的大道过河到五龙堂，东南一条小路通到子午镇。春儿站住说：

“大伯，跟我家去吧，我给你做饭！”

“不用了。”老人说，“你姐姐等着我。我要和她念叨念叨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看不出，你这孩子，可真有见识哩！”

春儿红红脸，往小道上跑下去了。她跑过几块菜园，绕过几处井台，到了自己的家。开开篱笆门，她养的那几只鸡连飞带跑围上来，跟着她咯咯的叫唤。

“下了你那蛋儿没有，没丢在外头吧？”她轻轻问那只麻丽母鸡，走到窗台鸡窝那里，摸出一个暖暖的粉皮大鸡蛋，笑着抓一把土高粱，撒给它们吃。

她烧火做饭，饭熟了，放一只小桌在炕上，一个人吃。她忽然想起大伯说的话来，她觉得在桌子对面，好像还该坐着一个人，这个人，现在到战场上去了。她想：该有那么一个人，在我做饭的时候，给我抱柴，在他推磨的时候，我来筛面，在他锄地的时候，

我去送饭。可是，日本过来了哩，什么也就说不上去了！自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人，他到战场上去了，应该帮助他。这样，就该是他去打仗，我来挖沟，今天的夫妻，是要这样的互相帮助呀！

不管是他还是自己，都应该替家乡和国家出力，自己醒悟过来的道理，还要去告诉别人。

吃过饭，收起小镐，她扯出一杆父亲看瓜园用的花枪来，红缨陈旧了，枪尖挂满了黑锈，她把红缨洗净，抱来一块青砂石，在小院当中，她蘸着清水磨着，用手指试着，嘴里哼着歌儿，把枪尖磨得锋利明亮。

她背上花枪，走在街上，吹着笛子集合新成立起来的妇女自卫队。在子午镇，人们听见了妇女们保卫祖国的第一声口令，这口令由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春儿喊出来。

男人们看见她们那乱脚步，起初觉得好笑，可是立时就想到那命运里共同的要求，这行动里的严肃的性质，他们也跑着去集合，说不能落在女子的后面。有很多工作，常常是男人带动女人，在有些地方，是女人走在前头男人们才跟上来。

妇女们排着队，从街上走过来，她们用力迈开脚步，身子扭动着。她们路过田大瞎子家的梢门，俗儿的爹老蒋，正在井台上打水，看着她们走过去，跟在后边说：

“消停着点扭。别扭出屁来，砸了我的脚面哪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后边的一个女孩子听见了，转过头来问。

“我没说什么。”老蒋咧着嘴，“我说着玩儿呢！”

“你侮辱我们！”女孩子们全回过身来，包围了他。

“唉，唉！这是干什么？”老蒋摇晃着水桶，摆手说，“别和我摆这个阵势儿，有能耐和日本人施去！”

“我们这就是去练习打日本的能耐，你得说说你满嘴喷的什么粪！”女孩子们不让他走。

“姑娘们！我们家里等着使水做饭哩！”老蒋绕着圈儿跑出去说，“我说错了拾回来还不行吗？”

春儿带起队来走了。后面跟着一群老婆儿和孩子们。

“平日给人家当狗腿子，日本人过来了，就是汉奸的材料！”排尾那个女孩子说。

“嘴上留德。”老蒋听见，站住回头说，“这年头儿，顶属这两个字儿难听，你别给我送这个外号，这比骂八辈祖宗还厉害哩！”

“春儿姐！”小女孩子叫着队长，“我们回到他家检查检查去，那个臭老道老在他家住着不走，是干什么的！这会儿仗打的这么紧，他们家整天整宿的围着一群人磕头烧香，那要不是汉奸，挖了我的眼睛当

炮儿渣！”

隔着一条大道，在两块大场院里，子午镇的男女自卫队对起操来。男自卫队队员们，不愿意在自己的妻子姐妹面前丢人，他们竭力把队形弄得整齐，脚步着地有力，队长竭力把口令喊得洪亮，可是终于夺不过那些老少观众来，他们还是围着妇女队看。

男子们扔起手榴弹来，提议和妇女们比赛，这一下把那些孩子们引逗过来了，还回过头，闹蠢样儿，对妇女们喊叫讨战。

妇女们低了头，她们从来也没摸过这个玩意儿。春儿挺挺身子过去了，她说：

“我们还没练习过，我扔两下试试！”

她把手榴弹冲着场边那一行柳树投去，第三次，就超过了男子们的纪录。

散操的时候，春儿站在妇女自卫队的前面说：

“今天前晌，村北里已经听见敌人的汽车叫唤，藏藏躲躲，早寻婆家，全不是我们的好办法，我们妇女躲到哪里，还不是叫日本欺侮，还不是一刀菜？我们要拿起刀枪自卫！我们的队伍到前面打仗去了，那里面有我们的丈夫，也有我们的兄弟，我们要帮助他们，和他们同心合力，就像在家里在地里做活的时候一样。”

野外起了风，摇撼着场边的一排柳树，柳树知

道，狂风里已经有了春天的消息，地心的春天的温暖已经涌到它身上来，春天的浆液，已经在它们的嫩枝里涨满，就像平原的青年妇女的身体里，激动着新的战斗的血液一样。

二十七

第二天，是腊月二十七，子午镇年终大集日。往年，不到天明，小贩们就推车挑担，来占地段，大街两旁是柿饼、核桃、黑枣儿，中间排满小车板床，摆的是海带、粉条儿、蘑菇。附近各村的农民，带领着孩子们，从四面八方的道路上奔着这里来了，人多得推挤不动，从东头走到西头，就要半天的时间。

卖年画儿的把画挂在客店的梢门洞里，卖花炮的占了村西大场。五龙堂里的花炮最有名，他们套着大车，打扮的像卖艺的，用红布包着头，用花枪挑着鞭炮，站在车厢上接连不断的放，大声宣传，互相比赛，好像是来争名，并不是做买卖。

今年大不同了，日本兵占了铁路线，西边的山货和东边的海货，都运不过来，集市冷落了很多，五龙堂的花炮，上市的也很少。

往年，五龙堂的变吉哥，总是在春儿家的门口，

摆个起花摊儿，头天晚上，春儿就给他把地方打扫干净，中午买卖忙，还给他端出碗便饭来。变吉哥做的起花，起的直，升的高，响的脆，还带着炮打灯。五个火球儿在天空极高的地方飘下来，像分开下垂的花瓣儿。临到晚上收摊，变吉哥就给春儿留下这么一把小起花，算是“地铺钱”。

今年，变吉哥没有扎起花，他担了一筐小灯笼来，灯笼做的很精致，画儿的颜色水色都很新鲜，还有走马灯，他装好一盏，挂在筐系儿上。前面跑着一群日本鬼子，在后面追赶的是八路军，男男女女的老百姓，背着铁铲大镐去挖沟，鬼子就跌跟头马爬的受擒了。

立时就围上一群孩子来，用买花炮的钱买了去，变吉哥叫他们拿好，别碰破了，还告诉他们点灯的办法。

春儿抱着一捆线子从家里出来，笑着问：

“怎么你不扎起花了？”

变吉哥说：

“你没到区上开会，你村的武委会主任没给你传达？”

“传达什么呀？”春儿问。

“你们村子大，工作可落后哩！”变吉哥说，“各村不是成立了武委会吗，今年禁止装花裹炮，留下硝

磺火药，制造地雷手榴弹，好打日本。”

“这个我早就听见说了。”春儿笑着说。

“你早就听见说了，还问我为什么不扎起花！”变吉哥说，“上级的布置，我们能当耳旁风，不严格执行吗？”

“那你还弄这个玩意儿干什么？是为的换饽饽吃呀！”春儿掩着嘴笑。

“你不要小看这个！”变吉哥红了脸，“这是宣传工作。买一个回去，大年三十儿起五更，挂在门口，出来进去的人全能受教育，不比买别的有意思？”

“还是变吉哥，”春儿笑着，“又有认识，又有手艺儿！”

“我大大小小也是个抗日的干部，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！”变吉哥安排着一个又大又好的灯笼说，“回来把这个送给你，过年就挂在这篱笆门上！”

春儿问：

“变吉哥，你现在是个什么干部呀？”

“五龙堂农民抗日救国会的宣传部长！”变吉哥郑重的回答。

“想起来了，”春儿说，“有个事儿和你商量一下，我们想成立一个识字班，你当我们的先生吧！”

“唉！你们村的大学毕业生，像下了雨的蘑菇，一

层一片，怎么单单请我？”变吉哥说，“我可不敢在圣人门前卖字画呀！”

“那些财主秧子们顶难对付，”春儿说，“你不去找他们，他们说你瞧不起他，你低声下气的去求他吧，他又拿着卖了。在背后造谣言，看哈哈笑儿，才是他们的拿手戏。有几个好的，全出去工作了，剩下一帮小泡荒子儿，教起书来，也不见得行，谁知道他能把我们教好，还是教坏了呢？再说好人家的妇女，谁愿意叫他们教？那些贼眉鼠眼，屁屁溜溜的，你不招惹他，他还瞅空儿楞着眼看你，好像解馋似的，再叫他对着脸讲起书来，他会连他家的大门冲哪边开，都忘掉了哩！我们不找他们，你是咱这一带的土圣人，我们就是请你，咱两村离的这么近，像一村两头，你每天晚上来教我们一会儿就行了！”

“你说的也有理。”变吉哥说，“抗日的道理，我不敢说比谁知道的透彻，可是心气儿高，立场准没错。我回去和我们主任讨论讨论，看合不合组织系统，我先不能自作主张。”

“好吧！我先去卖线子，等散集的时候，你到我家里，我还有件事儿求你哩！”春儿说着，摇摆着头发欢跳的跑到线子市上去了。

她卖了线子，到洋布棚买了七尺花布回来，已经晌午错，变吉哥也收了摊儿，把筐子挑到春儿的院

里。春儿先进屋扫了扫炕，放上小桌擦抹干净，请变吉哥炕上坐。她又去烧了一壶水，倒了一碗放在桌子上。变吉哥说：

“你这是待新客吗，这么费事？”

“我求你给我写封信。”春儿说，“我去买纸，捎着借笔砚来。”

“我什么也带着哩，你把我那筐提进来就行了！”变吉哥说，“谁求我写信，我也是赔上纸墨的。”

他盘着腿坐在小桌旁边，铺摊开纸。春儿立在炕沿边，给他研着墨。他问：

“给谁写呀，给你父亲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春儿说，“给一个人。”

“怎么个称呼？”变吉哥提着笔问。

“你这么写，”春儿红着脸，在纸上指划着，“你写上我姐夫的名字，可是上面的口气儿，要说给另外一个人听。”

“我没有写过这样的信。指桑树骂槐树，那怎么个写法哩！”变吉哥把笔一放说，“平常说话行，嘴里说着，眼里斜着。在信上就难了！”

“写吧，不难。”春儿说，“你先写上俺姐夫的名字。”

“写上了。”变吉哥说，“下边怎么说？”

“下边写，”春儿说，“我问他们这次打仗打胜了

没有？我又给他做了一双鞋，他穿不穿？我在家里也没闲着，道沟挖好了，开春就去拆城。俺姐姐和她公公都结实。不识字是很遭难的，叫他学习认字。”

“唉，”变吉哥连忙写着说，“我这不是写信，我这是做开会记录！可你也得有个前后条理呀，叫他学习认字，高庆山的文化不是不低了吗？”

“这是和别人说话，你照着我的口气儿写就行。”春儿说，“下面写，我现在是妇女自卫队的队长，我们出过操，正月里，就成立识字班，我也要去上学。麦子雨水大，明年收成错不了，只要仗打的好，不叫日本鬼子过来就行！完了。”

“完了。”变吉哥跟着说，“这不是信，这是天书！”

二十八

春儿把信带在身上，到姐姐家去，好找个顺便人捎走，另外，心里有些事，要对姐姐谈谈。

到了五龙堂，堤坡上姐姐家的小屋，整个叫太阳照着，几只山羊，卧在墙边晒暖儿。

小屋的门紧掩着，春儿听听：屋里不只姐姐一个人，好几个妇女在说话，她推了推门。

“谁呀？”屋里安静下来，听见姐姐下炕来问。

“我。”春儿说，“大白天上着门子干什么？”

“我妹子来了。”姐姐和别的人说。

“她是谁？”一个妇女小声问。

“还不是。”姐姐也小声说，“你们先等一等，我出去看看。”

姐姐慢慢开开门出来，随手又把门带上，对春儿说：

“你这个时候跑来干什么？”

“哈！上你这里来，还得看看皇历，择择好晌？”春儿一下子不高兴起来。

“我们正在开会呀。”姐姐笑着说。

“开会是什么稀罕儿？”春儿说，“区上的会我也开过，县里的会我也开过，就没见过你们这小小的五龙堂开会，关起门子来！是占房，怕人冲犯了？”

姐姐说：

“好妹子，你先到河滩里玩一会儿，散了会我叫你！”

“我偏进去看看，净是些什么贵人？我不信我就见不得她们！”春儿噘着嘴，往前迈一步。

“你看你这孩子，人家开的秘密会！”姐姐拦住她，“是党的小组会！”

春儿站住了，她的脸红了一下。对姐姐说：

“好吧，我就听你说，去玩一会儿。”

“好孩子，”姐姐给她拍拍身上的土说，“我们很快就开完了，你可不要走！”

姐姐转身进屋里去了，春儿离开那里，她嘴里“哦，哦，”的招呼着那几只山羊，羊们爬起，跟着她来了，她带它们到河滩里去找草吃。

阳光铺在河滩上，春儿有些发闷。党的名字在她心里响着，有一种新奇的热烈的感觉。这个贫苦的、从小就缺少亲人爱抚和照顾的女孩子，很容易被这

个名字吸引，就像春水阳光和花草一样。

她知道姐姐和姐夫都是共产党员，芒种也可能是了。凡是她的亲人，都参加了这个组织，就是她还没有。关于共产主义，这个女孩子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呢？很难测验。她能记忆的十年前的一次暴动，是为了穷苦的人们，在她感到亡国的痛苦的时候，他们又回来组织了抗日的队伍，进行广泛的动员，建立了政权，并且支持她打赢了官司。她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些：共产党保证了她的生活的向上和她的理想的发扬。

她要加入这个队伍，为它工作，并用不着别人招呼一声。她已经参加了妇女救国会，参加了妇女自卫队，早就认定自己是这组织里的一员了，可是现在看来，还有着—个距离，她被姐姐关在了门的外边。

她要参加党，要和姐姐说明这个愿望。她很快就决定了这个愿望，她抚摩着大母羊身上厚厚的洁净的绒毛，抬起头来，面对着太阳。

姐姐送走了别人，回头站在堤坡上向她招手，她带着羊群跑了回去。

“你不要不高兴，”姐姐笑着说，“不是组织里的人，就是亲生爹娘，夫妻两口子，也不行哩！”

“别充大人灯了，”春儿说，“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子，什么理儿也不解哩！”

“我怕你不明白，”姐姐说，“离年傍近了，你不在家里操扯操扯吃的，跑来干什么？”

“可说的是嘛！”春儿笑着说，“就为的是在家里吃不上，才跑到你这里来，站到大河滩里去喝冷风呀！要不，给你家当个羊倌，求姐姐赏碗面吃吧！”

“我知道你多心了！”姐姐说，“妇女自卫队的工作，你领导的起来不？”

“凑合子事呗，反正什么也做了，”春儿笑着掏出信来，“你给找个可靠的人捎了去！”

“给谁的信呀？”姐姐问。

“给我姐夫，另外也捎带着芒种。”春儿背过脸去，引逗那个爬在炕上的关东小孩去了。

“那天我公公回来，说起给你寻婆家的事儿来。”姐姐说，“十八九的人了，你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”

“什么主意？”春儿把脸凑到孩子的脸上说，“这孩子可胖多了，就是不忙。”

“是心里不忙，还是嘴上不忙？”姐姐问。

“两不忙。”春儿站直了身子，面对着姐姐，“我心里着急的是另外一件事！”

“什么事呀？”姐姐问。

“姐姐！”春儿庄重热情的说，“你介绍我入党吧，我想当一个共产党员！”

姐姐很高兴的答应了她。

春儿回到家来，热了一点剩饭吃。天黑了，她上好篱笆门，堵好鸡窝，点着小煤油灯，又坐在炕上纺线。

她摇着纺车，很多事情，在她眼前展开，心里很高兴。

她思想一些关于妇女的问题，她的知识不多，心里只有那些小时听书看戏得来的故事。在灯影里，她望着墙上那几张旧画儿，丈夫投军打仗去了，妻子苦守在家，并不变心。每一幅的情节，她都懂得，也能猜出那女人说的什么，想的是什么。“可是都没有我们好，我们除了纺线织布，不是还练习打仗吗？”

窗户纸微微的震动，她听见远远的地方，有枪炮的声音。她停下纺车，从炕上下来，走到院里，又从那架小梯子上，爬到房顶上来。

她立在烟突的旁边，头顶上是满天的星星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霜雪，落在了屋檐上。东北天角那里，有一团火光，枪炮的声音，越过茫茫的田野。我们的部队在那里和敌人接火了，她的心跳动着，盼望自己人的胜利。在严寒的战斗的夜晚，一个农村女孩子的心，通过祖国神圣的天空、银河和星斗，和前方的战士相连在一起。

二十九

不管季节早晚，平原的人们，正月初一这天，就是春天到了。在这一天，他们才能脱去那穿了一冬天的破旧棉袄。

三十晚上，春儿看看没风，就把变吉哥送给她的灯笼，挂在了篱笆门上。回到屋里，她把过年要换的新衣服，全放在枕头边，怎样也睡不着。荒乱年月，五更起的也晚，当她听到邻舍家的小孩放了一声鞭炮的时候，就爬了起来。

她开开房门，点着灯笼，高兴自己又长了一岁。在灯光底下，她看见街上挤满了队伍，在她家门前，有一排人坐在地下，抱着枪枝靠着土墙休息。

家家门口挂起来的灯笼照耀着他们，村里办公的人们全到街上来了，春儿正和战士们说着话，老常迈着大步过来：

“春儿，快着点，我们去给队伍号房子！”

“号房子要我去干什么？”春儿说，“又不是给妇女派活儿！”

“什么工作也离不开妇女！”老常说。

春儿跟着他走了几家，动员着人们腾出房子来，老常和房主们说：

“腾间暖和屋儿，把炕扫扫，咱们在那里挤插着住两天，也不要紧，叫战士们好好休息休息。人家打了十几天仗，一夜走了一百多里，到现在还水米不曾沾牙，这么冷天，全坐在街上等着哩！”

房主们说：

“你走吧，没错儿！孩子的娘！把炕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一下，把尿盆子端出来！”

老常说：

“不碍手的东西，就不要动，这个队伍，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！”

他们来到田大瞎子家里，田大瞎子的老婆正看着做饭，好几篋帘饺子放在锅台上，一听说军队住房，慌手慌脚又把饺子端回里间去了，出来说：

“真是，过个年也不叫人安生！大年初一吃饺子没外人儿，怎么能住兵呀，这有多么背兴吧，你说！”

老常说：

“人家军队也有家，出来打仗，还不是为了大伙儿？这时候，还说什么初一十五！”

“你看那屋里不是堆的满满的，插下人去了吗？你当着干部，就一点儿也不照顾当家的？”田大瞎子的老婆抱怨着。

“就是你们家房子多，还拉扯哪个？把东西厢房全腾出来吧，我看四条大炕，能盛一个连！”

老常说着出来，就又到了俗儿家里，她家的大门关的挺紧。老常拍打，喊叫，半天老蒋才开门出来，丧声丧气的说：

“老常，大五更里，你别这么砸门子敲窗户，呼卢喊叫的，我嫌冲了一年的运气！”

“来了军队！”老常大声说，“叫你腾一间房子！”

“我家又不开店，哪来的闲房子？”老蒋说。

“你满共两口人，怎么着腾挪不开呀？”老常说，“叫俗儿并并！”

“你们来的不巧，”老蒋说，“俗儿半夜里就占了房！”

老常一怔。春儿说：

“怎么先前一点不显，也没听见说过呀？”

“你一个闺女家，什么事也得去报告你？”老蒋说。

“我不信。”春儿说着就往院里走。

北房三间，俗儿那一间暗着，窗户上，遮着大厚的被子，春儿站在窗户下听了听，俗儿正紧一声慢一

声的在炕上哼哼。

“怎么样？”老蒋笑着说，“没骗你们吧，要不是赶上这个节骨眼儿，住间房那算什么哩！”

“我就是不信！”春儿想了一想，说着就要推门，老蒋一把拦住她：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，像个姑娘的来头吗？你不能进去，刚下生的孩子，见不得阴人，再说，那是什么好味气儿呀？”

春儿不听他，硬推开门进去，从口袋里掏出洋火来，点着梳头匣上刚刚吹熄的灯，伸手就向俗儿的被窝里一摸。俗儿一撩大红被子坐起来，穿着浑身过年的鲜亮衣裳，自己先忍不住笑了。

老常在一边说：“这是一个话柄儿：老蒋的闺女占房，根本没有那么一档子事！”

老蒋对于俗儿这一笑，非常不满，只好红着脸说：

“叫军队来住吧，咱们这人家，什么事儿也好办！”

号好了房子，太阳就出来了，春儿回到家里，看见有一匹大青马系在窗棂儿上。

“谁的马呀？”她说。

“我的！”从她屋里跑出一个年轻的兵来，就是芒种。

春儿的脸红了。

“怎么你出去也不锁门？”芒种问。

“街上这么多的队伍，还怕有做贼的？”春儿笑着说，“你有了马骑，是升了官儿吗？”

“不知道是升不升，”芒种说，“我当了骑兵通讯班的班长。”

“我去打桶水来饮饮它吧！”春儿说，“你看跑的四蹄子流水！”

“不要饮，”芒种说，“叫它歇歇就行了，我还要到别处送信去哩！”

“那我就先给你煮饺子去，”春儿在院里抱了一把秫秸，“你一准还没有吃饭。”

芒种跟进来说：

“上级有命令，不许吃老百姓的饺子。”

春儿说：“上级批评你，我就说是我愿意叫你吃！”

煮熟了，她捞了岗尖的一碗，递给芒种说：

“这回打仗打的怎么样？”

“在黄土坡打了一个胜仗，得了一些枪枝。”芒种说，“敌人增了兵，我们就和他转起圈子来，司令部转移到你们村里来了，吃过饭，你看看我们的吕司令去吧！”

“我怎么能见到人家？”春儿说，“我姐夫哩？”

“我们还住县城里。”芒种说。

“高疤哩？”春儿又问。

芒种说：

“也在队上，这回打仗很勇敢，看以后怎么样吧。”

芒种吃饱了，放下碗就要走。春儿说：

“等一等，小心叫风顶了。”

“当兵的没那么娇嫩。”芒种说着出来，解开马匹，牵出篱笆门，窜了上去，马在春儿跟前，打了几个圈儿。

“你怎么这么急呀，”春儿说，“我还有话和你说哩！”

“什么话？”芒种勒着马问。

“过了年，你多大了？”春儿仰着头问。

“十九岁了，”芒种说，“你忘了，咱两个是同岁？”

“你长的像个大人了哩！”春儿低下头来说。

“在队上人们还叫我小鬼哩！”芒种笑着说，“我们年轻，要好好学习哩！”

“我能到军队上去吗？”春儿问。

“怎么不能，要那样才好哩！”芒种把缰绳一松，马从堤坡上跑开了。

三十

春儿想到街上玩玩，今年的大街上，显着新鲜，在穿着红绿衣裳的妇女孩子中间，掺杂着许多穿灰棉军装的战士。战士们分头打扫着街道，农民和他们争夺着扫帚，他们说什么也不休息，农民们只好另找家什来帮助，子午镇从来没有这么干净整齐过。

十字街口，有几个战士提着灰桶，在黄土墙上描画抗日的标语，高翔引逗着一群小孩子唱歌，这一群孩子，平日总玩不到一块儿，今天在这个八路军面前，站的齐齐整整，唱歌的时候，也知道互相照顾。

在那边，有一个高个儿的军人，和农民说话，眼睛和声音，都很有神采。衣服也比较整齐，他多穿一件皮领的大衣，脚下是一双旧皮鞋。

有一个妇女小声告诉春儿说：

“那就是吕正操！”

春儿远远的站住，细细打量人民自卫军的司令

员，说起来，这也是她的上级呀，想不到这样大的人物，能到子午镇来。

吕司令和农民们说，破路的工作，做的不彻底。这样小的壕坑，只能挡住拉庄稼的大车，挡不住敌人的汽车和坦克，必须把大道挖成深沟，把平原变成山地。又问村里人民武装自卫的情形，农民们说：

“都成立起来了，人马也整齐，就是缺少枪枝，吕司令！你从队伍上匀给我们一点吧，破旧的我们也不嫌。”

吕司令答应了这个要求，春儿一高兴，觉得自己也该上前去说两句话，她慢慢走到吕司令的身后边。

“春儿来干什么？”一个年老的农民说，“也想要点东西？”

吕司令转过身来，看见了这个女孩子。在冀中，他遇见过很多这样的女孩子，她们的要求更不好驳回。

“我是这村的妇女自卫队的队长。”春儿立正了笑着说。

“我把枪枝送给村里，自然也有你们的份儿。”吕司令说。

“除去这个，我还有个要求。”春儿说，“我们不会排操打仗，吕司令教教我们吧，我就去集合人！”

“等明天吧，我派一个连长来教你们。”吕司令笑

着说。

“军队上要女兵不要？”春儿问。

“你愿意去打仗？”吕司令笑着说，“现在还没有招收女战士，我们政治部成立了一个剧团，你要是喜欢演戏唱歌，可以去报名。”

“俺不学那个！”春儿转身跑到妇女群里去了，妇女们都冲着她笑。

这天晚上，在村西大场院里，开了一个军民联欢晚会，五龙堂的老百姓也赶来了。吕司令、高翔在会上讲话，动员人民，政治部的火线剧团演出了节目。春儿和秋分，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看，高庆山和芒种也从城里赶来了，拉着马站在群众的后面。戏出都很简单，春儿第一次看到日本鬼子的形状。子午镇的鼓乐，也搬到台上响动了一阵，又把军属高四海大伯拉上去，请他演奏大管。老人望着台下这些军队和群众，高兴极了，他吹起大管来，天空的薄云消失，星月更光明，草木抽枝发芽，滹沱河的流水安静，吹完了，人人叫好。他接着做了一番抗日的宣传，最后大声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天下！”

春儿和秋分也觉到：今天这才是自己的大会，身边站立着自己的人，听的看的也都是自己心爱的戏文。

三十一

目前，从五台山开始的，以阜平城为中心的，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形成了。冀中区中心十几县的抗日政权，渐渐健全起来；边缘地区自发的抗日武装，还在加紧的整编着。冀中区行政公署正在积极筹备。人民自卫军的司令部和政治部住在子午镇，这一带村庄就成了冀中区抗日战争的心脏，新鲜的有力的血液，从这里周流各地。每天，有从远地来汇报工作的，有出发到边缘检查的，有边区来传达命令的，子午镇大街上，来来往往的尽是抗日的人员。车辆马匹不断的从这里经过，输送着枪枝子弹和给养。现在，这个村庄，是十分重要，也十分热闹了。惊蛰以后，夜里落了一场春雨，早晨就晴了，杨花飘落着，柳树发芽，田地里到处是潮湿的黄绿的颜色，特别是那些柳树，嫩枝在风里摇摆，好像是要把它那枝叶的颜色，扬送到天空里去。这样早，战士们就换上单军

装，军装也是黄绿色。骑马的通讯兵，从子午镇街里跑出来，在反浆的松软的大道上奔跑。场院里，河滩上，是战士练兵的歌声。

各村正做着拆城的准备工作。春儿头一天晚上，拿一把小笤帚放在碾台上，占好碾子，打早起插上一条新榆木推碾棍，推下了自己半个月的吃喝，装在一个小布口袋里。五龙堂和子午镇的民工，编成了一个大队，她和姐姐约好，到那天一块儿进城。

进城的日期决定了，是三月初一。头一天晚上，春儿就背上粮食，带了一身替换的衣服，跑到姐姐家去，她的心情不像是去工作，倒有点儿像去赶庙会。早晨起来，高四海在堤坡上，拾掇好一辆手推的小土车，把拆城的家具、伙食，还有那个东北小孩儿，捆在上面，车前系上一条长长的绳儿，叫春儿和秋分替换拉着，老人驾起绊带，吱扭吱扭的奔城里来了。

各村的人马车辆，全奔着城里去，在一条平坦的抄近的小道上，手推的小车，联成了一条线，响成了一个声音，热烈的做着比赛。高四海下身穿着棉裤，上身只穿一件破单褂，脊背上流着汗。春儿肩上搭一条毛巾，脸胀得通红。路过高坡，老人叫春儿把绳拉紧，下坡的时候，就叫她松下来。

一进西关，买卖家和老百姓全挤到街上来，看热闹，县政府已经分别给民工们预备好了下处，春儿和

秋分一家就住在城根一家小店里。

吃过中午饭，大家就背上家具跑到城上去看本村本组的尺丈去了，子午镇和五龙堂分了西北城角那一段，外边是护城河，里边是圣姑庙。李佩钟同着几个县干部，分头给围在城墙上的民工们讲话。李佩钟来到春儿她们这一队，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台上说：

“乡亲们：我们要动工拆城了，不用我说，大家全明白，为什么要把这好好的城墙拆掉？我们县里的城墙，修建一千多年了，修的很好，周围的树木也很多，你们住在乡下，赶集进城，很远就望见了这高大的城墙，森阴的树木，雾气腾腾，好像有很大的瑞气。提起拆城，起初大家都舍不得，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东西，这是祖先遗留给全县人民的财产，可是我们现在要忍心把它拆掉，就像在我们平平整整的田地里，要忍心毁弃麦苗，挖下一丈多深的沟壕一样。这是因为日本侵略我们，我们艰苦的进行战争，要长期的打下去，直到最后的胜利。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，一定要替我们的祖先增光，为我们的后代造福。我们现在把城拆掉，当你们挖一块砖头、掘一方土的时候，就狠狠的想到日本吧！等到把敌人赶走，我们再来建设，把道路上的沟壕填平，把拆毁的城墙修起！”

“到那时候，太平了，还修城干什么？把它修成电车道，要不就栽上花草，修成环城公园！”变吉哥

到过大城市，忽然想到这里，就打断了县长的讲话。

“先说眼下吧，”挤在前面的、子午镇的民工队长老常说，“把这玩意拆了，平平它，不用说别的，栽上大麻子，秋后下来，咱两个村子吃油，全不遭难了。可是这些砖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这些砖拆下来，”李佩钟说，“哪村拆的归哪村，拉了回去，合个便宜价儿，卖给那些贫苦的抗属，折变了钱，各村添办些武器枪枝！”

“好极了！”群众喊着，“干吧，一句话，一切为了抗日！”

大家分散开，刚要动手，沿着城墙走过三个穿马褂长袍的绅士来，领头是李佩钟的父亲大高个子李菊人。他们手里都玩着一件小东西，李菊人手里是两个油光光的核桃，第二个是红木腰子，第三个是黑色的草珠子。他们向前紧走两步，一齐把手举起，里外摇摆着，对群众说：

“且慢！我们有话和县长说。”

李佩钟站在那里不动，三个老头儿包围了她，说：

“我们代表城关绅商，有个建议，来向县长请示！”

“有事情，回头到县政府去谈吧，我现在很忙。”李佩钟说。

“十分紧迫哩，县长！”拿腰子的老头儿说，“我们请你收回拆城的成命。”

“什么！你们不赞成拆城？”李佩钟问。

李菊人上前一步说：

“古来争战，非攻即守，我们的武器既然不如日本，自然是防守第一。从县志上看，我县城修在宋朝，高厚雄固，实在是一方的屏障。县长不率领军民固守，反倒下令拆除，日本一旦攻来，请问把全县城生灵，如何安置？”

李菊人领了半辈子戏班儿，不但他的见识、学问，全从戏台戏本上得来，就是他的言谈举动，也常常给人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。全县好看戏的人差不多全认识他，民工们扛着铁铲大镐围了上来。

“我们不是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，把道理都讲通了吗？”李佩钟说，“那天开会你们没参加？”

“那天我偶感风寒，未能出席。”李菊人抱歉的说。

李佩钟说：

“我们进行的是主动的游击战，不是被动的防御战。拆除城墙，是为了不容进犯的敌人，在我们的国土上站脚停留。”

“那可以进行野战，”李菊人截住说，“昔日我轩辕黄帝，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，一战成功，这是有历

史记载的，可从没听说拆城！”

李佩钟说：

“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艰难困苦的战斗，这战争关系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，这战争由革命的政党领导，动员全体人民来参加。很多事情，自然是旧书本上查不出来的。”

“把城墙拆掉了，城关这么多的老百姓到哪里去？”拿草珠子的老头儿鼓了鼓气问。

“假如敌人占据这里，我们就动员老百姓转移到四乡里去，给他们安排吃饭和住居的地方。有良心的中国人，不会同敌人住在一起。”

“那样容易吗？”李菊人说，“城关这些商家店铺，房屋财产，谁能舍得下？”

“是敌人逼迫着我们舍得下，”李佩钟说，“看看我们那些战士们吧，他们背起枪来，把一切都舍弃了！这年月就只有一条光荣的道路，坚决抗日，不怕牺牲！”

“我也是为你着想，”李菊人降低声音说，“你是一县之长；你领导着拆毁了县城，将来的历史上要怎样记载呢？”

“历史上只会记载我们领导着人民，艰苦奋斗的战胜了日本侵略者，不会记载别的了。”李佩钟说，“对！每个人都想想历史的判断也不错！”

三个老头儿还要麻烦，群众等不及了，乱嚷嚷起来：

“这点儿道理，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，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？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，快闪开吧！”

他们一哄散开，镐铲乱动，尘土飞扬，笼罩了全城，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，除去李菊人，那两个还转回身来，向县长鞠躬告别，从原道走回去了。一路走着，拿草珠子的老头儿感叹的说：

“我们每天起来，连个遛画眉绕弯儿的地方也没有了！”

拿腰子的说：

“李老菊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哩！”

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，唱起戏来。

三十二

三个老头儿从城墙上下来，到了李菊人的家里，一进院子就听见李菊人的女人正在屋里唱《玉堂春》。

李菊人的宅院，有些没落地主的性质。大门的黑漆剥落了，影壁前面的养鱼缸里，栽种着几棵大葱，也早就冻干。正房窗台前面，原有两棵高大的石榴树，因为冬天没人养护，死了一棵。进屋里，是一股强烈的发霉的羊肉馅味，一撩门帘，这个唱戏出身的、李菊人的小婆儿，李佩钟的母亲，正坐在炕当中包饺子，她的艺名叫郭雁声。

她的两手粘着面，身子前面的案板上摆满了面剂、肉馅、蒜皮和葱头。她不过四十岁，长的少像，脸蛋儿很白。她盘着腿儿坐着，绣花的红缎子鞋尖儿，从屁股两边露出来。

“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，我一帘饺子还没捏满

哩！”她望着三个老头儿笑着说。

“别提了，快打点水擦擦脸！”李菊人说，“不光碰了一鼻子灰，还弄了一身土！”

“煤火上铜壶里是热水，你自己倒吧！”女人说，“你们见到佩钟吗？”

“见是见到了，”拿腰子的老头儿说，“所请一概不准！”

“怎么样，我猜的不错吧，”女人笑着拍拍手上的面，“那小妮子邪性着哩！”

“我们当时把你也搬去就好了，”老头儿又说，“当娘的说说她，或者有点儿效力！”

“我去了，还不是一样晾着，”女人说，“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，谁还管的了谁呢？比如说我吧，九岁上就叫人卖到戏班子上，到眼下爹娘连个音信也没有！”说着，眼圈儿就红了。

“别倒那千年的布节万年的穗子了，”李菊人擦完脸说，“我们出了正月，就安排着到北京去住，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！”

“那里不是叫日本占了？”女人说，“躲都躲不及，还往老虎嘴里送食儿去！”

李菊人说：

“那里有日本，这里有八路军，全不大好受，两头儿挤，我看还是到北京松快点。咱们把这里的铺子

合对了，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，到北京混他两年，那里有钱的人多，不像这里，什么事儿也找到咱头上，光这个合理负担就够呛！住在北京，实在混不住了，你还可以搭个班唱两天戏！”

“老的快没牙了，谁还爱听你唱戏哩！”女人说，“这么大的过活，就扔下不管？看看风头儿，再搬舵吧！”

“按说哩，佩钟在这里边，我不该讲，”拿腰子的老头儿说，“别看他们胡闹，长的了吗？”

“别提那妮子，”李菊人说，“她不是我的女儿，她是石头缝儿里爆出来的！不怕闹的欢，就怕拉清单，你说的对！”

“那你们就别愁了，”女人说，“快帮我捏饺子吧！”

“我们还有事儿，”拿草珠子的老头儿说，“要不，你就还接着唱你的《玉堂春》，我们三个坐在这里审你！”

“呸！回家审你太太去吧，问她这几天跟谁过来着？”女人笑着说。

三个绅士继续讨论关于拆城的对策。拿草珠子的说：

“看这样，他们是不守这县城了。那些穷光蛋，没家没业的人们，可以跟他们打游击去，你说我们这些

户，搬不动，挪不动的，到底怎么办呀？”

“不搬！”拿腰子的说，“这有多么干脆。”

“你不搬，他就说你是汉奸，这名帖儿可不大好听！”拿草珠子的说。

“到那时候，他们不知道早跑到哪里去了，还顾不上叫这叫那哩！”拿腰子的说，“目前是怎么想法不叫他们拆城，拆城对咱们终归不利！”

“已经在那里扑腾着拆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？”李菊人说。

“显个灵验给他们看！老百姓一害怕就拆着没劲了。”拿腰子的小声说。

“叫谁显灵验呢？”李菊人问。

“我们分头去进行，”拿腰子的对拿草珠子的说，“你到圣姑庙，叫老道姑在这两天里使个招儿，迷惑那些乡下来的妇女们，我和老菊去西关天主堂找外国神父，也叫他想个法子，威吓那些男人小伙子们！你们看怎样？”

“真乃妙计！”李菊人说着就又和他们出去了。

“你们造罪吧！”女人回脸对着窗户上的小镜儿说。

圣姑庙在北门里，这是一座工程浩大的庙宇，修在一座极高的土台子上，有一百零八级白石的阶梯。河北省流传王莽赶刘秀的故事，说赶到这里，看看拿

住，圣姑正在井口打水，放过刘秀，摘下头上的簪子一划，就地成了一条大河，就是现在的滹沱河。是一段形式美丽的传说，封建统治者利用了这个传说，鼓励了这个迷信。圣姑庙因为修建的庄严，粉画的秀丽，远近朝拜，香火很盛。圣姑的塑像，就是一个精采出众的艺术作品，老百姓认定这是圣姑的真身，她那灵活的富于情感的眼睛，注意和安慰了每个膜拜的人。庙里的道姑，又多方面铺张，给圣姑安排了婆家娘家的谱系，她是受婆婆虐待的，娘家是河北里河村一个贫苦的农家，每年夏天，里河村的群众，要迎接圣姑过河歇伏。

妇女们特别迷信圣姑，因为她出身贫苦并且受婆婆虐待。加上这一带，旱涝连年，兵灾不断，在那黑暗的年月，圣姑庙就成了附近几县妇女信仰的寄托。

关于西关的天主教堂，也有一段传说，不过是悲惨一些罢了。义和团事件的第二年，两个外国教士来到这个县城，看好一家小店，要强买这片庄基，并且打伤了那年老的店主。附近的农民，激于一种崇高的情感，背上火枪火炮来帮助，他们在西关的土寨后面，和鬼子调来的洋枪队开了火，整打了三天三夜，没让他们进来，农民的妻子儿女来往运送着火药和饭食。县知事出卖了抗战的志士，叫马快手在背后夹

击，农民们失败了，洋鬼子进城，杀死了那老店主和七个不离寨墙的青年农民，没等扫清他们的血迹，外国人就强迫着居民替他们修盖起教堂，安上了十字架。

自然，以后这教也传布开了，附近很多农民也在教。可是，他们忘不了这段经过，五十岁上下的人，都还记得死者的姓名和容貌，能演说当时火热的场面和悲惨的结局。大涝之年，寸草不收，外国人弄些高粱来，设粥厂，每个人赈济几斤山药，农民们就在教，他们不明教义，一般的都说在的是山药教。

抗战刚刚开始，农民们也曾向圣姑庙和天主堂求助，天主堂只答应他们，日本人来了，教友可以进教堂避难，但是不久就听说日本人打进了正定的教堂，还强奸了修女。至于圣姑庙上的道姑，就只能说这是劫数，圣姑也到峨眉避难去了。

当时的农民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才坚决的走上抗日的道路，并且建立了政治信仰。

三十三

很快，周围城墙的垛口就拆的不见了。子午镇民工队，并起大沙篙，斜倚在城墙外面，妇女们把送过来的砖，一个连一个滑到护城河外面的平地上去，那里的老年人们垒了起来，叫大车拉走。

城墙上有一层厚厚的石灰皮，很不容易掀起，大镐落在上面，迸起火星儿来，震的小伙子们的虎口痛。后来想法凿成小方块，才一块一块起下来。李佩钟也挽起袖子，帮助人们搬运那些灰块，来回两趟，她就气喘起来，脸也红了，手也碰破了。

“县长歇息歇息吧！”挑着大筐砖头的民工们，在她身边走过去说，“你什么时候干过这个哩！”

“我来锻炼一下！”李佩钟笑着说，用一块白手绢把手包了起来，继续的搬运。看见春儿也挑着一副筐头，她说：“春儿，给我找副筐头，我们两个比赛吧！”

“好呀！”春儿笑着说，“识文断字，解决问题儿，

我不敢和你比，要说是担担挑挑，干出力气的活儿，我可不让你！”

她们说笑着，奔跑着，比赛着。男人们望着她们笑，队长老常督促说：

“别光顾的看了，快响应县长的号召，加油吧！”

只要有女人在队伍里严肃的工作，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员。男人们，镐举的更高，铁铲下去的更有力量，来回的脚步更迅速了。

春儿年轻又有点调皮。她只顾争胜，忘记了迁就别人，她拉扯着李佩钟，来回像飞的一样，任凭汗水把棉袄湿透，她不住的叫着刺激性的口号：

“县长，看谁坐飞机！你不要当乌龟呀！”

李佩钟的头发乱了，嘴唇有点儿发白，头重眼黑，脊梁上的汗珠儿发凉。两条腿不听使唤，摇摆的像拌豆腐的筷子。

“春儿！”老常劝告说，“叫县长休息休息，她不像我们，就这么一骨突一块的活儿，有多少公事等着她办理呀！”

春儿才放下担子，拉着李佩钟到姐姐那里，喝水休息去了。

民工队里也有老蒋，他斜了李佩钟一眼，对人们小声说：

“你们看看：哪像个县长的来头儿？拿着一个大

学毕业的学生，城里李家的闺女，子午镇田家的儿妇，一点儿沉稳劲也没有！整天和那拾柴挑菜的毛丫头，在一块儿瞎掺伙！”

“这样的县长还不好？”和他一块担砖的民工说，“非得把板子敲着你的屁股，你才磕头叫大老爷呀？”

“干什么，就得有个干什么的派头，”老蒋说，“这么没大没小的，谁还尊敬，谁还惧怕？这不成了混账一起吗？”

“什么叫新社会哩？”那个民工说，“这就是八路派。越这样，才越叫人们佩服。过去别说县长，科长肯来到这里，和我们一块土里滚、泥里爬吗？顶多，派个巡警来，拿根棍子站在你屁股后头，就算把公事儿交代了！现在处处是说服动员，把人们说通了说乐了，再领着头儿干，这样你倒不喜欢？”

“我不喜欢，”老蒋一摇头，“总觉着没有过去的势派带劲，咱们拿看戏做比：戏台上出来一个大官，蟒袍玉带，前呼后拥，威风杀气，坐堂有堂威，出行有执事，那够多么热闹好看？要是出来一个像她这样的光屁股眼官儿，还有什么瞧头？戏台底下也得走光了！”

“你这脑筋，该受教训！”那个民工不再理他，催着他赶快工作。

李佩钟喝了一碗开水，心里亮堂了一些。她整整

头发，看见秋分坐在地上，正一手一个往下送砖头，她问春儿：

“这是你大姐吗？”

“是呀，”春儿说，“你们见的面不多，过去，谁上得去你们家的高门台儿呀？”

“你就是高庆山同志的……吗？”李佩钟又问秋分。

秋分笑了笑，春儿接过来问：

“啊，她是高庆山同志的‘吗’。‘吗’是个什么称呼呀？”

“这是你们的孩子？”李佩钟笑着抱起秋分身边的小孩来。

“别叫他弄你一身土！”秋分说，“是我们给人家养着的，他娘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！”

“我说哩，”李佩钟说，“高同志回来还不到半年呀！这孩子很苦，好好的养着他吧。我们给你妈妈报仇！你要在战争的炮火里长大成人呀！”她拍打着孩子的小屁股，孩子爬在她的腿上，啃着她的膝盖，她痒痒起来。

“高同志知道你来了吗？”停了一会李佩钟又问。

“还不知道吧！”秋分说，“我们还没看见他。”

李佩钟说：

“他正在开会，我回去告诉他，叫他来看你，你

们住在哪一家？”

“住在西城根一家小店里。”秋分说。

“回头我给你们找间房子，你和高同志轻易不在一块儿，趁这个机会该团圆团圆了！”

秋分红着脸没有说话。春儿说：

“你看这县长有多好！”

一句话把李佩钟的脸也说红了。

太阳已经掉到西边的几块红色的云彩里，民工们吹哨子收工了。在城外野地里觅了一天食儿的乌鸦，成群的飞回来，噪叫着落在街头的老槐树上过宿。

晚饭以后，李佩钟在城里找好一间屋子，就去叫秋分，秋分嘴头儿上不愿意，春儿说：

“既是县长好心好意的找了房子，你就去吧。我一个人睡在这炕上，才宽绰哩！”

李佩钟给她抱着孩子，把秋分带到房子里，又写了一个纸条，求老乡送到支队部，一会儿高庆山就来了，一看是这么回事，就说：

“她们是来拆城的，这影响不大好吧？”

“没人笑话你们。”李佩钟说，“谁不知道你们长久分离，难得相见？要不这样，老百姓才说我们不合人情哩！”

“你这县长也太操心了！”高庆山笑着说。

“算我做了一件民运工作。你们安排着休息吧，我走了。”李佩钟笑着出来，回身给他们关上了房门。

路过娘家的大门，李佩钟顺便看了看母亲。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，刚刚点上了灯。母亲见了女儿，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先抱怨起来：

“你这孩子，早把娘忘到脊梁后头去了吧！你还有家吗？走错了门儿吧！”

“没有。”李佩钟笑着说，“我爹哩？”

“你爹？”她母亲沉吟了一下，“无非又和他那些狐朋狗友们出去瞎逛吧，叫人捏好了饺子，他也不家来吃。你来的正好，等我通开火，煮熟了咱娘儿俩吃！你这是干什么去来呀？看身上那些土，快过来，我给你扫扫！”

李佩钟背过身去，母亲给她打扫着说：

“我说钟儿，你到底还到田家去不去？”

“不去了。”李佩钟说。

“就这样疯跑一辈子？”母亲停下手来问，“一个女孩子家，能跟那些当兵的们跑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哪里也是家。”李佩钟笑着说，“根据地的地面儿大着呢，我到哪里工作，也是自由的，也是快乐的。在外面，有人照顾我，心疼我；也有人教管我，指引我。娘不用操心惦记我好了。”

“我管的了你呀？”母亲叹了一口气，“听！外面

有人推门，准是你爹回来了。”

“他回来，我就该走了，”李佩钟说，“我们说不到一块儿！”

“对了，”母亲小声说，“你们拆城，他们编法儿反对哩！你做工作，也得多多留神呀！”

李佩钟刚转身要走，她母亲又叫住她小声说：

“听人说，你和那个姓高的支队长很要好，是吗？”

李佩钟沉静的说：

“我自己已经饱尝婚姻问题的痛苦了，我不愿意再把这痛苦加给别人。我和他只是同志的关系。他家里有女人，很好。”

三十四

父女两人，到底在院里碰上了，李菊人又喝了酒，酒气扑人的问：

“是佩钟吗？”

“嗯。”李佩钟答应着，“父亲到哪里去来？”

“到了个倒霉的地方，”李菊人很生气的说，“外国鬼子越来越不拿中国人当人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们简直连个猪狗也不如，要真的亡了国，这些玩意还不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吗？”

李佩钟只有在父亲喝醉了的时候，才能听见一些入情入理的话，她说：

“所以我们要坚决抗日呀！只有人人奋不顾身的斗争，我们的民族，才能扬眉吐气。你找的什么外国人？”

“啊！”李菊人醒悟过来，“为了一点闲事情，我同一个朋友到法国神父那里去了。我以前没到过这

种地方，这回去了，亲眼看见那老家伙对待那些求见的教友们，不是爱答不理，就是骂个狗血喷头。当着我们的面，就还差没叫这些人给他磕头罢了！”

“你们找他干什么呀？”李佩钟问。

“不要说这个了，”李菊人说，“我净说问问你，可老是没有机会，你打算和田耀武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哩？”李佩钟低头说，“各人走各人的路罢了。父亲再也不要干涉我。”

“我干涉你做什么？”李菊人很亲切的说，“蒋介石这个王八蛋，是成不了什么气候了，连我也不会对他再有什么指望，跟他跑到南边去的人，也不过像是道君皇帝的臣下，早晚给日本人纳贡投降完事。我主张你和他一刀两断！”

“父亲的思想，很有些进步了哩！”李佩钟笑着说。

“谈不到进步，”李菊人说，“我是认命要当亡国奴的了，中国不亡，是无天理！”

“你还是亡国论呀！”李佩钟吃惊的说，“根据地的军民，这样热烈动员，毛泽东同志指示的那样英明详尽，你全看不到听不见呀？”

“我对你们没有信心，第一你们不会用人。”李菊人说，“地方上藏龙卧虎，像我这样的人才，竟引不起你们的重视，真真奇怪！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不重视你？”李佩钟说，“你什么时候想过做工作呀？”

“鸡毛蒜皮的勾当自然我是不干。”李菊人郑重的说，“我只想在司令部弄个参议干干，你对事儿可以和吕司令念道念道。有个附带的条件，就是我不能跟他们吃小米，另外得给我三件家伙两匹马，外带一个特务员！”

李佩钟失望的托个辞离开了他。回来的路上，她又经过高庆山和秋分睡觉的房子那里。从矮矮的院墙望进去，屋里还点着灯。听见脚步声，院里的一只小狗吠叫起来，秋分的影子，在明亮的窗纸上一闪，把灯吹灭了。

李佩钟想去看看那些民工们睡下了没有。她奔着西关来，街上的店铺都上了门，只有十字街石牌坊那里，还有两副卖吃食的挑子点着灯笼。李佩钟在那里遇见了芒种。

“这样晚了，李同志还没休息？”芒种给她敬着礼说。

“还没有。”李佩钟说，“你干什么去来？”

“给支队长又送了一条被子去。”芒种笑着说。

“你没事跟我到西关去一趟吧，”李佩钟说，“我们去瞧瞧那些民工们睡觉的地方。”

芒种高兴的答应了，这对他是一个愉快的差遣。

他规规矩矩的跟在李佩钟后面，从身上摘下手电筒来，照明前面的道路。

“我用不惯这个，”李佩钟笑着说，“我道路很熟，摔不了跤，一照倒眼花起来。”

西关一带，虽说住下了这么多民工，街道上却非常安静，大家工作一整天，全安歇睡觉了。只有天主堂旁边，春儿住的那家小店房里，还点着灯火。

“春儿就住在这里，我们去看看她做什么哩？”李佩钟小声说着，轻轻的走到窗台外面。窗纸上的人影儿分明，春儿和店家老大娘，对坐在炕上说话儿。

“你摸摸，这炕热上来了。”老大娘说，“我特意给你烧了一把柴火，你小孩儿家，身子单薄，睡凉炕要受病哩！”

“大娘费心。”春儿笑着说。

“咱娘儿两个有缘，”老大娘说，“一见面我就喜欢你，疼你。我是六七十岁的人了，又住在城关，好姑娘好媳妇，看见的不知道有多少，说起来，哪个也比不上你。你是我心尖儿上的人。”

“大娘夸奖。”春儿又笑着说。

“我不知道你瞧得起这个大娘不？我满心愿意把你认成个干女儿。”老大娘仰着脖子说。

“只要大娘不嫌我拙手笨脚就行，”春儿说，“我是怕不能得儿的哩！”

“这就好了，一言为定。”老大娘很高兴的说，“咱娘儿俩都是苦命人，你从小孤身一人，我也是年轻轻就守上了寡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都有个亲人儿了。”

“干娘什么时候守寡的？”春儿问。

“就是有这个那一年！”老大娘用手一指，“修天主堂的那年，外国鬼子强占了咱那么大的—片庄基，还打死了你那干爹，又把我赶到这里来住，孩子，我有冤仇呀！”

老大娘呜呜的哭了起来，春儿劝解着，老大娘忍着泪说：

“要不你一提说是抗日，我就喜欢哩，你经的事儿还少，外国人可把咱中国欺侮坏了哩！”

李佩钟和芒种只听见老大娘哭泣，听不见春儿说话。这女孩子正在沉默着。她几岁上就死去了母亲，正当她需要人教导的时候，父亲又下了关东。最近一百年，在祖国的身上，究竟经过了多少次外人的侵辱，在平原农民的心里，究竟留下了多少悲惨的记忆，她知道得很少很少。这需要有一个经历多次灾难的母亲，每逢夜深人静，就守着一盏小油灯，对她慢慢讲解。可是春儿并没有这样的—个母亲。现在，她受到这—种教育了。这是神圣的民族教育，当它输入到春儿心灵里的时候，正和她那刚刚觉醒了、争取

解放争取自由的尊严的要求碰在一起。立时，一股拧搅在一起的强烈的力量，就在这个女孩子的心里形成了。一百年来，农民们几次在反抗外人侵略的时候，在保卫家乡的战争里流了血。这里的农民，是因为历次斗争失败，受了压抑，意志消沉；还是积累了斗争的经验，培植了反抗的热情？是失去了信心；还是蕴藏下了更大的力量？两种情形都存在吧，但是，共产党来教育了他们，长久埋藏在平原上反抗的火种燃烧起来了。

最后，春儿说：

“干娘，所以说，我们要坚决抗日呀！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就好了。”

“我也成天这么盼望，”老大娘说，“咱这里离圣姑庙不远，我每逢初一十五就去烧香磕头，求她保佑着咱们的军队打胜仗。刚才老道姑对我说，圣姑这两天不大高兴哩！”

“她怎么不高兴？”春儿问。

“她给人们托梦，说八路军不该拆城，拆了她的官墙，要犯罪哩！”老大娘说。

“干娘信不信呀？”春儿笑着问。

“我怎么不信？别的不信行，这圣姑的灵验，你可是不能不信呀！”老大娘把手合了起来。

李佩钟偷偷笑着，刚要推门进屋里去，忽然听见

城墙边大榆树上的乌鸦飞腾了起来，在黑暗的天空里，盘旋惊叫。接着又有砖瓦从城门楼子上飘下来的声音，芒种抓起手电筒，李佩钟拦住说：

“不要照！一照就惊走了。你轻轻爬上城墙去，看看是什么人！”

芒种掏出枪来出去了，春儿听见声音跑了出来，拿上自己的小镐，也跟到城墙上去。

他们在城门楼上捉住了两个人，一个拿着铁铲挖洞，一个正往里埋炸药瓶。

春儿说：

“这是汉奸来破坏我们！要不是看见的早，明天一拆城门楼，还不都把我们炸个粉碎！”

老大娘拽着一根柳木棍，也气喘喘的爬上来了，就近一看说：

“我认的他们！这个是天主堂种菜园子的王二鬼，那个是圣姑庙的小道士，咳呀，我那老天，你怎么也跟着他们造孽呀！”

小道士哆嗦着说：

“我不愿意来，是老道姑逼着我来的呀！”

李佩钟叫把他们押到县政府，派人报告给高庆山，连夜又逮捕了主使的罪犯。

三十五

第二天，决定召开一个大会：宣布破坏分子的罪状和对他们的处罚，再向群众做一次动员，说明游击战争的道理。另外就是拆城的民工和驻防部队的联欢。

有人提议，把昨天晚上捉汉奸的故事，编成一个剧本，真人上台，在大会上表演。就叫政治部剧团的团长来负责组织这个工作。

这个团长在“七七”事变以前，就爱好戏剧，曾经在北平参加过青年学生们组织的话剧团体，抗战以后，抱着青年文艺工作者无比的热情，参加了人民自卫军的政治宣传工作，亲自背着幕布行军，到处在街头上张贴招收演员的红纸布告，不久就成立起一个战斗性的话剧团。

这天早晨，他接受了这个任务，背着一挂包化装的油彩从子午镇赶了来，到支队部找到芒种，带他来

到春儿居住的小店。老大娘倒没的说，一口答应了，春儿一听说，叫她在城大里，当着这么些人演戏，说什么也不干，团长着急的说：

“女同志，这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呀，你既然实际上做过这样一件工作，难道你就不希望把你的英雄行动，再用艺术的形象表演出来，教育更多的群众吗？”

“实际做，那倒没什么，”春儿红着脸跺脚说，“叫我演戏我干不了，一上台我连嘴也会张不开。”

“那有什么难处？”老大娘在一旁撺掇着，“我们在底下怎么说的，到台上也怎么说，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团长说，“不过也不能完全照样，这里还有一段艺术加工的创作过程。”

“你看难不难？”春儿说，“还没动手演哩，只是这个同志说的话儿，我就一门不摸！还是叫我到城墙上搬砖头去吧！”说着就抓小镐儿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团长拦住她，“晚上我们就得演出，我已经给你请过假了。我们快来排戏吧，这就是舞台面。”他夺过春儿手里的小镐儿来，在老大娘的门口，画了一个四方形的界限。又叫芒种借了一张板床来，上面放好一台高高的灯盏。

“剧情我已经了解过了。”团长说，“就开始上场吧，大娘和春儿坐在床上，坐下呀！这就是炕。芒种

过来，站在这里，这里是窗台。”

“不是还有李县长吗？”芒种站过去说。

团长说：

“她有事不能来，不要她了。等审案子的时候，再叫她出场也可以，艺术并不是照抄现实，作家有独自选择取舍的方便！”

“我又不懂了啊！”春儿盘着腿坐在床上，侷促不安的说。

“这有什么不懂的！”团长说，“我是导演，你们听我的指挥就行了。就从你和大娘守着灯谈话的时候演起，大娘先张嘴吧！”

“我们先说的是认成干亲。”老大娘回想着说。

“不要叙述，要直接诉诸观众！”团长说，“不要看我，按你们当时的情形讲话！”

老大娘和春儿开始演起戏来，老大娘说：

“不知道你心里怎样，我满心愿意把你认成个干女儿！”

“停！”团长把手里的小镐一摆，“这个地方，大娘的表情还要热烈一些，‘我满心愿意’这几个字要提高一些，像这样……”

他做了一次示范，春儿笑了起来，她在日常生活里，并没有听到过这样说话的声音，它不像是在露天地儿里说话，它像是把头钻到了水缸里一样。

“严肃一点。”团长说，“继续。”

下面一段的进行，团长显然还满意，他把两手插在军装口袋里，用一只脚尖，轻轻的敲着土地。

老大娘说：

“我见过的姑娘媳妇，不知道有多少，说起来，可谁也比不上你。”

“大娘夸奖。”春儿笑着说。

“停！”团长走到界限里边来，对着春儿说，“你傻笑什么？要低下头去，表示害羞。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扭右下角的衣裳襟儿。”

“为什么扭衣裳襟儿？”春儿问。

“你照我说的做就是了，”团长说，“这能加强羞臊的效果。”

“可是这两个手指头儿？”春儿举起右手来问。

团长点点头。

戏剧进行着，老大娘说到店房被夺、丈夫被杀害的时候，真的哭了起来，低着头用手擦眼泪。春儿和芒种也忍不住垂头滴下泪来，团长大声说：

“大娘！这是一个高潮、沸点，舞台上要像开了锅一样！抬起头来，眼睛望着天幕，把声音提到最高度，喊！”

“哪里是天幕呀？”大娘忍住眼泪说。

上午排好了戏，晚上就在城隍庙的戏楼上演出了，全体民工和整个支队的战士都到了会场。团长在后台守着一碗油灯，在春儿的脸上特别是眼皮上，抹了很多的油彩，使她感到像贴上膏药一样疼痛和头晕。出台来，她演的很认真，一动真感情，很多地方就忘记了团长的导演，可是效果很好，观众看来顺劲，也很受感动。从这一回，春儿就学会了演唱，再登台讲话，也不会脸红。芒种死记着团长的话，在台上很拘束，连脚手也不知道往哪里放，演的最失败。总之，这次演出尽管还有很多缺点，却是把真人真事运用在艺术创作上的一个开头。

演完了戏，支队部的民运科长登台讲话，他说全体民工同志们很辛苦了，明天部队停止练兵，帮助大家拆一天城，叫妇女同志们休息休息。

春儿带着擦不干净的油彩，代表妇女民工讲话，她说谢谢部队同志们的帮助，我们还是希望武装同志抓紧时间练兵，这才是我们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。明天我们也不休息，我们要把战士同志们穿脏穿破的衣服，全部洗洗缝缝。

第二天，春儿她们选择的集体洗衣服的地点，是圣姑台左边的清水池。

这个水池周围全是碱地，地面上像铺着一层雪一样，水池里的水碧绿澄清，洗出来的衣服光滑洁

净。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们，全参加了洗衣组。

她们跳跳跔跔像赛跑一样，绕着池子选择自己工作的地方，蹲在那里，用水撩逗着左右的伙伴，又带着一脸水珠儿跑到圣姑台上去。

站立在圣姑台上，可以看到整个县城的景致。很多人家刚刚点火做饭，轻烟和嫩柳点缀着北方的小城。圣姑的大殿锁闭着，女孩子们扒开窗纸，往里面看。

“人们都说这是那圣姑的真身，是吗？”五龙堂一个女孩子回过头来问春儿。

“怎么会是真的呢，”春儿说，“这是用泥捏的呀！”

“为什么像真的一样？”那个女孩子又问。

“要我给你们讲讲吗？”春儿对身边的女孩子们说，“这里边有个好听的故事哩！”

“给我们讲讲，你得给我们讲讲！”女孩子们全围上来擗掇着。

春儿说：

“我也是听人家说的，听变吉哥说的。他说：长得好看的女孩子，遇见修庙的时候，不要到跟前去。那些捏泥人儿画画儿的师傅们，总要找一个人来做样子，你去了，他们就把你的相貌抓了去，塑在泥胎上，你看倒霉不倒霉？”

有几个女孩子认真了，脸上有些惊慌，可是又说：

“长的好看的才怕那个，像我长的这么丑怕什么呀？”

春儿说：

“塑这个圣姑像的，是一个手艺很好的师傅，他全心全意的工作，圣姑的身段手脚都捏成了，很好看，就是眉眼神情差一些。这个师傅就整天站在这个高台上望着，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刮风下雨也不躲避，他说：要等一个长得十分好看的女孩子过来。修庙的整个工程停顿了，木匠不再上梁，瓦匠不再运瓦，大家也每天陪他在这个高台上望着。”

“就没有人从这里路过吗？”女孩子们问，“这么一个县城里，难道说就没有一个姑娘长的叫师傅满意？”

春儿说：

“对于那些穿绸挂缎的，对于那些擦胭脂抹粉的，对于那些走动起来拿拿捏捏的，对于那些说起话来蚊声细气的，这个师傅都看不上眼。他等着，田里的庄稼都熟了。有一天早晨，一个女孩子从地里背了一大捆红高粱穗子回来，她力气很小，叫高粱压的低着头，她走到高台底下，放下休息休息，擦了擦脸上的汗，抬头向上面一看。那个师傅说：行了，圣姑显

圣了。就照着这个女孩子的相貌捏成了。你们看，这圣姑脸上，不是有受苦受累的样儿吗？”

春儿讲完，女孩子们对于这个故事，并不感觉有多大的兴趣，她们一前一后，从高台两旁的白石扶手上，像打滑梯一样，欢笑着出溜到平地来。在北方战斗的初春，任是神仙，也没有参加了民族自卫战争的女孩子们幸福。

三十六

当折城完工，民工们收拾家具要回去的时候，县里又开会欢送了他们，表扬了子午镇、五龙堂两个模范村镇。回来的时候，春儿还是拉着高四海的小车一出西关，看见平原的地形完全变了，在她们拆城的这半月，另一队民工，把大道重新掘成了深深的沟渠。大车在沟里行走，连坐在车厢上的人，也露不出头来。只有那高高举起的鞭苗上飘着的红缨，像一队沿着大道飞行的红色蜻蜓一样，浮游前进。每隔半里，有一个开车的地方，在路上，赶大车的人不断的吆喝。

变平原为山地，这是平原的另一件历史性的工程。这工程首先证实了平原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力量，紧接着就又表现出他们进行战争的智慧 and 勇敢。它是平原人民战斗的整体中间的筋脉。

“我们只说拆城是开天辟地的工作，”高四海推

着小车说，“看来人家这桩工程更是出奇！”

“人么，”春儿笑着说，“谁也是觉着自己完成的工作，最了不起！”

他们回到自己家里来。春儿把半月以来刮在炕上、窗台上、桌橱上的春天的尘土打扫干净，淘洗了小水缸，担满了新井水，把交给邻家大娘看管的鸡们叫到一块儿喂了喂，就躺到炕上睡着了，她有些累。

在甜蜜的睡梦里，有人小声叫她：

“春儿，春儿！”

“唔？”春儿揉着眼睛坐起来，看见是老常。

“喂，我们少当家的回来了？”老常说。

“谁回来了？”春儿撒着迷怔问。

“我们那少当家的，田耀武呀！”老常着急的说，“你醒醒呀！”

“他回来，回来他的吧，”春儿打着哈欠说，“和我们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你这孩子！”老常说，“怎么没有关系呢？他穿着军装，骑着大马，还带着护兵哩！”

“那许是参加了八路军，”春儿说，“八路军能要这号子人？”

“又来了！要是八路军还有什么说的？是蒋介石的人马哩，张荫梧也回来了！”老常哼唉着，坐在炕沿上，靠着隔扇墙打火抽起烟来。

春儿一时也想不明白。这些人不是慌慌张张的逃到南边去了吗，这时候回来，又是为了什么？她说：

“高翔不是住在你们那里？他们怎么说？”

“还没听见他怎么说，”老常说，“我刚刚到家，田耀武就回来了。他穿着一身灰军装，打扮的还是那样么不么六不六的，你想，咱们的队伍都是绿衣裳，胡不拉儿的，羊群里跑出一只狼来，一进村就非常扎眼，梢门上的岗哨就把他查住了！”

“他没有通行证吧？该把他扣起来！”春儿说。

“你听我说呀！”老常说，“站岗的不让他进门，这小子急了。还是虎牌的，立时从皮兜子里掏出一个一尺多长的大信封儿来说：这是我的家，你们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进去？我是鹿主席和张总指挥的代表，前来和你们的吕司令谈判的。站岗的给他通报了以后，高翔叫人出来把他领进去了。”

“什么鹿主席，什么张总指挥？”春儿问。

老常说：

“张就是张荫梧，鹿，听人们说是鹿钟麟，也是一个军阀头儿！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我看这不是一件小事儿，你说哩？”

“你再回去听寻听寻，”春儿说，“看看高翔他们怎么对付他。”

“我回去看看。”老常站起身来，“我是来告诉你

一声儿，叫咱们的人注意点，别叫这小子们给咱们来个冷不防呀？”

“不怕，”春儿说，“有咱们的军队住在这里，他们掉不了猴儿！”

“不能大意。”老常说，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刚说城也拆了，路也破了，一铺心的打日本吧！你看半晌不夜的，又生出一个歪把子来，真他妈的！”翘起一只脚来，在鞋底儿上磕了烟灰，走了。

他心里有些别扭，从街上绕了回来，吃中午饭的时候，街上没有什么人，只有那个卖烟卷的老头儿，还在十字路口摆着摊儿，田耀武带来的那个护兵正在那里买烟。

这个护兵腰里挂着一把张嘴儿盒子，脖子上的风纪扣全敞开，露出又脏又花哨的衬衫尖领，咽喉上有一溜圆形的血疤。他抓起一盒香烟来，先点着一支叼在嘴角上，掏出一张票子，扔给老头儿说：

“找钱！”

老头儿拿在手里看了看，说：

“同志，这是什么票子，怎么上边又有了蒋介石呀？”

“委员长！”那个护兵大声说。

“啊，委员长！我们这里不时兴这个，花不了！你对付着给换一换吧！”老头儿笑着送过来。

“混蛋！”护兵一斜楞眼，眼仁上布满了红色血丝儿，“你不花这个花什么？你敢不服从中央！”

“你怎么张嘴骂人哩？”老头儿说，“你是八路军吗？”

“我是中央军！”护兵卖着字号。

“这就怪不的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八路军里头没有你这样儿的！”

那个护兵一抓盒子把儿。

“干吗！”老头儿瞪着眼说，“你敢打人？”

“你反抗中央，我枪毙你！”护兵狠狠的说。

“你有胆子，冲着这儿打！”老头儿拍打着胸脯说，“我见过这个！”

那个护兵要撒野，老常赶紧跑上去，这时有两个八路军刚刚下岗，背着枪路过这里，一齐上前拦住说：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，同志？”

“他要杀人！”老头儿说，“叫他睁开眼看看，我们这里，出来进去住着这么些个队伍，哪一个吓唬过咱们老百姓？”

“不要这样，”八路军劝说着那个中央军，“对待老百姓，不应该采取野蛮态度，这是军阀主义的表现！”

“为什么你们不花中央的票子？”那个护兵举着

票子满有理的说。

“不是不花。”八路军说，“这些问题，还需要讨论一下。当初是你们把票子都带到南边去了，印票子的机器却留给了日本。真假不分，老百姓吃亏可大啦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才发行了边区票。现在你们又回来了，老百姓自然不认头。再说，他是小本买卖，你买一盒香烟，拿给他五百元的大票，他连柜子搭上，也找不出来呀！”

那个护兵看看施展不开，把票子往兜里一塞，转身就要走。

“你回来！”卖烟的老头儿说，“我那盒烟哩？”

护兵只好把烟掏出来，扔在摊上。

“你抽的那一支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也得给钱！”

八路军说：

“老乡，吃点儿亏吧，这是咱们的友军！”

“什么友军？凭这个作风，能白抽我的香烟？”老头儿冲着护兵的后影儿说着，打开了一盒烟，递给两个八路军，“要是咱们自己的人哩，别说抽我一支，就是抽我一条儿，我也心甘情愿呀！同志们，请抽烟！”

“谢谢你吧，老乡，我们都不会！”两个八路军摇摆着手儿笑着，回到住处去了。

老常回到家里，看见田大瞎子，像惊蛰以后出土的蚰蜒一样，昂着头儿站在二门口，看见老常就喊

叫：

“到城里游逛了半个多月，还没有浪荡够？猪圈也该起，牲口圈也该打扫打扫了！中央军就要过来，我们也得碾下点儿小米预备着，下午给我套大碾！”

老常没有答言。

三十七

有很多事情，实在不能不引起一个稍有经验的人的警惕。这一天，老常心神紧张的工作着，他从当家的高大的粮食囤里，装满两口袋谷子，背到外院碾棚里，套上一匹青骡子。像一条金带泻下来的谷粒，沙沙的，在宽大的青石碾盘上铺平。老常背靠着桐油油成黄色的扇车抽着烟，在心里分辨：他的主人，缴纳八路军的公粮和迎接中央军的时候的两种心情。也渐渐明白：为什么两种军队各有各的支持？一个庭院里，自己的伙计和老少当家的中间，又存在着一道什么性质的深沟？对国家和人民来说，这两种军队，负着什么不同的使命？

老温替少当家的马拌好了草料，在马脑袋上狠狠的敲了一料棍，也来到碾棚里。

“你看这回是红还是黑？”他和老常打着哑谜。

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”老常说。

“看样子，真像秦叔宝的黄骠马，来头儿不小哩！”老温说。

“怕什么？水来土挡，兵来将挡。”老常说，“不怕他有千条妙计，就怕我们没有一定之规！”

“芒种来了！”老温听见院里的马蹄声，转身看见高庆山从马上跳下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到里院去了。他跑出来帮着芒种料理牲口，小声问：

“你们知道了吗？”

“早就知道了，支队长来，就是办理这件事情。”芒种也小声说。

谈判就在田大瞎子家的客厅里进行，张荫梧的代表田耀武，人民自卫军的代表高翔和高庆山，还有一个记录，四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坐下来。

“真是巧的很，”问过了姓名籍贯，田耀武龇着一嘴黄牙笑着说，“我们三个都是本县人，两个村庄也不过一河之隔！”

“我们是本乡本土的人，对于家乡的历史情况都很清楚，”高翔说，“对于家乡和人民的前途命运，也都是热心关切的。我们非常欢迎贵军的代表，希望在这个会议上，能讨论出对日作战的一切有效的办法！”

“请把贵军此次北来的主要方针说明一下吧！”高庆山说。

“这是我的家，我应该尽地主之谊，”田耀武站起来说，“我去叫他们预备点儿酒菜！”

“先讨论问题吧！”高翔说，“关于吃喝的事情，以后机会很多哩！”

田耀武只好坐下来，说：

“刚才这位问什么来着？”

高庆山说：

“希望你把贵军的作战计划约略谈谈，好取得协同动作。”

“这个。”田耀武说，“上峰好像并没有指示兄弟。”

“那么我们怎样讨论呢？”高翔微微蹙着眉毛说。

“你们一定要我谈，那我就谈一下。”田耀武说，“我谈一下，这个问题，自然，不过主要是，其实呢，也没有什么……”

担任记录的是一个青年同志，为了好好完成工作，他事先修好了铅笔，放好了纸张。他全神贯注的听着这位代表的发言，铅笔尖儿在纸面上来回的比划半天，仍然记录不下一个有用的字眼来。他迷惑的抬起头来，望着田耀武那也在翻动着的嘴唇，在心里恳求着说：行善的人！你能不能发一点慈悲，叫我从你的嘴里抓住一点点实际的东西呢？可惜的是，这个青年人的愿望，就像一个老太婆希望能从一只好诈

窝的母鸡的屁股里拉出鸡蛋来一样，不容易实现罢了。

“我们想知道的是：你们打算怎样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！”高翔打断了田耀武的浮词滥调。

“请原谅，”田耀武慌张的说，“这是国家的机密。我不能宣布！”

“我们可以把人民自卫军对日作战的方略谈一谈，贵代表乐意不乐意听取？”高翔说。

“欢迎极了！”田耀武拍着手说。

“我们不把抗日的方针当作机密。”高翔说，“而且是随时随地向群众宣传解释的。我们和群众的愿望相同，和乡土的利益一致。组织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在‘九一八’以前我们就用全力进行了。在芦沟桥事变以前，我们在东北、察绥组织了抗日的武装，在全国范围里，我们号召团结抗日。当时在这一带负责守卫疆土的、你们的军队和政府，不顾国土的沦陷，遗弃了人民，席卷财物，从海陆空三条道路向南逃窜。我们誓师北上，深入敌后。有良心有血气的农民，武装起来，千河汇集，形成了海洋般的抗日力量。”

“委员长对于敌后的军民，深致嘉慰！”田耀武说。

高翔说：

“我们从陕西出发，装备并不充足。官兵兼程前进，不避艰险。从晋西北到晋察冀，从冀东到东北，从河北到山东沿海，一路上挫败敌人的锋锐，建立了一连串的、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抗日民主根据地；改变了因为国军不战而退的极端危险的局面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的前程，才使得大后方得到喘息和准备的时间。”

“这一点，就是兄弟也承认。”田耀武说，“我们在大后方刚刚站稳了脚根，就又全副武装的回到这里来了。”

“我们还是愿意知道你们北来的目的。”高翔说。

“无非是一句老话，收复失地！”田耀武笑着说。

“收复失地！”高翔像细心检验着货色的真假一样，咬嚼着这四个字说，“虽说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指示，目前还不是收复失地的时机，它究竟是一个光荣的口号。我们对于贵军的抗日决心，表示钦佩，当尽力协助，但愿不要在堂皇的字眼下面，进行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勾当！”

“这话我就不明白了。”田耀武故作吃惊的说。

“我想你是比我们更明白的，根据确实的报告，贵军并没有到前方去抗日的表现，你们从我们开辟的道路过来，驻扎在我们的背后，破坏人民抗日的组织，消磨人民抗日的热情，你们应该知道，这对于我

们是怎样重大的损失，这是十分不重信义的行为！”

“这是误会，我得向你解释一下，”田耀武说，“为什么我们驻在你们的后面？这是因为我们刚刚从大后方来，对日作战还没有经验，在你们的背后，休息一个时期，也是向老大哥学习的意思呀！”

“你们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好到十倍，带来的军用物资也很多，这都是我们十分缺乏的。”高翔说，“我们希望，贵军能把这些力量用到对日作战上。因为，虽然你们在这一方面确实缺乏经验，但在另一方面，你们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。”

“客气，客气，你指的是哪一方面？”田耀武傻着眼问。

“就是内战和磨擦！”高翔说，“我们热诚的希望，你们高喊的收复失地四个字，不只包括这一方面的内容！”

“绝不会那样，”田耀武把脖子一缩，红着脸说，“绝不会那样。”

“为贵军的信誉着想，也不能一绝再绝于人民！”高翔说。

田耀武抓耳挠腮，他觉得自己非常被动，有一件重大的使命，还没得机会进行。他看见高翔和高庆山也沉默起来，就用全身的力量振作一下，奸笑着说：

“我忘记传达委员长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指示。委

员长很是注重人材，据兄弟看，两位的才能，一定能得到委员长的赏识。兄弟知道两位的生活都是很苦的，如果能转到中央系统，我想在品级和待遇这两方面，都不成问题。”

“虽然我们很了解你，”半天没有说话的高庆山说，“好像你还不很了解我们。如果你事先打听一下我们的历史，你就不会提出这样可笑的问题了。”

三十八

这一晚上，田耀武又只好宿在他爹娘的屋里。早就吹熄了灯，爹娘和他小声儿说着话。

“这院里住上他们，连说话也不方便了，”田耀武的娘说，“那些穷八路还和我宣传哩，我有心听他们那个？”

“佩钟家来过吗？”田耀武在黑夜里睁着两只大眼想媳妇，心里一股闷气，翻了一个身。

“你刚刚家来，”他娘长叹一口气说，“我不愿意叫你生气，提她干什么？”

“她不是当了县长吗？”田耀武说。

“现眼吧！”他娘说，“她做的事情，叫人们嚷嚷的对不上牙儿！耀武，我看和她散了吧，我们再寻好的。叫她呀，把我们田家几辈子的人都丢净了！”

“老絮叨！”田大瞎子说，“提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干什么？耀武，你和高庆山、高翔他们谈个什么，这

都是我们的仇人!”

“张总指挥叫我拉过一点队伍去,”田耀武说,“谁知道这两个小子根底儿很硬,搬不动他们!”

“这些事情,你得看人呀!”田大瞎子教导着,“明儿,你可以找找高疤,这个家伙,在八路军里并不妥当,我看一拍就合!”

“招惹他干什么呀?”田耀武的娘说,“高疤霸占了俗儿,你可不许再往她家去!”

“那是私事,这是公事,有什么关系?”田大瞎子说,“耀武,日本人来势很凶,你们能跟人家打仗吗?”

“跟日本打不着仗。”田耀武说,“要有心跟日本打仗,当时还往南跑干什么?我们的队伍过来,是牵制共产党,叫它不能成事!”

“这我就明白了,”田大瞎子说,“有个白先生在保定府日本人手里做事,前些日子到我们家里,还打听你来着。对机会,你可以和他联络,打共产党,非得两下里夹攻不可,委员长真是个人物!”

说完,一家人就带着田大瞎子的希望和祝词走进梦境里去了。

第二天,是子午镇大集。田耀武带着护兵在街上来回转游了两趟。他逃走的时候曾经提高人们的恐日情绪,现在凭空回来,又引起街面上不少的惊慌和猜疑。在一辆相熟的肉车子旁边,田耀武遇见了俗

儿。

“你回来了呀？”俗儿手里攥着一把黄叶韭，倒退一步，打量着田耀武说。

田耀武点了点头。

“做了官儿啦，”俗儿笑着说，“派头儿也大啦！”

“你不是早就当了官娘子吗？”田耀武又像是哭又像是笑的说。

“受罪的官娘子，”俗儿说，“整天价连个零花钱儿也没有。你看正是吃黄叶韭饺子的时候，我干站在那里看着，连点儿肉也割不起！”

“这不是打发钱的回来了吗，”卖肉的掌柜刘福指着田耀武说，“我赊给你，要肥要瘦吧！”

“人家还肯给打发钱？”俗儿瞟着田耀武说，“隔年的衣裳隔夜的饭，我们的交情早就凉了，你看他爱答不理的！”

“多年的交情，火炭儿热，有个凉呀？”刘福笑着在肉架子上割下一块臀尖来，递给俗儿。

“那你就记在他的账上吧，”俗儿笑着接来说，“我说田先生，今儿晚上，你一准到我家里吃饺子啊，我等着你，不见不散！”

犹豫半天，趁着天黑没人儿的时候，田耀武到了俗儿家里。原来住在俗儿家的一班八路军，因为俗儿有事没事，也不管黑间白日的到屋里招搭，班长生了

气，前几天搬到别人家去了。老蒋正站在门口等着，一见他过来，就迎上去笑着说：

“酒早就烫好了，锅里也开着，单等你来了下饺子！”

田耀武没有说话，三步两步迈到屋里，俗儿打扮好了站在灶火前面，笑着说：

“真难请啊，你比大闺女上轿还为难哩！快上炕去吧！”

“高团长回来不回来？”田耀武担心的问，“你去关上点门好不好？”

“司令部就住在这村里，八路军的规矩又紧。他不回来。”俗儿说，“他回来了，有我哩！你放心大胆的坐一会儿吧！”

老蒋安排着碗筷，田耀武和俗儿对面坐在炕上，喝了两盅酒，俗儿说：

“自从你走了，我常常惦记你。没依没靠，我才嫁了高疤。我这个人呀，反正就是这么一回子事儿！”

“那没有关系，”田耀武说，“我们又不是爪角儿夫妻，还能叫你给我守节呀！”

“你还是老脑筋呀，”俗儿笑着用筷子一指田耀武的鼻子，“就是爪角儿夫妻，你也管不住她跟了别人呀！比方你那李佩钟！”

“她怎么样？”田耀武放下筷子。

“怎么样呀？”俗儿说，“反正人家很自由就是了。要不然，你出去半年六个月回来了，还用着到我这儿来呀！”

“她妈的！”田耀武说，“回头犯到我的手里，我把她宰了！”

“你有那么大权势？”俗儿说，“人家是县长呀！闹了半天你到底是个什么干部呀？”

“什么干部？”田耀武说，“我是个官儿！回头，我一个命令把她们这些共产党的县长完全撤换了！”

“你是个什么官儿，一月能挣多少钱？”俗儿问。

田耀武说：

“往小里说吧，也是个专员！”

“是专员大，还是团长大？”老蒋问，他打横坐在炕沿下面，听得很出神。

田耀武正要答话，有人一撩门帘进来，正是高疤！

“呀！”俗儿叫了一声，“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偷偷摸摸的，进门连点儿响动也没有！”

高疤一见田耀武，就抓起枪来，大喊着说：

“我说这么晚了，还开着大门子，屋里明灯火仗，原来有你这个窝囊废，滚下来！”

田耀武把头一低，钻到炕桌底下去，桌子上下震动着，酒盅儿，菜盘子乱响，饺子汤流了一炕，俗儿

一手按着炕桌，一手抓手巾擦炕单子上的汤水，一只脚使劲蹬着田耀武的脑袋说：

“你还是个专员哩，一见阵势儿，就松成这个样子。快给我出来！”一边笑着对高疤说：“你白在八路军里学习了，还是这么风火性儿，人家是鹿主席的代表，这一带的专员，来和咱们联络的，交兵打仗，还不斩来使呢，你就这么不懂个礼法儿！”

“哪里联络不了，到他妈的炕上联络！”高疤把手里的盒子在炕桌上一拍，把碟子碗震了二尺多高，饺子像受惊的蝴蝶一样满世界乱飞。

“是你不在家呀！”俗儿说，“人家是专来找你的，人家是张总指挥的代表！”

“谁的裤裆破了，露出个张总指挥来！”高疤说着坐在炕沿上，把炕桌一掀，抓起田耀武来。

有半天的工夫，田耀武才安定下魂儿来。高疤说：

“你们过来了有多少人？”

“人倒不多，”田耀武说，“钱带的不少！”

“像我这样的，到你们那里，能弄个什么职位？”高疤问。

“兄弟能保举上校，”田耀武说，“可得把人马枪枝全带过去。”

“你做梦吧！”高疤说，“八路军的组织，容你携

带着人马枪枝逃跑投敌!”

“这要看机会，”田耀武说，“在情况紧张的时候，在日本人进攻的时候!”

“和日本勾手打自己的人，你们是中央军，还是汉奸队?”高疤说。

“这叫曲线救国!”田耀武说，“委员长的指示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找别人，单单来找我?”高疤笑着说，“是特别瞧得起我高疤吗?”

“是呀!”田耀武也敢笑了，“就听说高团长是个人材!”

他接着进行起游说工作来。

三十九

鹿钟麟要到这县里来视察，直接给深泽县政府下了公文，李佩钟向高庆山请示怎么办，高庆山告诉她：“召开群众大会欢迎。”

会场在县政府前面的跑马场上。宣传队在县政府的影壁上用艺术体写好“欢迎鹿主席抗战到底”的标语，每个字有半人高。因为拆除了城墙，这一排大字，在城南八里地左近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。

由高翔主持大会，这天早晨，下起蒙蒙的细雨来，城关和四乡的男女自卫队都来了，高翔和他们一同在雨中等候着。

鹿钟麟一直没来，直等到晌午大错，才望见了一队人马。

那真像一位将军。鹿钟麟到了会场上，由四五个随从搀扶下马来，他坐在台上，吸的香烟和喝的水，都是马背上驮来。休息老半天，才慢慢走到台边上讲

了几句话，有四个秘书坐在他后边记录着。

因为态度过于庄严，声音又特别小，他讲的话，群众一句也没听懂。群众被那些奇奇怪怪的事物吸引着，从十八里地以外跟来看热闹的老蒋挤到他女儿的身边，小声问：

“俗儿，讲话的那是谁呀？”

“鹿主席！”俗儿小声答应。

“他讲的什么？”老蒋说，“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呀？”

“人家是个大官儿，”俗儿说，“要叫你能听懂，还有什么值重？”

“对。”老蒋点头儿，“就得是这样。不能像高翔他们一样，蚂蚱打嚏喷，满嘴的庄稼气，讲起话来，像数白花菜一样。喂，你说人家刚才喝的那是什么水呀，怎么老远里看着黄橙橙的！”

“花露水。”俗儿说，“你看那瓶瓶儿多好看，拿回家去点灯多好呀！”

鹿钟麟讲完，是张荫梧讲。这个总指挥，用一路太极拳的姿势，走到台边上。他一张嘴，就用唱二花脸的口音，教训起老百姓来，手指着县政府的影壁墙说：

“谁出的主意？带那么个尾巴干什么？添那么些个扯鸡巴带蛋的零碎儿有什么用？”

“什么尾巴？”台下的群众问。

“那个标语！”张荫梧大声喊叫，“欢迎鹿主席——这就够了，这就是一句完整的话。干什么还加上个‘抗战到底’四个字！”

“你们不抗战到底呀？”群众在台下说，“你们没打算长住呀？喝完那带来的瓶瓶里的水，你们就往回走吗？”

“混账！”张荫梧喊，“在我面前，没你们讲话的权利！”

“你八个混账！”群众也喊叫起来，“我们认识你！”

“把‘抗战到底’四个字儿给我擦掉！”张荫梧拧着粗红的脖子退到后边去。

高翔到台边上来，他说：

“我们不能擦掉这四个字。这是四个顶要紧的字，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，或者是抗战不到底，我们这些老百姓，就不要淋着雨赶来欢迎你们了！”

“对呀！”台下的群众一齐鼓掌叫好。

“我们欢迎你们抗战，抗战是光荣体面的事情。”高翔说，“虽然在去年七月间，你们一听到日本的炮声就逃走了，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回来，我们还是希望你们抗战到底！”

“报告主席，我讲几句话！”在群众中间，有一个

女孩子举起手来，高翔和台下的群众，一齐鼓掌欢迎她。

她把头上的一顶破草帽，推到脊背上去。细小的雨点落在她乌黑的头发上，又滴落到她的肩上。淋湿的小袄袄紧贴着她的身体，站在台前，她把胸脯挺得很高。她说：

“我是子午镇的人，我叫春儿。我是一个没依没靠的穷孩子，现在是我们村里妇女自卫队的指导员。我愿意在今天这个会上讲几句话。”

女孩子的热烈的真诚的声音，使台下上万人的会场安静下来，人们可以听见，春天的雨点落在树枝草叶上的声音。

“这才过了半年多。”春儿说，“什么事情我们也记得。在去年秋季儿大水漂天的时候，听见日本人的炮响，官面和军队，有钱和有势力的人都往南逃跑了。这些人，平常日子欺压我们，临走拐带着枪枝和钱粮。我们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当时都说：等死吧。可是天无绝人之路，中国不会亡国，八路军过来了，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。八路军来了，给我们宣传讲解，我的心才安定下来，才觉得眼前有了活路。坚决抗日！我们老百姓动员起来，武装起来，我们成立了农救会，妇救会，我们站岗放哨。破路拆城，我们学习认字，我们实行民主。从这个时候起，我就想：我

们将来有好日子过。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了，也不叫那些混账东西们再来压迫我们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汉奸投降派！”

群众随着她高举的小拳头呼喊，她从台上跳下来，腰里的手榴弹碰的小洋铁碗叮当乱响，跑到她村的队伍里去。

接着由高庆山指挥，在跑马场里，举行了全县男女自卫队的会操和政治测验。高翔请鹿钟麟和张荫梧参加检阅，虽然一切成绩都很好，这两位官长，像土地庙门口的两座泥胎，站立在台上，却满脸的不高兴。

“半年以来，群众在武装上，在思想上，都进步很快。”高翔说，“这是我们国家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保证！”

两位官长没有说话。

“张先生在事变以前，不是也训练过民团吗？”高翔又问张荫梧，“那时的情形和眼下不同吧？”

“不同。”张荫梧说。他招呼了鹿钟麟一声，就命令手下人把马匹拉过来，气昂昂的跳上马去走了。

“不远送！”群众说笑着，继续进行检阅和测验，春儿带来的自卫队，表演的顶出色。

检阅完了，人们要回去的时候，李佩钟跑过来，叫住了春儿。

“什么事儿呀？”春儿笑着问。

“有句话和你说。”李佩钟拉着她走到广场前边的一棵小槐树下面说，“好久看不见你，我很想你！”

“我也想你。”春儿笑着，一边扬着手冲着她的姐妹们喊：

“你们头里先走吧，一会儿我赶你们去！”

“这些日子，你在家净干什么？”李佩钟问。

“不得闲儿，正赶着给军队做鞋。”春儿说。

“上识字班没有？”李佩钟问。

“上哩。”春儿说，“我们村里住着队伍，有个女同志给我们讲书，人们上学的心可盛哩，到的可齐截哩！”

“认识多少字了？”李佩钟问。

“说不上来。”春儿说，“反正课本上的字都学会了。”

“田耀武回到你们村里了？”李佩钟一下转了题目。

“嗯。”春儿说，“什么你们村里呀，不也是你的家吗？”

“你把这个带回去，”李佩钟从口袋里，掏出一封信说，“交给田耀武。”

“什么信呀？”春儿拿着信问。

“你不是认识很多字儿了吗？”李佩钟笑着说，

“又没有封着口儿，你自己看吧。”

“我不看你们的私信。”春儿笑着把信塞进挂包里。

“不是私信。”李佩钟严肃的说，“是个通知，我要和他离婚了。”

遇见这种事儿，春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呆了一会儿她说：

“李同志，还有别的话没有？我该追她们去了。”

李佩钟送她，从拆平的城墙上绕到西关来。天气放晴了，天空跑着云彩，地基上长着一团团的野菜，黄色的小花头顶，吊着水珠儿。

在西关头起分别的时候，春儿觉得应该安慰安慰女县长，她腼腆的说：

“李同志，这以后你就好了！”

说完，她就转身跑到堤坡下面去，遍地是长高的麦子，春儿跑在小道上，像在大海里浮游。白色的云朵掩过太阳，金黄色的跳跃的阳光，从天边那里一直铺到她的身上。她周围的小麦，乱摇摆着身子。

李佩钟站在高坡上望着她。在年龄上，两个人只差七八岁，应该庆幸，从今以后，不会再有种种苦痛，沾染一个女孩子的心了。

四十

春天，把新鲜的色彩和强烈的情感，加到花草树木的身上和女孩子们的身体上。春儿跑了一阵，看看还是追赶不上队伍，就慢慢的走起来。小道两旁，不断有水车叮当响动。有一个改畦的女孩子，比春儿稍微小一点，站在那里，扶着铁铲柄儿打盹。水漫到小道上来了，那匹狡猾的小驴儿也偷偷停下，侧着耳朵，单等小主人的吆喝。

“喂，开了口子了！”春儿站住，叫醒那女孩子。

女孩子一愣，睁开眼四下里看了看，笑着跑过来，慌忙把水堵住，一边吆喝动牲口，一边看着春儿身上的枪枝手榴弹说：

“检阅完了吗？哪村的第一呀？”

“我们的第一，”春儿说，“四区子午镇！”

“我们村里第几呀，小王庄？”改畦的女孩子指一指身后的村庄。

“小王庄？”春儿仰脖儿想了一想说，“我记不清了，反正不大靠前吧！”

“丢死人了！”改畦的女孩子使劲儿挖开一个畦口，把水引进去，说，“去的时候敲锣打鼓，我看怎么着回来见人吧。”

“你怎么不去？”春儿说，“你不是妇女自卫队员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是？”女孩子说，“我要是去了，就不能落个这样。是我爹不让我去，他叫我浇园，他是个出名儿的老顽固！”

“下次检阅的时候，你务必去吧！”春儿安慰她说，“可热闹哩！”

“就是吧！”女孩子笑着说，“等几天，咱姐妹两个在大会场上见面儿吧！这么热天儿，你不喝口新井水，歇息一下再走吗？”

“喝口就喝口，”春儿跑到井边上，扎下脖子喝了一阵凉水，直起身来擦擦嘴儿，在小驴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才走开了。

一路上，红皮的枣树枝上，吐出嫩芽儿来，葫芦蔓儿，刚刚爬到架边上，就仰起头来，开了第一朵花。一只怀孕的野兔儿，在麦垄儿里悄悄的跑过，从山地飞到平原来的蓝靛儿鸟，在一片金黄的菜子地里一起一落。

春儿也忽然困倦起来。她靠着道边一棵大柳树坐下，眼皮打起架来了。

这地方离黄村不远，野地里，有几个小孩子，追赶一只虎不拉鸟儿。他们估计虎不拉儿要在这独棵柳树上落脚，一个小孩子就提着拍网奔这里跑来。这孩子长的像个小墩子鼓，来到树下，呼哧呼哧的，在拍网的信子上套上一个大蜈蚣，就往地下一按，正按在春儿的怀里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春儿一惊睁开眼，紧紧抱着她的枪枝。

小孩子说：

“你挪挪地方睡去吧，我要在这里下网！”

“我碍着你下网了吗？”春儿揉着眼，不高兴的说，“吵了人家的觉，还叫人家给你挪地方！”

“这是我们黄村的地方，”小孩子说，“要睡觉到你家炕头儿上睡去！那里没人撵你！”

“你这孩子说话儿怎么这么霸道？”春儿说，“就分的那么清楚呀？我们不都是中国人呀？我们不都是为了打日本吗？”

“你没有我们老师讲的好。”小孩子一擦鼻子，“快点儿动动吧，鸟儿就要飞过来了！”

春儿勉强站起来，把枪使劲往肩上一抡，虎不拉儿飞过来，刚要落树，吃了一惊，一展翅儿，像箭一

样飞到崔家老坟那里去了，小孩子跺起脚来，那几个也围上来叹气，春儿说：

“抗日时期，你们不好儿上学，却满世界跑着玩儿！”

“跑着玩儿？”小墩子鼓儿说，“我们这是练习打游击战，看看就要把全部敌人，包围歼灭在这棵柳树下面，想不到完全叫你给破坏了！你是哪村的？干什么背着枪？有通行证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春儿掏掏挂包和口袋儿，笑着说。

“那就到团部去吧！”小墩子鼓儿镇静的说。

“什么团部？”春儿忙问。

“黄村儿童团团部。”孩子们说着围了上来。

春儿有些着慌，她赶紧解释，说是参加检阅去来，小墩子鼓儿说：

“那你为什么不和队伍一块行动？不是打算开小差，就是犯了自由主义。”

叫他们逼的没法儿，春儿打算到村里去，这时通城里的道上，跑来一匹马，骑马的战士，一会儿把身子贴在马上，一会儿又直起来，用力抖动着缰绳，孩子们都转过身去看了，春儿早笑的张开了嘴儿，认出那是芒种。

芒种跳下来，问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儿，说：

“小同志，你们不认识她呀，今天全县妇女自卫

队检阅，她考的第一名！”

“看不透。”小墩子鼓儿说，神色上已经对春儿表示着尊敬。

“我给她证明，”芒种笑着说，“把她交给我吧！”

“那没有问题，”小墩子鼓儿说，“我们认识你。不过我们要给这位女同志提个意见：你在全县的检阅上，考了第一，这自然是好，可是根据刚才的事实，你还有两个缺点。”

“哪两个缺点？”春儿问。

“第一，脱离队伍，单独行动，这证明你的组织观念不强；第二，带着武器，在大道旁边睡觉，这证明你的警惕性不高。站在同志的立场上，我们提出这两点意见，不知道你虚心不虚心，接受不接受？”

“接受，我虚心。”春儿笑着和芒种走了。

走出了一截，芒种说：

“你是在那里等着我吗？”

“闲话！我怎么知道你来哩？”春儿说，“是和李县长说话儿耽误住了，又叫这群孩子们缠了一阵。你这是干什么去？”

“给司令部送信。你累了，骑上去吧。”芒种把马拉住。

“过了村儿吧！”春儿笑着说。

过了黄村，就着崔家老坟旁边的石头人儿，芒种

把春儿扶上马去，春儿试着叫马跑了几步，震的肠子肚子生痛，赶紧停下来。

“你应该习练习练，”芒种赶上去给她拉着缰绳说，“用时不当，当时不用，多学一桩本领，又不担什么沉重。”

“怎么这样颠的慌呀？”春儿皱着眉说，“我在上面坐不住。”

“骑几遭就好了，”芒种说，“身子放活一点儿，不要光叫马随你，你也要随着它一点儿。”

到了子午镇村边，春儿笑着说：

“站住。我下去吧，你骑上办你的公事儿去。”

她从马上跳下来，两腿酸痛，一拐一拐的走，在快进街口的时候，遇见了一个邻舍家的老大娘。大娘从地里回来，提着满满的一毛篮野菜。里面有马勺菜、老鹑锦、乍乍菜和苕苕菜。

“大娘！”春儿说，“又到哪里弄了这么些新鲜菜儿来？”

“在崔家老坟那里！”大娘说，“不光菜儿新鲜，我还看见了桩子新鲜事儿哩。”

“什么新鲜事儿呀？”春儿问，“是小孩子们到那里赶雀儿了吗？”

“啊，是一对雀儿哩！”大娘瞅着春儿的脸说，“沿着大道飞过来的！”

“我就没有看见。”春儿说。

“你哪里就看见了，”大娘笑着说，“你只顾骑人家的大马了！”

“唉！”春儿红了脸说，“大娘只会逗笑儿！”

“西庄的花轿铺，把花轿全都拆卸了。”大娘又说，“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呀，”春儿说，“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人家说，以后娶媳妇儿的，没人再坐花轿了。”大娘说，“打你这兴起，都改成骑大马了！”

“她愿意坐什么就坐什么！”春儿笑着说，“我晚上还没菜吃哩，大娘给我一把苣苣菜！”

“多抓点儿，”大娘把篮子放在地下说，“咱娘儿俩这叫不说不笑！不笑就不热闹。”

春儿怀里抱着一把根儿像奶汁一样白的、菜儿上还带着露水的苣苣菜，跑回家去。

四十一

春儿回到家里，这一晚上睡的很不踏实，白天检阅民兵的场面，还在眼前转，耳朵里不断喊口令的声音。她感到屋子里有些闷热，盛不下她，她不知道，是一种要求战斗的情绪，冲激着她的血液，在年轻的身体里流转。

她听见街上有狗叫，有马蹄的声音，有队伍集合的号令。她坐了起来。

有人拍打门。她穿上衣服出来，从篱笆缝儿里看见芒种拉着一匹马，马用前蹄急躁的顿着地面。

她赶紧开开门，问：

“黑更半夜，什么事？”

“司令部要转移了，”芒种说，“明天早晨这里就有战斗！”

“我们哩？”春儿说，“我们妇女自卫队怎么配合？”

“部队已经和地方上开过会，区上会来领导你们，你早一点准备一下吧，我要回城里去了。”

“你快去吧！”春儿说，“明天，我们战场上见吧！”

芒种跳上马走了，队伍从村子的各个街口中开出来，像一条条黑色的线，到村西大场院里去集合。

队伍的前边都有一个老乡带路，农民们像打早起、走夜道一样，轻轻咳嗽着，又要摸出火镰来抽烟，叫战士们小声止住了。

“对！”农民把烟袋又掖在腰里，“那兔崽子们有千里眼！”

听见响动，老百姓都起来了，大人一穿衣服，小孩子也跟着爬起来。家里住着队伍的，男女老少都送到村外来。一路上，话语不断：

“同志们，你们在我这里住了一程子，茅草房舍，什么也不方便，好在咱们是一家人，这没说的。你们再走到这里，千万不要忘了我，一定到家里落个脚儿。咱家里没有别的吧，可喝个开水儿，吃个高粱饼子呀，你们又不嫌弃！”

“大伯，我们一定来。”战士们小声说，“大伯回去睡觉吧，天还早哩！”

“你们出兵打仗多么辛苦，我缺那么一会儿觉睡呀？”大伯说，“这一程子，别的倒没什么，就是你大娘嘴碎一点，小孩子好发废，你们没得安生！”

“大娘心眼儿很好，”战士们说，“小兄弟也叫人喜欢，好好叫他上学呀！”

“反正得供给供给。”大伯笑着说，“赶上这个年月，还能不叫他上上学？长大了，也叫他出去，和你们一样打日本！”

“等不到他长大，我们就把日本打跑了！”战士们笑着说。

一直送到场院里，站好了队形，大伯还不断猫着腰跑过去，和战士们小声说话儿，说两句就赶紧退回来。大娘也赶了来，着急百赖的在一个战士手里塞上了一个热乎乎的大鸡蛋！

“拿着吧！”大娘喘着气儿说，“光着急，怕你们走了，也不知道煮熟了没有，你们趁热儿快吃了吧！”

队伍前面，民运科长正说损失了老乡的什么东西，要折价赔偿的事。一个战士说：

“大娘，我们不是给你打了一个小玻璃盆儿吗？我去领钱！”

“快别寒伧！”大娘小声说，“就当你小兄弟打了。”

“老乡们，肃静一些吧，”作战科长讲话了，“过去，我们转移的时候，总是不言一声的就走了，使得老乡们惊惶，并且对我们不满。现在我把今天的情况简单分析一下，叫老乡们有个准备。敌人从保定、河

间出动，沧石线上也增加了一些兵力。主要的是保定出来的这一股，已经侵占了我们的博野、蠡县、安国三座县城，有向沙河以南地区侵犯的企图。现在沙河和滹沱河里都没有水。我们一定能打退敌人的进犯，可是开头一两天，我们得先和他绕绕圈子，比比脚步！老乡们应该听区上和自卫队的指挥。坚壁东西呀，转移呀，帮助军队打仗呀，地方上都有布置。老乡们，我们再见吧，过几天，我们一同庆贺胜利吧！”

队伍分成两路出发了，全村的老百姓，站在堤坡上，直到最后的一个战士也隐没不见，才回到家去，作战斗的准备。

春儿回到家里，往灯盏里添了些油，小灯立时亮了。她开开小柜，把几件衣服和一匹没织完的布包起来，藏在挖好的一个洞里；把纺车埋在柴草堆里，把粮食装好，背到野外麦地里藏了。看看屋里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，才松了一口气，坐在炕上，她守着灯，整理好她的枪枝手榴弹，把干粮装在背包里，披挂好就去集合她的人了。

军队在急行军，他们脚步轻快，带着饱满的战斗的力量。他们在黎明前要绕到敌人的后面去。在延绵曲折的道沟里，他们像雨季的河水，震荡着平原。他们通过村庄，换过向导，绕过枣树林，绕过大壕坑。田野里雾气很重，北斗星低垂着，好像再走几步，就

可以抓到它的柄子一样。

高庆山的支队，奉命从县城开到五龙堂一带村庄驻扎，他接受了战斗的任务。

指挥部就设在他家有战斗历史的小屋里，他的父亲和女人都到街里工作去了。在小屋里，他召集区委同志们开了一个会。区委同志们的意见，希望高支队能在这里打一个硬仗，长长抗日的威风。他们说，这样一来，地方上的工作就更好做了。

高庆山说明：目前的形势，还是敌强我弱。我们只能选择有利的时机，打击敌人，在战争的锻炼里，壮大自己的力量。用逐渐的由小到大的胜利，来保持和发扬军民的战斗情绪。他说，“拿句地方上的土话做比方，我们的战略是：‘老虎捡蚂蚱墩儿，碎拾掇！’”

四十二

区委连夜召集附近几个村庄的支部书记和武委会主任开会，布置了配合军队作战的任务。高四海担任了侦察组的组长，组员里面有一个女的，就是春儿。

“你要我去干什么呀？”从会场出来，春儿问高四海，“给你们添累赘吗？”

“快到家里打扮一下，我们一块儿去出探，”高四海笑着说，“我知道你是个顶灵通的孩子！”

一老一少，在堤坡小屋里打扮好出来，天刚发亮儿，高四海背着大柴草筐，破袄袄，系着白搭包。春儿举着红缨大鞭，赶着姐姐家那一群山羊。她的腰里，挂着一个用破布袋片缝成的兜囊，盛着两颗手榴弹和几块硬干粮。

他们估计敌人可能从县城这个方向来，就奔着崔家老坟去。春儿赶着羊在道沟里，老头儿走在道坡

沿上，四下里了哨着。

四月初，小麦正扬花儿。早晨野外的风很凉，春儿的身上却是躁热，她说：

“大伯，前边有动静吗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，夜里开了会，连路行人都断绝了！”

“你眼花不眼花？”春儿笑着说，“别叫我和敌人走个碰头儿呀？”

“我眼花你给我去配花镜？”老头儿不高兴的，说，“年少别笑白头人！”

到了崔家老坟，老头儿站住说：

“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，把羊轰上来！”

一丈多高的沟墙，就是山羊也爬不上去，春儿一个个把它们抱起来，老头儿搬着犄角，拉了上去。羊们抖抖身上的土，就跑到坟坎里去吃草了。

老头儿把春儿拉上来。

这是一片大坟地。临道边。有两个老虎样儿的石兽，半截身子埋进土里，嘴上涂满车油泥。有几匹石马也陷在泥土里，山羊们跳到它们的脊背上去玩耍，羊们离开山地和石头，已经快到一年了。

坟地里，密密的芦草有半人高，一排排高大的杨树，没有风，也在哗哗的响。有两只秃尾巴老鹰，立在坟头上，看着人走近了，才慢慢的飞起来。

春儿摇动着大鞭，把羊们赶到芦草深处去。

高四海把草筐放在道沿上，割起芦草来，不断直起身子，了望通城里的路。

春儿有些着急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她就仄着耳朵听。她听见通通的响声，在她身边的一棵大杨树上，有一只啄木鸟儿，展开花丽的翅膀。春儿脱了鞋，光着脚儿爬到树上去，坐在树杈上了望，把手榴弹掏出来，插在啄木鸟的窝洞口儿上。

“有人来了！”她小声对高四海说，把身子紧贴着树干。

从东边来了一个骑车子的，他在道沟上面，走走站站，看看前边，又看看后面。

路过坟边，他从车子兜儿里掏出一枝手枪来。

高四海还是弯着身子割芦草，整整齐齐放到筐里去。

“老头儿！”骑车子的人下来走到他跟前说，“你是哪村的？”

“你问我呀？”高四海直起身子来说，“小村庄，五龙堂的，你打哪里来呀？”

“你不要问！”骑车子的人把手里的枪一扬。

高四海就又弯腰割草。

“你们村里驻着军队没有？”骑车子的人问。

高四海不言一声。

“喂！”骑车子的人喊，“你聋了吗？”

“我不聋。”高四海一边割草一边说，“鸡叫狗咬我全听得见。你不叫我问你，你就也别问我！”

“这老头儿很倔！”骑车子的人把枪又一扬说，“你不怕这个玩意儿！”

“我不怕，”高四海说，“在我们这一带，凡是拿枪的都是八路军，工作人员。他们从来也不吓唬人，除非是那些汉奸们，可我看着你又不像！”

“我不像吧？我不像一个汉奸吧？”骑车子的人笑着，把枪放在车兜儿里，把车子靠在石兽上。

“不要靠在那上边，那上边有油。”高四海说。

“可不是！你不说，我还没看见哩，”推车子的人把车子往前推了推，靠在高四海身边一棵小树上，转过身来坐在一铺芦草上说，“你这老头儿很好，谁在这老虎嘴里抹了这些油呀！”

“这是一对坏家伙，”高四海也坐下说，“你要不往它身上抹点油儿，它就祸害你，叫你翻车！”

“你们这里的人，也够绝短了，”骑车子的人说，“这样一挖道沟，汽车坦克都不好走，通到你们村里，都是这么深的沟吗？”

“到处一样，”高四海说，“咱这里哪有汽车呀？”

“你们没有，日本人有呀！”骑车子的人说，“一边走一边填沟，你看有多么别扭！”

“他别扭他的吧，用不着替他们发愁。”高四海把烟袋递给骑车子的人说，“谁叫他侵略咱们呀！抽袋烟吧！”

骑车子的人接过烟袋来，低头打火，他没有使惯火镰，老是打不着。高四海伸手从他的车子兜儿里把枪摸出来，坐在屁股底下，说：

“来，我给你打吧，你是使自来火儿的手！”

“你算猜着了！”骑车子的人说，“我平常抽的是烟卷儿，可是这两天，什么也买不到。”

“一看你就不像乡下人！”高四海又说，“你一定生在大地方！”

“唔！”骑车子的人说，“我是保定府人！”

“你是出来给日本人带路，你一定是个汉奸！”高四海说着站起来。

骑车子的人立起来，就去车子兜里抓枪。

高四海把枪一举说：

“在这里呢！”

汉奸扑过来要夺，高四海一闪身子，顺劲儿一推，汉奸就栽到一个石老虎身上，亲了个嘴儿，沾了满脸油泥。高四海把他的手背过来说：

“你先不用回去给日本报信，就在这里凉快会儿吧！”

他把汉奸的裤带解下来，把汉奸的脑袋硬折过

去塞到裤裆里，像打蒲包儿一样，用裤带捆了，推到芦草深处一个狐狸洞口上。

“大爷，你不要活埋我呀！”汉奸在裤裆里说。

“谁家的坟地叫埋汉奸呀？”高四海说，“这叫看瓜园。说实话，你出来干什么？”

“日本人叫我来扫探这里有没有八路军，道路儿好走不好走。”汉奸说。

“日本人到了哪里？有多少人马？”高四海问。

“到了新营，”汉奸说，“两辆汽车，二十匹马队。现在也许过了河。”

“走哪条路，奔哪里来？”高四海问。

“就打算走这条路，奔子午镇来。”汉奸说。

“你在树上猴着吧，我去给你姐夫送个信儿，”高四海望着春儿说，“就骑着这辆自行车！”

四十三

高四海把车子拉进道沟里，骑上去歪歪扭扭的走了。

春儿一个人望着通城里的大路。大路上，除去有时飘过一个旋风，拧着沙土和柴草，跳过道沟，跑进麦地，连一只飞鸟儿也看不见。到处的村庄像封闭着，谁家房顶上也没有炊烟。

春儿看着这条路，她想：如果没有敌人，这时候大道上就会有送粪拉土的车辆，有吆喝牲口的声音，有接连的鞭子的响动，有小孩子们去砍草放羊。这样好的天气，也许有妇女们打扮好了，到近处去赶庙会，有男人们带着本钱和行李出外去经营。他们的妻子，一直送到大路边。在这条大路上，经常有热闹红火的迎亲的花轿和鼓乐，那些老年的乐手们，永远在吹奏着轻快和振奋的调子。

她想：假如叫敌人占据了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就什

么也没有了。

春儿揭开手榴弹的盖儿，她看见了日本人的汽车。这孩子头一次看见这种奇怪的车辆，它装载着敌人，凶恶的践踏了家乡的土地。

汽车在道沟旁边的正在扬花的麦地里走，密密的小麦扑倒了，在汽车后面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委屈痛苦的痕迹。

女孩子震动了一下，她用力咬着嘴唇，一只手紧紧搂着树枝，敌人的车辆马匹，像是在她的胸膛上轧过来了！

高四海回来了。

“大伯！”她招呼高四海，“日本人过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不要慌！”高四海把车子草筐藏好，把手枪掖在裤腰带上，脱下鞋来。这老人上树，赛过一匹猿猴，他两只手攀着光滑的大叶杨树身，弓着身子，像走路一样。

“就是送信也来不及了，”春儿着急的说，“我们扔个手榴弹，叫村里知道吧！”

“等我数一数，”高四海一手扳着树枝，探出身子去望着，他说，“敌人数目并不大，不要惊动它！”

“进村烧了房怎么办？”春儿说。

“军队早有准备。这像一个荷包儿，等它钻进去，

我们再收口儿吧！”高四海小声说。

敌人的汽车从坟前面过去，两旁有几十匹马队。他们浑身是土，满脸是汗，他们侵略别人的国家，一步步是走的下到地狱去的道路。高四海和春儿把身子隐在枝叶里。等敌人走到河滩中间的时候，高四海向空中放了三声枪。

那是一段大空地。敌人在阳光照射的白茫茫的沙滩上，像晾在干岸上的鱼。我们的部队在四处的道沟里飞快的运动着。

这只是一小股侦察性质的敌人，高庆山命令直属的一个营在很快的时间把它消灭在河滩里。

战场就在五龙堂村庄的边沿，作战的又都是农民的子弟，五龙堂的老百姓，全围在堤坡后面助威来了。战士从他们身边跑过，老年人小声的鼓励和嘱咐他们。

秋分领导的妇女炊事组，对面站在堤坡里面，一排人捧着烙饼裹鸡子，一排人提着开水壶，像戏台上的执事一样。战士们顾不得吃东西，她们只能等候亲人们作战回来。

必须占领那片高高的丘陵起伏的柳坡子地。

芒种的通讯班，抱着一挺轻机枪，跑过一段沙滩，完成了这个任务。

河滩里的敌人四处乱窜起来，一辆汽车打翻了，

另一辆汽车想突围，回到崔家老坟来。春儿在树上看的准准的，扔下了两颗手榴弹，在车厢里炸开了。

全村群众跑出来，帮助打扫了战场，军队进村吃了些东西，就向北方转移了。

四十四

但是，北边的敌情，发生了变化。高疤带领的一团人，奉命驻扎在石佛镇附近一带的小村庄，任务是监视敌人，牵制敌人，在不利的情况下，迅速转移。高疤近来觉得自己在这个支队里，比起别的团长来，有些闷气。支队长一谈就是政治、政策，他对这些全都不感兴趣。他觉得，既是一个军人，就应该在打仗上见高低。很久以来，他就想露一手给大家看看：我高疤的长处，就在这打仗上面。

为了热闹和吃喝方便，他私自带着一营人驻在石佛镇大街上。中午的时候，他听说在子午镇打起来了，并且是直属营打胜了，他越发跃跃欲试起来。敌人从安国县顺着通石佛镇的公路走，道路完全破坏了，敌人就沿着道沟沿走，并不防备附近村庄驻着我们的队伍。这也是敌人兵力较大的表现，高疤却单单把它看成了敌人的弱点。并且生了气，咒骂敌人不把

高团长放在眼里，他很想跳到高房上去呐喊一声。他鼓动手下两个连长，带着一部分弟兄们上了房，当敌人的先头部队刚刚爬进他的火力圈的时候，他开了枪，暴露了目标。

高疤的队伍，从成立以来，打过几回高房防守仗，在束鹿县，曾死守一个城镇，到一个月工夫。那都是在混乱时期，他同别的杂牌队伍互相吞并的时候。敌人发觉前面有我们的队伍，就好像找到了目标，散开包围过来。敌人火力很强，飞机很快也来了，炮弹炸弹毁了很多房屋，村子着起火来。高疤的队伍，还没有经过这样严重的阵势，支持不住，下面的人对高疤的冒失行为有很多抱怨，意见不一致，有的跟着老百姓逃散到漫天野地里去了。老百姓见他们不能保护自己，反跟着乱跑，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，排斥他们，他们就乱冲乱撞那些妇女孩子，只顾自己逃到前边去。敌人打进了石佛镇北街口，眼看就包围了整个村庄，队伍和老百姓再也撤不出来了。

高庆山接到报告，研究了全部情况。他带领部队，采取极为隐蔽的形式，迅速的转移到了敌人的侧面。派一营兵力，去切断敌人。

芒种和他那一个班，又参加了战斗。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指挥得好的战斗，取得了胜利，光荣和功绩还在鼓舞着他。在路上，他见到那些满脸泥汗，饱受惊

慌的妇女孩子们，一种战士的责任感，强烈的冲激着他的心。

他带领一班人，在大洼里准备好，顺道沟翻过大堤。他们的任务是：经过一带菜园，冲进一个坟丛，沿着潞龙河岸，占领石佛镇南街口那座大石桥。现在，园地里的春大麦长得很好，但是也还不能完全隐蔽跃身前进的战士。包围村庄的敌人，正要在桥头会合，遇到芒种他们的袭击，慌乱了一阵。利用这个时机，芒种弯着身子跑到一架水车后面，然后冲到了那个坟丛里面。

不久以前，曾经有一辆敌人的坦克，绕过道沟，冲到这坟地里，几棵碗口粗细、枝叶茂密的榆树，连根折断了。一个坟堆，像被犁过的一样，铲去了一半，这不知是谁家祖先的坟墓。现在，芒种伏在它前边的白石碑座子后面射击，等候弟兄们上来。

前面，还有一段地，就是潞龙河，河两岸，长满芦苇和青草，看不到里面的流水。敌人火力很强，现在芒种他们只能匍匐前进。他们一边射击，一边注意着眼前的每一棵小树，每一丛野草，每一个坑壕。他们觉得，所有祖国大地上生长着的一切，就连那西沉的太阳，河里的泥水，也都和他们的生命，和他们的作战的任务，结合在一起了。

他们紧紧趴在地上，心跳得很厉害，感觉身子下

面的大地也在震动。家乡的土地！是你在万分危急，生死存亡的时候，默默的鼓动着你的儿女！当你受到侮辱的时候，你有权利召唤你那最勇敢的儿子前进！

他们跃身抢到河边。然后，一齐把手榴弹投向敌人，占据了石桥，切断了敌人。但是芒种受了伤。

黄昏，炮火笼罩着平原。所有的村庄，都为战争激动着。青年和壮年，都在忙着向导、担架和运输。沿大路的村庄，建立了交通站，夜晚，有一盏隐蔽起来的小红灯挂在街里。受伤的战士们，一躺在担架上，就像回到了家。在路上，抬担架的人宁可碰破自己的脚，也不肯震动伤员，又随时掩盖好被头，不让深夜的露水洒落在伤员的身上。

妇女们分班站在街口上，把担架接过来，抬到站上去。那里有人把烧开水，和煮熟的鸡蛋，送到战士的嘴边。

一路上，不知经过多少村庄，战士们听到的是一种声音。当他们被轻轻的声音唤醒，抬起身子，接受一个打开的生鸡蛋，或是一箸头缠搅着的挂面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的是姐妹和母亲的容颜。

芒种的腿上受了伤，高庆山把他交给高四海带领的担架队，抬到子午镇春儿家里来休养。

春儿背着两枝大枪，跟在担架后面，太阳下山了，地里有一阵阵的风声。她为亲人的受伤担忧，心

里又十分兴奋。

她跑到前面去，把屋子打扫了一下，铺好厚厚的被褥。把芒种安排着睡下，把人们送走，她就去请医生了。

子午镇有个西医姓沈，是个外路人，因为和这里的一个女孩子结了婚，就在大街上甜井台旁边丈人家开了一座小药铺。他原来在保定一家医院里拉药抽屉，手艺儿自然不高，为人可是十分热情。住在丈人头上，更要亲密乡里，不管早起夜晚，谁家有了病人，去个小孩子请他，也从来没有支吾不动的时候，人缘儿很好，过年过节，常有人请他去陪客吃饭。

春儿到他家里，他刚从外村看病回来，在院里解车子上的药匣子，他的女人正坐在灶火坑旁拉风箱做饭哩。一见春儿进来，那女孩子就拍拍身上的土，迎出来说：

“快屋里坐吧，大姐！听说你打了胜仗，我正要有点儿好吃的给你庆功哩！”

“谢谢你吧，可是顾不上，”春儿笑着说，“我是来请你们的先生来了！”

“什么蠢先生！”那女孩子笑着说，“不要看他胡子拉塌的了，论乡亲辈儿，他是你妹夫子，就叫他的小名儿好了！你就单身一个人，是谁病了呀？”

“是军队上一个通讯班长，”春儿说，“我姐夫让

抬到我家里来养着，为了离着你家近，看病方便。”

“那就是芒种哥吧，你快去！”女孩子笑着命令她的丈夫，“不要往下解你那行头了！看病要紧，回来再喂你！”

医生忙着又把药匣子捆好，推着车子跟春儿出来。

“大姐！”那女孩子站在台阶上喊，“这不是外人，你可别给他烧水做饭呀！”

“就是吧！”春儿答应着。

来到家里，春儿放轻了脚步，医生把车子轻轻靠在窗台下，跟着走进屋里。

“他准是睡着了，”春儿说着点上小油灯，走过去照了照，芒种睁着两只大眼醒着哩。

“怎么又醒了，痛吧？”春儿问，“我给你请了先生来了！”

“来，我看看！”医生轻轻掀开了芒种身上的被褥，斜着身子坐在炕沿上，“大姐，你把灯端近点！”

春儿一只手护着灯，弯下身子去。她看见芒种腿上那些血，赶紧转回脸来，强忍住自己的眼泪。

医生给洗了洗污血，涂了些药，春儿把坚壁的新布取出来，扯下一条缠好了。

四十五

春儿送回医生，顺便约好医生的丈母娘来做伴儿。这位大娘，今年五十岁了。她的丈夫和春儿的爹一年下的关东。

她好和人家做伴儿，能全心全意的帮助有困难的人家。夜里，她抱着一条被子过来，指着炕上小声说：

“他吃饭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哩，”春儿说，“兵荒马乱的，咱这人家，有什么好做头儿呀？”

“我拿来了一把儿挂面，三个鸡蛋，”大娘打开被子说，“你去给他煮煮！”

春儿添水做好了饭，端到被窝头起，叫芒种吃着，大娘说：

“春儿，我嘱咐你：破伤怕响动，最怕铜器，可别再叫那些孩子们到你院子里来扭秧歌了！”

“不怕，”芒种说，“阵地上机关枪大炮都经过了，敲敲锣鼓算什么？”

“不能那样说呀，孩子！”大娘说，“打仗的时候，心里有一股火气，只想打胜了，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眼下你是养病呀！”

“大娘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好了，”春儿在一边笑着说，“还顾着抬杠哩！”

“我的伤并不要紧，是支队长一定把我留下来！”芒种叹了一口气，就翻身向里睡去了。

“你跑腾了一天，也睡吧！”大娘上炕对春儿说，“上半夜我来支应着！”

春儿把灯盏移到窗台上，打横儿躺在大娘的身后边。她用力闭着眼睛，一直睡不着，翻了几个身说：

“大娘，咱娘儿俩掉换掉换吧，我侍候上半夜！”

“不用掉换，”大娘说，“别看我老了，精神大着哩，三宿几夜的不合眼，我也不觉困，你睡吧！小人儿家，失了觉可不行哩。”

“我睡不着。”春儿说着坐了起来。

“你睡不着，咱娘儿俩就说闲话儿吧。”大娘说。

“那不吵的他慌呀？”春儿指一指芒种，“干熬着两个人干什么，大娘你就先睡会儿吧！”

“那我就睡会儿，”大娘说，“你什么时候困了，什么时候再叫醒我！”

大娘靠着墙，把眼一闭，就轻轻打起呼噜儿来，睡着了。她做起梦来。她梦见芒种的伤养好了，背起枪来对她说：

“大娘，这些日子，多亏你照看我，管我冷热，喂我吃喝，拿着黑间当白日，端屎端尿不嫌脏，我一辈子忘不了，我要把你当亲娘看待！”

“那你不要挂意，”大娘对他说，“你打仗是为了谁呀，还不是为你的大娘呀？你只要告诉我你现在到哪里去，什么时候回来就好了！”

“我要到东三省去，”芒种笑着说，“我要一直打到鸭绿江边，把日本鬼子完全消灭！”

“那你等一下，”大娘着急的说，“等我换上双鞋，跟你去！”

“千出万水，大娘去干什么呀？”芒种说。

“我去找你大伯！他走的时候，我的头上插着红花儿，现在头发白了，他还不回来。我要去找他，告诉他说：我们这里，因为有共产党领导，八路军打仗，穷人们全有了活路，年轻小伙子，不用再撇妻撂子受苦下关东，家来过好日子吧！”

“那就走吧，大娘，”芒种搀扶着她，跟在大队后面，走了很远的路，过了多少条河，出了山海关，穿过大森林，一天傍黑，在一间地主人家的场屋里，找到了她的年老的丈夫。

大娘的老眼里流下泪来。

“不知道队伍宿营，找到房子了没有？”芒种翻过身来说。

“睡醒了呀，”春儿笑着说，“还是说梦话？”

“睡醒了。”芒种说。

“大娘睡着了，”春儿说，“可老是说梦话。”

“大娘是个苦命的人，”芒种说，“她家那个大伯，小的时候，和我一样，给人家当小做活的，后来逼的下了关东！比起老一辈儿的人们来，我们是赶上好年月了。”

“俺爹也是在关东呀，”春儿说，“你不要忘了他。”

“我怎么会忘了他哩，”芒种说，“我要好好打仗，一直打到山海关外去，把那里的人民也解放出来，把咱这一带因为穷苦，因为地主豪绅剥削逼迫，失家没业，东流西散的人们全接了回来！给他们地种，给他们房子住！”

“这是你的志向呀？”春儿笑着说。

“这是我的头一个志向。”

“第二个志向呢？”春儿问。

“第二个志向更远大，我一下还说不周全，”芒种说，“党会领导我去实现的，我只要永远做在前头，永远不掉队就行了。”

“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了？”春儿低下身子笑着问。

“嗯。”芒种说，“你有志向没有？”

“为什么没有？”春儿直起身子来说，“你不要小看我！”

“说说你的吧！”芒种说。

“你等我想一想，”春儿昂起头来，“姐姐对我说，村里的支部，就要吸收我入党了，我的志向就是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！”

她说着，拉住芒种的发热的手，又轻轻抚摸着他的头。

月亮照到炕上来，三个人的热情和希望，把这间常年冷清的小屋充实了起来。

早晨起来，大娘家去吃饭，春儿撒开了鸡窝儿，抓给它们一把粮食，低声说：

“吃饱了，你们就出去玩儿，下蛋也不许叫唤。不要吵闹屋里的人！听见了吗？”

鸡们使劲点着头，赶快吃米。

她照着芒种穿的旧鞋，剪了一双鞋底儿，坐在院当中。一只喜鹊叫着飞到院子里来，她扬着手轻轻把它轰了去。一个好说笑的女人，挟着一抱衣裳来了，蹲在东房凉儿里那块青石板前面，抡起棒捶来。春儿赶紧放下针线跑过去说：

“嫂子！到别人家去捶吧，我家里有个病人！”

“一宿的工夫就忘了，我真是个冒失鬼！”那女人说，“轻些了吗？”

“轻些了！”春儿说，“睡着了。”

“等他醒了，也替我问个好儿吧！”那女人把衣裳卷起来，提着脚跟走了。临出门又回过头来小声问：

“大妹子，你给谁做的鞋呀？”

“给受伤的战士，”春儿说，“等他好了，好穿上找队伍去呀，你不愿意早些把日本鬼子打走吗？”

“看兴得你！”那女人咂咂嘴儿说，“谁说不愿意来呀？”

四十六

高疤不按照命令作战，部队受了很大损失，敌人退走以后，高庆山在石佛镇一家盐店的大院子里，召集支队的干部开会，检讨了这次战役，强调说明在目前形势下的游击战争原则，严厉的批评了高疤，高疤红着脸坐在一边，不服气的说：“扯那些原则当不了飞机大炮，我不懂那个，直截了当的批评我打了败仗就完了！”

“我们要明白打败仗的道理！”高庆山说，“为什么打了败仗？”

“是战士松包，武器禽蛋，众寡不敌！”高疤一甩胳膊说，“我高疤在战场上可没有含糊！”

“你是一个团长，一团人的性命在你手里。你不是一个走江湖耍枪卖艺的单身汉，部队受了损失，就证明你不是英雄！”高庆山说。

“那么该杀该砍，就请支队长下命令吧！”高疤低

下头去说。

“我要请示上级，”高庆山说，“这次一定送你到路西去学习一个时期。”

散会以后，高疤趁着大家吃饭，一个人到街上来。石佛镇，是南北交通的要道，又是潞龙河的一个热闹码头，大街上有很多店铺，石桥头上有一家小酒馆，门口挂着一只破酒壶，高疤走进去，说：

“烫一壶，有菜没有？”

“菜是没有，”跑堂的说，“同志要喝酒，还有昨天剩下的两块豆腐，也许有点儿馊了！”

“拌了来。”高疤一拍桌子坐下。

这桌子正对着朝南的窗子，窗外就是潞龙河，这是一条清水河，水流很安静，水里浮着绿水草。因为左近的人家，长年往河岸上倾倒脏东西，不断有一股臭气扑上来。石桥下系着几只船，也在淘米做饭了。

对岸有一只新油的楼子船，一个女孩子从后舱的小窗口探出身来，一条油黑的大辫子甩到船帮上，穿一件对襟儿的红布小褂，把洗菜的水，泼到河里。她提着水盆，望着小酒馆的窗户。

高疤闷闷的喝着酒，转脸看见了这女孩子，一拧眼眉说：

“你看我干什么，想叫我过去吗？”

“你不叫看呀？”女孩子一抽身藏进船舱里去了，

菜盆碰在船板上，当的一声。

“怎么了呀？冒失鬼！”一位白头发的老大娘吆喝着，从小窗口伸出头来，“和谁吵嘴？”

“和我吵嘴。”高疤接过来，说，“你的女儿多大岁数了啊？”

“十八岁了。”大娘说。

“该寻个婆家了。”高疤笑着说，“穿红挂绿了，船舱里还养的住她吗？”

“女大不中留，”大娘说，“女儿是娘的挂心钩。同志，你多打胜仗吧，把日本打走了，地面太平了，顶马花轿，铜鼓喜炮，热热闹闹的，我把她送出门子去！”

“这个模样儿，该给她寻个带兵的官长……”高疤说。

“对，给她寻个打日本有功的人！”大娘说。

女孩子过来把她的母亲一推。狠狠的把小窗户关上了。高疤听见母女两个在船舱里吵起来。

“你老瞎了眼，”女孩子说，“你和他唠叨什么？”

“人家不是一个八路？”母亲说。

“一个吃败仗的家伙！”女孩子啐了一声，“要不是人家高庆山支队长过来，我们连今晚上的饭也吃不成了！”

“他妈的，”高疤把桌子一拍站起来，“势利眼！”

跑堂赶紧过来，笑着说：

“同志，包涵一点儿。赶的时候不巧，今天鬼子出动，高团长指挥的又糟糕，这街上受了大害，油也叫鬼子们吃了，盐也叫汉奸们给抢走了。滋味儿全不对吧？”

“我问你，”高疤小声说，“你们这里有那个地方没有？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跑堂的睁大眼睛问。

“解闷儿的地方。”高疤说。

“没有。”跑堂的说：“鬼子刚走，救火的救火，埋人的埋人，这时候哪里还有什么解闷儿的地方？”

“我问你有暗门子没有？”高疤说。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跑堂的连忙摆手，“早先，河边上倒是有这等人家，自从成了八路军的地面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，改造的改造，不学好的就跑到敌人那里去了。同志，你是一个革命军人，怎么打听起这些肮脏事情来？”

“我是调查调查。”高疤说着走出来。

他上了大石桥。蹲在栏杆上面的小石狮子，一个个拧着脑袋望着他。桥下的河水冒着浪花，石桥的一头，还有一片血迹，有一班战士在这里作战牺牲了。

他感到烦躁，拐进河南岸的一家小澡塘里去；这是乡下的小澡塘，十天半月才换一次汤水，屋子里潮

湿霉臭，池子里翻搅着白色的泥浆。高疤脱光了跳进去，在雾气腾腾里，踩住了一个胖胖的身子。

“谁呀？”那人像受惊的蛤蟆一样，翻身坐起来，抹着脸上的水说。

“高团长！”高疤大声说，“你看见我进来，为什么不早早躲开，是想绊倒我，叫我喝这口脏水吗？”

“啊，原来是高团长，”那人笑着说，“巧遇，巧遇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高疤问。

“我们在子午镇田大先生家里见过一面。”那人说，“那天我们不是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来吗？”

“你是白先生？”高疤四脚八叉的仰在水里问，“你不是在保定做事吗？”

“这里是我的家，”那人说，“回来看望看望。”

“这澡塘的掌柜也算胆大，”高疤说，“今天他还开张！”

“我们这是沾的日本人的光，”那个人笑着说，“这是日本人洗过的剩水，我们好久不见了呀，高团长近来一定很得意吧！”

“得意个屁！”高疤在水里翻滚着，像小孩子爬在泥坑里练习游泳，溅了对方一脸水，他也不在意。白先生只好缩到一个角落里，躲避他造成的浪潮，背过脸去说：

“没有升官？”

“就要到山沟里受训去了，”高疤说，“还升官！”

“八路军的事情，就是难办！”白先生叹了口气，“耀武这次回来，高团长和他有没有联系？”

“见过一面。”高疤停止了运动，靠在池子边上喘气说。

“听说中央的队伍占了你们县城，”白先生爬过来小声说，“我劝你还是到那边去。在这边永远吃苦受限制，在那边，武装带一披，是要什么有什么。千里做官，为的吃和穿，何苦自己找罪受？当了半辈子团长，又叫去当兵受训，那不是罐里养王八，成心憋人吗？”

“他们怎么占了县城？”高疤也吃了一惊。

“怎么占了？”白先生冷笑说，“这像走棋一样，八路军退一步，中央军就得进一步！空出的地面不占，还到哪里捡这样的便宜去？”

“里外夹攻，那我们不是完了吗？”高疤说。

“可不是完了呗！”白先生说，“日本的来头，你是尝过了，你看人家武器有多凶，人马有多整齐？这还不算完哩，听说各路又增兵不少，非把吕正操完全消灭不可！中央军再一配合，从今以后，八路军再不能在地面上存身了，你只好跟他们到山沟里吃野菜去，你舍得这个地方吗？舍得下你的太太吗？”

“我有点不信。”高疤思想了一会。

“我要骗你，就淹死在这池子里，”白先生把脖子一缩说，“你想想吧，升官发财，倒是哪头儿炕热？晚过去不如早过去，你要去，我们一块儿走。”

“我穿着八路的军装，路上不大方便吧？”高疤说。

“只要你去，”白先生说，“我家里什么也有。”

四十七

在姓白的家里，高疤换上一套便衣，在灯光下面，对着镜子一照，恢复了他一年前的模样。他脸上的疤一红，叹口气说：

“干了一年，原封没动，还是我高疤！”

姓白的站在一边说：

“走吧，到那边你就阔起来了！”

由姓白的领着，他俩翻过石佛镇大堤跑了出来，没有遇到岗哨。这样晚了，路上已经断绝了行人，在堤头的一棵老榆树上，有一只夜猫子叫唤。

“我们要先奔子午镇，”姓白的说，“到田大先生那里一下，你也可以顺便告诉家里一声。”

“白先生，”高疤说，“我不明白，你是给日本人做事，还是给中央军做事？”

“其实是一样。”姓白的笑着说，“原先我是投靠了日本的，当了汉奸，觉得有点对不起乡亲。中央军

过来，田耀武对我说，我走的路子很对，还推许我是一个识时务有远见的人，叫我也给他们做些事情，这样一来，我的路子更宽，胆量也就更大起来了！”

“我是个粗人，”高疤说，“现在的事情，真有点儿不摸头，从今以后，希望白先生随时指点。”

“其中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。”姓白的说，“你这样看：中央军和日本，合起来就像一条裤子，我们一边伸进一条腿去走道就行了。这个比方你不懂，我们再打一个：你原先不是一个走黑道的朋友吗？你的目的是偷，是发财。我们不管别人说长道短，不怕官家追捕捉拿，有奶便是娘亲，给钱就是上司，北边的风过来向南边倒倒，东房凉儿没有了，到西房凉里歇去，中国的事情越复杂，我们的前途就越远大！”

“白先生真是一把老手。”高疤说。

“这一篇书叫汉奸论。”姓白的笑着说，“你学会了，就能在中国社会上，成一个不倒翁！”

两个人讲究着到了子午镇村边，由高疤引路，避开自卫队的岗哨，把姓白的送到田大瞎子家门口，他回到俗儿这里来。

田耀武也刚偷偷的回到家里。他的母亲正把李佩钟通知离婚的信，交给他看。田耀武说：

“你们不要生气，她咋不了刺儿！”

“人家是县长啊！”他娘说，“衙门口儿是她坐着，

还不说个什么就是个什么？天下的新鲜事儿，都叫她行绝了，头回是审公公，二回是捕她父亲，这回是传自己的男人去过堂！”

“她传她的，我不会不去？”田耀武说，“我们不承认她们这份政权。论起官儿来，我比她大着一级哩，我是个专员！我是中央委派的，是正统，她是什么？邪魔外道，狗尿苔的官儿！”

“对，”田大瞎子说，“不理她这个碴儿！”

“可是哩，”他娘有些怀疑，“你做了官儿，你那衙门口儿在哪里呀，就在咱家这炕头儿上吗？”

“我们就要进攻县城，把她们赶出去，”田耀武说，“这不是白先生来了，你和日本联络了没有？”

“联络过了。”姓白的说，“我还给你们引来了一个向导高疤，明攻明打，恐怕你们进不去，就叫他带头，冒充八路军，赚来这座县城！”

“你们在村里，也要做些工作，”田耀武对他的爹娘说，“要尽量破坏八路军的名誉，在村里，谁抗日积极，就造他的谣言，叫群众不相信他！”

“反对共产党，造八路军的谣言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田大瞎子说，“我研究了一年多，也想不起什么高招儿来。现在不像从前，那时候共产党不公开，红军离咱这有十万八千里，你编排它什么也行。眼下共产党就在村里，八路军就住在各家的炕上，你

说它杀人没人信，说它放火看不见烟。村里穷人多，穷人和共产党是水和鱼，分解不开。像我们这样的户，在镇上也不过七八家，就在这七八家里，有很多子弟参加了抗日工作，他们的家属也就跟着变了主张，现在人们的政治又高，你一张嘴，他就先品出你的味儿来了，有话难讲。”

“田大先生的分析，自然有道理。”姓白的说，“可是我们也不能在困难面前认输，群众也有反对他们的时候，妇女出操，碰球开会，演戏扭秧歌，男女混杂，那些当公婆的就不赞成，当丈夫的也有的会反对，我们就要看准这些空子，散放谣言，扩张群众对他们的反感。再如征粮的时候，做军鞋的时候，扩兵的时候，都要看机会进行破坏。”

“白先生很有经验，”田耀武介绍说，“他在东三省破坏过抗日联军的工作。”

“常言说：没缝还要下蛆呢，”姓白的说，“有缝你再拉不上，简直连个苍蝇也不如。干部也好打击，男的积极，你就说他强迫命令，女的积极，你就说她有男女关系，无事生非，捕风捉影，混乱黑白，见水就给他搅成泥汤儿！”

“我看那个叫春儿的，就是个好对象。”田大瞎子说，“咱们那小做活的芒种，是她鼓动着参加了八路军，那天作战受伤，现在她家里养着。我看这就是个

好题目，一敲两响，既破坏了八路的名声，又打击了村里的干部！”

“这些事儿，”田耀武的母亲说，“我不好出头。我得去找俗儿。”

“就去找她。”姓白的说，“她丈夫成了我们的人，她自然也得是我们的了！”

四十八

医生又来给芒种换药，芒种的伤已经大见轻了，春儿站在一边，笑着说：

“先生，你为什么不参加八路军呢？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手艺贡献给国家呢？”

“年岁大了，”医生收拾着药箱子说，“腿脚又不得劲儿，八路军不要我吧？”

“请都怕请不到哩，”芒种说，“要是先生参加，为了工作方便，我看是应该给一匹马骑的！”

“那你回到队上，就和我姐夫说，”春儿说，“叫先生去参加！”

“先不用！”医生笑着说，“我还得和家里商量商量，一大家子人，全凭我跑动着养活哩！”

“你去了，她们也饿不着，”春儿说，“我那妹子能织能纺，还愁吃穿吗？你不要犹豫了，抗日战争，人人有份，你更不能落后，我们就一言为定吧！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医生有些慌张，“我给芒种同志看病，这不也是抗日的工作？大姐，你不知道，各人家有各人家的困难，她们离开我不沾！”

“怎么就不沾呀？”春儿说，“你把我们妇女看的太落后了，你才来了几年？你不来，我那妹子，还不是长到了十七八，也没见得饿死吧？”

“不能那么讲，”医生说，“我还得和她商量。”

“和她商量什么，”春儿说，“她能限制你抗日吗？我和她说去！”

医生不再言语，提起药箱子来走了。芒种对春儿说：

“你怎么那样急呀？叫人家回去商量商量，安置安置不好吗？你这不是逼人家？”

“怎么算逼他哩？”春儿说，“抗日是光荣的，一听人家动员，应该提脚就走！这样为难哪？”

“那得是一个好党员。”芒种笑着说，“你应该到他家里去，看看人家到底有哪些困难，有哪些地方想不通，帮助他们解决。不能只是一句口号：抗日是光荣的！”

“接受你的意见，”春儿笑着说，“我去找他媳妇儿，这个人惧内，我那个妹子说一句话，管保比圣旨还灵！”

“对了，”芒种说，“你多做些妇女工作，叫她们

的眼界放大，心地开展起来，动员参军的工作，就好办多了！”

“你不要小看我们妇女！”春儿说，“你怎么看着我们就心地狭窄，眼界不开呢？男子大汉，自己没有主张，一定得媳妇在枕头边念咒，才去参军吗？”

“那是你自己说的呀，怎么又往我身上推？”芒种，说，“实际上是这样：妇女同志在推动参军工作上，起了很大的作用！”

“你自己呢？”春儿笑着，眼睛却看着别的地方。

“我是完全自愿。”芒种笑着说，“自然也不能忘记，你对我有很多的鼓励和帮助。我的意思是：你应该多做些妇女工作，从两方面着手。”

“哪两方面呢？”春儿问。

“一方面是组织她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学习，使得她们知道抗日战争的道理，我们为什么作战，斗争的结果是怎样。一方面组织她们参加生产。”

“我们这些妇女里，没有二流子，”春儿说，“天天早晨纺，夜里织，看孩子做饭，推碾子捣磨，喂猪喂狗，照顾丈夫公婆。你看，哪一个不是累的头不梳，脚不洗，跟斗趔趄，喘不过气儿来？”

“还要组织她们学习种地，”芒种说，“她的男人参军去了，就不再牵挂家里的吃食，地里的庄稼！”

“是你们爱牵挂。”春儿说，“只剩下妇女，我们

也不能叫田地荒了！”

“这要做很多工作，”芒种说，“不是你一个人在这屋里保证，就算成功了。要说没有二流子，那更是睁着眼儿说瞎话。俗儿是一个什么人？”

春儿出来看看阴了天，想先抱下些柴禾。她走到柴禾垛跟前，听见吱吱的声音，吓了一跳，以为是藏在柴禾里的老鼠，下了小耗子，要不就是家雀儿安了窝。她走近一看，在抽去柴禾的窝洞里，有一条绿色的带子拖下来，她一扯带子，掉下一个沉重的包裹来，哇的一声，里面是一个刚刚下生的小孩子。春儿慌的不知道怎样好了。

正好大娘来了，大娘拿着包裹一看，是一个八路军用的绿色挂包，小孩子饿的快断气儿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大娘惊慌的说，“快把他丢到河滩里去！”

“一个活活的孩子，怎么能丢了？”春儿把他抱到屋里，放在炕上，端来芒种吃剩下的挂面汤，喂了小孩子两口。

“我劝你不要行这个善心，”大娘站在一边说，“这不定是哪个黑心肠的给你安的脏哩！”

“他给我安的什么脏？”春儿说。

“你这孩子！”大娘说，“怎么不解理儿呀？一个十八到九的大姑娘，炕上放着一个血娃娃，算是怎么

说的呀？”

春儿一下红了脸，没有说话。

“你不去，我去把他扔了！”大娘抱起小孩儿来。

“我不。”春儿说，“我们不能造这个罪，他们给我安赃，安得上吗？”

芒种也不同意把小孩抛弃。他爬起来，端相着小孩子的脸，用手指把一根面条抹到小嘴里去，笑着说：

“你们来看，这小人儿长的像谁？”

“我看不出。”春儿说，“管他像谁哩？”

“我看很像老温，”芒种说，“你看这鼻子！”

“瞎说八道，”大娘说，“他一个穷光棍，上哪里弄孩子去？”

“那也说不定，”芒种说，“穷人就不该有个小孩儿吗？”

“别拉闲篇儿了！”大娘说，“你们不愿意扔，就抱到我家里去吧，我七老八十的，他们没的说！”

大娘把小孩子裹好，抱了出来。刚一出门，就看见俗儿从田大瞎子家的房角拐过来，一步一探头，像一个等鱼吃的鹭鸶，大娘赶紧往回一闪。

“闪什么呀大娘，”俗儿笑着走过来，“怕我冲了你们的好运气吗？”

“有什么好运气？”大娘用袖子一盖。

“那么大的玩意，盖得住吗？”俗儿走到跟前，伸手一扯说，“啊，这是谁家新添的大胖娃娃呀？”

“这是拾来的，你不要胡说。”大娘往前走着说。

“从春儿的炕上拾来的吗？”俗儿跟在后边说，“她家炕上躺着一个大八路，怎么又弄出了一个小八路儿来？哈，还用挂包兜着，这么小人儿，就穿八路军的军装吗？”

“你嘴上留些德行吧，”大娘说，“冤枉了好人可有报应！”

“叫别人听听吧，”俗儿说着拐到大街上去，“整天价在一块儿，我准知道就不能干净，大娘，谁拉的皮条纤呀？”

大娘是个热脸皮的人，又从来不能跟人吵架拌嘴，只好返回来。把遇见俗儿的事和春儿说了：

“真倒霉，碰上这么一个扇车嘴，管保嚷的一村子也知道了！”

“不怕她嚷，”春儿说，“我们要调查这件事。”说完就到街上去了。

四十九

俗儿像一个屎蜚螂，带着臭气一路嗡嗡着，她的谣言已经发生了影响。有几个妇女围在临街的碾棚门口说话儿，一见春儿过来，就散开进去了，故意拿大腔吆喝拉碾的牲口。春儿走过去，她们又从门口探出身子来。

春儿不理她们，走到医生家里来。医生出去看病了，医生的小媳妇儿，上下打量着春儿。

“我怎么了？”春儿笑着说，“你在我身上看出什么毛病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医生的小媳妇说，“有句话儿，我不能不告诉你。”

“有话说吧。”春儿坐在炕沿上。

“姐姐！”小媳妇站在对面，把手搭在春儿的膝盖上，亲热的说，“咱俩虽然不是紧邻当院，从小可像亲姐妹一样。”

“你有什么话，就直截了当说吧，”春儿说，“怎么学起田耀武的说话来？”

“我们小时一块儿到人家地里拾麦穗，”小媳妇说，“披着星星出去，戴着月亮回来，歇晌的时候，我们俩坐在一棵柳树下面，分着吃一块糠饼子。田大瞎子那老狗，拿着棍子追我们，骂的我们多难听：别叫大麦穗突破了你们的裤裆呀！你还记得吧？”

“记得。”春儿点点头。

“我们穷人家的孩子，要争昂赌气。”小媳妇说，“名帖儿要正，脚跟儿要稳，衣服是要自己穿破，不能叫人从背后指点破！”

“我觉得我这当姐姐的，并没有给你丢人！”春儿说。

“我的姐姐，在妇女群儿里，是一个英雄。”小媳妇说，“可是，刚才我听见人们喧嚷，你和芒种哥添了一个私生！”

“你白寻了一个医生男人！”春儿推起她来，说，“那孩子身上还带着脏东西，顶早也是夜里添的，前天我才打过仗，爬到崔家老坟的大杨树尖上。你看我的模样气色，像刚坐了月子的吗？”

“不像呀，”小媳妇说，“可人家都那么说哩。”

“人家怎么说，你就怎样信呀？”春儿说，“我们要把这件事弄清楚，把那些人喷出来的狗血，涂到他

们自己的脸上去！”

“这以后我就不信了。”小媳妇笑着说。

“我不是来和你对证这个，是为了一件要紧的事。”春儿说。

“是动员你妹夫参军吧？”小媳妇说，“刚才他回到家来，就和我说了。”

春儿说：

“国家现在正打仗，前方很缺少他这样的人材，他要是走了，你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“困难是有啊，我那姐姐！”小媳妇说，“头一条是钱，他有这点手艺，地方上的人信服他，推着辆车子绕世界跑，我们的吃穿就不发愁。可是呢，现在我们正打日本，谁也不能光替自己打算，虽说我有这么一条困难，实在并不成问题儿。”

春儿笑了。小媳妇又说：

“我家有三亩半地，麦秋两季，他也算得上半个长工。有个阴天下雨，街上一擦一滑的，他替我担桶水。房子漏了，他上去抹点泥。他走了，我去求谁？”

“他走了，”春儿说，“村里要照顾抗属，耕耩收割，有人帮助。你的水瓮里总得常常满着，房顶儿上也不能看见一棵草。”

“我也可以下地。”小媳妇说，“我上房，腿也不会打颤儿。有困难我要不说，不是在姐姐面前作假

吗？还有第三件。”

“第三件你也就忍耐着些吧，”春儿笑着说，“等打走了日本鬼子，夫妻们再相会在寒窑前吧。”

“那就叫他去吧。”小媳妇说。

从医生家出来，春儿准备好词儿到识字班去。这一天，妇女们到的很少，来了几个，也不愿意进讲堂，在门口推打吵闹。从来没到过的田大瞎子的老婆，和轻易不来的俗儿，却肩并肩的占据了前边的座儿。

春儿走到讲台上，说：

“今天，我来讲一段儿。是和咱们妇女顶有关系的、结婚生小孩子的事儿。”

站在门口的人们一听，都挤进来了，有的笑得捂着嘴，有的用两只手把眼睛也盖起来。

春儿说：

“我们常说，托生女人，是上一辈子的罪孽，这自然是迷信话。女人的一辈子，也真是痛苦的不能说。儿女是娘肚子里的一块肉，掏屎擦尿，躲干就湿，恨不得孩子长大成人。当娘的没有不痛孩子的。”

屋子里的人满了，还有很多人挤在窗台外面，推开窗户，伸进脑袋来。

春儿说：

“今天我在柴禾垛里拾了一个小孩。我心痛那孩子，也心痛那当娘的。为什么要扔孩子呢？也许是家

里生活困难，儿女又多，养活不起。也许是因为婚姻不自主，和别人好了，偷偷生了孩子。生活困难，现在政府可以帮助；婚姻不自由，妇救会可以解决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为什么还按老理儿，忍心扔掉自己的孩子？那当娘的，在家里不知道怎么难过，伤心啼哭呢！”

在讲堂的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女人哭起来，她先是用手掩着嘴，后来一仰脖子，大声号叫起来。春儿跑过去，看见是一个寡妇，她的脸焦黄，头上包着一块蓝布，春儿说：

“嫂子，你不是早就闹病吗？家去吧！”

“我那亲妹子！”寡妇拉住春儿的手说，“那是我的孩子啊！”

五十

这个寡妇住在东头，平常身子很结实，走路的时候，胸脯儿狠狠往前挺着。她还不过三十岁，家里有两间瓦房，一个小场院。去年秋天，她从水里捞回几个高粱头，放在场里晒干轧了，堆起来。她坐在粮食堆边上，休息一下，准备扬场。那天闷热，抓一把粮食，扬出去试试，糠皮粮食一同落下来，望望场边的树，树叶儿一点儿动的意思也没有，她叹了口气，天越阴越沉，就要下雨了。

这时长工老温背着张大锄，从地里回来，他在这村里呆了好几年，大人孩子全认识，也常和妇女们说笑，路过寡妇的场院，转脸说：

“还不快拾掇，雨就过来了。”

“哪里有风啊！”寡妇说，“你有工夫没有，帮我甩出去。”

“有工夫没工夫，这只是三簸箕两簸箕的活儿。”

老温说着把锄靠在场边树上，走过来抓起簸箕，收了点粮食颠了颠，站好了位置。寡妇拿着木锨，站在他的旁边。

老温用力把粮食甩出去，很快就扬完了场。抓起扫帚来，漫去粮食上的草末儿，用推板堆在一块儿，寡妇笑着拿了布袋来。

刚刚装起粮食，大雨就过来了，寡妇赶紧收拾着家具，老温替她把粮食背进小屋。

“全亏你，”寡妇跑进来说，“再晚一点儿，我这个大秋就完了。快擦擦你身上的汗，坐下歇一会儿吧！”

她拉开一领麦秸苫子，铺在地上。雨下得大极了，天昏地暗，房里院里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一个妇道家过日子，就是难。”老温大声说。

“那难听，就不能提了，”寡妇说，“还算我有人缘儿，你呀，老常哥呀，全肯帮助我。”

“这些活，放在男人身上就不算什么，”老温说，“放在你们身上就难大发了。”

“难的净哭。”寡妇说，“你们也有遭难的事儿呀，缝缝补补的活儿，就拿给我吧！”

老温几次想走，都叫寡妇拦住了，她说：

“热身子，叫雨激了，可不行！”

从这一天起，老温和这寡妇发生了爱情。寡妇的

肚子大起来，她用布把它缠紧，后来就不愿意出门了。前几天俗儿来她家，冷不防叫她看出来了，俗儿说：

“你知道，八路军最恨这个男女关系，知道了，小人要摔死，大人要枪崩。”

寡妇老实，叫她给想个办法，俗儿说：

“添下来，你就交给我。”

妇女们叫俗儿和田大瞎子的老婆坦白，田大瞎子的老婆摆肉头阵，站在台上，两手交叉捂着肚子，低着头高低不说话，群众的质问，她当做耳旁风。俗儿顶不住，说了。她说：

“那天高疤同着一个姓白的汉奸来了，在田大瞎子家开会，叫我们破坏村里的抗日工作，谁抗日积极就破坏谁的名誉，我和她就想了这个招儿，今后改过，再也不犯了。”

从这件事情，春儿想起来，应该为村里的妇女和儿童们做些工作。她请变吉哥按照乡村的实情，画两套画儿。

听说又请他画画儿，变吉哥很是高兴，他说：

“当然，现在是武装抗日第一，可是社会上的落后势力我们也要负责扫除。关于婚姻自主，我可以编排着画，可是关于生小孩子，我就有点外行。”

“这有什么困难，”春儿说，“你可以问问你家我

嫂子呀！”

“她知道的那一套，都是我们要改革的对象，”变吉哥说，“关于新的接生法，我得去请教那位医生。”

当天晚上，他支架起做饭的案板，点上油灯，从老婆的梳头匣子里，找出几包颜色就工作起来。

他的创作的环境，并不安静，女人有病，孩子闹的慌。可是他能专心的工作，他对躺在炕上奶着孩子的老婆说：

“你们添孩子，是坐着还是立着？”

“你问那个干什么，”他的老婆笑着说，“这些脏事情，也能上画儿呀？”

“叫你说，什么才能上画儿？”变吉哥问她。

“你还不知道吗？”他的老婆说，“你师傅怎么教你来着？你这些年不都是画的那些神仙、云彩、花鸟和大美人儿吗？”

“那都是为了侍候人，为了吃饭。”变吉哥说，“宣传迷信，粉饰太平，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
“那你就画吧，”他的老婆说，“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不是坐着立着，折腾了半宿吗？”

“那些偷偷和人好了的，怎么处置那肚里的孩子？”变吉哥又问。

“有的用棒槌砸下来，有的用大弯针扎下来，有的请人揉下来，吃药打下来。”他的老婆念道着，“你

这是画的什么呀，我困了，你别再问我了！”

“你先不要睡，”变吉哥说，“你听我说：我打十三岁上，替师傅背行李，学画匠，到现在快三十年了。整天价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在那荒山野寺，面对着粉墙，一笔一画的工作。我专心的学习，千里投师；精细的描画，一笔不苟，饿了打开梢马吃一口剩饭，渴了，提起白铁壶喝一口凉水。身边围着一群光屁股的孩子，指指点点，乱加批评，说好听点儿，我也算个手艺人，说难听一点，简直连要饭的化子也不如！我常想：三百六十行，我为什么选中了这一行？我的工作，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哩？看见村里的土财主横行霸道，气愤不过，也只能画张黑帖儿，偷偷贴到他家的门口。现在，我才觉得我的工作，是很有价值，很有意义的了。我的画儿可以贴到大街上去，也可以贴到会场上去，它能推动村里的工作，扫除落后和黑暗，助长进步和光明。这两套画儿画好了，贴出去，能改变村里的风俗习惯，能使年轻的姑娘们找到合心如意的丈夫，能叫孩子们长的美丽和胖壮。一想起这个来，你看，我的画儿就越画越精彩了！”

他的女人笑着爬起来，站在他后面，看着他画，一直到夜深。

画儿贴在识字班的讲堂的两面土墙上，妇女们看过婚姻自主的画儿，埋怨着包办婚姻大事的顽固

爹娘，咒骂着胡说八道的媒人，绕到南边去看怎样生养小孩的画儿。一看见一个产妇躺在那里，嗡的一声就返回来，像逃难遇见了情况一样。后来还是你推我，我推你，三四个人拉起手儿来，像过什么危险的关口，红着脸看完了这套画儿，可真长了不少的知识。她们明白，只有积极参加抗日的工作，参加村里的民主建设，参加劳动和生产，学习文化，求得知识，才是妇女们争取解放的道路。

五十一

乡村医生每天来治疗，芒种的伤口渐渐好了。他已经能够在春儿家的小院里走动几步，因为技术和器械的限制，有一小块弹片没有能够取出来，好在他的身体过于强壮，正在发育，青春的血液周流得迅速，新生的肌肉，把它包裹在里面了，他也并不在意。

这天从早晨，就刮起了黄风，初夏的风沙阵阵的摔打着窗纸。天黑以后，风才渐渐停了，天空又出满了星星。和他们做伴的大娘，吃罢晚饭就来了，和春儿坐在炕头起，围着油灯给军队做鞋。芒种靠在被罗儿上，显得有些烦躁，他说：

“春儿，你把那马枪递给我。”

“又干什么？”春儿抬起头来问。

“你和大娘坐开一点，让给我点灯明儿，”芒种坐直了笑着说，“我把它擦整擦整。”

“这就是你的亲人。”春儿爬起身子，从墙上给他

摘下枪来，递过去说，“你可忘不了它。小心点儿呀，别走了火，打着我们！”

大娘赶紧靠窗台一闪，说：

“黑更半夜，你可摆弄这个干什么？我就怕人们搬枪动斧的！真是，你可留点心，别打着我了。你别看我老了，我还想活到把日本打出去呢！”

“又想把日本打出去，又不叫人拿武器。”芒种笑着说，“你这个大娘呀！”

春儿又从破迎门橱里，找出一个小小的生发油瓶子，摇了摇递给芒种说：“使我们妇女自卫队点擦枪油吧，我说你可省着使，不同你们大部队上，我们就剩瓶底儿上这一点点了。”

芒种在炕尾巴上擦枪，大娘在炕头上一直不安心，不断的回过头去看。春儿说：

“你快收拾起来吧。叫大娘把针扎到手指头里去，不能给你们纳鞋底儿，你就不闹了！”

村北头田大瞎子家的狗，忽然叫起来。它先是汪汪了两声，接着就紧叫起来，全村的狗也跟着，叫的很凶。

“听一听！”芒种侧着耳朵说。

春儿和大娘全停下手里的活计。街上乱哄哄的，像是队伍进了村。接着有喊叫骂人的，有走火响枪的，有通通砸门子的。芒种眉开眼笑的说：

“好啊，我们的队伍回来了！”说着爬下炕来，就摸着找他的鞋。

“你先停一下！”春儿小声说，“别是日本进了村吧！”

“那明明是中国人讲话，怎么会是日本？”芒种说。

“那也许是汉奸。”春儿说，“你听听骂的多难听，你听听，八路军有这样叫老百姓的儿子的？像砸明火一样！小心没过祸，我去看看吧！”

“你，你也要多加小心呀，”大娘说，“我那老天爷！”

春儿穿上鞋，下炕来，轻轻打开房门。她走到院里，扳着篱笆往外一看，田大瞎子家的外院里，已经是明灯火仗，人和马匹，乱搅搅的成了一团。

她看不见老常和老温。她看见田耀武和三四个人，站在二门的台阶上，喊叫：

“快！派人包围了村子！”

春儿的心一收缩，“我们那些岗哨哩！”

她赶紧回到屋里。她把情况和芒种说了，芒种判定这是张荫梧的队伍，自己不能留在村里：要冲出去。

春儿说：

“你的腿还没好俐落，走得动？也许不要紧吧，我

们和他们不是统一战线了吗？”

芒种背上枪，着急的说：

“我们信得住自己，可不能相信这些人。他们狼心狗肺，两面三刀，这回一定是编算我们来了，快走！”

“那我也就跟你走！”春儿说。

“要是他们来了，你们就全出去躲躲吧！”大娘说，“我给你们看门，我不怕他们，你们不要看我平常胆小，遇上了，刀撂在脖儿颈上，我也不含糊！”

开开篱笆门，芒种提着枪走在前面，春儿提着枪跟在后面，叫堤坡掩护着，往西南上走。穿过一段榆树行子，跑进那片大苇坑，已经离开村庄了。

在村西打毳场一圈毳罗儿里，他们遇见了老常。老常正影着身子向村里张望，一见是他们就说：

“我就结记着芒种，这就好了！”

“我们那些岗哨哩？”春儿急的跺脚说。

“没有经验，叫他杂种们给蒙混了！”老常说，“他们进了村，还冒充八路军哩！”

“这些人呀！看不见他们穿的灰色衣服？”春儿说。

“前面来的，都是穿的绿衣服，胳膊上还戴着八路的符号儿哩！”老常说，“搭腔说话的，你们猜是谁？”

“我和他们又不认识，我猜那个弄屁！”春儿说。

“是高疤！”老常说，“我看这小子是叛变了。我们不能在这里耽误着，要赶紧到五龙堂，给区上去报信！”

三个人奔着五龙堂来，芒种说：

“老常哥，你怎么跑出来的？你听到什么情况吗？”

老常说：

“别提了。他们砸门子，我正和老温蹲在牲口屋里学习认字哩。一开门，田耀武和高疤拥进来，老温冲我使了一个眼色，我就想走。后来一想，要看看他们干什么，说什么，就借机会到里院去了两趟，听到田耀武讲：要拿县城。田大瞎子看见我，冷笑了两声，说：老常主任！这里没有你的事儿，先到外边休息一会吧，回头我们就要正式谈谈了！我一听事不好，才闪出来。”

“老温哥哩？”芒种说，“他也该出来呀。”

“我出来的时候就很难了，”老常说，“他叫我先走，他说：他有一条命支应着他们。我们要快走，去报告区上。”

到了五龙堂，在高四海的小屋里，区委书记听了老常的报告说：

“情况十分紧急，敌人正在进行一个政治阴谋。

我们城里武装力量很小，准备也不足。我们第一步，要去通知李县长做准备。第二步组织附近各村的民兵武装，打击敌人。”

老常、芒种、春儿担任了进城送信的任务，马上就出发了。区委，高四海，去召集民兵。

春儿飞身跑下堤坡，着急的对芒种说：

“我们得快一点，得比敌人先到一步，要不就坏事了。可是，你的腿痛不痛？”

“不要紧，”芒种跟上来说，“你路上说话，声音要小一些。”

芒种忍着痛，赶到春儿前边去，在这个情况下面，一个男孩子不愿意落在一个女孩子的后面。老常也迈着大步跟上来。

他们没有走那条通往县城的大道，他们从紧紧傍着这条大道的一条小路走，可以近便一些。就要成熟的、沉重的、带着夜晚的露水的麦穗子，打着他们的腿，芒种在前面，差不多是用一条腿跳着跑。

他们要走到前边，要保卫已经解放了的土地。过了黄村，他们听到了第一声叫明的鸡声，在树林里过宿的小鸟，也在不安的飞动。村庄、树林、道路和麦地都不是在旁观，它们在关切着，它们在警戒着。小路在黑夜里，渐渐变得非常清楚，走起来非常平坦了，家乡要继续战斗，平原鼓励她的亲生的儿女，在

黎明之前抗拒那些进犯的、叛变了祖国的敌人。

他们听见田耀武的队伍，已经从子午镇出发了。大道上有乱嘈嘈的马蹄响。

如果，是田耀武先到了，这一带的村庄和人民又要从白天退回黑夜去，命运就十分悲惨了。如果，是芒种和春儿先到了，我们的家乡，就按照这两个孩子的宝贵的理想，铺平它的幸福的道路吧！

芒种和春儿望见了县城，那拆平岭城垣，反射着星斗的光辉。

他们三个人的心里，同时一冷。难道拆去这座城墙，他们辛辛苦苦的工作，是做错了吗？无坚可守，今天夜晚，他们怎样来阻击敌人的进攻呢？

五十二

芒种他们先到了。芒种刚刚和守城的几个民兵说明情况，叫春儿和老常快去报告县里，田耀武的几匹马队已经到了眼前。

“站住！口令！”民兵们伏在原来是城门的土岗后面，喊叫起来。

“耳朵叫黄蜡灌了，连自己人的声音也听不出来？我是高团长！”答话的还是高疤。他的马已经上到土坡上来了。

“你回来干什么？”一个民兵问。

“敌情吃紧，”高疤说，“回来防守县城。”

“你后边是什么人？”民兵们问。

“高支队长！”高疤说。

“你是一个叛徒！”芒种喊叫着射击了一枪，高疤的马直直的打了一个立桩，就倒下了。

高疤并没有受伤，吃了一嘴土，跑回田耀武的队

伍里去。芒种指挥着几个民兵射击，民兵们的破枪旧子弹不好使唤，枪法又不准，看到敌人的大队，心里又有些害怕，实在抵挡不住，敌人分几路攻进了县城。芒种拼命奔着县政府跑去。

白天，李佩钟用电话和司令部联系了，知道情况紧张。但是她知道的只是日本人有可能从东面向县城进攻，并没想到高疤的叛变，和张荫梧匪军的偷袭。县委们分头下乡去做战时的动员，留下她做城关坚壁清野的工作。她看着大车队把公粮拉到城外，又派人把一些重要的犯人押送到乡下去。政府的大多数干部，也都分配下去了。夜晚，她把重要的文件，装到一个白色绣字的挂包里，放在身旁，准备天明以后，到区上去看看。她躺在只剩下木板的床上，要休息一下，就听见了西关附近的枪声。春儿和老常跑了进来，她仓皇的带好文件，挂上手枪跟着他们出来，刚刚走到大堂门口，就遇见了田耀武和高疤。田耀武用手电筒一照，就抱起一枝冲锋式枪，向她扫射，她把文件投给春儿，倒在了跑马场上。春儿慌手慌脚的投了一颗手榴弹，田耀武和高疤跳开，钻小胡同跑了。

“背着她走！”春儿喊叫着老常，在地上摸着李佩钟的文件包。

老常背起李佩钟，春儿在前边，碰见了芒种，他

们和城里的一部分工作人员，一群老百姓，冲出县城来。田耀武的队伍在城里抢夺着商店居民的财物，放起火来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春儿哭了。她一直跟在老常的后面问：

“她要紧不要紧？”

“不要紧吧。”老常觉得李佩钟的伤很重，血不断流到他的手上来。他细心听着，李佩钟的气息虽然微弱，可是她还是活着的。

老常心里非常难过。他亲眼看见是田耀武端着枪打的她。老常想：“这个畜生，平日那样窝囊，对待自己的女人，竟这般毒辣。从今以后，在天地之间，我是不能和田大瞎子这一家人在一起活着的了！”

他们把李佩钟放在黄村南边一个小村庄上，找了医生来。春儿叹气说：

“我们没有完成任务，还吃了大亏。去的时候，一个拐腿，回来又多了一个伤号。一个是叫日本鬼子打的，一个是叫张荫梧害的！”

他们等候着主力回来，收复县城。

主力并没有过来。这天下午，日本军队没放一枪，就进了县城。田耀武的队伍恭恭敬敬的交代了“防务”，就退回到子午镇来，实际上成为敌人的右翼。

他们在镇上，积极的恢复汉奸统治。他们搜查了

各个抗日民主团体，逮捕了很多人。砸碎一切抗日的牌示，烧毁文件和报纸，封闭民校。田耀武打发两个护兵，跟在田大瞎子的后面，站在大街十字路口，给村众讲话，要选举村长。村众虽然很多，没有一个人讲话。田大瞎子忽然变得很谦虚了，他说：

“你们不要以为我又想上台，我是绝对不干这个的了。八路军在这里的时候，谁给了我气受，他自己知道，可是我绝不记恨。咱们走着瞧吧！可是，你们不要再选我当村长，不要选我。实在没法，你们可以选老蒋，因为这次打出共产党去，光复我们的村庄，是他女婿高疤的功劳！”

田耀武在家里，把长工老温倒吊在牲口屋里的大梁上，下面是牛屎马尿。田耀武拉过长工们的棉被垫着屁股，坐在土炕沿上，手提着一根粗马鞭子，拷问老温的口供。

“你是一个共产党！”田耀武咬着牙说。

“我不是。”老温说。

“老常是不是？”田耀武翻着一只白眼问。

“他是不是我不知道。”老温说。

“你说：你赞成国民党不？”田耀武奸笑着。

“我没见过国民党是什么样儿，”老温说，“你说他们一个人我看看。”

“我就是。”田耀武颠着脑袋说。

“啊！你就是。”老温咬着牙不言语了。

“你怎么不说赞成！”田耀武喊，“你是赞成共产党？”

“共产党我从前也没有看见过。”老温说，“这半年我才见到了。看见了他们的人，也看见了他们的主张行事。日本侵略中国，老百姓心慌没主，共产党过来了，领导着老百姓抗日，就是像我这样的人，心里也有了主张。八路军里面，干部们多是贫苦出身，当兵的也是村中的子弟。办公的讲究说服动员，做官绝不见钱眼开。从他们来了，村里的穷人也有了希望，老弱孤寡有人照顾，妇女们上学识字，明白了好多道理。道路上没有饿倒儿，夜晚没有小偷儿，睡觉全用不着插门。没有放债逼命的，没有图谋诈取的，没有拐儿骗女的。我不知道共产党将来要做什么，就他们眼前的行事儿，我看全都是合乎天理人心的！”

“你还说你不是共产党，这就是你的口供！”田耀武狠狠的说。

“我能问你一件事吗？官长！”老温喘着气说，“现在不是团结起来打日本吗？你们为什么却来抄抗日军队的后路，给日本当开路先锋？”

“混蛋！”田耀武说，“不许你问。我要吊着你，一直到你改口为止。”

“恐怕我这一辈子是不能改口的了。”老温闭上

眼睛说。

田大瞎子回到家里，很不以儿子的措施为然。他夺过田耀武的马鞭子说：

“东伙一场，不能这样。老温自然对不起我们，我们可不能和他一般见识。你在军队上打人打惯了，当家过日子，可不能全用军队上的规矩。麦子眼看就熟了，老温还得领着人给我收割回来。他这个人，有点认死理是真的，别的倒没有什么，他不过是受了老常的坏调教！快把他放下来！”

张荫梧也到这镇上来了一次，田大瞎子像孝子见了灵牌一样，就差没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这回站住站不住。但是，张荫梧脸上并不高兴。虽说今天占了八路军一点点便宜，他心里明白：深武饶安这个地区，已经不是一年以前他所统治的那个样子了，它已经从根本上起了变化，张荫梧说是人心变坏了。

他要犒劳他的军队，叫老百姓杀猪送鸡。老蒋的差事又来了，很忙了一阵，到一个人家，他就说：

“我为什么来掏你的鸡窝？你要知道，我是新当选的村长呀！”

“嘻呀，你要不卖字号，我可真不知道。”那些人家说，“你顶好是登登报，把你的官衔和你的大号联在一块儿，要不就在脖儿里挂上一个牌子。我刚吃了一肚子稀饭，你别叫我恶心吐了！”

“咱们平日不错，我警告你！”老蒋沉着脸说，“现在可是改了势派，张总指挥就在咱们村里，这不是八路的时候，容许老百姓胡说八道的，你可要自己小心一点！”

“咬不了谁的！”人家冷冷的把他送出来。

张荫梧的队伍，一天一夜的工夫，就改变了子午镇的容貌。

这天晚上，有人捡着地下的破衣烂裳痛骂了，有人守着空洞的猪窝啼哭了。街道上，很早就像戒了严一样，家家紧闭大门。小孩子们也惊吓的在母亲怀里哭了，母亲赶紧把奶塞给他，轻声说，“野猫子来了。”

人们偷偷埋藏着东西，谁都明白：这个中央军就是日本鬼子的前探。他们要在子午镇做一次日本进村的演习，我们也赶快做一次坚壁清野吧！

人们感觉：这简直又回到了去年七月间。那时日本离的还远，眼下，强盗就在身旁了！

这一晚，这么大的一个子午镇，只有田大瞎子家和老蒋家热闹。

五十三

给春儿看门的大娘，从春儿他们走了，就用一个大木杈子，把篱笆门顶了个紧，还在外边落了锁。白天，她也不撒鸡窝，抓一把粮食，扔进鸡笼。鸡们不知道村庄发生了严重的变化，那只大花公鸡，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在笼子里照例的长叫了一声。

大娘从屋里跑出来，小声斥责它说：

“嘘！安静点。外边驻了张荫梧的队伍，他们要进来抓你去拔毛下锅！”

鸡不明白她的意思，不久，它又哽哽着叫了一声。大娘狠狠的踢了鸡笼一脚。

紧跟着，就有生人叫门。还没等大娘跑过去，两个张荫梧的兵，就蹬着篱笆，跳到院子里来了！一个年长，一个年幼；年长的东北口音，年幼的河南口音。

“老婆子，为什么大白日，倒锁上大门？”年长的说。

“听说你们来了。”大娘说。

“我们又不是日本鬼子，你怕啥？”年长的说，“八路军在这里，你们把好吃的拿给他们，把热炕头让给他们。我们来了，还没见面，你就关门子。都是中国的军队，你为什么两般看待，你有鸡吗？掏出来，慰劳我们！”

“我有一只老公鸡。”大娘说，“你们拿去也可以，谁叫它不看头势，瞎叫唤？这可不能说是慰劳。”

“我们不辛苦？”年长的说，“我们从东三省跑回大后方，又从大后方跑回你们这里，你敢说我们不辛苦？”

“这么远跑来跑去的，那是干什么呀？”大娘说。

“为了抗日，为了收复失地。”两个兵一齐说。

“你们和日本打过仗吗？”大娘问。

“还没有。”年幼的笑笑说。

“你们收复了多少失地？”大娘又问。

“昨天收复了你们的县城，”年幼的说，“又叫日本占了。这不怨我们，这是总指挥的命令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两个兵放下大娘不管，自己对答起来。

“他奶奶个雄！怎么回子事？咱们从大后方出发的时候，不是说来抗日？怎么到手的東西，还让给日本？”年幼的问年长的。

“我明白。”年长的说，“我们的上级，从‘九一八’起，就一直这样欺骗我们。抗日，抗日，实际上，我也算是十来年的老兵了，我做梦也没有梦见过他们抗日。他们是要打共产党。”

“为什么要打共产党？”年幼的问，“共产党和我们有什么仇？”

“就因为共产党抗日。”年长的说，“你看见了，我们从共产党手里夺了一座县城，就双手交给日本。”

“那我们不成了汉奸队伍吗？”年幼的说。

“谁说不是！”年长的说，“妈拉巴子，这就不要怨老百姓小看我们了！”

大娘在一边听得很入神。她想：有些话，是可以和这两个兵说说了。

“老百姓顶恨的是汉奸，”她笑着说，“顶欢迎的是抗日。人们为什么那样喜欢八路军，就因为他们真心抗日。不瞒你们说，我这小院里，就不断住过八路军，我就是顶喜欢他们。他们不只对待我好，大娘长，大娘短，替我挑水扫院，帮我捡柴推碾；他们还有一条你们没见过的好处，就是官对兵好。我见过那些团长连长，他们看待那些战士，就像亲兄弟。不用说吃穿一样，开会学习在一起，要是哪个弟兄有了个灾枝病叶，那些官长呀，跑前跑后，照看得真比家里人还周到。有些好吃的送来，有些好铺好盖的抱来，知冷

知热，安抚劝说。家属们来了，全班的弟兄都欢迎，要是爹娘，就是全班的大伯大娘，要是兄妹，就是全班的哥哥妹妹。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人情道理的队伍，只凭这一点，我就断定八路军一定能成事，一定能抗日，一定能把老百姓救出来。可是，你们那里怎样，也是像他们这个样儿吗？”

“我们哪！”那个年幼的兵说，“当官的是阎王，当兵的是孙子，你有病，他只恨你不死，好多吃个空名儿！要想对你好，除非你是他的小舅子！”

“我常想：”大娘说，“不当兵便罢，要当兵就当八路军，名誉又好，工作又顺心，老百姓又欢迎，你说哪一条不好呀？”

“你看这位老大娘，”年长的兵说，“比我们那卖膏药的政工队长说的还有道理。大娘呀！你不要见外，我认识你们村里一个人。”

“你认识我们村里的田耀武。”大娘说，“要不就是高疤。你认识他们，我不嫌你恼，我们还是成不了一家人。”

“不是他们。”年长的兵说，“是一个小姑娘。”

大娘没有说话。

“是一个小姑娘。”年长的兵又说，“可惜我没记住她的名字。去年七月，我们的队伍溃散南逃，我掉了队，害怕路上叫人卡了，在高粱地里藏着，好几天

没有吃饭。是那位小姑娘看见了我，给我换了便衣，拿了干粮，我才得走路。临走，我把我那枝枪送给了她。”

“这样我就知道了，”大娘说，“她是我的小侄女，名叫春儿！你那枝枪也早去抗日了。”

“我一直感念她的救命恩情。”年长的兵快活的说，“快请她来见见。”

“她逃出去了。”大娘说。

“为什么逃出去？”年长的兵问。

“因为她抗日，你们进村捕杀抗日的老百姓，她就走了！”大娘说。

“这是从哪里说起？”年长的兵说，“我真对不起她呀。我临走时候说：我要回东北参加抗日联军，走在半路，就又叫国民党抓住，他们欺骗我，说是就要北上抗日。我原想到这里来可以见到救命的恩人，谁想倒成了仇家？大娘，我们这些当兵的，和抗日的八路军，并没有一丝一点仇恨。等她回来，你一定替我问候她！走吧。”

“那好办。”大娘给他们开了篱笆门说，“你们还要鸡不要？”

“不要扯我们的臊皮了！”两个兵笑着说。

田耀武继续在村中进行宣传。他叫老蒋召集民众在小学堂开会，半天只到了十几个老头，其中有几

个早就聋了。田耀武站在讲台上说：

“我们是来消灭共产党的，因为他们不好。他们怎样不好呢？你们是都见到了。从他们来了，把我们的村庄，闹了个天翻地复。儿子不尊敬老子，媳妇不服从婆婆，穷的不怕富的，做活的不怕当家的。工人也开会，也讲话，也上学识字，也管理村中的事情，这是从来没有的，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。抗日，抗日！抗日是我们政府的事，我们军队的事，你们老百姓瞎嚷嚷什么？国家事用不着你们操心，没看过《空城计》？从今以后，不许老百姓抗日！不许穷人背枪！从今以后，不许工人开会，不许妇女上学，不许唱歌扭秧歌。富的还是富的，穷的还是穷的，男的还是男的，女的还是女的。不能变更，不能不服从。从今天起，取消合理负担，改成按地亩摊派。听到了吗？你们！我是代表蒋委员长讲话。”

他讲完话就走了。老头儿们也就散了，他们的心理很沉重，也很恐怖。因为他们的儿子并没反对过他们，媳妇也还孝顺。家里没有长工，儿子是在别人家当长工。取消合理负担，难道说已经掀去的压在头上的大石头，就又要搬来顶上吗？

五十四

正赶得这样不如意，地里的麦子熟了。去年河南河北全泛水，黑土地白土地里的小麦都很好，沉甸甸的穗子乍乍着长，“谷三千，麦六十”，今年随手摘下一穗，在手掌里捻开，就有八十个鼓鼓的大麦粒。麦子身手高大，刀劈斧砍一样整齐，站在地这头一推，那头就动，好像湖面上起了风。

古老传言：“争秋夺麦。”麦收的工作，就在平常年月也是短促紧张。今年所害怕的，不只是一场狂风，麦子就会躺在地里，几天阴雨，麦粒就会发霉；也不只担心，地里拾掇不清，耽误了晚田的下种。是因为：城里有日本，子午镇有张荫梧，他们都是黄昏时候出来的狼，企图抢劫人民辛苦耕种的丰富收成。

老百姓说：今年的麦子，用不着雇看青的巡夜了，有八只眼睛盯着它：一边是日本和张荫梧，一边是本主和八路军。这几天，城里的敌人，不断用汽车

从安国运来空麻袋，在城附近抓牲口碾轧大场。子午镇的村长老蒋，也正在找旧日的花户地亩册子，准备取消合理负担，改成按亩摊派。

敌人是为麦子来的。

抗日县政府指示各区：要组织民兵群众，武装保卫麦收。

指示规定邻近村庄联合收割。芒种和春儿都参加了民兵组织，每天到河口放哨。高四海担任了子午镇和五龙堂的护麦大队长，他的小屋又成了指挥部。

白天收割河南岸的麦子。高四海到各家动员了，秋分又分别动员了那些妇女们。农民们鸡叫的时候就起来，拿着镰刀在堤坡上集合。他们穿着破衣烂裳，戴一顶破草帽，这些草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紧张的麦秋，抵御过多少次风雨的袭击。高四海从小屋里出来，肩上背一枝大枪，腰里别一把镰刀。用过多年的窄窄的镰刀，磨的飞快，它弯弯的闪着光，交映着那天边下垂的新月。高四海站在队前，只说了几句话，就领着人们下地去了。

这队伍已经按班安排分好，一到指定的地块就动起手来。割的干净，捆的结实，每个人都用出了全身的力量。这不是平日的内部竞赛，这是和对面的两个敌人争夺。胶泥地是割，河滩附近的白土地，就用手拔。抡着拔起的麦子，在光脚板上拍打着，农民们

在尘土里滚滚前进。

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。大车队在村东村西两条大道上，摇着鞭子飞跑。三股禾叉，在太阳光里闪耀着，把麦子装上大车，运到村里。秋分领导着妇女队，担着瓦罐茅篮，从街口走出，送了中午的饭菜来，也有人担来大桶的新井水。小孩子们也组织起来了，跟在后面，拾起农民们折断和遗漏的麦穗儿。

在五龙堂村里碾了几片打麦场。在场边，放几条大板凳，结实的小伙儿们，光着膀子站在上面，扶着铡刀。大车把麦子卸下来，妇女们抱着麦个儿，送到铡刀口里去。

中午，她们在大场中心撒晒着麦穗。几次翻过摊平，到起晌的时候，牵来牲口，套上大碌碡。鞭子挥动，牲口飞跑，碌碡跳跃。她们拿起杈子，挑走麦秸，拉起推板，堆好麦粒。用簸箕扬，用扇车扇，用口袋装起。

晚上，民兵和收割队到河北去。三天三夜，他们把麦子全收割回来，地净场光，装到各家的囤里去了。田野像新剃了头似的，留下遍地麦楂，春苗显露了出来，摇摆着它们那嫩绿的叶子。

我们的军队，正在平原的边界袭击敌人。这是新成立起来的队伍，最初几天，曾经想法避开了敌人的

主力。不分昼夜的急行军，跳出了敌人布置的包围圈。对于刚刚参加部队的农民来说，行军就是一种作战准备，在行军中，组织严密了，纪律的感觉加强了，每个战士都要学习判断情况，决定动作，掌握敌人运动的规律，并且看穿它的弱点。

在保定和高阳的公路上，连续袭击了几次敌人。敌人从深泽、安国撤走薄弱的兵力，我们赶在前边，破坏了公路，在唐河附近作战，又消灭了两股敌人。最后，高阳的敌人也撤回保定去了。

当日本鬼子从深泽撤退，民兵武装，就开始攻击张荫梧盘踞在子午镇附近的队伍，高疤随着田耀武窜到了冀南地区。

一场患难过去，李佩钟的伤还没好。芒种回到部队上，还住在城里，春儿和老常回了子午镇。

晒麦子的天气，白天焦热，一到夜晚，天空是晴朗的，星星是繁密的，风吹过来是凉爽的。五龙堂村边平整光亮的打麦场，是农民们夏季夜晚的休息场所，一吃过夜饭，人们就提着小木凳，或是用新麦秸编制的小蒲墩来了。在场院中间，是一个夜晚也在闪着银光的、发散着香味的高大的麦秸垛。

农民们坐在风凉的地方，恢复白天的疲劳，庆贺护麦的胜利。妇女们刷洗了锅碗，挂上大门，也跟在后面来了。她们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扯着宽大的麦秸

垫子，铺开了坐在男人的后边。孩子躺在怀里，她们拍打着，哼哈着，什么时候孩子睡实着了，就把他放到草垫上去。

这是闾村欢乐的时候，邻居畅谈的时候，然而她们只是静静的听着。夏季的晚风吹拂着的妇女们，脚踏着收获过的土地，头顶着明媚的星斗，从这里听到了多少古往今来的战争，知道了多少攻防斗智的故事？为那些悲欢离合的情景，多灾多难的人物，先苦后甜的结局，她们流过多少次眼泪和轻声的欢笑过啊！

虽然都说：“听书长智，看戏乱心”，乡村的文化生活，很早就有了明显的阶级界限。田大瞎子，在酒足饭饱以后，好在他家的场院上，讲说“三国”。他说这真是一部才子书，他的全部学问，就是从这一部“圣叹外书”得来。可是去听他讲演的，只是村中那些新旧富户，在外面发财的商人，年老退休了的教员。农民们进不去，也不愿意进去，他们都是跑到五龙堂来，听些庄稼玩意。

这几天，五龙堂的打麦场上，变吉哥正在说唱新编的抗日小段。他说的是梨花调，一定得请高四海来给他伴奏弹弦。高四海很忙，顾不上弄这个。可是那些书迷们，一到天黑，就给他们摆好了桌子，放好板凳，还从做饭的大锅里舀来一大壶开水。又有人把鼓

板弦子取了来，任凭他怎样推托，也是不能不来一段了。

变吉哥说书的兴致是非常高的。这在他也有一套想法：既然自己拔麦手痛，背口袋不动，赶车牲口夹套，扶犁沟垄不平，能在文化宣传工作上下些工夫讨些彩，不也是十分应该的吗？

所以，每当他唱完一段，说天气不早该休息了，明天还要去耩晚棒子的时候，有几个青年农民说：

“变吉哥，不要紧，再来一段。明天一早，我们背上种式去给你耩地，连饭也不吃你的，还不好吗？”

变吉哥，就又抓起壶来，润润嗓子，扬着两块用破碎的犁铧砸成的铁片，叮当的说唱起来了。实际上，你就叫他说个通宵，他也是高兴的。

农民们听的入迷，真是鸦雀无声。直到西北角上变了天，云彩一涌一涌的上来，甚至已经在滴着雨点了，他们还不愿意散。一边往树底下躲，一边说：

“说完，说完。下紧了再走！”

其实呀，并没有惊人的场面，离奇的故事。变吉哥不过是把这次五龙堂人们的护麦斗争，稍加编排，添些枝节，大致上是按实情实事说唱一番罢了。

五十五

雨渐渐下紧了，这一场雨，对晚田的播种很有益处。听完变吉哥说书的人们，都往家里跑，妇女们低着头紧扯着衣襟，遮掩住怀里的小孩，男人们把麦秸垫子顶在头上。变吉哥把鼓板揣在怀里，还是扬长的走着，好像他的光头，并不怕风吹雨打。高四海有些抱怨，又心痛他那张旧三弦，只好扯起破棉袍的大襟，包裹住它，这样走起路来，就感到非常的不方便了。

他要回堤上去，刚刚走到村口，有人叫住了他。

“四海大哥，慢走。”老温喊着赶上来，“我有个问题和你讨论一下。”

“有什么问题，到我那小屋里细讲。”高四海说，“这么大雨。”

“这个节气的雨并不伤人，”老温说，“像这样的好雨，往常年念经打醮都不容易求下来。真是：国民

党带来水旱雹灾，八路军占着天时地利，麦收一过，就又催着人们种小苗儿了。我和你讨论一下，我在田大瞎子家这活还做不做？”

高四海说：

“不做活，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到哪里去呢？”

老温说：

“我是不想再在这个人家呆下去了，这回没叫他们吊死我，难道再等他吊我一回？凭我这年纪力气，就是给人家打短，我看也饿不着，为什么非缠在他家？”

“我也不愿意你在田大瞎子家里。”高四海说，“我是说，要研究一个长远的办法。眼下，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日本，我们和田大瞎子的斗争，也是为了抗日。你要是一跺脚走了，对我们的工作，反倒是一个损失。”

“吃他家的饭，他总是当家的，咱总是做活的。”老温说，“在他看来，咱头顶的是他家的，脚踏的也是他家的呢！你就得看他的眉眼，听他的声口。一离开，谁也是一个脑袋，谁也就不比谁矮一截了！”

“村里的工作是多打粮食，支援前线。”高四海说，“田大瞎子，反对抗日，我们偏要抗日；田大瞎子不愿交公粮，我们偏要好好生产，打下粮食，他敢不交？这个时候你辞活，田大瞎子正怕不能得儿的

哩。要走，就像芒种，到我们部队上去。村里的工作，有老常他们也就行了。壮大我们的军队，才是最长远的打算。你回去就和老常谈谈吧。”

他们在堤口上分手，高四海上堤回家，有一个女人从堤上跑下来。

“谁呀这是？”高四海往旁边一闪，伸着头问。

“我呀，”那个女人笑着说，“你不认识我？”

“可不是一下听不出来。”高四海说，“这么大雨，你这是干什么去来？”

“去找你家秋分，讨论问题儿。”那个女人说着，脚一滑，就仄着身子溜到平地上来了。

刚刚走到河边上的老温，却听清了这是谁的声音。这声音，即使离得再远一些，说得再轻一些，他也会听得很清楚的。这是和他相好的那个东头的寡妇的声音。

妇女也看见了他，追上来了。她轻轻地说：

“喂，你等等我。”

等她走到身边，老温说：

“这么大雨，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听说书来呀！”那女人笑着说。

“怎么我没看见你？”老温说。

“我坐在人们的后边。”那女人说。

雨点虽然细小，下的可紧。它滴落得很有力，打

在干燥轻松的泥土上，泥土马上就把它吸收了。在眼下，收获了一季的土地，是需要多少雨水啊。春苗们挺直着腰，仰着头，把中间的一张新叶，拧成一个喇叭承接。突然降落的温暖的雨水，使它们的心胸张开，使它们的身体润湿了。

老温和这个女人，在这样深的夜晚，这样紧密的雨里走着。他们走得很慢，风雨天对他们竟成了难得的时机。走到河滩里，看到那只被日本的炮弹打破，现在修理好了的摆渡船，那女人靠着它坐下来了。她说：

“我累极了，歇一歇再走。”

老温对面蹲在她的跟前，摸摸烟袋，想抽一锅烟，想一想又放下了。他说：

“你找秋分讨论什么？”

“讨论我和你的事。”那女人说，“这样就算完了呀？我怎么把那孩子抱到街上来？难道叫他在小屋里长大，一辈子不见日头？”

“抱出来怕什么？”老温说。

“那样省事？”女人说，“他娘是我，他爹是谁？”

“人们不是全知道了吗？”老温说。

“知道是知道了，”女人说，“还得办一件事儿。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老温说。

“你要把我娶过去。”女人歪着身子哭了，泪水和

雨点一同滴在摆渡船底上。这只摆渡船，每当夏季水涨，两岸相隔，曾经载负着多少男女，渡过了汹涌的河流。

虽然全身已经叫雨水浇湿，女人的眼泪，却一直浇进老温的胸膛里去了。他说：

“我要对得起你和孩子。你想，我不愿意把你娶过来？可是，我的家在哪里，难道叫你跟我去打短，在树底下睡觉。”

“我不嫌你穷。”女人说，“跟着你，我沿街讨饭也心甘情愿。再说，眼下也没有要饭讨吃的了。”

“秋分怎么说？”老温仰起头来问。

“她说，过去我们做的事有些缺点。”女人说，“应该先结婚。她又说。这也不完全怨你和我，旧社会里的妇女们，并没有婚姻的自由。现在呢，她劝我和你结婚，她说这对哪方面也好。”

“难就难在我还没有房子地。”老温说。

“这我早就替你打算过了，”女人说，“我家里不是有那么两间瓦屋，几亩碱地？就缺你这么一个人来耕种收拾它哩！”

“那我不干。”老温说，“那不成了倒踏门儿？再说你那当家子们也有话说。”

“他们有什么话？秋分说，妇女今天也有继承权。”女人说，“你的脑筋还没有我开通，为什么净认

那些老理儿？”

“我想的更长远一些，”老温说，“眼下顶要紧的是抗日。是要不叫日本和张荫梧再过来，他们一过来，你看还有我们的活路？我现在想的不是结婚，是怎么着辞了活去参加八路。”

“去抗日，那就更好。”女人说，“张荫梧在这里，俗儿不断找寻我，我连门儿也不敢出。你去抗日，我和孩子都有脸面。你的年纪过时不过时？”

“抗日是看的决心，”老温说，“不像找男人看的是年纪。比起芒种来，我自然是老了一些，可是干起活儿来，不比他弱。论打整个牲口，铡个草什么的，他还得让我哩。”

“人家讲究是出兵打仗，”女人笑着说，“又不是当长工。”

“八路军里也有了马队呀。”老温说，“我们就这样决定。”

“就这样决定吧。”女人说，“我们还是得先结了婚。头天晚上过了事，第二天早上，我就送你到队伍上。这不是我落后，这为的是端正我们娘儿们的名声，好有脸见人。”

“你说的也有道理。”老温站起来。

在旷野里，他亲了亲她那只亲近过一次的、现在被幸福和希望烧干了雨水和泪水的脸孔，就分别了。

五十六

老温回到家里，把辞活的事和老常说，还说了结婚以后就去参军的事，老常说：

“不呢，我还是愿意和你就伴儿。我们这些人，离不开土里刨食儿，可是眼下我们又没有自己的土地。既是要参加八路军，那我就不能拦你了。参加军队是根本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长远的指望，不要犹豫，就去吧。这活什么时候辞呢？”

“明天一早就辞。”老温说，“我先在春儿家住两天。”

“那好。”老常说，“眼看四十的人了，虽然我们穷，结婚也是一辈子的大事。要准备准备。咱弟兄俩就伴过十年了，我不能帮衬你什么东西，给新人添箱。可是我有力气，跑前跑后的还行。”

第二天早起，老温给牲口添上几筛子草，把自己的几件破旧衣服，两只鞋子，包裹好了，就找田大瞎

子去。田大瞎子说：

“老温伙计，这是你不干，可不是我辞你，你要和农会说清楚。按你们的律条是：东辞伙，工资按一年算；伙辞东，就得按月日算。实在说，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，你这一走，真有点撂我的过儿。可是，赶上这个年月，我还有什么说的。回头我看看账，把你的活钱算给你。”

“算出来，你就交给老常哥吧。”老温说着走出来。

田大瞎子跟在后面说：

“我们东伙十几年，按实情说，我们谁也没有亏待谁。就说前几天把你吊了一下，使你受了点委屈，那也是耀武的过，现在他走了，你叫我怎么办？咱们都要往长处看，谁也不要记恨这些小节。你走吧，我不送你，以后，在外边要是混不上吃喝，你就还回来，千万不要不好意思。”

老温说：

“不要你结记。我就是饿死在大道边上，也不会再登你家的门限儿！”

“老温，你说的什么话？”田大瞎子说，“真的咱们就有了那么深的仇恨？说话不要往气上顶。我对你明白说了吧，这么几顷罪孽地，我也不想费心经营它了，回头，我想把它贱贱的去了，不担这个富户的臭

名，我也参加农会，到那时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”

其实，老温早已经走远，他这一套话语，是对送走老温、站在梢门口的老常说的，老常也没有答言。

老温到了春儿家里，把小包裹往炕上一丢，说：“春儿，我把活辞了，要在你这里吃两天闲饭，行吧？”

“行，太行呗！”春儿高兴的说，“我就去给你做饭。”

“我不能白吃你的饭，”老温笑着说，“我去给咱挑水。”

他挑上水桶，把小瓮灌满。又给春儿抱了柴来，坐下就烧火。春儿一边和面一边笑着说：

“打了点麦子，今天叫你吃白馒头。什么时候，我用上这么一个大领青的长工就好了。”

“不要盼那个。”老温说，“用上长工，人就黑了心。”

“我说着玩儿哩，”春儿说，“我是说添上你，我倒轻闲多了。”

“你轻闲不了几天，”老温从灶火里扯出一根火，点着烟说，“回头还得叫你忙活一阵。”

他告诉春儿，要和东头寡妇结婚的事。春儿赞成极了，不过，她为难的说：

“这是件大事，恐怕我料理不好，还是请大娘来

吧。”

“对，就请她来。”老温说。

春儿带着两手面，去喊叫大娘。叫她赶快过来，有要紧的事儿商量。大娘立刻就来了，一听明白，就问：

“合了八字儿？看了好晌儿？”

“不用那个。”老温说，“个字只剩下四个字：人穷命苦。好晌不用挑，就是五月初五。”

“几乘轿？几个吹打的？”大娘说，“就打着咱们定不起官轿，花轿总得有一乘。至少也得叫四个吹打的，娶场子亲事，连个响动儿也没有可不大好。”

“我看全免了吧，”老温说，“抗日时期，凑合着办了事儿就算了。”

“我不赞成大闹，也不赞成太省事。”春儿说，“今年不同去年，现在咱们是根据地了。我看就请咱村的子弟班来吹唱吹唱，叫他们喝上两盅就是了，也不费什么。”

“他不懂得颜色布丝儿，明天集上，春儿去给他扯点布，做身裤褂。”大娘说。

“行。”春儿答应着，“我再赶着给你做双鞋。”

“那我就成了甩手掌柜的，什么也不管了。”老温笑着说。

五月初五是端午节。初四那天下午，小孩子们钻

到村西大苇坑里去摘苇叶，回来叫母亲包粽子。其实小户人家还是吃不起，子午镇包粽子的不过十来家。春儿整整一夜没有睡觉，直到老常他们赶来两辆大车，老温穿戴好，到东头娶亲去了，她才稍稍休息了一下。

本来订了四个吹鼓手，可是村中的子弟班，自动来了八个人。老常到工会一说老温娶媳妇，那些工人们争着来赶大车，要求拉着老温和新媳妇，围着村子多转几转。

到东头，天还没亮，新人上了车，大车一直转到五龙堂村南里去了。

太阳一露头，听见了大笛吹奏的将军令，大娘和春儿又忙了起来。关于接待新人下车的礼节，春儿和大娘很有一番争执。这是一个后婚儿，按照老理儿，要在新人下车以后，叫两个小伙子抱了大捆的秫秸，跟在她身子后面燎火把，为的赶走她身上带来的邪魔。春儿说那简直是拿着妇女开心，是封建势力对寡妇的残酷虐待。现在婚姻自主了，妇女的人格提高了，要免除这个，叫她像初次结婚时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，感到快乐。大娘只好依她，免去这一个步骤。

院里挤满了人，新人一下车，大娘和春儿赶紧把她围随到屋里去，随后就插上了门子。小孩子们在门外顶撞着，爬到窗台上去撕窗纸，吹鼓手们站在院子

里，拚命的吹打，四支大笛冲着天空，一低一扬，吹笛的人脸红脖胀，眼珠儿全鼓了出来。

大娘和春儿在屋里忙着，春儿是有些手忙脚乱。大娘为了表现她经历的事儿多，并且还想叫春儿提前见习一下，以备结婚时心里有数，不着惊慌。她把结婚时一些繁重的手续，都加到这个新娘子身上来了。把新人弄得筋疲力尽，大娘才开门出来，鼓乐手们才停止演奏。

院里放上几张方桌，酒菜十分简单，每桌上不过是一斤酒，一碟子绿豆芽儿，一碟子豆腐泡儿。人们喝的很高兴，老常带着老温，一桌一桌的给人们斟了酒，致了谢意。老常说：

“酒薄菜少，我想也没人挑他的礼儿。大家多喝几口，也算是给他送行吧，明天，老温兄弟就到部队上去！”

“这样更好。”人们说，“可有一桩，新报名的战士隔不得夜，明天一早，可不许叫新媳妇的大腿压住了！”

“不能，不能。”老温笑着保证。

晚上，老常又套上车，把新人和老温送回东头。大娘和春儿也跟了来，说了一会话儿，替他们端出灯盏带上房门，叫新郎新妇安歇了。

从这一天起，老温就有了老婆孩子。一夜的时间

很短，多半辈子在田地里操劳过去的汉子，从窗纸的颜色，看出天就要亮了。从幼年起，他的两只粗手，只是在风沙的田野里，抚摸着青苗和黄谷，泥土和草根；只是在炎热的太阳下面，操持着鞭把和镰把，犁杖和锄头。现在抚摸着的是身边的妻子。从幼年起，在他耳边响动的只有大道上车马的声音，水井边轱辘的声音。现在听到了女人轻轻的嘱咐。除去田大瞎子的吆喝，老少当家们的白眼，在天地之间，原来还有这样可爱的声调和欢喜温柔的眼色。

然而，他还是很早就起来了。穿好他新做的服装，告别了新婚的妻子。到城里找芒种去报名参军了。

因为，有了妻子，就有了牵连，也就有了保卫她们的责任。生活幸福，保卫祖国的感情也就更加深了。

五十七

女人把他送出大门来。她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扶着门框，看着老温走到街上去。她说：

“春儿给你做的这身衣服很可体呢，颜色也好。”

“到军队上恐怕就穿不着了。”老温爱惜的轻轻拍着褂子的前襟说，“等我换了军装，有方便的人就把它捎回家来，在外边丢了怪可惜了儿的。”

“衣裳不要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。这会城里不知道还有照像片儿的没有？你要能给我们捎回一张穿着军装照的像来，那多好啊。”女人说。

“照那个干什么，光花钱。”老温说，“家去吧，我这就走了。”

他走到街上来，往东西两头一看。这时候，普通人家还都没有起来，只有村里的长工们，勤谨的农民们，集合出操的男女自卫队员们，开始在街上活动。老温不愿意惊动别人，他很想从小胡同穿到村外去。

可是老常正在井台上打水，早就看见他了，三把两把提上水桶，把担子往旁边一扔，大踏步赶过来说：

“怎么起的这样早？也没吃点东西？我是说拾掇清了，再去叫你的。咱镇上的工人同志们，约会下要欢送你一下。”

“不要送了吧！”老温笑着说，“大家都很忙。”

“早晨的工夫，忙什么？芒种走的时候，没有热闹一下，那时咱们还没有组织。”老常说着跳到当街一个半截碌碡上，向村西那头扬着手吆喝了一声，几个长工，就都放下水桶跑过来了。

这些长工们，都在壮年，一清早就敞着怀，宽大的胸膛晒得黑黑的，走起路来，拿着摇鞭把赶大车的姿势。他们跑到小学校里，推出那架大鼓来。一个年老的，在后面抡起两根像擀面杖一样粗的鼓槌。

这是惊天动地的音响。使小孩子们，顾不得穿裤子就跑到街上来了，妇女们一手掩着怀也跟出来。男女自卫队，踏着鼓点，迈着坚强的步子，排队过来了。

“欢送老温同志武装上前线！”

在子午镇大街上，是什么力量在鼓动人心，在激励热情，在锻炼铸造保家卫国的决心呢？是谁在领导，是谁在宣传？

“同志们，乡亲们！”老常站在碌碡上说，“老温同志就去参加咱们的八路军了！他像我们一样，在别

人家，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。昨天才成了个家，今天就到队伍上去。这是我们工人弟兄的光荣，这是我们工人弟兄的榜样。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还是叫老温同志自己给我们讲究讲究吧！”他说完，就从碌碡上跳下来。

老温不愿意登台讲话，过去两个长工，差不多是把他抬到碌碡上去。他站稳了，慢慢的说：

“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工人弟兄们会明白我的心思。我胡涂了几十年，从去年七月间到现在，才从一连串的实际事儿里，看出一个道理来。我从共产党八路军这里看见了咱们的明路，日本和张荫梧过来了那就是咱们的死路，只有这个八路军，才能保卫我们的国家，才能赶走日本，只有参加这个八路军，才能解放我们工人和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！”

“老温哥，你先走一步，我们就跟上来！”子午镇十几个长工，围着老温到村外来。

这样晴朗的天气，大鼓的声音是多么清脆！远近十几里都可以听到了，更何况那仄着耳朵站在小小庭院里的新人？

光荣，随着大锣大鼓的声音，飞到小院里来了，飞到女人的耳朵边、小孩的头顶上。它旋转着，跳动着，长久不能消散，一直到战争的胜利。

到摆渡口，老温才伸着大胳膊，把人们拦回去。

在五龙堂的堤头上，又有很多人站在那里欢迎他了。

到城里一共是十八里路，在这十八里路上，老温有几十年的感触。到了城里，他才觉得肚里饿了，在十字街口找了一家豆腐脑棚，坐在临街的一张白木桌旁边的板凳上。掌柜的用围裙擦着手过来，老温说：

“盛一碗，多加醋蒜！称一斤馒头。”

他掏出烟袋，抽着，望着大街上来往的车马、军队。在过去，无论是赶集上庙，出车走路，他最注意的是车马。牲口的毛色，蹄腿的快慢，掌鞭的手艺，车棚的搭法，车脚的油漆，车轴的响动。今天，他注意的是军队。在他眼里，今天的队伍，已经不像去年冬天。去年冬天，我们的队伍，在服装上还是不么不六，在走动上还是一群一伙，今天的队伍，是服装也一律，步伐也整齐了，枪枝的披挂得法，马匹的鞍鞴齐备。

是谁在指挥，是谁在训练？农民们为什么这样快就变成了支持祖国北方的坚强的长城？从今天起，老温也就不是给当家的收割几亩庄稼，看养几匹骡马，他的职责扩大了，他是保卫这一片广大的乡土、关心祖国的前途的人民战士了。

掌柜的端了饭菜来，他慢慢的吃着，还望着南来北往的人们。

北大街通着北关，是从保定来的大道，大街两旁都是客店，门口都还挂着久经风雨的箬篱。现在车马不多，街口上只有两挑卖馒头的柜子，几只卖青菜的筐子。从北边过来一个老年人，他的头发多日不剃，布满风尘，脸晒得很黑，皱纹像一条条的裂口。一身黑色洋布裤褂，被汗水蒸染，有了一片一片的白碱，脚下的鞋，帮儿飞了起来，用麻绳捆在脚背上。这是一位走过远道的人，他已经很疲乏了。可是，使人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好强的汉子，走在人群里，他拿着一种硬架式。从这个架式，老温猜想这也许是一位赶四五套大车的好把式。

老人后面，有一位中年妇女，她穿一身蓝色洋布裤褂，头上的风尘，脸上的干裂，和老人是一样的，她背着一个黑色的破包袱。

老人走到十字街口，等女人跟了上来，笑着说：“这可就到了，这就到家了，还有十八里路。你看看，这就是我们县里最热闹的西大街，你看那座石牌坊，是明朝的物件哩！”

“那我们就歇息一下子吧。”女人说话是外路口音。

“要歇息歇息，”老人说，“还要吃点儿东西。来，吃碗豆腐脑，我有七八年不吃这家的豆腐脑儿了。”

老人招呼着女人坐在老温对面的板凳上，女人

仄着身子把包袱放在脚底下。

老人的口音，老温听着很熟。他仔细看了看，从老人那在高兴的时候、眼睛里的跳动的神采，他认出这原来就是他多年的老伙计，秋分和春儿的父亲吴大印！

“大印哥，是你回来了呀！”

老人站起来看了看，就抓住了老温的两只手。

掌柜的端来两碗豆腐脑，老温说：

“再拿二斤馒头来，一块算账。唉呀，大印哥！这咱们可就团圆了，就差你一个人了。”

他拉着吴大印坐在他的身边。大印说：

“我出去七八年，没有一天不想念你们。人一年比一年的老了，在外边又剩不下个钱，光想回来，可没有盘川呀！今年听说咱们这里也有了八路军，改了势派，我就一天也呆不下去了，走！要饭吃，也要回老家。老弟，这一路真不容易呀，全凭你哥哥从小卖力气，修下的这副腿脚，换换别人，早躺在大道旁边了。老常兄弟好吧，芒种哩？”

“都好。老常哥是咱镇上的工会主任，”老温说，“芒种去年就参加了八路军。我对你说吧，咱这里可大变样儿了，庆山也回来了，是一个支队的司令，你看！”

“你看，”大印对那女人说，“这个支队的司令，就

是我们那个大女婿！”

女人正低着头吃饭，抬起头来笑了。老温说：

“这是谁？”

“这是，”大印说，“这是你的新嫂子。出外七八年，这算是那落头。”

“我们这里的妇女可提高了，到镇上就要参加妇女抗日救国会哩，”老温高兴的说，“春儿就是主任！”

“春儿，就是咱们那小闺女。”大印又对女人介绍。

五十八

在县城里，吴大印知道了村里的很多事情，故乡的新的变化，在他的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约略的轮廓。老温也和他谈了自己结婚，现在就去参军的事。直到天快晌午，豆腐脑棚的买卖忙上来，他们才分手告别。

吴大印领着女人回子午镇去，这十八里路，他走得非常快，女人得时时喊叫他等一等。

起晌以后，他们到了子午镇的东街口。墙院还是旧墙院，堤过上的柳树高密了。乡亲还是旧乡亲，子午镇的男女老幼都集在十字街口的广场上。用碾场的碌碡支着台板，搭起来的席棚里，挂着宽大鲜红的幕布。它不像是庙会演戏，台上没有锣鼓胡琴的响动，台下没有各种叫卖的嘈杂。在席棚附近是严肃的、紧张的，好像在讨论什么要紧的事情。

一进街口，两个背枪的青年民兵，就把吴大印拦

住了，虽然吴大印笑着说这里就是他的家，并且还能指着叫出一个民兵的小名，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。可是因为他身上带来的过多的风尘，身后女人的远方打扮和外路口音，使得两个青年查问得越发紧了。

十字街口的席棚那里，有人在讲话，尖利又带些娇嫩的声音，传到村外来了，吴大印望见那里，是一个女孩子站在台上。

“那讲话的不是春儿？”他对两个青年民兵说，“我就是她爹！”

两个民兵才好像想了起来。一个民兵带他们到会场上去，在路上，这个青年也不肯安静，不住的用鞋尖踢着道沟边上的土块，说：

“走这么远路，怎么你就不开个路条呢？”

“没有路条，我能从关外飞回来？”吴大印兴奋的说，“到了自己家门，我就该是活路条，谁知道碰上了你们两个年轻的，偏不认识我，论乡亲辈儿，你该跟我叫爷爷呢！”

“咳！”青年民兵一拧身子，把枪枝换到另一个肩膀上说，“你就算我的亲爷爷，出外这些年，回来也要查问查问哩！你们先在这里站一站，不要搅乱了会场。等妇女主任讲完了话，我再去给你通报。”

吴大印和女人只好靠着墙站住。他提着脚跟，望着自己的女儿，想听听她在白话什么。

“妇女同志们，”春儿在台上正讲的高兴，“今天这个大会，是个选举会，选举村长和村政权委员们的大会。我们选举的村长，是抗日的村长，是坚决抗日的人，是誓死不当汉奸的人。选他出来，好领导我们抗日。我们妇女，在过去不能参加选举，就是穷门小户的男人，也不能参加选举。过去的村长，都是几个人唧咕成的，他们财大气粗，可是不给老百姓办事。今天参加选举，是我们妇女的权利提高了，我们绝对不能马虎，要在心里过一下，看谁抗日坚决，就选举谁！”

春儿讲完话，就退到后面去。这一回站到台前来的的是老常。老常在台前这一站的姿势，引起了吴大印一段亲切的回忆：在从前，乡村演唱大戏，总得请上几个管台的人，管台的工作，是维持台下的秩序。乡下人看戏，要拚着全部力气和一身大汗。戏唱到热闹中间，比如《小放牛》唱到牧童和小姑娘对舞对唱，《喜荣归》唱到花头一手叉腰一手扬着花手绢来回踏碎步，《柜中缘》唱到哥哥要开柜、妹妹不让开的时候，台下就像突然遇到狂风的河水一样，乱挤乱动起来。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，讲究看戏扒台板，就像城里的阔人，听戏要占前五排一样。他们通常是把小褂一扒，三五个人一牵手，就从人群里劈进去。挤到戏台前边，双手一扒台板，然后用千钧的力量一掀

屁股，这一动作，往后说可以使整个台下的人群向后一推，摧折两手粗的杉篙，压倒照棚外的小贩；往前说，可以使戏台摇摇欲坠，演员失色，锣鼓失声。当这个时候，管台的人，就站到台前边来了，他们一手提着烟袋荷包，一手一按一扬的喊：

“乡亲们！这是和谁过不去呀？还看不看戏呀！”

态度既从容又急迫。这样台下就会渐渐安静起来，管台的笑一笑，又退回打锣鼓的后面，抽着烟看戏去了。

这种角色并不好当，第一要有人缘，第二要有涵养，第三要人佩服。面对着动乱的群众，他负责的显然是临阵指挥的工作。但是今天他的老伙计来到台前，并不是为了台下挤。

台下的人正在鼓掌，人们问什么话，老常笑着解答着。吴大印等不及，他说：

“我可以过去了吧？”

“还得等一等，就要选举了。”青年民兵说，“我也要去投一张票哩！”

“我们也要去投票呀，”吴大印说，“赶上了，还能放过去？我当了一辈子长工，还没有参加过村长选举哩！”

“你刚来，你知道选谁？”青年民兵说，“允许不允许你投票，我还得去问问呢？”

青年民兵说着就到台那里去了。这时台下放上了几张桌子，每个桌子有一位写票的，一位监视的。工农妇青，都按小组编好，拿着票到桌子前边，轻轻说明自己要选的村长，写好了，再投进台前的票箱里去。

那个青年民兵只顾自己投票，一直没有回来。吴大印着急，自己走过去了。春儿第一个看见，从台上跳下来。吴大印说：

“春儿，别的事家去再说，我要写一张票！”

群众决定让新回到家乡来的吴大印参加选举，发给了他一张票。吴大印拿着票走到写票桌跟前，写票员小声问他：

“你选谁？”

“我选老常。”吴大印说。

“他的大名叫常德兴。”写票员笑着说，“你真有眼力呀！”

选举的结果：老常当选了子午镇的抗日村长。老常站到台前来，讲了话，作了抗日的动员。去年冬天，高庆山在地里和他谈话，说工人可以当村长，他当作一个笑话听。现在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不容他推托，他要担负起这艰难沉重的工作。最后，他约请他的老伙计吴大印发表一点回到家来的感想。

吴大印站到台上去说他的感想。他说，他出外不

久，那里就叫日本占了，农民们更不能过活。在那里很受了几年苦，回来的时候，日本人又占了我們很多地方，他只能挑选偏僻的道儿走，整整走了三个月。可也见到很多新鲜事儿，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地面上，不管是铁路两旁，平原村镇，山野森林，湖泊港汊，都有我们的游击队。凡是八路军到的地方，农民们就组织了抗日的团体，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。这些根据地，有时看着并不相连，有时又被敌人切断，可是，它们实际上是叫一条线连接着，这就是八路军坚决抗日的主张，广泛动员人民参加抗日的政策。他知道这条线通的很远，它从陕北延安毛主席那里开始，一直通到鸭绿江岸的游击队身上。他想，这条线，现在是袭击敌人的线，动员群众的线，建立抗日政权的线；以后，我们就会沿着这条线赶走日本。回到家来，看到村里的热烈的抗日气象，他要告诉大家的是：象我们这样同心协力坚决抗日的地面，是很宽广很强大的了。他要求参加村里的抗日工作。

在他讲话的时候，人们都往台前挤，高四海和秋分也赶来了。只有田大瞎子和老蒋退到远远的地方，低着头抽起烟来，好像不爱听。这一天，春儿家里，亲人团聚。一年以来，在子午镇和五龙堂，发生了很多变化，过去流散在外的，像高庆山、高翔、吴大印，全都回来了，像芒种、老温，成群结队的从村里走出

抗日去了。无论是回来和出去，分离和团聚，都是存了保卫乡土、赶走日本的一片热心的。

也有那走了又回来，回来又走了的，像田耀武和高疤。因为他们并不保卫乡土，只知道闹磨擦，乡土也就不再需要他们，不再在他们身上寄托任何的希望了。

五十九

这天下午，秋分又给爹娘送了一小筐箩白面来。临走，叫出春儿去说：

“你的好日子到了，今天晚上。”

“在哪里呀？”春儿笑着问，她的脸有些发红。

“在我们家里，吃过晚饭，你就赶快去吧！”秋分说。

“为什么在你们家里，”春儿问，“我们村里没有共产党呀？”

“眼下，因为党员还少，两个村子合着成立了一个支部。”秋分说，“看你，哪村不是一样呀，普天下的共产党还是一家人哩，别说一条河隔不开，就是国家的边界也分不开、割不断呀？”

“还要开大会吗？”春儿问，“叫我讲话不？姐姐，你告诉我，到时候该说些什么呀？”

“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革命的同志，”秋分说，

“同志的关系和姐妹不同。它比起姐妹来，还要亲密。讲什么话，要出自你的心里，能叫别人教呀？”

春儿点了点头，姐姐走了。

春儿的心里，忽然觉着沉重起来。她想到入党不仅是高兴的事，从今天起，她是负起一种责任来了。一种重大的责任，她的生命，成了党的生命的一部分。党对人民所负的责任，她也要分担。她已经把自己的青春和将来，交给了党。党就要培养自己，使自己的生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，完成最光彩最高尚的任务。

她告诉爹和娘，就到五龙堂来。

天快黑了，有三片红色的云彩留在西边的天空里。遍地是庄稼，一只鸟儿衔着一条青虫，正在吐着穗子的密密的谷丛上面飞腾，里面有新出卵壳的小鸟在啾啾叫唤。棒子吐出的红绒花，鲜艳得像结婚的新娘子头上的花朵。小道旁边的园子里，已经搭起一个新窝棚，一对年轻的夫妻，并排坐在上面，把光着的脚板垂下来，共同看守着他们那已经结成的碗口大小的甜瓜。

“开园了吗？”春儿望着他们笑着说。

“还没有，”窝棚上的媳妇说，“瓜是熟好了，就等一个有福分的人了！”

“你还没有福分吗，”春儿说，“看乐得你快钻上

冒天云儿里去了。”

那丈夫轻轻推了媳妇一下，那媳妇就笑着跳下来，摘下躺在垄沟边上的一个黄皮大甜瓜，跑到春儿跟前说：

“今年算赶上吉幸了，你的小嘴儿顶有福，就请你给我们开园！”

“我有什么福呀？”春儿说。

“我看准了，”那媳妇说，“你今天一定有喜事。你吃了我们这瓜，管保我们今年能做好买卖，瓜园里，不涝不旱，不闹地羊，不出虫子！”

“好吧，恭喜你小两口儿发财，”春儿接过瓜来，打开就吃，“地羊虫子是你们管着，我只管不叫日本鬼子来糟蹋你们的瓜就行了！”

“我说你是顶有用，顶能叫我们幸福的人么！”媳妇高兴的跑回窝棚里去了。

一路吃着甜瓜，春儿也很高兴，她回头望望，那一对夫妻说笑着钻到窝棚里睡觉去了。春儿觉得脚下的土地，头上的天空，庄稼和人民，都在自己的身上，寄托着亲密的希望。

春儿过了河，上了堤坡，天空出现了那颗大明星。姐姐正在小屋门口等着，领她到屋里去。

炕上地下全打扫了，靠南边的小窗户，摆好一张桌子，变吉哥正装饰着他画的毛主席像。一盏明亮的

灯放在窗台上。

高四海严肃的望着毛主席的画像。变吉哥安排好了，回过头来笑着说：

“大伯，你知道画这张像多为难呀，遇见从延安来的人我就打听，有没有毛主席的照片，后来还是庆山哥给我借来了一张，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保存的，我高兴极了，买了好纸张、好笔墨，等到晚上，老婆孩子全睡下了，我安安静静的画，整整画了三宿才成功，你们看画得怎样？”

“画得好，”高四海点头说，“他在望着我们，在鼓励我们，他经过了多年的艰苦的斗争，把党的事业领导到胜利。这些情景，从你的画像上，全可以看出来！”

“那样啊！”变吉哥高兴得红了脸，激动起来说，“大伯最能批评我的作品，秋分同志，你说哩，我愿意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“是好。”秋分说，“面对着这张画像，就像毛主席亲自在前面指引我们！”

“春儿，你说说！”变吉哥说，“是为了你入党，我才精心画的呀！”

“我心里高兴极了，”春儿笑着说，“从今天起，毛主席来领导我这个穷孩子了！”

“那我们开会吧，”变吉哥立正了说，“我先向春

儿同志介绍：高四海同志是五龙堂子午镇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书记，我是支部的宣传委员，秋分同志是组织委员。同志们，我们今天举行春儿同志入党的仪式。我们接受春儿入党，因为她是一个敢于反抗地主压迫的雇农吴大印的女儿，因为她在抗日战争中勇敢负责的工作，对党的热情和忠诚。”

高四海讲话说：

“春儿！你还年轻，你要知道我们党的历史，要想念那些为党艰苦的工作和英勇的牺牲的人们，秋分！你把我保存的那面红旗取出来！”

秋分打开一只破旧的红油板箱，取出那面旗来。这是十二年以前农民暴动的时候，高庆山打着的旗帜。庆山把它插在堤坡上，在它的下面抵抗围攻的敌人，胸部的鲜血，染紫了红旗的一角。庆山出走以后，高四海叫秋分把它保藏了起来。它仍然完整，颜色凝重，十几年来，它不停的在这一带人民的心里招展。

高四海把红旗铺展在春儿前面的桌案上，它带着当年滹沱河边的风暴，壮烈的斗争和鲜明的理想，和这个女孩子的热情结合了。

春儿举起右手来，安静有力的说：

“我要做一个好的忠诚的、积极斗争不怕牺牲的党员！”

会后，高四海又谈了谈子午镇的政治情况，把党

员介绍给春儿，把她编在老常领导的组里。

回去的时候，姐姐送她，在河滩里，慢慢告诉她以后应该怎样工作，怎样团结群众和领导群众。

六十

高庆山支队原有的骑兵连，新近扩充成了一个骑兵团，芒种是个班长。老温参加部队以后，就在这个班里当了一名骑兵。他原来要求并不高，就是当马夫也乐意，可是到班里以后，芒种发给他一支新马枪，还把全班最好的一匹小青马交给他骑。在我们的部队里，对于新来的战士，就像对待最小的弟弟，是什么也要让他挑选的，虽然按年岁说，老温在这一班里要算是最大的了。

老温看养和驾驭了二十多年牲口，在他手里倒换过的骡马也有几十匹了。他被惊车的牲口轧伤过腰，惊了犁踢破过脸，可是，老温能使劣性牲口是有了名的。对于牲口，他不只能从口齿看出年龄，从眼色看出性格，从蹄腿看出快慢，从肩膀看出力量，还能一鞭子下去打倒直立起来的牲口，并不损伤它的毛皮。他对牲口的使用法是：能打也能喂。在他手里

调理出来的牲口，真是力大膘肥，驯顺无比。

当了骑兵，他渐渐知道，军队里使用牲口，并不完全像庄稼主。对一个战士的要求也并不像对一个长工的要求。牲口要喂好，这是一样的，但主要是训练得它成为战士的肢体，对牲口的感情也要加重，对待它，就要像对待自己的腿脚一样。他骑在小青马身上，就把小青马当做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了，马能了解他的意图，很好的完成战斗的协同动作。

他要和小青马锻炼成一个整体。就像爱人们幻想把男女两个人扫乱重分一样。他身上要有马的感觉，马身上要能寄托他的想像。小青马，跃进飞扬吧，当他冲锋陷阵的时候；小青马，迅速卧倒吧，当他隐蔽作战的时候。

虽然这匹小青马还只有四岁，已经长的非常大，今后转战疆场，老温和它就不只关心对方的饥渴冷热，灾病甘苦，也细心的听着战友的呼吸和心脏的跳跃吧。

不久就有大战到来，冀中军区正在利用战斗空隙，进一步整训部队。高庆山支队就要调往河间去了。老温请了半天假，回了一趟子午镇的家，看了看他的妻子。他往返只用了三四个钟头，站在院子里说了五六句话，他的目的不过是穿着新军装，骑着小青马，在乡亲、伙计、妻子的面前，晃一下就是了。

部队夜晚出发，骑兵团走在前面。在满镇过滹沱河。在五毛营过沙河，在张岗休息十五分钟，半夜就到了河间。

第二天是七月七日，芦沟桥抗战一周年了。芦沟的流水和月光，石桥和芦苇，还披带着敌人侵略的创伤，但它有的已经不只是创伤，也有了动员起来的巨大的民族的信心和力量。它已经在看着祖国儿女的英雄行为含笑了。

冀中军区的阅兵在河间东关的古教场上举行。初升的太阳的多彩的光耀的光芒，射向平原晴朗的天空。在教场中间的墩台上，竖起了一面高大的红旗在飘展作声。新近训练的青年的号兵们，吹着集合号。在附近的古代遗留的残断的碉堡上，有一只苍鹰展翅飞起，所有这一切，都在兴起战士们对于敌人的愤恨，对于战争生活的向往；也强烈的吸引着周围那些从事耕种的农民。

祖国现在进行的，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、规模巨大组织坚强的民族解放战争。吕正操司令员，高庆山支队长，高翔政治委员，站在墩台上检阅了他们所领导的、由冀中区青年农民组织成的抗日部队。

阅兵完毕，高翔作了政治报告。他说明抗日战争的性质，战争的过程，为什么是持久战，怎样进行持久战，和怎样才能争取到最后胜利。他打击了亡国

论，揭发了投降论，也批评了速胜论。他的报告比起去年十月，更确切，更有事实的根据。他指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，描绘了大牙交错的战争，强调了政治动员的重要，又详细解释了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原则。

他讲的很生动通俗。经过一年实际战斗的战士们，都感觉政委是总结了他们每个人的经验，指出了军民全体奋斗的目标。这总结和每个战士的思想结合，加强了他们的信心，鼓舞了他们的力量。

他们能够理解，受到鼓动，听得十分入神。坐在地下，抱着枪枝，相互称赞他们政委的讲话的才能，分析的能力。部队里的知识分子，平日虽有些自高自大，一听这样卓识远见的分析，也感到自己的理论水平太低，和政委比较起来，是相差太远了。

高翔的报告，依据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，和同年同月在延安讲演的《论持久战》。

这两本书，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指南针，是通俗的兵书战策，是必胜的决算，民族解放胜利的保证。

《论持久战》，在冀中军区最初只油印了几百本，随后由印刷厂大量铅印出版了。这本书由“钢板战士”们精细刻写，由印刷工人们夜晚赶印，它有各式各样的版本，用过各式各样的纸张。这本书由干部研

究，向战士传达，由部队向老百姓宣传。随着它，部队前进，根据地建立，抗日武装扩大了。它把必胜的信念注射到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战斗血液里。

六十一

一九三八年七月，冀中区创办了一所抗日学校。这所学校，分做两院，民运院设在深县旧州原来的第十中学，军事院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因为怕日本、逃到大后方去了的地主的宅院里。

部队保送芒种到军事学院学习。行前，他捎一个口信给春儿，说到深县学习去了。他带着组织介绍信来到深县，学校里到的人还不多，房舍也正在改造修理，看样子得过几天才能开学。他闲着没事，到旧州去玩了一趟，顺便打听：民运院是不是还招收学生，前来学习要经过什么手续？教务处回答说：现在人数还不齐。学生入院，一般的要经过考试，如果是地方上保送，文化程度低一些也没多大关系。芒种在回去的路上，坐在道旁大麻子棵下边，掏出钢笔日记本，给春儿写了一封信。叫她见信就来深县投考。

把信折叠好，赶进深县城，今天正是大集日，可

是因为正在秋忙，遇不见一个他们那边来的熟人。把信交到交通站，又怕耽搁，他就站在十字街口等起来。

直等到晌午大错，才遇见一个贩蜜桃的，托他把信带到子午镇。小贩怕忘记了，把信压在桃堆里。

这些日子，春儿在家里倒比较清闲。她家地里的庄稼已经锄过三遍，今年雨水不缺。青纱帐期间，战争情况也不紧张。村里的群众基础，比过去巩固了，工作也顺利。自从父亲回来，她也有了照顾，新来的后娘，待她很好，帮她做饭做活。她自己觉得：这么大的一个姑娘，现在竟有些娇惯起来了。

这天晌午，天气很热，人们都在歇晌。春儿似睡不睡的，听到街上有卖蜜桃的声音。这个孩子，从来很少买零食。今天，她忽然从蜜桃联想到深县，想起吃个桃儿来。她跑到街上，卖桃的小贩刚进村，正把桃子放在南房凉儿里。春儿过去望着堆在筐子上的小桃奴儿说：

“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五百。”小贩蹲在两个筐子的中间，用一块白布手巾扇着汗。

“这么小的桃儿，”春儿说，“这样贵？”

“别不懂眼，这是真正的深州蜜桃，给西太后进贡的东西。”小贩说，“你尝尝，保管顺嘴流蜜！”

“我不尝你的。”春儿笑着说，“称半斤吧！”

她随手就刨开桃堆，正要挑拣，一封折叠着的信，像认识她一样，从桃堆里挺了出来，她立刻看见了那亲切的字体和自己的名字。

小贩正要向她打听这个叫春儿的住在哪街哪头，她已经把信打开，看的入了迷。她告诉小贩，不称桃了。谢谢他给带了信来，问他是不是到家里坐坐喝碗开水？就跑回家里去了。小贩也高兴碰得这样巧，虽说半斤桃的买卖没有做成。他想：对于这位姑娘，这封信的内容，一定是比深州的蜜桃还要甜蜜。

刚刚看过了信，是要她去学习，春儿很高兴。可是当决定明天就走，她也像那些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孩子们一样，心里有些烦乱起来。

她经过村、区、县，写好了介绍信。她又和本村的同志姐妹们告别。她到五龙堂去看望了姐姐。回来，一夜差不多没有合眼，年老的父亲就催促着母亲起来给她煮赶路的饺子了。

她带了一个挂包，装着她珍惜的纸笔和文件；一个小包裹，里面只有一身替换的单衣和一双新做的鞋。

子午镇到深县有六十里，走到双井村，天气就热上来了，一个人走远道，有些累得慌。过了双井村，净是沙土道，走着更费力。好在这一带大道旁边，果

木树很多，随时有树荫凉可以歇息。雨水勤，梨儿挂的很密。起晌以后，春儿就到了旧州。

旧州实际上只是一个小乡村，并没有春儿想像的那样热闹。原来的第十中学却占着很大的地势。红油的大门旁边，有两棵一般粗的大柏树，一棵树下面蹲着一头白石大狮子。春儿很少见过这样大片的青楼瓦舍，和这比较起来，她村头一份的田大瞎子家的宅院，也不成什么规模。一眼望过去，这个学校，给了她个大庙的印象。

校门口，有一个战士，来回走动站着岗。春儿想起，她是要进到这里面去学习，是来这里投考了。她的心很快的跳动起来，脸也腾的红了。

她被人领进教导主任的办公室，教导主任是一个年轻人，看来是刚从部队上调来，春儿还好像在哪里见过他，顾不上问，忙把自己的介绍信交过去了。

年轻人详细的问了问春儿在村里的工作，和她的家庭生活，就叫人来测验一下她的文化。前来测验文化的是一个年老的教员。他虽然也很喜爱眼前这个女孩子的活泼态度，却为她回答试卷的情况皱了眉头。

“我没有上过学，”春儿不住的用手擦着脸上的汗，把卷纸也染湿，“我只是在冬校识字班里，念完了一本书。”

“你考的可是学院，”教员笑着说，“是大学哩。”

“文化可以慢慢提高，”教导主任解释着，是在安慰春儿，“她有一定的政治认识和工作经验。”

“那你就听候榜示。”教员摇摇头，拿着那张如果没有几处污手印，就是一张完全的白卷出去了。对于榜示，教导主任又给春儿解释一番，就叫人带她去吃

饭。

这一顿饭，春儿吃得很不安心。她不知道这究竟算考上了没有？如果考不上，又怎样回到村里？她奇怪：为什么对着一张纸，坐了那么一会儿，身上就这样不舒服，比三伏天锄几亩小苗还觉累？对于文化，她真有点害怕起来。后来又想，既是叫她吃饭，就有几成儿，心里一宽，才吃完那拨搅了半天咽不下去的一碗小米干饭。

吃完饭，有一个比她年岁大些，穿军装的女同志来叫她去做游戏。春儿一听这个女同志的口音，就和她攀起乡亲来。女同志说：

“把你那包袱放到我屋里，晚上就和我一块睡觉。”

春儿出大门，就看见那片大操场，一大群男女学生正在那里拣拾烂瓦和砖头。他们要把“七七”事变学校南迁以后，久经荒废的操场清理出来。在这群青年学生里边，有些是穿制服的，更多的是穿着便服。

他们多数是原来北平、保定的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。女学生有的是玉白色士林布短大衫，下边光着腿；有些是短袖漂白小褂，露着胳膊。这些当然都是富家小姐，有的脸上还擦着脂粉。她们的手很小很白，她们轻轻的蹲下身子，一只手小心的提着衣裳襟，在那里喊叫加油。干这种勾当，春儿觉得比答卷要超脱得多，她的活泼熟练的动作，立刻引起了那些女学生们的注意。

然后，她们牵起手来，拉成一个大圈子，那些女学生很自然的把手伸给男同学，春儿找好两个女同学的中间，插了进去。把圈子拉圆，她们围着操场转。按照旧有的习惯，春儿觉得，她，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，是幸运的参加到这些学生们的队伍里来了。但等到跑步开始，这些学生们就能看出：不仅在姿势和动作上，春儿可以作为她们的表率，在认真努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上，这个女孩子更是远远的超越了她们。

六十二

榜示以后，春儿也跟着人们跑到大门口墙壁上去看榜，她从最后面找寻自己的名字，她的心怦怦的跳着，然而她的名字却列在了榜的前端。她是正式录取了，学院也正式开了课。她们没有星期休息制度，芒种在一天黄昏的时候，来看了看春儿，给她送来一个他自己裁订的笔记本，还有一条用棉被拆成的夹被。春儿都收下了，在人群里红着脸送他出来，说：“你有什么该拆该洗的，就给我拿过来。”

“这些事情我都会做了，”芒种说，“我们都在学习，哪能侵占你的宝贵时间。”

学院是军事组织，制度很严，春儿把他送到门口，就赶紧跑回班里去了。当时，即便女同学们在一起，也并没谁追问这些关于男女的事情。至于那些男同学，虽然平日对春儿很有好感，自从看见芒种来过一次，也只是从心里知道，像春儿这样一个女同志，

好像是已经有主儿的人了。

学院的学习很紧张，上午是政治科目，下午是军事科目。雇来很多席工，在大院里搭了一座可容五百人的席棚。这里的教员都称教官，多数是从部队和地方调来的知识分子。他们参加工作较早又爱好理论研究，抱着抗日的热情来教课，在这样宽敞的大席棚里，能一气喊叫着讲三点钟。

春儿对军事课很有兴趣，成绩也很好。政治课，她能听懂的有“论持久战”和“统一战线”；听不懂的，有“唯物辩证法”和“抗战文艺”。虽然担任这两门功课的教官也很卖力气，可是因为一点也联系不到春儿的实际经验，到课程结束的时候，她只能记住“矛盾”和“典型”这两个挂在教官嘴边上的名词。

春儿认识的字有限，能够运用的更少，做笔记很是困难。在最初一些日子里，每天下午分班坐在操场柳树下面讨论，她发言也很少。在这些时刻，她就时常望着远处地里的庄稼，想到在那青棵棵下面工作，虽然热得流汗，也比在这里“讨论”好受一些。她愿意讨论些乡村里的实际事儿，现在主要的是要记些教条。在一些日常生活里，她也有时感觉和这些学生们相处不惯。主要的，她觉得有些人会说会写，而实际上并不爱去做，或根本就反对去做；好教训别人，而他自己的行为又确实不能做别人的榜样；想出人

头地，不是从帮助别人着手，而是想踩着别人上去。春儿是个有耐性的孩子，在一些细节上，她很少和人家争吵，也知道帮助别人。有些事情，想通了也知道向别人学习。比如这些学生们很讲究卫生，很爱洗头发，每隔一个星期，就到后院的井台上洗一次。春儿觉得洗过了的头发，确实好看，因此，她除去向她们学习勤洗衣服和穿衬衣，也经常去打水洗头。她那特别乌黑的头发，立时引起了人们的羡慕。但是当这些学生只干净自己，不干净别人，甚至为了干净自己把别人和环境弄脏，春儿就不向她们学习，还要指出她们的错误。

她从不嘲笑别人。当她在讨论题目的时候，有时忘记和说错了，那些学生们是常常忍不住用手帕堵住嘴的。但当她们在树下讨论问题的时候，一听见飞机声就那样惊慌，而有时飞过的不过是一只蜚螂，才强作镇静；偶尔又有一条绿色的小虫，爬上她们的脖颈，就尖声怪叫，活像挨了蝎子螫一样。春儿虽然看不惯，也没有觉得好笑。她知道这些人从小是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长大的，和自己并不相同。

这些女学生，有的也能热心的帮助春儿，好像也了解她。有时，在收操以后，她们叫着春儿到田地里去游玩。这时大秋就要到了，遍地高粱，长得像红山一样。这些学生还只知道爱好风景，不知道关心老百姓

的收成；她们面对着夕阳唱歌，并不问雨水的勤缺。她们问春儿：

“你觉得在家里种地好，还是在这里学习好？”

“学习好。”春儿说，“学习好了，我才能做更多的工作。我的文化太低了。”

“文化高有什么用？”女学生说，“现在就是生产和打仗有用。我还后悔自己有文化哩！我已经给我妹妹写信，叫她不要上学，快学织布。我羡慕的是像你这样的人。”

“你是笑话我。”春儿说。

“是讲的真话。”女同学说，“你出身好。”

“可是，文化总是好的。”春儿说，“我没有文化，我很痛苦。我要好好学习，希望你们多帮助我。”

春儿颜面上表现出来的真实感情，使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同志们很受感动。她们沉默了。

她们有的时候，发些怪问题，问的春儿不好回答。走着走着，她们会忽然指着一丛树木问：

“春儿，你喜欢柳树，还是喜欢枣树？”

春儿想一想：柳树枣树对人们都有好处，就说：“我，都喜欢。”

这就使得提问题的女同学很不满意，说她白白的在农村长大了。春儿又想：枣树能结果实，柳树不能；枣木能砍油楔，能做车轴，而柳树有的只能砍马

杓。就说：

“我喜欢枣树，我好吃甜枣儿。”

这又使得女同学不满。女同学说：

“在一切树木中间，我呀，顶不喜欢枣树。它是个孬头。发芽最晚，落叶最先，长年枯枝少叶，干巴拉杈。我顶喜欢的是柳树，春天还没有来到，她的身上就发绿发黄；她的枝条柔嫩，她的身态多姿；她是春天的信号，构成大平原风景的主要角色。在性格上，她见水就活，能抗旱也不怕涝，不管山地平原，气候冷暖，到处都有她的子孙。并且在一切树木中间，她落叶最迟……”

春儿虽然觉得这些谈话里面也有一定的学问，可是她只能点头，并不能从心里感到兴味。

六十三

春儿在这里过的是军事生活。每天，天还很黑就到操场跑步，洗脸吃饭都有一定时间，时时刻刻得尖着耳朵听集合的哨音。夜晚到时就得起熄灯睡觉，她没有工夫补习文化。有些课程，道理是明白了，可是因为记不住那些名词，在讨论的时候，就不敢说话，常常因为忘记一个名词，使得这孩子苦恼整天。为了记住它们，她用了很多苦功。

因为默念这些名词，她在夜晚不能熟睡。为了把想起来的一个名词写在本子上，她常常睡下又起来，脱了又穿上，打开书包抱着笔记本，站到宿舍庭院的月光下。

有时，庭院里没有月光，或是夜深了，新月已经西沉。她抱着本子走到大席棚里来，她记得那里的讲桌上有一盏油灯，里面还有些油。她把油灯点着，拿到一个角落里，用身子遮住，把那个名词记下来。

每逢这时，她的脑子很清楚，记忆力也很好。整个课堂里，只有她自己和一排排摆在黑影里的长板凳。席棚外边，有一排大杨树，一只在上面过夜的鹁鸪，在睡梦里醒来叫唤了两声。

在灯光下面看来，到学院的一个月里，这女孩子是削瘦了许多。她望着灯光喃喃的念着笔记本上的名词，当她记住了，她也就觉得困乏了。她想闭着眼休息一下再回宿舍去，可是头一低就睡着了。灯盏里的油也点完，灯头跳动了一下，熄灭了。

起初，她听见有人闯进课堂，绊倒了迎门的一条板凳，她还以为是在梦里。接着，她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：

“进来呀！”

“看急得你。”一个女的笑着说。

春儿立刻惊醒了，心里突然怦怦的跳动起来。

“连玩的时间都没有，我看不出在这里有什么好处。”男的说，“人们还一群群的奔这里来，简直是自找罪受！你过来呀！”

“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去叫我，真把我吓死了！”女的说。春儿听出是她班里的一个女同志，心里就更害怕起来。

“理由不是说过了吗？”男的说，“并且我就是爱上了你。”

“你是在威胁我。”女的说。

“威胁是爱情的集中表现，是发展的最后阶段。”男的说，“你为什么穿衣裳那样慢？”

“我们班里少了一个叫春儿的，我怕她回来看见了，看样子她又是一个党员。”

“怕她干什么？”男的说，“她一定也是出去打野食儿吃了，你以为她们都是些贞节烈女吗？他妈的，用大学的幌子把我们骗了来，却叫我们受大兵的训练，和一些野孩子们在一起。我知道你出身书香门第，受过的是教会办的大学教育，我们的身份教养相同，我们有相亲相爱的基础。”

“你是个流氓。”女的躲闪着，“这些早不是求婚的光荣条件了，现在人家爱的是工农老干部。”

“我并不想在他们这里呆一辈子，所以还是按照我的习惯找爱人，”男的扑过去说，“这才叫生活。”

春儿很后悔自己打了一个盹儿，就陷入了这样难堪的境地。当这一对男女站起来要走的时候，男的用命令的口气说：

“明天或是后天，有一个国民党的委员到这个学院里来。你要在女同学里串通一下，在委员来到的时候，表示热烈的欢迎，并高呼口号：欢迎中央派人来领导我们的学院。你一定要执行，从今天起，我直接领导你。”

明天或是后天，委员并没有来。学院正为一个新鲜的问题，争论的有趣。不久以前，有从鹿钟麟那边来的一个姓胡的教官，据说，他是一个左倾分子，受那边顽固分子的排斥，要求到我们这里来的。他没有担任正式课程，却主持了一种课外的讲座，就叫“生活讲座”。他背来很多马列主义的书籍，态度严肃，满嘴革命的名词，好像是一个很有理论修养的人。但细细听起来，他的唯物辩证法真是海派，他惯于添油加醋，他所作的比喻非常荒谬，他所有的用意非常下流。他从不用唯物辩证法去讲解革命和抗日战争，却常常去联系他个人的“生活”，甚至吃饭喝酒、聚赌嫖娼的历史。

这一次，他在学院的告示牌上，贴出来的新题目是：“自由恋爱”。许多同志认为：在紧张的军事训练里，这个题目会分散青年的政治热情，松懈他们的生活纪律，瓦解他们的战斗要求。但前来大席棚听讲的学生很多。又因为胡教官的颠倒是非的口才，拼命一般的叫喊，他竟能一战成功，被一些学生誉为名教授！

在他的讲演里，照例以革命的词句作引，然后引证了很多下流小说弹词和唱本上的故事，有时近于丑角的打诨，有时超过花旦的骚情。使青年们觉得：那些革命的理论，好像不是先烈的热血浇灌起来的

果实，不是无数次壮烈斗争积累起来的经验，不是为了阶级斗争，不是为了抗日胜利，不是为了社会改革和文化的发扬。一切都被他利用，成了他个人哗众取宠的阶梯，招摇撞骗的工具。

凡是真正为了抗日和革命来学习，并且有了初步判断能力的同学，都非常不满的退出了教室。春儿因为文化低，必修科目还学着巴结，她很少参加这些课外的讲座。但是“自由恋爱”这个题目，确实也打动了这个女孩子的心。她在课堂里挤满了人的时候，才偷偷的站在后面去听了几句。她立时认出主讲的教官，就是那天晚上为了反动的政治目的，玩弄了一个女同学的人。

他把问题反映给党的组织。回到宿舍，她就发起疟疾来。隔一天一场，冷上来浑身打噤，热上来想跳进水井。她用了一些土方子，藏到别处去躲，跑到野外去丢，但疟疾并不离开她，越来越重。这种病夺色夺力，几场过去，这女孩子就黄瘦得像蜡捏的人儿了。

她不愿意到学院的卫生所去打针。班长强迫她，医生也来劝告，她才勉强的去了。打过一针，病就显好，对医生也就非常信任起来，第二天就自动到卫生所去了。

汉奸张荫梧在衡水一带抢劫了农民的食粮，收

编了一些封建势力和土匪流氓混合的武装，又突然向北进犯，到了学院附近。

六十四

两个学院先后两期训练了将近五千个干部，那正是根据地非常缺乏有理论基础的干部的时候。这些干部投入实际工作以后，冀中区就转向艰苦的阶段，他们多数经过了考验，成了对革命有用的人。他们散布很广，几年以后，当有几位教官，从冀中出发，路经晋察冀、晋西北，到延安去的时候，一路上，不断的遇到他们的学生们。因为他们熟人很多，不被盘查，行军得到很大方便，同行的人就送给他们一个“活通行证”的称号。

三个月的学习期间，春儿也有很多收获。主要的：她理解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和持久战的方针；对于领导群众，她也觉得有些办法、有些主见了。学习初期，那些因人设课的“抗战地理”、“抗战化学”，她虽然听不大懂、记不大清，对于她也有启蒙作用，她知道知识的领域是很广大的。对于各式各样的人，对

于各种理论上的争执，她也有一些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了。

并且，当习惯了这个新的环境，心里有了底，学习有了步骤，她又慢慢胖了起来。眼下，她的像貌和举止，除去原有的美丽，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庄严。确确实实，她很像是一个八路军的女干部了。

三个月期满，芒种在军事学院毕业了，要回原部队上去。春儿成绩很好，学院留下她，当下一期学生的小队长。

芒种临走的时候，绕到旧州来看她。这几天学院正在青黄不接，春儿也有些时间，她请假送他出来。大队长问她：

“那个小同志，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我的一个亲戚，”春儿笑着说，“你怎么看着他小呀？他年下就要二十岁了。”

“现在才十月初，”大队长说，“离年下还远哩，同志！”

春儿先到学院附近一家小饭铺里，用她节省下的津贴费，买了几个油炸糕给芒种吃。然后，他们顺一条小路，去找通往城北边的大道。他们要通过一个大洼，大洼里是碱地，没有庄稼，只有一片片红色的草。在水坑里洗得洁白的绵羊群，躺在沙滩上晒着，阳光在这里，很明净也很强烈。一条小路弯弯曲曲通

过草地，伸延到前面的大沙岗。大秋已过，路上并没有很多的行人，道旁边倒有很多肥大的蚂蚱，被春儿的脚步惊起，飞几步就又落下了。它们都带着沉重的肚子，春儿不明白为什么它们不在那草丛中松软的泥土里生产，偏偏要找到这硬棒棒的道路上来？

“把你的被包给我，”春儿拉着芒种那打得整齐的被包上的带子，“我给你背一截路。”

“不沉重。”芒种说，“你背着我可干什么哩？”

“你轻闲一会儿。”春儿硬把被包拉过来，套在自己肩膀上，“看起来，你还没有我胖哩，被包带子怎么这样短呀？”

她用力拉着两个肩头上的带子，她的胸脯还是叫带子挤得高高的鼓了起来。

“勒死人了。”她说。

“来，我给你松一松。”芒种过去说。

“我不松。”她笑着奔跑到大沙岗上去了。

这条沙岗很高很长，站在上面也看不到它的头尾。沙岗啊，风从哪里把你吹来？什么年代把你吹到这里来？为什么把你吹到这里来呀？沙岗上树木不多，在通过沙岗的这条小路旁边，只有一棵黑树皮的高大的枝叶繁密的杜梨，它的叶子已经发红，今天天气还热，它的荫凉投到白沙上，就像在炎热的高山顶上遇到的一洼墨色的水泉。

“你回去吧。”芒种站住说，“把被包给我。”

“我累了。”春儿把被包放下，坐在树荫凉儿里，“我们在这里休息休息，我们要分别了，我要和你谈谈。”

“在这个制高点上，四下里走路的人都望得见，”芒种也坐下说，“可谈什么呀？”

“怕他们看见呀！”春儿低下头去说，“我们就好比到这里来站岗放哨的呀！”

但是很长的时间，她并没有谈什么。她拔着沙地上的野草玩儿。在她旁边，有一棵苍翠的小草，头顶上歪歪着一朵紫色的铜钱大小的花朵。虽然到了晚秋的时候，它才开放了这样小的一朵花，它那乳白的多汁的根，为了吸收水分和营养，向地下作了怎样努力的坚韧的探求呀？它的根足足有一尺多长。

春儿挖掘着白沙下面的湿土，拍成一个小窑，然后用湿土在手掌里团成一个个的小球儿，放在里边。在小窑的旁边，她又堆起一座小塔。

“上了三个月大学，”芒种说，“你会闹着玩儿了。”

春儿笑着把小窑小塔全毁了。她用力拍打着，用沙土筑成一个小平台，在平台上面，轻轻的整齐的插上三枝草花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芒种问。

“看不出来呀？”春儿抬起头来，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庄重的问，“猜一猜！”

“你弄的那个什么也不像，”芒种说，“这都是跟那些女学生们学来的玩艺儿，我猜不着。”

“这就是你的缺点，”春儿不满意的说，“笨。不好动脑筋。”

“我是有这么一个缺点。”芒种不好意思的笑了。

“这是一个香案。”春儿指着那个小平台，抚摩着那三根草儿，“这是三炷香儿，咱们乡下结婚的旧规矩。”

她笑着伸过手去，拉着芒种站起来，替他挂好被包，说：

“走吧，要不你就赶不到了，你看树影儿转到哪里去了呀！”

她站在沙岗上，望着芒种穿过一片梨树园，走到大路上去。有一架敌人的飞机飞了过来，它飞的很低又很慌促，好像是在侦察什么。

六十五

民运院第二期收生，变吉哥也被录取了。直到现在，他才脱下那破旧的长衫，穿上了全新的制服。可是，他脸上的胡子还是不常刮，下边的绑腿也打不紧，个儿又高，走起路来拿着穿大褂的架式，就很容易给人一个浪当兵的印象。

他学习很努力，讨论会上也踊跃发言，最爱和那些学生们争辩，参加课外的活动，他尤其热心。变吉哥常到担任“抗战文艺”的张教官那里去请教，非常热诚的去替张教官做一些事，在执行弟子礼上颇有些古风。

教官起初叫他给墙报画些小栏头、小插图，看出他有一套本领，就叫他画些大幅的宣传画，这样他的两只手上，就整天沾着红绿颜色。不久，学院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，他担任演员又管理布景，遇见音乐场面上没人，就抓起小锣来帮忙。他很能照顾那些女同

志，剧团里女演员又多，他实际上成了剧团的负责人。

现在学校强调联系实际，变吉哥的剧团常常跟着实习队到乡下去演出。他走在最前面，打着一面小红旗。其实他像一只远行的骆驼，他的身上，上下左右都背满和挂满了东西。在背后，那个装着大幕布的包裹上面，驮着他自己的被包，人们看着这被包上面很稳当，又赶上来给他加上一把别人不愿意提着的胡琴。到了村里，他放下东西，就去看地势，拿着铁铲帮老乡修整戏台，登在板凳上张挂幕布。他们演的戏都很短小，一天上午，要演出四五个节目，差不多每个戏里都有变吉哥。老乡们热情的犒劳他们，在戏台旁边烧了一大锅开水，用筐子背来一堆粗磁碗。变吉哥绝不感觉劳累，一到演戏他总像神附了体一样。最后的一个戏已经演完闭幕，台下的观众也要走散，他不换服装，也不擦去油彩，又慌忙的从幕布里钻了出来。他哑着嗓子，对观众们说：

“今天的戏就算完了，不早了，回家吃饭去吧！怎么样，大伯，你对我们的演出有什么意见？没意见，回去就照着我演的这个模范人物学习呀！”

“行了。”有的老乡回过头来说。

变吉哥已经攀到柱子上去解绳子拆幕布。

一些学生出身的演员，对于变吉哥这种演戏作

风，有些不满。他们认为这样絮絮叨叨，会减弱戏剧的实效。但看到变吉哥这样做，实在是出于过分的热情，并不是想闹个人突出，也就不好意思提出来，只有时和变吉哥开个玩笑，说他像在跑江湖卖艺一样。变吉哥听了，点头认可，并不以为这是讽刺，他以为大家对他的评价很是适当。

他说：

“我们要向那些人学习，学习他们苦学苦练的精神，学习他们联系群众的方法。你们见过那在庙会上变戏法儿的，在他打锣开场的时候，只有几个小孩子守着他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总不肯闲着，他叨念着和孩子们逗笑话。抖出一块白布来，在地下铺平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蛤蟆，放它上面跳几下，又收了进去。这都是为了招引人，在表演中间，在散场的时候，他都有一份和观众维系感情的诚意。使观众明知道戏法是假的，也还要掏出钱来，因为艺术是真的，感情是重的。在那旧社会里，凭一技之长，在人群里端碗饭吃，实在并不比今天容易！”

联系到过去的身世，说着说着，他竟有些伤感了。对于变吉哥，这只能使他对今天的宣传工作更加努力。下午，他又盘腿卧脚的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，编写明天演出的新词了。

他的窗外，有一盘石碾，这也像一个农民，每天

从早晨起一直忙到天黑。现在，有一位粗腿大脚的中年妇女在那里推碾。她已经推好一泡儿玉米，又倒上了一泡儿红粮。

这时又来了一个青年妇女，背着半口袋粮食。她的身段非常苗细，脸上有着密密的雀斑，可是这并不能掩盖她那出众的美丽。

“让给我吧，大嫂子！”她放下口袋喘着气说。

“你的脸有天那么大，”中年妇女笑着说，“我好不容易摸着了，让给你？”

“你是推糝子吗？”青年妇女问，“那我就等一会儿。”

“我推细面，晚上烙饼吃。”中年妇女说。

“那你就让给我吧，”青年妇女跑过去拦着她的笤帚，“我的孩子好容易睡着了，就是这么一会儿的空。”

“我就没有？”中年妇女说，“三四个都在村南大泥坑里滚着哩！你图快，就帮我推几遭。”

“呸！”青年妇女一摔笤帚离开她，“你这家伙！”

“我这家伙不如你那家伙！”中年妇女摊开粮食，推动碾子，对着青年妇女的脸说，“你那家伙俊，你那家伙鲜，你那家伙正当时，你那家伙擦着胭脂抹着粉儿哩！”

青年妇女脸上挂不住，急的指着窗户说：

“你嘴里胡突噜的是什么，屋里有人家同志！”

“同志也不是外人，”中年妇女说，“同志也爱听这个。”

青年妇女跺跺脚，背起口袋来，嘟念着：

“我是为的快交公粮，谁来和你斗嘴致气呀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中年妇女格登一声把碾子停了。

“公粮！”青年妇女喊叫着。

“你的嘴早些干什么去了？”中年妇女赶紧扫断了推得半烂的粮食，“你呀，总得吃了这不好说的亏！来，你快先推。”

青年妇女转回来，把口袋里的金黄的谷子倒在碾盘上，笑着说：

“醒过人味儿来啦！”

“我是看在那些出征打日本的人们的脸上，”中年妇女说，“这年头什么也漫不过抗日去！”

她头上顶着一个簸箕，左胳膊挟着一个簸箕，右手拿着笤帚，挺挺直直的走了。走了几步，又转过身来，说：

“大妹子，你可把米碾细点。你的汉子和我的汉子全在前方。他们穿的还是我们织的布，吃的还是我们种的谷。”

“你那高粱还推不推？”青年妇女问。

“不推了，这样贴饼子正合适。”中年妇女走着

说，“为了他们呀，我在家里吃糠咽菜也甘心！”

青年妇女默默的把谷铺好。她的身子很单薄，推着碾子有点吃力，天快黑了，有几只麻雀飞回来，落到碾棚的檐上，它们唧唧的叫着，好像在催促。

一个女孩子跑来。这女孩子穿的衣服很瘦很短，裤子又狠狠的往上兜着，身体显得格外结实俐落。她过去一帮手，大石碾立刻就轻快起来了。

“你不来，我着实费劲哩，”青年妇女高兴的说，“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样晚？”

“考试来呀！”小姑娘笑着说，“题儿很难答。我到家放下书包就跑来了。”

“回头和我一块吃饭去。”青年妇女说。

天黑了，她们要点着碾棚里挂着的小油灯，小女孩扒着变吉哥的窗台来借洋火。变吉哥问她：

“你和她是一家？”

“不是。”小姑娘说。

“你们经常互助？”变吉哥又问。

“嗯。”小姑娘笑着答应，“我这个嫂子是抗属，我应该帮她做活。你问我们这个干什么呀？”

“唔，”变吉哥说，“我可以给你们编写一个剧本。”

六十六

变吉哥也常常编写一些小剧本。

变吉哥编写的剧本，在题材上，虽然也不外是青年参军，妇女支前，拥军优抗，送交公粮，但是在他的每一个小戏里，都有真实的群众生活的情调。

他的编剧和他的绘画一样，并没有经过多少明师的指点，差不多都是自学自纂出来的。幼小的时候，他跟着一个堂叔父，在冬闲期间，学习过一本千字文，没有纸笔，他用镰刀在村边的土寨墙上习字。后来学习绘画，他才认识和积累了更多的文字。在他的生活里，凡是遇到印着和写着字的东西，他都非常尊重和珍惜，对于学习文字，他有超过一般人的热诚。村中街头上的公私告白，粘在人家立柜上的喜帖，他都认真的去读。流浪画庙的年代，对于那些用木炭或是粉块题在破庙墙壁上的诗句和谜语，尤其感到兴味，总是尽情的欣赏和批注。至于那些躺在道

路上的残断的古碑，庙宇里悬挂的匾额，他就更当做伟大的作品来仰慕了。

结婚的那年，他称了几斤旧报纸，自己裱糊的新房，乡间的画匠都兼有纸匠的技能。在风雨天不能外出的时候，他在炕上，仰着立着，挨篇挨段，读完了所有报纸上的文字。这间用废报裱糊的小屋，成了他的藏书库和文化宫，等到报纸被烟熏火燎，不能辨认的时候，他还能指出在屋顶上有一篇什么故事，炕头上有一则什么新闻。包了杂货的旧书篇页，他也是仔细的读过，然后保存起来。

他喜欢听人讲说故事，在外边画庙那些年，冬天的夜晚，他常常和那些小贩，同宿在山村的小店里。他有机会听到了很多很好的故事，有时也受骗。一天下了大雪，小店的炕上早早的就挤满了人，后来的一个卖线货的客人，只好蹲在地下，他看见变吉哥睡在热炕头上，很是舒服自在，就说：

“这样冷天，我们来说个故事吧？”

“你会说故事？”变吉哥一翻身坐起来。

“我会讲《西游记》。”卖线货的说，“平常忙着做买卖，我轻易不说罢了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”变吉哥催促着，“你快讲吧，人们一定爱听。”

“这样公平吗？”卖线货的说，“你们睡在热炕上，

叫我这说书的蹲在地下。”

“说的有理。”变吉哥说，“伙计们，那我们就给说书先生挤出—个地方来吧！”

可是，那些客人们都纹丝不动。他们好容易睡下了，宁可放弃听书，也不肯缩小自己既得的地位。

“这样吧，”变吉哥说，“你上来在我这个地方睡，我下去在你那个地方蹲着。”

他们换了一个位置。实线货的拿着会讲故事的架子，安排好自己的行李，慢慢的脱了衣服，钻进被窝里，眯缝上眼。

“你可讲呀！”变吉哥说。

“唔，”卖线货的说，“讲什么？”

“西游。”变吉哥在地下冻得直打颤。

“好。我讲。话说：唐僧取经到东天，骑着草白鸣哇大叫驴……”实线货的并不会讲故事，他不过借这个名义，骗取一夜的热炕，而且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，他终于生了气，说：

“我不会讲。你会讲，你就讲给我听吧！”

等到别的人真的讲起来，才证明他既不会讲故事，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鉴赏家，他睡着了。

变吉哥更好看戏，他能看到的只是在乡间跑大棚的那些戏班。只要戏唱得好，不分寒暑，他可以跑出二十里外去看夜戏。看完戏走回家来，天就亮了。

前些年，这一带来了一个唱青衣的，叫小出云。变吉哥看她看的入了迷，他制了一些卖给孩子们的耍货，跟着这个青衣跑了四个台口。戏班在一个地方唱完四天，当夜就坐上接戏的大车，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演出，有时竟在一百多里以外。变吉哥也就背上他那不值钱的耍货跟了去，耍货里有红油的小轿车、小皮鼓，黄油的小碌碡、小木枪，把它们摆在戏台旁边，做着买卖听小出云的戏。在这十几天里，变吉哥完全忘记了道路的远近和自己的饥渴。

他同情和帮助那些出门卖艺的人，年节时候，凡是街上来了唱独角戏的，唱十不闲的，说书为了卖针的，变戏法带着卖药的，都找他担任散筷子的职务。当演唱終了，再由他收回那些插满过年的饽饽的筷子，卖艺的人对他十分信任和感激。

六十七

十月，武汉失守。十一月，冀中区的敌情就很严重了。敌人在正面战场对蒋介石诱降，并在蒋介石节节败退的形势下，抽调大批兵力，进攻八路军，认为这才是它的真正的心腹之患。敌人又是先从东北角上蚕食，侵占了博野、蠡县，这次并用公路把据点连接起来。不久，深县也被敌人侵占了。

学院转移到深南地区。一天，变吉哥，春儿，还有教“抗战文艺”的张教官，接受一个任务，到滹沱河沿岸，慰问一支新来到冀中的部队。起初领导同志并没有告诉他们是什么部队。他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公路，要预先计划好可以依靠的社会关系。在路上，张教官提议第一天晚上，就宿在他的家里。

张教官家中有一个很好的媳妇，参加工作以后他很爱回家，每逢行军，只要向着他的家乡的方向前进，他就走着特别有精神，说话也多；如果是反着方

向，他就觉得腿脚沉重，因而也就沉默寡言。这次，他这样说服春儿：

“按说，我们的感情并不错。不过，她有些落后。”

“谁呀？”春儿正在望着前方警戒的走着。

“我的老婆。”张教官说，“她有些落后，不愿意出来工作。我们那里的妇女工作同志，能力很弱，她们说服不了她。我更说服不了她，她只是和我打哈哈。我好久就想：只有你能够帮助她进步。你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。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宿在我家里，你可以和她彻底谈谈。”

春儿笑了笑。张教官又说服变吉哥。变吉哥替张教官背着东西。他虽然道路不熟，却好跑在头里。也不爱打听，常常钻错了胡同，又退了出来，还是急忙走到别人的前面去。

张教官叫住他说：

“变吉，我知道你喜欢书画，可是因为生活条件不好，你见过的好书好画并不多。我家里书画很多，有一柳条包，还有一火柴箱。我也是个穷学生，隔二跳三的才上完了大学。我家里是一个富农。一个普通的富农，只能供给一个中学生，上大学就要省吃俭用，我这些书画得来的实在不易。你去了，可以翻着看看，对创作有帮助。我家里还有些颜色纸张，都是现时不容易买到的，我们可以拿出来用。”

变吉哥高兴极了。他帮着张教官说服春儿，春儿说：

“走着看。”

现在，田地里已经没有庄稼，眼界很宽。农民害怕敌人进村放火，把秫秸、棒子秸、谷草和豆蔓，分散的垛在地里，不往家拉。道路上很少行人，地里跑着很多野兔。抗战以来，硝磺贵重，就是在初冬，也再看不见有人在漫地里踢跫着打猎了。野兔们变得胆子很大，可以沿着道旁，和人们面对面的行走，等到你伸手去捉，它一闪就窜到柴火垛后面去了。

在黄昏时候，他们过了公路。应该记住，他们还是第一次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，通过敌人修筑的公路。天空很晴朗，四野里没有一个人，离公路还有好远，他们就快跑起来，跳过公路的封锁沟，变吉哥还跌了一脚，春儿走到公路中间，立住，向东西两方面张望了一下，她看见公路翻掘起家乡的土地，伸延过来，就像敌人在母亲的胸膛上，狠狠的砍了一刀，心里骤然的搅痛起来。

张教官的村庄，四面叫白沙包围，在本县的地图上，称做“沙漠”。原有几处树林，都被敌人砍伐了，今后几十年，在这一带就会看不见参天合抱的大树了。村边，正在刮着一个旋风，那旋风像一条直直立

起的长蛇，脚踏着白沙地面，头顶着晴朗的天空，它漫过小树，坟丛，沙岗，摧残着一切，滚滚前进。到了村庄的东头，忽然有一股黑烟火炆，卷进它的身体，其中夹带着哭喊的声音。

“情况不好。”张教官说，“我们在村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吧。”

他们跑到村西南的一座砖窑上来，一窑砖刚刚烧好，窑工们爬在窑道上，偷看村里的事变。

张教官认识这里的掌作张老冲。这老头子到这个时候还光着脊梁，白胡子飘洒在黑胖的胸膛上，抽着一条宽大的绣花围腰，站在窑顶后面。他指挥着张教官他们爬下，春儿感到身子下边滚热。

“我们的一个小队被敌人包围在村里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他们本来可以撤出来，也可以隐蔽起来。他们叫敌人的疯狂劲儿气坏了，就打了起来，敌人太多，现在是撤不出来了。”

窑工们都焦心的望着村里。打水坯的模子翻在坏场上，闷窑的水担和水桶扔在窑道上，他们关心的不只是自己家里的老小，现在主要的是这一小队战士的命运。

敌人早已经攻进了村子，但村子里很沉寂，除去不断升起来的烟火，简直听不到什么声音，也看不见有人往外跑，这种沉寂是可怕的。田野紧张起来，太

阳停在远远的村庄上面，收敛了光辉，像一块烧红了又离开了风炉的铁。窑的附近，就连那一排排整齐的水坯，一垛垛高耸的柴火，都像在那里激动着。

“我们的一个战士上了房，”老头子提高了声音说，“咳，他受了伤，他躺在房顶上了。”

别人却望不见。

“他没有命了。两个鬼子上了房。”老头子的声音低下来。接着，他喊叫，“好！他站起来了，他和鬼子拚了！”

人们听到了一颗手榴弹的爆炸，一家房顶上冒起一股黑烟。

村里又沉寂起来，那些房屋和树木好像僵直的一样。可是，街道上和房屋里正遇到了多大的灾难呀！

“跑出来了一个！”老头儿说。

这次人们都可以看见：我们的一个战士从村南头一条小胡同里跑出来，他的腿部受了伤，他不断的跌倒。有一个日本人追他。

“奔这里来吧！”老头子喊叫了一声。

那战士好像并没有听见，但是他奔着这里跑来了。日本人也跌跌撞撞的跟上来。战士的血滴在白沙上，窑上的人也可以看见。他挣扎到窑坑旁边，就倒在地上了。

日本人站在那里望着窑顶。

“我们不能放这个鬼子回去，他会报信。”老头子说。“战士身上有一枝枪，我们这里的人，谁会射击呀？”

望着那些窑工，他知道他们都不会，就叹了口气。

“我会。”春儿说着就从窑顶上滚下去了，她从战士身上摘下枪枝，在烂砖堆后面卧倒。日本人并没看到她。她瞄准的时间很长，最后枪声响了，老头子叫了一声好。

他们把战士埋葬在砖窑的附近。

六十八

他们等到天黑才进村。张教官的家是四合砖房，一个黑油梢门。他们到家时，张教官的父亲正要关门，看见儿子回来，有些吃惊也有些高兴，看见后边还跟着两个人，脸上又一冷，说：

“怎么你们就赶这么个日子？日本人刚走！家家拾掇了个落落翻，在东头烧了好几家的房子，杀了四五十口人。”

“我们还是往前走走吧！”春儿说。

“不要紧，”张教官的父亲怕儿子也跟着走，就说，“既然来了，就好歹在家里住一宿吧。敌人今天来了，明天不一定再来。家来吧！”

二门外边有一大架葡萄，月光从落了叶子的架上洒下来，使得庭院的景象阴森，人的心情不得安定。走进二门，张教官的老婆站在院子里，在月光照耀下，她那秀丽的脸上，带着亲切的笑容。

“给他们烧壶水喝。”张教官的父亲说，“赶上这个时候，家里也没好吃的。”

媳妇很怕难为了自己的丈夫和他带来的客人，她低声说：

“爹！你到东头老马那里称点挂面吧。”

“我去换点。”张教官的父亲，在一条蹲在灶火旁边的破麻袋里掏摸着，“卖挂面的掌柜就是喜欢这个，这一本，你看不厚，能换一斤。”

“那不是我的书吗？”张教官跑过去，翻着麻袋，“怎么都装在这里面？”

“再别提你这书，差点没叫它要了我的命！”张教官的父亲两只手抖擻着，“东头你姐姐家，就是因为几本书，叫日本烧了房！眼下，这是顶犯病的东西！”

他又从麻袋里掏出几本，一起夹在胳膊窝里出去了。

“这不是添了一大锅水，”媳妇掀开锅盖对丈夫说，“我们撕着烧了半天了。别说你看见心痛，我还心痛呢。我拣了几本硬皮好纸的，想留着当样册，还叫爹闹了一顿。”

“给我几本吧。”变吉哥蹲下身子挑选着，把自己的挎包塞满，又要过春儿的挎包，“我们背着它抗日去。”

“把我那些颜色和图画纸也给了他。”张教官对

媳妇说。

一会，张教官的父亲换了二斤挂面回来，又掏出几本，在手里掂量掂量，说：

“再去换点杂碎肉儿！”

这一顿饭虽然算是丰富，可是主人客人全吃得苦脸愁眉。

媳妇在外边拉着风箱，父亲蹲在旁边把一本本的书，撕碎了扔进灶火。他抱歉似的对儿子说：

“烧，也得晚上，白天就不方便。”

“把它埋了不好吗？”张教官说。

“埋在这里也是祸害。”父亲凄惨的笑着，“还是烧了吧。你以为我就不爱惜这个？这也是我地亩里的出产，一大车一大车的粮食，供给着你买来的呀！”

锅里的水大开着，沸沸跳跃着，女人拉着风箱，书的火烧得她心痛。她热爱自己的丈夫，结婚以来，他们还没有一个小孩。丈夫的书和画，她的花样和布头，曾经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珍宝。丈夫常常把新买来的书，和她新做好的针工，一同放在她的陪送妆盒里。现在是一把火烧了，不留一片纸。

越是烧到最后，她越难过。她站起来，擦擦眼泪，到自己屋里去了。她为了文化的遭厄，很是伤心，这个女同志，后来参加了抗日工作，当了一名油印员。到那时她才看到，在战争里，文化也和别的事物一

样，有一些是毁灭了。但是，抗日战争创造了更新鲜活泼、更有力量的文化。这就是那些用粗糙的纸张印成的书报。这些文化产生在钢板上、石块上；它和从来没读过书的人们结合，深入人心，和战争一同胜利了。

“把他那些制服也找出来，”张教官的父亲在外边紧紧拉着风箱说，“那也不能存着，李家就是吃了一条裤子的亏！凡是安袖的褂子，直缝的裤子，都包在一起，我系上块石头，趁着天黑，沉到村北大井里去！”

“嗯。听见了。”媳妇慢慢开着柜。

“还有他在外边照的那些像片……”父亲说着咳嗽起来。

六十九

在这个家庭里感受到的是一种非常低沉的气压。等到一切拾掇清，该烧的烧了，该沉的沉了，张教官的父亲才叫媳妇安排着客人睡觉。家里只有两条炕，变吉哥愿意张教官和媳妇去团圆一夜，那媳妇怎样也不肯，她把春儿拉到自己屋里去了。变吉哥、张教官，老人，三个人睡在西屋。

春儿和张教官的媳妇，早早吹灭了灯，可是不断的小声说话儿。这个媳妇给了春儿一个很好的印象。

“你认识字不？”春儿问她。

“小的时候，跟着哥哥念过一本头册。”媳妇说。

“在村里参加了工作没有？”春儿问。

“参加了妇救会，”媳妇说，“有时也帮着集合集合人儿，统计统计数目字儿，我不知道那叫不叫工作。”

“叫工作。”春儿说，“你为什么不出去？”

“出去是好，就是舍不得家呀！”媳妇说。

“你当家的在外边，舍不得谁呀？”春儿说。

“舍不得我这立柜、红箱、梳头匣子、镜子、花瓶、小吃饭桌儿；舍不得我睡觉的这条炕。”媳妇一边念叨一边笑，“庄稼主儿过日子，就是这么一堆呗！”

话音还没有落下去，街上忽然响了一声枪。

枪在街里乱响起来，听枪音又不像打仗，有的冲着天上打，有的冲着地下打，有的冲着墙，有的冲着看门子窗户。这是土匪绑票的枪音。

在临街的高房上，有人大声喊叫：

“枪子儿没眼，有事的朝前，没事的靠后！”

接着砰砰的就是一梭子子弹。

“这是叛徒高疤的声音！”春儿吃惊的说。

张教官的父亲，叫起张教官和变吉哥，开门跑出来，砸了媳妇的窗子一下，就都上房跳到村子后面去了。

媳妇拉着春儿出来，说：

“我们也从房上跑，后面就是沙岗。”

她扶着春儿上了小耳房，春儿刚要回过身拉她上来，从西邻的房上，跳过一个土匪，端着枪问：

“别跑，谁是女学生？”

春儿没答话，转身就往下跳，一枪打过来，子弹

贴着她的耳朵穿过去。

春儿栽到沙岗上，荆棘刺破了她的手脸。她等候那媳妇跳下来，她听见一声尖叫，那媳妇叫土匪捉住了。

街里，枪声夹杂着乱腾腾的叫骂、哭喊、哀求。土匪们架着绑住的人往村北去了。

春儿赶紧藏到一个刨了树的土坑里。土匪们从她身边走过去，到了最高的沙岗上，放了一声枪。春儿听见高疤打骂那些被绑的人：

“喊叫！叫家里拿现洋来赎你们，你们都是抗属，不然就毙的你们这里！”

沙岗上接二连三的喊叫起来，里面也有那媳妇的脆弱的声音。春儿心里多么痛苦啊，那媳妇是为了让她快跑，才晚走了一步。不然，是会跑出来的。这是高疤新从张荫梧那里学来的政治绑票吗？

高疤不断往村里打枪，过了好久，从村里出来一个提着灯笼的人，一边走一边大声咳嗽：

“朋友们！我是烧窑的张老冲。我给你们送钱来了。这不是，放在这棵大臭椿树下边了。”

“多少？”高疤大声问。

“四八三百二。”张老冲说，“白天刚叫日本抢了一下，硬货实在太缺。”

“你当过牲口经纪，连行市也不懂？”高疤喊叫，

“牵你一条骡子，你得给多少？”

“咱们赌场上不见，酒场上见，”张老冲说，“看我的面子！”

“你这老家伙，还有什么面子！一个票儿再添二十，少一个，就叫他们抬门板来吧！”

这是一个女人。春儿听出是俗儿的声口，差一点没有呕吐起来。夜猫子叫的难听，如果一只公的和一只母的在一个桌面上唱和起来，那就更要命。

“女镖客！”张老冲打着哈哈，“在团长面前，你该给我帮个好腔才是，怎么还打破桃？”

“那就放下吧。”俗儿说，“你回去告诉村里，高团长这回不是绑票，是筹划军饷。”

“是。”张老冲提起口袋来摇了摇，洋钱在里边哗哗的响着，说，“过来拿吧！”

高疤过来提上口袋，喊叫了一声，又放一阵枪，就带着他的人马奔公路那里下去了。

张老冲打着灯笼，在一个拔了坟的大坑里，找到了那些遭难的人，给他们解开绳子。

春儿回到家里，那媳妇扑到她怀里痛哭着说：

“你带我出去吧，家里呆不得了，我什么也不要了。”

张老冲提着灯笼，对张教官的父亲说：

“不要难过。咱们宁叫财帛受屈，不能叫人受屈。”

钱财是倘来之物！不过，我要说大兄弟一句：可能是你拿书换杂碎肉的时候，走漏了风声！”

听说春儿她们要走，又自报奋勇，送她们一程。他对春儿说：

“女同志，昨天有幸，我们见过一面。我自己再介绍一下：我叫张老冲，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好赖人儿。好事儿里面有我，坏事儿里面也有我。我认识高疤，我可不赞成他。这叫什么，日本人刚刚放火杀人走了，他们就来绑票，这叫趁火打劫！还说什么筹划军饷！这算什么军头？我，可也不是什么正经人，我从小赶趟子车，后来当牲口经纪，现在烧窑，也拉过宝局，也傍虎吃过食儿。可是我赞成抗日。高疤这回专绑抗属，又图财害命，又破坏抗日，证明他心肝都黑了，以后我就不招惹他，你们可别把我也看成他们一起。”

“你们村里那些民兵哩？”走出村来，春儿问。

“唉！”张老冲说，“从一修公路，日本人又这么一闹，村里的工作有点儿泄气，同志，要打几个胜仗才行啊！这也不能怨老百姓，谁经过这个年月？可是，我们不能悲观失望。当一辈子人，顺水能鳧，呛水也得能鳧。看事情，就像交朋友一样，要往长远里看。当人家红火了，你才看见人家红火，那不算能耐；在他不红的时候看出他能红，这才算眼力。你们别看我

无二八非了一辈子，我可不是个轻易就随风转舵的人。你看高疤今天夜里横不横？四条人命在他手心里攥着，愿意打就打，愿意骂就骂，别人不敢吭声，这算不算威武？可是我说他不行，他一百个不行，他没有好结果。日本人就不用说了，那更是暴横绝短。可是，依我看，它像我们村边常常刮着的旋风一样，谁也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起来，只要留心，谁也能看到它的灭亡。它旋的越凶越快，消灭的就越麻利。日本没有根，它是没头没尾的旋风，在中国地面上做梦。它虽说找到了高疤这些人，这些人既是我们这一带的败类，就绝不会成事。反过来看，我们八路军找到的净是些什么人，这些人，是这一带地方的真正的财宝，结实的根。从人上看，八路军一准能成事。看见日本人修了一条公路，烧了几间房，有几天看不见八路军，或是看见八路军打了一两次败仗，就说抗日不行了，我绝不相信这个。天南海北，我哪里也去过，什么人物我也见过。我见过品正操吕司令。我见他，不是在他带领了多少支队，手下又有多少司令的时候。我见他，是在去年七月间，他不愿意南撤，带着一支小队伍往回翻的时候。那时候，人们每天看见的是队伍往南逃，谁也没想到队伍会往北开。我正在安国东长仕庙上拉着宝局，一天晌午，我站在那大庙的山门高台上吹凉风，看见他带着队伍从正南下来了。

这队伍，鞋袜不整，脸上都有饥色，走的实在又困又乏。吕司令走在前边，脸晒得很黑，步眼很大。他看见我站在庙台上，就问：老乡！这是什么村庄？离城几里？我说：东长仕，离城八里。吕司令叫队伍站好，在我站的那个大石牌坊下边讲了几句话。这一段话，直到现在我还记得。这段话是说我们要抗日，就不能怕艰难；我们的力量虽然小，可是有群众支援。他讲的很短，可是力量很大，我看见那些军队立时精神起来，结了结鞋带，就奔安国去了。到了县衙门口，把两门子小炮一支，就收编了伪商团一百多枝枪，这队伍越闹越大，后来打着野外，在十二村解决了土匪高建勋，我都亲眼见来着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认定吕正操这个人，行！”

老头子一路话语不停，送出春儿她们十里。

七十

天明的时候，春儿她们到了滹沱河边。使她们兴奋的是：她们已经知道，她们前来慰问的部队，就是那传说和盼望了很久的，贺龙将军带领的一二〇师。

更巧的是：司令部就驻在春儿的家乡子午镇。她们在村东头一家贫农的北屋里见到了贺龙将军。突然见到他，她只顾得浑身打量，好像在这位将军身上，每一个地方都带着红军时代的灿烂的传说，都是那些出奇制胜的英雄故事。

将军很是和蔼可亲。向她们致谢以后，他首先关心的是她们身体的健康。问到学校里的伙食，问到她们除去军事科目，平时还有什么运动？

她们还见到了周士第参谋长，参谋长站在悬挂着的一张军用大地图旁边，给她们详细的讲解了目前敌后战场上的形势。她们虽然缺少军事经验，也能预感到：随着这些英雄人物的到来，一场新的激烈的

战争风暴，就要在她们的家乡开始了。参谋长告诉她们：敌人好像发觉我们的主力过来了，情况变化得很快，叫她们先不要离开司令部，编成一个民运小组，跟着部队转移。可是，晚上还从容的召集了一个交流经验的座谈会，主要是请她们介绍了冀中区的风习和人情。

慰问了自己的部队，见到了红军时代的人物，是春儿生平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。她想：她出生的这个村庄，有机会驻扎了这一支革命劲旅的首脑机关，它一定也感觉着光荣。

春儿和变吉哥都到家里看望了看望。春儿家里也住着一班战士，他们看见自己部队上的客人，和这家房东这样熟识，最初还有些奇怪哩，后来才知道是春儿的家，战士们笑着说：

“好呀！这么一来，你这个女同志，就不是我们的客人，快来招待我们吧！”

乡亲们偷偷的问春儿：她会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司令？春儿保守军事秘密，只是笑着说：这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，一位很能打胜仗的将军。乡亲们虽然闹不清将军到底是谁，可是他们知道：这一准是真正老牌的八路过来了。

一开始就是紧张的行军。春儿还没经历过这样的行军，行军是从每天黄昏开始，宿营是在第二天的

早晨。她们编列在一支队伍的后面，一走起来，就得跟着紧跑。队伍走开了，真像一条龙，它忽东忽西，忽南忽北，有时，使得春儿她们这些本地人，也闹不清方向，只是跟着紧转。只有在第二天驻下的时候，一打听村庄的名字，才知道又出来了一百几十里。

是连续的行军。最初几天夜里，春儿是累，是腿痛，是害怕掉队。后来，也就习惯了。每天黄昏出发的时候，她觉得很有精力，脚步跟得上，也就用不着那样紧追紧赶了。行军到了黎明，才是最困最乏的时候，她常常是走着路就做起梦来了。

到了宿营地，太阳升起来，坐到大场边上就不再愿意动弹。可是她们的任务，正是要在这个时候完成。部队上的口音，老乡们听不清，有些风俗习惯又不相同。她要帮助管理员去找房子，借东西，要粮要草。她要向老乡们动员解释。等大家都进了房子，火房里把米下了锅，她才能去休息。

敌人从东西两线向根据地压迫，调集了很大的兵力，跟在一二〇师的后面。

一二〇师好像并没有和它一决胜负的意思。这支部队只是在敌人的空隙里穿过，攻击敌人的弱点，在根据地的边缘打着回旋。这支部队也不是单纯的行军，它有很大的政治影响，有很强的吸引力量。它刚刚进入冀中的时候，听说只有两个主力团，现在它

一路行军，一路扩大，谁也不知道它已经增加了多少倍的人马。

跟着这支部队，春儿走遍了冀中区。在平汉路一带，村庄很大很密，水车园子很多。定县境内，小小的清凉的水沟在村边绕过，用手就可以捕捉那潜藏在芦苇根底下的小鱼。在津浦线附近，地形宽阔，村庄很稀，农民们住在那零散的黄土筑成的小屋里，村外大洼里是一丛丛的红荆，天空里盘旋着大鹰。

她渡过了家乡的不同姿态的河流。夜晚，她跟着部队，在一个灯火繁多的镇上，通过子牙河的木桥。再往东，沿着红土河身的运粮河，它两岸都是长满了肥大白菜的园地。有时候，她蹚着沙河的清澈的浅水，一直走到西边的铁路，看看就到大山的脚下，然后又返回东北，宿营在雾露很重的大清河边。她无数次在奔腾的河流上，小心的走过颤动的浮桥，她的身影和天上的星月，一同映进碧绿的水流。有时候，她静静的站立在河岸上，等候那集中起来的、穿梭一样摆渡的船只。

亲爱的家乡的土地！在你的广阔丰厚的胸膛上，还流过汹涌的唐河和泛滥的滹沱河。这些河流，是你身体里沸腾的血液，奔走和劳作的动脉！是你的奋发激烈的情感，是你生育的男孩子们的象征。你的女儿是沉静的磁河和透明的琉璃河。她们在柔软的草地

上流过，娇羞得不露一点儿声色，她们用全身温暖着身边的五谷，用乳汁保证了田园的丰收。她们摇动着密密的芦苇，飘载着深夜航行的小船，她们给了人们多少慰藉和恩情啊！看见她们，就看到你的美丽，也看到你的孕育的伟大和富庶了。

春儿经过号称金的束鹿和号称银的蠡县，这里丰产棉花；她到过叫做小苏州的胜芳，那里著名的是荷菱鱼稻。农民们用秋收的新粮，供给过往的部队。

行军当中，她可以听到各个地方的民间小曲。家乡啊！你的曲调是多么丰富，为什么一枝横笛，竟能吹出这样繁复变化的心情？原来只是嫁娶时的喜歌和别离时的哀调，现在被保卫祖国的情感充实激发，都变得多么急促和高亢了啊！

黎明的时候，春儿远远望见过定县的古塔，正定的大佛，起伏在大水洼里的曲折的十二连桥。

她望见过大城市里的不安的灯火，听到过人民在那里受难的呻吟。

家乡啊！一支曾在几次反“围剿”战斗里立下威名，经过雪山草地上的千辛万苦的部队，正在你的富饶的土地上，急急忙忙连续不断的行军。

深夜里，春儿看见过那骑在马上将军。他们有时停在村庄的边缘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掩遮着一个微小的光亮，察看地图和指示向导。他们骑马走在队伍中

间，春儿不知道在他们前边走着的有多少人，在他们后边走着的又有多少。有时他们闪在一旁，让队伍通过，轻声安慰和鼓励着每一个人。到了宿营地点，战士们都睡下的时候，他们又研究敌情，决定行程。

仍旧是长距离的方向不定的急行军。春儿跟着部队，每天夜里，就又要经过无数的村庄，听着一起一落的大吠鸡鸣，听着妇女们在夜间操作，因为各地的出产不同，她们有的泡制皮革，有的编筐抱篓，有的织造铜丝罗。

各个村庄的民兵都在集合，深夜里，区村的干部们还在工作。所有根据地的人民，站在门口，兴奋的欢迎他们，把必胜的信念，寄托在自己的主力部队身上。

她听到铁锤叮当的声音。在一处背静的街道里，她看见一座打铁炉燃烧着，火苗闪在油黑的大风箱上。在火光里，那系着破油布围裙的，来自冀南或是山东的铁匠们，正在给农民打制破路的铁铲小镐，给民兵们修制枪枝地雷。就是在阴雨连绵的夜里，炉火也不会熄灭，铁锤的声音也不会停止。

家乡啊！你儿女众多，你贡献重大，你珍爱节操，你不容一丝一点侮辱，你正在愤怒！

七十一

大敌当前，在家乡的土地上，存在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，人民的斗争就复杂和艰难了。

敌人的进攻方略，在张荫梧这些磨擦专家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呼应。当敌人的军事行动显得非常嚣张的时候，张荫梧提出一个口号来：“变奸区为敌区”。敌人进一步引诱他，对他表示友好，把“剿共灭党”的口号削去一半，只剩下“剿共”一条。张荫梧紧跟着又感恩的喊出“反共第一”。敌人因为获得了这样忠实的汉奸伙伴，就在北平开了一次庆贺大会。

高疤叛变了八路军，张荫梧写了一篇文章，大加称赞，这篇文章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了，敌人的报纸也全文转载它。可是张荫梧对待高疤，就像他对待那些“礼义廉耻”的词句一样，也是用来一把抓，不用一脚踢。他对高疤的队伍没有供给，也不指明防

地，叫他利用环境，自己找饭吃。高疤完全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。

当八路军和日寇在平原上转战的时候，高疤在这一带空隙里狠狠抢掠了一番。但是，高疤也能看出来，在人民武装日见壮大的形势下面，这绝不是长远的办法。有一天，他听说张荫梧为了配合敌人修好通过滹沱河的公路大桥，来到了五龙堂，他就带着他那一小股人马过河找上前去，追索给养。张荫梧起初不接见他，高疤在村边开了火，张荫梧才叫人把他带进来。

张荫梧住在五龙堂西头一处比较整齐的砖瓦房舍里，这是高翔家的宅院。

这个军队最初住进来，高翔的父亲赶集去了。这班人马既不通过村干部，又不招呼主人就涌进了正房。高翔的母亲看着不对路，赶紧叫高翔的女人躲到邻舍家里去，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支应着。
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高翔的女孩子在房后边场院玩得饿了，回到家来拿饽饽吃，她一路上唱着歌儿，手里托着一个鸡毛毵儿，她看见家里住了军队，心里很是高兴，因为这些日子打仗，八路军好久不来村里住了。她跑近在房门口站岗的那个马弁身边说：

“叔叔，你给我带来胜利品了吗？”

“小丫头子，什么胜利品？”那马弁瞪着眼看着她

问。

女孩子听着口气十分不对，她仔细看了看，这个人穿的是中国军装，她还是愿意和他亲近亲近。她又问：

“你见到我父亲吗？”

“我知道你父亲是黑的白的！”马弁轻蔑的说。

女孩子心里很是委屈了，她听见奶奶在西屋里叫她。但是，她还没有完全失望，她愿意再给这个士兵解释一下。过去那些八路军叔叔们，听到这些话，就会亲热的把她高高举起来的。她说：

“我的父亲叫高翔，是一个支队的政治委员哩！”

“啊？你这个该死的小八路！”那个士兵做个狠狠的鬼脸，把女孩子差点儿吓哭了。

她非常纳闷，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军队？她呆呆的坐在西屋的台阶上冷眼观察着，又到街上去看了看，后来她明白了，这是另外一种军队。他们到来，不只人们插门闭户，街上冷冷清清，连院里这些鸡狗，也在惊惶的躲避他们，她也赶快躲到屋里去了。

高翔的父亲在集上听说家里住了中央军，东西没买好就赶紧往回返。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又知道自己儿子和这帮人是死对头，一路上心里很是不安。这样冷天，棉袍叫汗水湿透了。

当他走进家门，张荫梧正在房里和石友三、高疤

会议。庭院里和台阶上布满了马弁卫兵，穿的都是灰色服装。现在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，前院里一棵大槐树上落下了两只鸽子。这是一雌一雄，它们还没来得及看清庭院里的变化，和往日一样，在阳光下面，忘情的追逐着，嘀咕着。一个卫兵走过来，掏出小手枪，简直是没有声响的就打落了一只，同伴们围上来，称赞他的枪法。老人看见心爱的鸽子躺在地下，哭丧着脸，走过去拾起来。卫兵瞪眼说：

“放下。这是我的猎物。”

老人只好扔下，苦笑着走进二门去了。打死的是一只雄鸽，那只雌的像断线的风筝一样，在高高的天空里，翻腾号叫，然后不知道飞向哪里去了。

老人回到西屋里，低着头对坐在炕上的高翔的母亲说：

“听说儿子负责咱这一个分区，就住在近处。”

“快给他捎个信去！”老太太脸上立时布满了笑，“叫他带兵来把这帮子匪类打出去！”

“他那么听你调动？”老人说，“他的军队是打日本，叫你一说，那不成了内战？”

“那你就出去应酬这些阎王爷吧，”老太太气愤的说，“你可要小心点。真是，一块地里能长五谷，也能长蒺藜和刺儿棵！”

今天是张荫梧主席，在北房外间，高疤坐在一个

末座上。张荫梧不停的在桌子头起那块不大的地方转动着，有时回身把一只肥厚的手掌用力抵到糊着粉纸的墙上，有时把两只手挂在大方桌的边沿上，悬起他那牛犊一样的身体。

石友三正在发言，他说：

“和日军联络问题，在兄弟这一方面，有几条线索。兄弟和保定的特务机关长有旧，前些天有信来，他的意思叫我们直接和平津联络，我打算叫我的兄弟友信到北平去一趟。”

“很好。”张荫梧说，“要利用一切关系。我们的同乡、同学、同事，凡是和日本有来往的，都叫友信联络一下。多带一笔钱去不算什么。”

“我建议，”石友三说，“我们应该精诚团结。”

“这你还怀疑吗？”张荫梧说。

“不然。”石友三沉下脸来说，“我这位兄弟友信，跟我多年，很有功劳，这次到河北来，我委了他个县长。前些天上任去，听说已经有四个县长在那里争吵不休。”

“有共产党派去的？”张荫梧问。

“没有。”石友三说，“都是我们派去的。”

“民政厅委派了一个，省政府又委派了一个。”张荫梧说，“我想以后委派人的事，还是大家提出名单来，由民政厅统一掌握才好。”

“还有一个，听说是什么专员委派去的。”石友三说，“那我就更有权利委派两个了。”

“一个是我委派的。”坐在对面的田耀武站起来说。

“听说你委派去的那个，是个混蛋！”石友三喷着唾沫说。

“不要争了。”张荫梧说，“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扩充我们的地盘。我们是混世魔王，在时间空间上，都得有充分广阔的天地。希望大家努力完成这次决议的任务。”

散会以后，张荫梧和高疤谈了一次话。在座的有田耀武。

“你来要求什么？”张荫梧问。

“补充和给养。”高疤说。

“我不能生孩子给你添兵；也不能种地打粮食给你添饷。”张荫梧说，“兵和粮食，你和老百姓去要。”

“老百姓不给我们。”高疤说。

“你的手段哩？”张荫梧说，“道路多得很，你要灵活点。”

“上级的军令军纪呢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呀！”高疤说。

“笑话。”张荫梧说，“军令军纪是对八路军说的，你是什么？”

“我们可以换上皇协军的臂章吗？”高疤问。

“等我联络好了就换。”张荫梧说，“你记住，和日本友好，是我考虑好久得出来的上策，谁也不要怀疑。可是要做得秘密，不要给八路口实。你自己想想，自从你投靠我方，出力很小，影响很坏。我所以宽容，只是希望你以后能有些成绩。”

“希望总指挥多指示，”高疤说，“目前我们实在困难。前次遇到日本，因为条件没讲好，他们把我骑的马也抢了去，我要求总指挥发给我一匹好马。”

张荫梧没理他就出去了。

“高团长，”田耀武抬起头来说，“你不要碰日本，那不会有好处的。”

“我哪里是碰他？”高疤说，“就是老躲，也有个躲不及呀！”

“你以后不要躲，要向他身上靠。”田耀武说，“我再向你说一次，我军北来的目的，绝不是为了抗日。这些好名声，叫别人去承受吧，对我们并不要紧。我们的职责是消灭共匪，这样就必须和日军协同动作，你好像对这个根本道理，并不十分明白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高疤说，“从那天跟白先生到你这里来，他就给我讲清了。投靠日本，也得有些人马枪枝呀，凭我这一群，日本也不一定收留。”

“收留的。”田耀武说，“就像我们当时收留你一

样。这当然不是军事上的胜利，可也是政治上的胜利。”

七十二

高疤顺便又向田耀武要求补充和供给。田耀武说，他更没有办法，自己只是一个空头专员。他给高疤出主意，叫他多利用家乡关系，把俗儿还放回子午镇去，探听一些八路的消息，联络一些反共的力量，还可以完成一些其他的任务。高疤只好答应了。

高疤从正房里出来，天已经快黑了。他的情绪很不好，低着头。当他走到前院的时候，老房东的长工正慌慌张张牵着一匹青马到槽上去，高疤立时精神起来。

“这牲口什么口？”他问。

“是个马驹子。”长工说着，赶紧把马拉到屋里去。

“好玩意儿。”高疤打量着马匹的后腿说，“这样热天，你为什么不把它拴在外面？”

“它不老实。”长工拴好牲口，关上门出来说，

“院里住着队伍，踢着人了，不是玩儿的。”

“不是为那个。”高疤笑着说，“你是怕军队要了你的马去，你把它藏了起来。好，你把门上再加一把锁就更严紧了。”

高疤在院里站了一会，四下里观望了一下。他一直和那些马弁们混到夜深。

半夜里，长工开门喂牲口，青马不见了。他跑来告诉主人，差一点没把高翔的父亲气挺在炕上。

“我怎么说来？”老人斥责长工，“不要在这些队伍面前牵出牵进。”

“牲口渴的不得了，天黑了我去饮它。”长工辩解道，“回来遇到一个官儿，他还劝我把门加上一把锁。”

“那个官儿就是高疤！”老人说，“你以为他们是什么真正的大老爷吗？”

“可是门窗全没动。”长工叹口气说。

张荫梧晚上招待石友三，丰富的筵席上，又增加了一盘清蒸小鸽，使得主客都非常满意。饭后，两个人促膝谈心，夜深还没睡。

“在这里吃到野味实在不易。”石友三说。

“这是我那卫兵们孝敬的。”张荫梧说，“他们常出去打只野兔、野鸡儿什么的，拿回来叫我吃。”

“平原上也有野鸡？”石友三吃惊的问。

“有的。”张荫梧说，“你知道，我是不允许我的卫队偷鸡摸狗的，这样才能给部队树立起一个模范。可是，这些大兵有他们变通的办法，他们把老百姓的鸡，从窠里轰出来，赶到野外去，这样家鸡就变成了野鸡！在目前这样混乱的局面下，我们也不好管教得过于严紧，这就叫做行为不轨，情有可原吧！我这个厨师傅也真好，他曾经给袁世凯做过饭，对袁大总统的故事知道得很多，我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学问哩。”

出其不意的，老房东走了进来，张荫梧说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有一匹牲口丢失了。”房东说，“请总指挥给我查点查点。”

“你那意思是说我的部下偷盗了你的牲口？”张荫梧变色说。

“我不敢那么想。”老房东说，“我只是求求总指挥的情面，帮我找找。”

“丢了东西，要报告区县。你们县的县长，现时就住在我的对门。”张荫梧说。

老房东只好站在一旁，不敢再说。

张荫梧的面色却渐渐缓和下来，他转身对石友三说：

“这位房东原来是个洋布庄的经理。他的儿子就

是大名鼎鼎的高翔政委。高翔曾经在四存中学上过学，现在八路那边。”

“那只是传闻，”房东说着要退出去，张荫梧把他叫住，说：

“老先生，有这样大名气的儿子，还瞒得住人？你的儿子是我的学生，虽然他在八路那边工作，我们还是师生。我希望他能幡然改悔，来我们这里做事。因为和高翔有师生之谊，我和老先生的关系，也就非比寻常。荫梧侧身戎伍，出身翰墨。我的家乡博野，曾经出过两位圣人。我办四存中学，就为的使礼义廉耻的观念，得到继续。这次奉蒋委员长命令，率队北上，也是为了反抗共党，解除老先生们这些殷实户主的苦痛，数月以来，孤军奋斗，备尝辛苦。老先生，你的儿子和你讲过阶级斗争吗？说实话，按照马克思的学说，你和我才算是一个阶级，我们应该站立在一条战线上。如果共产党得了势，他们就要分你的地，拆你的房，还要开大会斗争你。这二年，虽说你是政委的父亲，在村里大概也尝到一些苦头了吧？老先生应该体会我们来此地的本意，和衷共济，尽力支援。现在居然对我军这样看法，荫梧实感遗憾。”

张荫梧说着话，眼睛死盯着高翔的父亲，嘴角上挂着森冷的微笑。他的话，有些确实激起了老人内心的波澜，但是，面对着这种现实，这波澜很快就平息

了。很久以来，老人确实为他的产业担过心，经历了多少不眠的夜晚，痛苦的矛盾的纠缠。但他明白：中央军是不会抗日的，如果当了亡国奴，那就不只是财产的问题。至于将来的事，他早已想通：脑袋破了用扇子搨，就只当是万贯家财叫儿子糟了，管不了那么多！因此，老房东说：

“总指挥，这牲口的事情，我自己认倒霉吧。可是白天我亲眼看见你的卫兵打死了我那心爱的鸽子。我希望你能约束一下你的队伍。”

“不会有这样的事！”张荫梧横眉立眼的说，“我马上就把队伍集合起来，你指出那个人来，我立刻把他枪毙。”

“唉唉，”老房东说，“为了一只鸽子，我敢老虎嘴里掏食儿去？我不敢闯那个祸。天不早了，总指挥早点休息吧。”

老人回到西屋里，坐在炕沿上，半天没说话。高翔的母亲早钻了被窝，说：

“明天再想法儿，先睡觉吧。”

“这就是有些人想念的中央军！”老人说，“看起来，咱那儿子的说法，真对！”

他无可奈何的脱了衣裳，刚要睡觉，又听见张荫梧住的正房里吵闹起来。他爬在窗台上，贴着窗户纸听着。老太太也爬起来听。正房里来了什么紧急报

告：

“报告总指挥，东面十几里一带村庄，来了一小队汉奸，挨家抓民夫修路。”

“叫他抓就是了。”张荫梧的声音。

“有些乡绅来请求我们保护。”报告的人说。

“不要理他。”张荫梧说。

“弟兄们都愿意打。”报告的人说，“敌人兵力很小。”

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？”张荫梧说，“告诉士兵们，谁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，我就把谁枪毙。”

“这样我们会失掉人心。”报告的人小声说。

“混蛋！”张荫梧说，“失掉什么人心？你以为人心在我们手里吗？”

“假如那些人再向这边进攻哩？”报告的人问。

“那我们就再向西退却。”张荫梧说，“战略原则不能动摇！”

报告的人匆匆走了。

不到天明，张荫梧的司令部就从这个村庄向西退走，老婆子听见人马乱搅搅的从院里走完，合起手掌念了一声佛。

“可走了！”她说。

“日本也就要来了。”老人叹气说。

七十三

当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，一二〇师，用一个团吸引住敌人的主力，往死里拖，然后用全部力量包围上来，坚决、猛烈的歼灭了它。敌人有生以来还没见过这样严重的阵势，它着急施放毒气，也没得逃过死亡。

战斗结束以后，虽然敌人还占据着一些县城据点，冀中区的局面和人民的心情已经稳定下来。地方部队经过这一次战争的学习和考验，也能够逐渐在各方面适应新的环境，壮大自己和保卫根据地。一二〇师不久就奉命转移到山地去了。

春儿她们接到通知，学院暂时结束，张教官和变吉哥调路西参加文化工作，要回家准备一下，头两天先走了。春儿留在地方工作，她在区党委那里办好手续，想看看芒种，没有找见，就一个人回县里去。

整个的冬天和青年人一向迷恋的旧历年节，今

年是第一次在战争中度过了。现在已经是春天，严冬的痕迹，除去披在春儿身上的破军装棉袄，就是在田野里也很难找到了。麦苗油绿并且长高起来了，很多雁群在大洼的麦地里啄食和过宿，在浅沙上留下连环的竹叶形状的爪印子。有的小桃树得天独厚，这样早就在一棵大柳树下面开花了，柳树长在一眼大井的旁边。田野里到处是驴马拉动水车的响声，改畦的妇女们倚着铁锹的种种姿态，黄雀在榆钱里穿动的尖厉的叫声。小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沙岗上翻跟头，姑娘们只穿着一身单衣，还觉得浑身躁热。在战争的空隙里，根据地的人民劳动生息，就是在黄昏黎明，谷垛底下，麦苗垄里，也不断爱情的追求。

晌午的时候，春儿走到安国县城南二十五里有名的大镇伍仁桥。还离北寨门很远的时候，春儿就听到了集市上骚动嚣乱的声音。从这些声音里，可以分辨出大粮食市那里的过斗的呼喊，牲口市那里的对蹄腿快慢的褒贬评价。这些买主和卖主，好像不是赶集做交易，而是进行着一场严重无情的斗争。经纪已经说好价钱了，因为一句话不合，卖主又抱住粮食口袋，不让过斗；或者是牲口已经牵在买主的手里了，卖主又搬着小牛的犄角硬把它夺回来。

自从敌人占据了一些县城，我们就把商贩动员到四镇上来。各处的抗日集市越赶越大，伍仁桥的四

九大集，一到中午，就到处拥挤不动，各色货物一直摆到四下的大堤上来了。

安国城关有名的饭馆，像宴宾楼、宴宾园也打起游击，跟着农民到这里赶集做生意。南堤坡上有一家搭着席棚卖豆腐菜的馆子，生意最好。他们原来开设在安国南关药王庙对过，是一个山东老汉，因为老家遭了荒年，担着两只破筐来到那里，发财起家的，现在也转移到伍仁桥来了。老汉已经去世，儿子们全参了军，老伴儿只是坐在柜台上照顾着，掌柜的跑堂的全是家里的一班女将，年轻的女儿和媳妇们。这一班女孩子，长的都很好，在棚口掌柜的她家那位大姑娘，在大集日，密黑的头发，梳得整齐，穿一身十成新蓝布袄裤，一件洁白的护襟围裙，从领口接下来。她一边做着菜，低头注意着火色，一边又不住的抬起头来，用她那一对又黑又大又水灵的眼睛，看着在她家棚前过往的人。

春儿饿了，走进来坐下，因为钱少，只要了一碗素豆腐菜。那个掌柜的姑娘一直望着春儿，把菜盛好，叫她的一个小妹妹端过来。

穿得整齐的小姑娘两只手捧着一个豆青大花碗，里面的豆腐和丸子冒起了尖儿，汤上面浮着很厚的荤油。她小心翼翼的把碗放在木案上，一仄，还是流了一桌子。

“吃吧，同志。我姐姐特别给你加了油水。”小姑娘低声笑着说。

“为什么特别优待我？”春儿昂着头问，又赶紧低下头去喝汤。

“你说为什么？”小姑娘蹲在她的身边，说，“你从堤上走过来，我们老远就看见你了。姐姐和我说：‘这个女同志是个老八路，刚打了胜仗的，她要到我们这里吃饭多好哇！’”

“你姐姐长得多好看，她有了婆家吗？”春儿问。

“我早有兩個小外甥了。”小姑娘说，“我们南关的家叫鬼子烧了，把我们赶到这大堤上来。”

听见姐姐叫了一声，她跑过去，端来一碟子热烧饼，说：

“你为什么不要干的？”

春儿笑了。

“我知道你没有钱。”小姑娘拿起一个烧饼，放进春儿碗里，溅出很多汤儿。“这烧饼不要钱，是我们姐儿俩请你吃的！”

这一家人是多么值得留恋啊！春儿从大堤上跑下来，走得更高兴更轻快了。

在前面的道上，跑着一辆小牛车，赶车的是一个矮矮的身体浑实的女孩子。她穿一件褪色的宽大的红袄袄，卷着裤子露着腿肚。车上装着几棵大白菜，

肥大得像怀了八个月孕的妇女，在车厢里滚来滚去。还有几个又大又圆的红萝卜，不断的从车后尾巴蹿下来。小姑娘回头看见了春儿，就喊：

“女同志，快赶两步，来坐车吧！”

她的声音很嫩很脆，难道是从小吃这些新鲜菜蔬的关系吗？

“我走得动呀。”春儿笑着说。

“我一个人实在压不住它，”女孩子说，“你上来，它就稳当了。”

春儿上去，和她并排坐在前车辕上。这头黄色的小犊牛，肥胖得油光发亮，两只小白犄角，向前弯着，像个“六”字。它感到了新增加的重量，小尾巴愤怒的害羞的摆动了几下，老实了。

女孩子把红山木小鞭压在腿下面，然后用一柄镰刀，悠闲的雕刻着一颗萝卜。她很快的把它做成了一个精巧的花篮儿。

这应该是春节前后的礼物。女孩子们把它挂在房梁上，里面种上麦子，等麦苗长高，萝卜缨儿也就开花了。过年的时候，还可以在里面插上一枝蜡烛，这萝卜就叫灯笼红。可是，这一个新年是叫日本鬼子给搅了！

“你是哪村的？”春儿问。

“过河就到了。”女孩子望前一指说。

七十四

春儿坐在车上想：今天竟遇到了这些个好心肠的人。自从参加工作以后，人们对自己都很好，难道也真的是因为自己长了个有人缘的脸蛋儿吗？

牛车很快就到了沙河的草桥。今天集日，桥头上挤着很多车辆，等着过河，看桥的老头儿，站在他那房顶和地面相平的小屋门口，和熟识的车夫打着招呼，又伸着手向远地来的车辆要桥钱。沙河里的冰块快融化完了，水流很大很急。草桥两旁压上了很多的土袋，桥桩顶上碌碡，防止摇倾，可是大车在上面一走，桥身还是颤动着，咯吱咯吱的响着。桥的两头，有两根高大的杉木，临时搭起来的军用电线，被河滩里的风一吹，发出很大的丝丝的声音。

车夫们正为抢先过桥争吵，堤坡上面忽然出现了一个战士，他全副武装，脸上满是尘土和汗，手里斜举着一面小小的军旗。他那跑上堤坡昂头一望的

姿势，使人想起黎明的时候，一只虎或豹爬上了一座可以俯瞰一切的高峰。他后边有一小队人，严整的沿着堤坡走过来，他们前进的沉重有弹性的步伐，就像连绵的山峰向前移动，流水的节拍也加紧加强了。

当领队的人走到桥头上，和看桥的老头儿说了几句话，老头儿就向车夫们喊：

“把车往外靠一靠，叫同志们先过去。”

春儿坐的牛车，本来在很多车辆的后面，队伍过来，她们也看不清楚。因为过河就可以到家，赶车的小姑娘也不太着急，她坐在车上，撕着白菜的烂叶子，探着身子喂她的小牛儿。

春儿忽然感觉到了什么。她在车辕上站立起来，望着这队过河的人马。他们差不多是用力按住枪枝和弹药，在草桥上冲了过去的。带队的人站在草桥旁一只土袋上指挥着，春儿看清了，就从车上跳下来说：

“小妹妹，我走着过去吧。我还要赶路呢！”

没等小姑娘答言，她就在人马车辆的中间插过，跑到草桥上喊：

“芒种！”

带队的那人一转身。

“我们要调到山里去。”他低声的说，“我没想到在走以前还能看到你。”

“我到区党委那里打听你来，”春儿喘息着说，“他们说你们的队伍改编了。”

“这次战役以后，我升了指导员。”芒种说，“我们已经完全是正规军的建制。现在要到路西执行任务，你回家吗？告诉村里同志们，就说我走了。”

他的队伍已经过完，战士们在他和春儿的面前通过，都好奇的望望春儿，有的还做个怪样儿。春儿红着脸，芒种装做没看见。

“我不能也到山里去吗？”春儿着急的说。

“你向上级要求么！我们也许还要回来的。”芒种望了望她的眼睛，就转过身去，赶紧跑到队伍的前面去了。春儿沿着草桥的旁边走过来，跳过那些土袋，踏着翻乍起来不断绊人的秫秸。队伍过了河，就沿着南岸奔西方走了。太阳已经被晚霞笼罩。

春儿站在河岸上，望着西去的队伍。河水翻滚着从西面过来，冲击桥身，向东流去。有一只刚刚开河就从下水航行上来的对槽大船，正迎着水流，全部紧张的钻进桥孔。她的感情也好像逆着大水行船，显得是多么用力又多么艰难哪！

芒种差不多没有回头。只有走在排尾的那个战士，春儿现在才看清他是老温，不知是真情还是和她开玩笑，不断的回过身来向她摆手儿，那意思是说：不要远送。

大车也陆续从桥上过来了。车一过桥，便像通过了一道险阻的关口一样，人马欢畅的奔跑起来，谁也没有注意她。只有那个赶着牛车的小姑娘，坐在车辕上，摇摆着腿儿对春儿笑：

“你这赶路的可好，天快黑了，还站在这里！你骗我，和你说话的那是谁？”

“一个认识的同志。”春儿含着眼泪说。

“还坐上来吧，”小姑娘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轻声把车停住，“今天不用走了，就宿在我家里，和我做伴儿。”

春儿说可以赶到家，就和小姑娘告别，一个人走上那条奔东南方向的小路。夕阳在沉落以前，鲜艳得像花的颜色，春儿再回头西望的时候，它已经完全钻进山里去了。春儿想：芒种他们今天晚上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也可以赶到山里去的。在经过平汉路的时候，一场战斗也是避免不了的。她觉得她和他不是一步一步、而是两步两步的分离着。

她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，她的心不断的牵向西面去。路上行人很少了，烟和雾掩遮住四野的村庄。在战争环境里，这种牵挂使她痛苦的感到：她和芒种的不分明的关系，是多么需要迅速的确定下来啊！

当她走到子午镇村北的横道上，遇见了一个一边走一边发着哮喘的女人，是变吉哥的老婆。她手里

拄着一根在路上拣起的干树杈，怀里还抱着一堆细小的干树枝。

“你这是到哪里去来？”春儿问她。

“学了学新兴样儿，”那女人又喘又笑的说，“送郎上前线。你哥哥要走西口，我这老婆子也难留。”

“变吉哥动身了吗？”春儿问。

“信上插着三根鸡毛，要不我是叫他和我耩上地再走。”女人说，“反正他干活也不中用，还是俺娘儿们自己遭罪自己受吧。”

“你送到他哪里了？”春儿问。

“送到他刘家大坟那里，我捎着拣了点干巴，春天就是柴火缺。”女人说，“唉，我到 he 家里十几年，他出外像是上炕下炕，什么时候送过他？他到山里也不是一遭儿了。过去是给人家画庙，这回是抗日工作吧，也不过还是画个画儿，编个剧词儿，也没有长进多少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送他这么老远？”春儿忍不住笑了。

“是为了那么一位客。”女人说，“你哥哥说是他的老师，一块到路西去的。老师来了还不算什么，后边又来了一个师娘，一个漂亮的小媳妇。”

“那是我们的教官和他的女人。”春儿说。

“没见过人家这样的夫妻，真是恩爱夫妻呀！”女

人笑着说，“看样子一块儿从他们家里来，也是过了夜的。在家里有多少亲密话说不完，又陪伴着到这里！一把鼻子一把泪，你看那个哭劲呀，把我也哭得伤心了。我想：我和你哥哥结婚以来，地里是我，家里也是我，我不管多冷多热带着孩子们下地，省下工夫叫他在家里画画儿。锅里没米，灶前没柴，都是我一个人操心，有点好吃的，叫他和孩子们吃，受累的勾当，我一个人去作，还不到三十年纪，我就落下了痲病喘的病根儿。你说我还能不陪着那小媳妇哭一场？我这一哭不要紧，你哥哥对他的老师说：‘你看她，病病拉拉的身子，跟着我可没得过一天好。’大妹子！结婚十几年，这是你哥哥说的头一句人话，多么知心的话呀，我哭的更欢了！”

“就哭着送了这么远？”春儿问。

“可不。”女人咂着嘴，“我是送他去学习，去抗日。你们说的，只要打败日本，我们就能解放，就能改善生活，我没有别的指望，我就是指望那一天！”

七十五

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，有些人是轻松愉快的，也有些人是负担沉重的。对于变吉哥，更明显的是对于像芒种这样的年轻人，他出身贫苦，脱下破棉袄，穿上新军衣，扔下缺米少柴的愁苦，过一天一斤十四两小米口粮的日子。过去不能进学堂，现在可以学文化，都是一种生活的提高，切实的改善。他没有妻子儿女，因此也就没有过多的牵挂。偶尔想到这些，也只不过把希望寄托在革命胜利，革命成功了，什么也就会有。张教官的情绪，就不能这样单纯。他好像每逢前进一步，就感到一次身后的拉力，克服这一点，是需要坚强的意志的。

他们走在路上，他的老婆一步不离的靠在他的身边。这年轻的女人，又从来没有走过这样长远的路，她的脚一颠一拐的，好像踩了水泡。张教官就只好常常停下来，甚至搀扶她。

这女人从家里给丈夫打整了一个很大的包裹，除去路上吃的东西，还包上单夹皮棉四季的衣服。变吉哥为了对老师的尊敬，只好背在自己身上，他的行囊是非常简单的。今天晚上，他们要赶到地委那里，办过路的手续。如果情况紧急，今天夜里也许就要过路。他几次劝说师娘回去，而那个多情的女人一定要送他们到地委那里，她说那里有她一家亲戚。

到地委那里，已经是半夜的时分。因为这里接近铁路据点，在寻找机关的时候，很费了一番周折。最后，一个民兵把他们领到一家大梢门场院里，在一间像草棚的房间里，他们见到了李佩钟。

李佩钟自从受伤以后，调到地委机关来工作，因为她的身体还不很健康，就暂时负责过路干部的介绍和审查。她正守着一盏油灯整理介绍信。在灯光下看来，她的脸更消瘦更苍白了。虽然她和变吉哥认识，可是不知道是由于哪一个时间的观感，她对于这位“土圣人”印象并不很好。变吉哥把学院党委的介绍信交过去，李佩钟问了他很多的似乎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审查的内容。因为一天劳累，和还没有人招待他们饮食，变吉哥的态度变得很不冷静。

“我找这里的总负责人。”他说。

“总负责人是地委书记，你过路是部门的工作。”李佩钟说。

变吉哥抓起包裹来，就转身出去了。他到处找地委书记，结果他找到的地委书记不是别人，正是高翔和高庆山。

“我知道这里总没有外人。”变吉哥得意的说。

高庆山立时给他们叫了饭和安排了休息的地方，并且告诉李佩钟，除去一般的组织介绍信，再用他自己的名义给那边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写封信，说明变吉哥在美术工作上有一定的修养和成就。高庆山还告诉他们，明天晚上才过路，今天夜里可以好好睡一下。
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李佩钟把组织介绍信和那封私人的介绍信交给变吉哥。他把组织介绍信慎重的带好，打开那一封看了看，信写的很长，变吉哥对于这样的介绍信，并不满意，他认为李佩钟的文字，过子浮饰，有些口气甚至近于吹嘘。他想：虽然地委书记关照自己的情意是可感的，但对自己来说，这是不必要的，他把这封信扯毁了。

黄昏的时候，他们在树林里集合。他知道掩护他们过路的，是芒种带领的队伍，紧张的心情，就沉静了一半下去。他靠在一棵杨树身上，养精蓄锐的闭起眼睛来听指挥人的报告。

近来敌人已经在铁路两旁掘了封锁沟，在一些重要的路口，还建立了炮楼，安设了电网。在沿路的

村庄设置保甲，在哪段发现八路军过路，哪村就要受残酷的刑罚。关于通过铁路，我们用过好多的方式。一种最简单利索，我们兵力强大，一阵炮火硬打过去。一种是在铁路上安设两处爆炸物，阻止敌人的铁甲车前进，我们从中间过去，岗楼上伪军的动作，是无足轻重的。可是，在铁路附近，绝对保密是很困难的。村庄里“两面派”的人物很多，他们可以不让我们受很大的损失，可是也多少的让敌人知道点儿，好不担沉重。如果消息走漏了，敌人的铁甲车出动到爆炸物跟前，就停了下来用探照灯照射，用掷弹筒打过路的人们，我们前些日子就吃了这个亏。并且，爆炸有时会伤了普通客车，影响也不好。

这次是用一种新研究出来的办法。

现在是阴历月初，一钩新月升起的时候，他们集合好了，从树林里出来。新月遭到了普遍的诅咒，谁也希望快有一块黑云把它遮住。但当他们接近铁路的时候，月亮就像很懂事似的落在山后去了，这都是指挥人员事先算计好了的。他们在离铁路十几丈的地方，伏在地上掩护起来。变吉哥看见芒种带着队伍爬到路基下面那里去了。

大地有些颤抖。有一列火车隆隆的从南方过来了，不久他们看到北边不远是一座小车站，车站上的红红绿绿的信号全点着了。列车在他们面前还没有

过完的时候，芒种的队伍就站立起来，列车一过去，战士们就跳上路基，一个人举起大锄刀劈开了铁丝网的栅栏，回头招呼人们快过。

他们在铁路上跑过，有些没有见过铁路的人，还俯下身子摸一下铁轨。沿线的电灯和车站上的信号喇的一声全灭了，敌人已经发觉，可是它那辆预备在车站上随时准备出动的铁甲战车，现在却开不出来，它的道路被刚刚要进站的这一列客车挡住了。铁甲车和列车，愤怒的慌乱的吼叫着，等到它们错开，我们的人已经过完了。

铁甲车还是冲了出来，芒种他们伏在地下向它射击。

过了铁路是一段急行军。因为不只要防止敌人的追击，还要通过敌人在山口的封锁。这是沙河滩上，人们一路跑着，脚下不是泥沙，就是尖石。这里的河水，还在结凌，蹚水的时候，刺骨的寒冷。

变吉哥替张教官背着包裹，还要随时照顾他。进入山口以后，本来是可以休息一下的，忽然下起大雨来，很多人头一次进山，就赶上了在大雨中爬山的艰难的时刻。

他们从冀中穿过来的薄底鞋，一着水很快就叫山石磨穿了，脚趾不断碰在石头尖上。下山的时候，越战战兢兢越容易被冲下来的红泥滑倒。这一段山

路，对于张教官来说，真是艰苦的锻炼，变吉哥有时回过头来，看看他那作为一个画家的老师，在弥漫的风雨里，攀登着高山奇峰，竟没有了任何观察和创作的心情，他浑身流水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发抖，情绪可以说是低落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了。

绕过几座山峰，雨渐渐停止了，一下到山脚，就奉命休息，人们就不顾一切的躺在岩石上草丛里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大家吃了些东西，换了换鞋子，又开始行军。天已经放晴，现在是早饭前后的时刻。一夜的紧张、劳累、惊恐、痛苦，都雨过天晴的忘记了，人们又沉入一种精力恢复、肚子饱、腿有力量的幸福的感觉里去了。

现在，大家才有心情看看山区根据地的可爱的景色。太阳照射在半山腰里，阳坡上的茅草小屋的炊烟和流散的薄云分别不开。穿着浅蓝色布衣服的妇女们，站在门口。穿着白粗布棉裤的汉子们，披着老羊皮袄，悠闲的抽着烟。小孩子们抱住大雄狗的脖子，为的是不叫它们向新来的同志突奔吠叫。

七十六

随同部队，芒种和老温行进在荒凉和高险的山区。当部队继续向西北进发的时候，简直是一步一登高，好像上天梯一样。部队每一回顾，他们原来驻扎的地方，就好像栽到盆底去了。按照序列，芒种行军的时候，总是走在他那一连人的后面。老温现在是第三班的副班长，正好走在芒种的前面。老温是顶爱说话的，更好在别人感到疲乏的时候，说个笑话。对于芒种，虽然他时刻注意到：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在田大瞎子家牲口棚里的关系，而是正规军里的直属上下级，应该处处表现出个纪律来。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和芒种那一段伙计生活，不应该忘记，那也是一种兄弟血肉之情，和今天并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一有机会，他还是和芒种说长道短。在芒种这一方面，老温看出来，变化是很大的。根据他们那些年相处时的情形，老温觉得芒种没有按照他的预计发展，而是向另外

一条他当时绝不能想到的道路上发展了。这小人儿好像成熟得过早了一些，思想过多了一些。当然老温明白，这是因为他负责任过早了一些也过重了一些的缘故。芒种现在的脸上是很难找到那些顽皮嬉笑，在他的行动上也很难看见那兴兴撞撞的样儿了。

老温想起：他们有一次在田大瞎子家地里割谷子的情景。那时天气还很热，地块离家很远，他们提来一破锡壶凉水，主要是为了磨镰，也为了实在干渴的时候喝上一口。芒种割谷的时候，很卖力气，他紧紧跟在老温的后面，老温前进一步，他就前进一步。当时弄得老温很不高兴，他想：如果我不是“二把”，这孩子就把我漫过去了。老常领青，照例走在最前面，也回过头来说：

“芒种，慢着点，干什么那样急，没大没小的！”

“他想挑了我的饭碗哩！”老温苦笑着说，“你这孩子，就不想想，你就是忠心保国，累死在谷地里，田大瞎子也不会给你买口柳木棺材的。”

老温觉得说话重了些，他看见芒种立时就像撒了气的皮球，半天没精打采。这孩子显然是还有些不明白这长工生活里的种种底细和艰难，他直起身来，低着头到地头上磨镰去了。

他磨镰磨得时间特别长，老温割到地头，看到这孩子正提着那把破锡壶，用里面的清水，冲灌一个田

鼠的洞穴。他爬在地上，仄着耳朵倾听那水灌进洞口的嘟嘟的响声，就好像看见了那些小动物因为突然的水灾，家庭之间发生的慌乱一样。

老常的镰也需要磨，老温口渴，很想喝水。芒种却把水全灌了老鼠洞。老温非常生气的说：

“你这孩子实在是废！那老鼠洞是个填不满的坑，你一壶水，十壶水也灌不出它来！没有水磨镰，我们今儿个的活别做了！”

芒种好像并没有听见他的话，他还是注意着那洞口，手里紧握着镰柄，等候田鼠跑出来。可是等到水渗完了，田鼠还是没有动静，只是从洞里慌慌张张的跑出一只大肚子的蝼蛄来。芒种一镰柄把它拍死了，笑着说：

“看样儿这蝼蛄就像田大瞎子一样。我们为什么还给他出力做活呢！”

闹的老常和老温全笑了。

现在队伍还是向高山上爬。前边的人们不断的停下，用手挥着汗水，有的飞到后面人的脸上，有的滴落在石头道路上。山谷里没有一丝风，小块的天，蓝得像新染出来的布。

“我们要爬到哪里去呀？”老温说，“我看就要走进南天门了。”

芒种没有说话，他的眼睛老是放到最前面，放到

他那一连人的领头那里。他注意大家是不是很累了，是不是快到休息的地方。

“指导员，”老温看见芒种不回答，就改了一个题目，“你说是六月天锄高粱热呀，还是六月天行军热？”

“热是一样的，”芒种说，“可是意义不同。”

“怎么意义不同呢，指导员？”老温说，“不是一样的出汗吗？”

“是一样的出汗，”芒种说，“那时出汗是为了田大瞎子一家人的享乐，现在流汗是为了全中华民族的解放。”

“是。”老温说，“一切问题都应该从抗日观点上看。可是，指导员，这民族解放是不是包括田大瞎子那些人在内？”

“谁真心抗日，就包括谁在里面。”芒种说，“田大瞎子反对抗日，自然就没有他。”

“我看没有他。”老温说，“我们抗半天日，要是叫他沾光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说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芒种说，“抗日战争解放了我们，我们要努力学习，努力进步才好。”

老温不再问了。前面还没有传令休息的征候，他们继续往前爬，老温走路，如果不说话了，就得闹些动作，他不断的用脚踢起路上的石子，叫它滚下那万

丈深沟，仄着耳朵听那隆隆的声音。

“不要闹声响。”芒种制止他，“下面有人有羊怎么办？”

“我保险这阴山背后，除了我们，没有别的人。”老温说，“我们这真叫走进深山老峪里来了。”

“什么地方也有人住。”芒种说，“老百姓很苦，是没法挑拣地方的。”

“有人住也许有人住，”老温说，“可是我敢保险，除去我们，外处的人从没有到这里来过。这是什么地方，谁的肉痒痒得受不了，跑来喂狼？”

“你怎么能保险？”芒种有些烦躁，“人们为了生活，哪里也会去的。日本挡不住人，狼还能挡住人？”

“日本挡不住我们。”老温镇静的辩驳着，“多么高的山我们也过得去，多么宽的河我们也过得去。我是说，这个地方是个没有人烟的地方！”

“那不是烟？”芒种指一指山顶上面笑着说。

部队在原地休息了。在这一直爬上来的笔峭的山路上，战士们有的脸朝山下，坐在石子路上；有的脸朝左右的山谷，倚靠在路旁的岩石上；有的背靠着背，有的四五个人围在一起。人们打火抽烟，烟是宝贵的，火石却不缺少，道路上每一块碎石，拾起来都可以打出火星。战士们说笑唱歌，这一条条人迹稀罕的山谷，突然被新鲜的激发的南腔北调的人声充满

了。

太阳直射到山谷深处，山像排起来的一样，一个方向，一种姿态。这些深得难以测量的山谷，现在正腾腾的冒出白色的、浓得像云雾一样的热气。就好像在大地之下，有看不见的大火在燃烧，有神秘的水泉在蒸发。

“这不是烟，”老温抽着烟，对芒种说，“这是云彩。我们种地的时候，常说西山里长云彩，就是这个。”

随后他们就继续行军了，他们在这无边的烟云里穿上穿下，云雾越来越浓，山谷里响起了雷声。

“又可以不动脚手的洗洗澡和洗洗衣服了。”老温兴奋的说。

在这些年代，风雨并不会引起部队行军的什么困难，相反的大家因为苦于汗热，对风雨的到来，常常表示了不亚于水鸟的欢迎，他们会任那倾盆的大雨在身上痛痛快快的流下去。这里的山路石头多，就是在雨中，也不会滑跌的。

往上看，云雾很重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距离山顶究竟有多远，是没法想像的。可是雨并没有下起来，只有时滴落几个大雨点。他们绕着山的右侧行进，不久的工夫，脚下的石子路宽了，平整了，两旁并且出现了葱翠的树木，他们转进了一处风景非常的境地。这

境地在高山的凹里，山峰环抱着它。四面的山坡上都是高大浓密的树木，这些树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叶子都非常宽大厚重，风吹动它或是有几点雨落在上面，它就发出小鼓一样的声音。粗大的铜色的树干上，布满青苔，道路两旁的岩石，也几乎叫青苔包裹。道路两旁出现了很多人家，人家的门口和道路之间都有一条小溪哗哗的流着。又有很多细小的瀑布从山上面、房顶上面流下来，一齐流到山底那个大水潭里去。人们在这里行走，四面叫水、叫树木包围，真不知道水和绿色是从天上来的、四边来的，还是从下面那深得像井底似的、水面上不断窜着水花和布满浮萍的池子里涌上来的。

“看见人家了吧？”芒种逗老温说。

“这是仙界。”老温赞叹的说。

七十七

这里的居民，并不像老温说的是什么仙乡佛界，他们也像高山区的群众一样，生活非常贫苦。部队原来打算过了前面的关口再吃中饭的，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不平常的环境，村庄的几个老年人，相约出来，挡住爬山的道口，要部队休息做饭。那些妇女和小孩子们的欢笑惊奇的脸，全贴在粗木窗棂上，而窗棂外面，瀑布像水帘洞一样挂下来，她们看不清楚过路的人，更是多么希望男人们把客人引到家里来呀！

领导决定在这个村庄做饭。

部队在“街上”立正，然后分配到各家房子里。老温带一班人进到面对南山的一户人家。这一家的房舍，充分利用了山的形势，一块悬空突出的岩石做了房的前檐，后面削直的岩石就成为房屋的后壁。房椽下面吊挂着很多东西：大葫芦瓢里装满扁豆种子，长在青棵上的红辣椒，一捆削好的山荆木棍子，一串

剥开皮的玉米棒子。两个红皮的大南瓜，分悬门口左右，就像新年挂的宫灯一样。

这家房子很小，祖孙三代人却很齐全。老头子招呼着大家，叫老伴、儿媳和躺在炕上的孙女儿退避到炕角上去，把在灶火台上烤着的烟叶也清理了，让同志们坐下休息。

这一顿饭，因为村庄小并且还没有粮秣委员，下锅的是战士身上米袋里的小米。柴火不缺，家家门前都有砍下来的松杉树枝，这些木柴就是潮湿也燃烧得很旺。老温虽然是副班长，每次行军做饭，都自讨下抱柴烧火的职务，他很早就发现了这一工作的种种好处：费心不多，抽烟方便，如果赶上雨天冷天，还可以取暖烘干。

据老汉说，这里知道抗日还是不久以前的事。是一个从曲阳调到繁峙去的干部，在这里路过告诉大家的。这个干部过去是个石匠，几乎是唯一的到过这个山庄的外路人。至于见到八路军这还是头一次。

“八路军的好处，我们从那个石匠嘴里就听说了。”老头子说，“可是我们想，你们一定走不到这里来。”

“我们哪里也能走到的，大伯！”战士们说。

“我们一辈子可不常出门。”老头子说，“我今年六十七岁了，就没有离开过这四面山。”

战士们观察着这屋里的陈设，他们信服了老头子说的话。这一家人吃穿使用的东西，每一件都好像鲜明的打着这座高山的印记。他们的衣服，毛皮是一部分，树皮和草又是一部分。只有那害羞的、靠着窗台坐着一声也不吭的媳妇才穿一件布褂子。布的颜色是染的不匀的黑红色，这种颜色的原料也许是橡树的果实、乌拉叶，也许是长在山坡上的野靛。老头子用来抽烟，老婆子用来簪发，媳妇用来捻毛绳的，都是用兽骨削成。屋里很多工具是石器，好看的兽角兽皮，和肥大的果实种子一同张挂在墙壁上，这是他们的生活资料，也是他们的装饰品。

起初，这屋子里很暗。含有多量油脂的松枝，在灶火膛里吱吱剥剥的响着，屋子里弥漫着有香味的烟。当战士们的饭快要煮熟的时候，云雾忽然裂开，阳光照射进来，屋子里非常明亮了。小米饭在锅里突突的响，米的香味也散射出来。

战士们原以为在那里睡觉的小姑娘，忽然转动起来。她掀开盖在身上的黑山羊皮，向锅台这边伸着一只小手。

“香。”她睁开眼睛，喃喃的说。

“好些了。”那媳妇望着婆婆笑着说，“想吃东西了哩。”

“病了两三天，汤水不进。”老婆子向战士们说，

“你们都是福星，一来我这小孙女儿就清醒了。”

“孩子有病，这可不知道。”老温说，“我们这样吵吵嚷嚷了半天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老婆子说，“一个小妮儿，病了也没拿她当过回子事。”

小孩子这时才看见，在她家屋子里竟有这么多眼生的人。她把伸出来的手缩回去，插到母亲的怀里。媳妇又对婆婆笑笑，老婆子才说：

“我和大哥们卖个老脸，俺家小孙女儿想吃你们的干饭哩！”

“这好说。”老温连忙掀开锅盖，在锅台角上抓了一个饭碗，盛得满满的送过来。

奶奶喂着小孩吃，小孩吃得实在香甜，轮着小眼对战士们笑了。

“在我们这里，不容易吃到这样好的干饭。”媳妇羞怯的对战士们说。她爬下炕来，给战士们抄出一大盘酸菜来，当做回敬。

“小孩子什么病啊？”老温吃着饭问。

“发热。”媳妇说。

“那要看看。我们带着医生哩。”老温放下饭碗到连部里去。芒种听他报告完了，对卫生员说：

“去给老乡的孩子瞧瞧，用见效的药品，不要老是阿司匹林和红药水。”

卫生员跟着老温过来，把当时认为珍贵的退热剂给小孩注射了一针。

村庄里听说军队会看病，那些有症候的人就全找了来。这里边有多年的疮疖、心口痛、眼疾，原不是一时可以治好的。卫生员尽可能的满足了他们的要求，告诉他们应该注意的方面，军民的关系显然更亲密了一层。那些患病的人说：

“八路军给我们治好了病症，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我们这里实在难得有个看病的先生哩。”

尤其是那个小孩的母亲，她心里有十分的感激，又苦于没有办法表示和报答。她忙着替战士们洗锅洗小碗，又把炕上扫一下，愿意他们坐到上面再休息休息。老温有时到街上去，她就站在门口张望，好像对待刚刚回家的亲人一样。老温终于感觉到了这一点，当他整理背包准备集合的时候，他想应该留给这个妇女和小孩一点纪念。可是，他是一个穷八路，有什么富裕的东西可以留赠旁人？他翻倒背包，打开几层纸，找出他还没有参军时，求变吉哥画的那张毛主席的像来。

这是尺幅不大的一张水彩像。当时，他到集上买了好几次纸张，又替变吉哥做着地里的活，变吉哥才很高兴的画好了。

“把这张毛主席的像留给你们，挂在墙上吧。”老

温对那媳妇说，“我们就是他的队伍，我们就是听他的话到处关心老百姓的困苦的。”

一家人全俯着身子来看。那媳妇两手捧着画像，轻轻的欢笑着说：

“啊，这就是他吗？这就是他！”

当队伍集合起来，宣传员在对着村口的那面大岩石上，写好一幅大字的抗日标语。从此，这个高山顶上的村庄，就到处传说：

“毛主席的队伍到过我们这里了。”

“是的。他们奉毛主席的命令到前边抗日去了。”

部队啊，你的任务，不只是开山辟路，作战冲锋，万里跋涉。你是革命的耕犁，每逢你前进一步，每逢你走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你就把革命的种子，播种在那一带人们的心灵之中了。

七十八

部队在这里作战，十分艰难。这地区群众的生活很苦，粮食和棉花，都很缺少。天气冷得早，补充给战士们的服装，都是用旧衣改制，尺寸又小，很多人穿上露着腿腕和半截胳膊。鞋袜也是用破单衣做成的，妇女们，不分昼夜的搓着麻绳给战士们做鞋袜，把她们给丈夫纳好的厚鞋底，也都捐献出来。

本来这里人烟就稀少，经过敌人的连续“扫荡”，这地区就更显得凄楚荒凉了。

但是，在那吹着大风的山顶，在那砖石残断的长城边缘，在那堆插着乱石的河滩和道路上，部队在行进。

他们黄昏时分在狭窄的河滩上的乱石中间集合，然后爬上高山的绝顶，再冲下去，袭击川下敌人的据点。登上高峰，天空的星星也并不多给战士一些光亮，他们在羊肠小路上行进，伸手可以摸着天，脚

下艰难，偶一失足，就会滚到万丈深的山沟里去。在行军中，常常听到哗啦一声，一匹负重的驮骡掉下去，就再也无法挽救它。

狂暴的风，战士们要用全力把步子踏下去，才免得被暴风吹落下去。

一天夜晚，他们露宿在一处山腰的羊圈里。这是牧人带领羊群来卧地施肥时搭成的。现在没有牧人也没有羊群，周围一排木栅栏，中间是厚厚的干羊粪。能在这里面睡一觉，使人感到难得的舒适和温暖。战士们靠在木栅上，小声说笑几句，就睡着了。

“有人说抗日战争就是农民战争。”老温睡前和芒种说，“我完全相信这句话。除去行军打仗，我们的一切，都还是一个贫苦的农民。”

“这句话也表明我们和农民是血肉相连的关系。”芒种说，“我们的衣食住行，都离不开农民。进了深山，我们也是睡在他们辛苦搭成的羊圈里。”

整夜，一阵冷风，一阵骤雨，沉睡的战士，连身也不翻。谁能知道，他们现在正做着什么甜蜜的梦？有人在梦里发出了轻微的笑声。

芒种同一个战士在附近的山头上担任前半夜的岗哨。北风呼啸着吹卷他身上那件全连人轮流穿用的棉大衣。远处山坡上奔跑着号叫的狼群。在这样的時候，他的头脑很清楚，心境很安静。他直直的站在

那里。

他守卫着荒山就像以前在冀中守卫着乡土一样。已经沉睡的弟兄们，占有了他全部的感情。参军已经有两年的时光，每个冬季，都在紧张的战斗里度过。两年来，他已经有显著的进步和变化。他现在能够用整个的心，拥抱这距离他出生地方很远而又荒凉的山区。

因此，掩盖住狂暴的风声，他听到了山野和村庄发出的每一个轻微的声响，包括野兔的追逐声，羊羔落地的啼叫声，母亲们拍抚小孩的啊啊声，青年夫妻醒来时充满情意的谈话。一切生命，现在对于他都变成了名叫做诗的那种东西，只有庄严纯洁的胸怀，才能感觉到的那种境界。

他下岗回到羊圈，躺在老温的身旁。在这样寒冷的夜里，老温睡起来，也是这样香甜，他那高亢沉着的、表示着没有丝毫挂念和烦恼的鼾声，几乎要和山风争雄，响彻了梯田层层的山谷。

但是因为他身量高，脚手大，睡时肢体伸张，那短小的军衣，包裹不住他，有一半身子露在外面。芒种给他往下拉了拉衣服，然后紧靠着他睡着了。

七十九

家乡的音问，好像断绝了似的。每逢在一个地方驻下，芒种带几个班长到附近那些高山上去观察地形。有时和战士们一同去打山柴和采野菜。

今天带着他们观察地形的是寺院里的一个佃户，年纪老些了，可是爬起山来，就是这些长年行军的战士们，也有时跟随不上。对于这一带的地理，他完全可以详细背诵，每次上山之前，他都是一沟一坡一石一木的讲清了，然后实地观察，分毫不差。他笑着对芒种说：

“指导员，为什么地方上不给你们介绍一个放羊的或是砍柴的，单单介绍我？就因为放羊的只知道哪个山上有草，砍柴的只注意哪个山上有树。我是一个活地图，熟悉从这个地方通往各处的路。我从小在这一带山上爬上爬下，你看，这样高的地方，我可以一屁股从山顶滑到山底。”

这引起了战士们的好奇心。芒种俯身往下看，刚刚升起的太阳，照耀着这座山坡，山坡上没有种什么庄稼，却有一片片开着黄花的野菊，一丛丛挑着紫色小铜铃样花朵的丰润的灌木。有他们熟悉的草虫噪叫，有他们在平原从来没有见过的鸟儿飞掠。

那年老的佃户，把上衣紧了紧就从山顶滑下去。他有时是立着，有时就坐在地上。那些树木葛藤都不能阻碍他，他随时可以利用它们，保持了滑行的平衡。

芒种和几个班长也跟着他滑下去，手脚衣服全有些伤损。

太阳虽然照不到山脚地方，这里却显得宽阔明朗。他们从上面滑下来的这个山头，是群山的主峰，和另外的两座山脚，形成一个雄奇的局面。那两座山长满幼小的杉树，沉静温柔，左右伸张，像两扇大门的样儿，围抱着这座主峰。

溪水围绕着三座山流泄，使人不能辨认它们的方向和源头。溪流上面，盖着很厚的从山上落下的枯枝烂叶，这里的流水，安静得就像躺在爱人怀抱里睡眠的女人一样，流动时，只有一点点细碎的声响。

他们脱下鞋袜，把脚浸到这绵软清凉的水里。

“指导员，不要认生，这就是你们滹沱河发源的地方。”老佃户说，“谁要是想念家乡，就对着这流水

讲话吧，它会把你门的心思，带到亲人的耳朵旁边。”

“不像。”老温用脚踢着水里那些枯枝烂叶，它们结片成堆的飞到山坡上去。“我们村边的河流可又宽又大。”

“到你们那里，它没有拘管自然就宽大了。在我们这里，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儿。”老佃户把他们领到主峰的山脚那里。山脚悬起来，在它下面是一汪泉水。泉水从一条赤红色的石缝里溢出，鼓动着流沙，发出扑扑的声音。

这就是滹沱河的主泉。两座小山下面，还有几个泉眼，流出的水也加入在它的雄厚的声势里。

同志们相信了老佃户的话。

“我知道了你们的家乡，我就想领你们来看看。”老佃户说，“我们住的相离很远，可是多少年来，就有这么个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。”

“我们就像吃着一个井台上的水，那样亲近。”老温笑着说。

“年轻的时候，我曾经沿着这条河，走出山地，然后坐上船，航行到海边上。”老佃户说，“你们那一带的风俗人情，我还记得清楚。条河两岸，高粱种得多么整齐，长得多么兴旺！夹着大抱高粱叶的小伙子们，从地里钻出来，汗水冲着满身上的高粱花儿。老头儿提着旋网，沿着河岸走，看着水花撒网。河两岸

的松软的泥块，不停的崩散到河水里。有的人用一个兜网捉鱼，站在一个回水流那里，半天不移动，像扇车一样的工作，不管有鱼还是没鱼。我们船往下行。滹沱河过了饶阳、献县，和滏阳河合并，河身加宽了，再往东北流，叫子牙河。可是，天下的水，都是我们从这里流过去的。我看着那里的河水，也像看着亲眷一样。经过水淀，大个蚊子追赶着我们，水拨子载着西瓜、香瓜、烧饼、咸鸭蛋，也追赶着我们。夜晚，月亮升起来了，人们也要睡觉了，在一个拐角地方，几个年轻的妇女，脱得光光的在河里洗澡哩，听到了船声，把身子一齐缩到水里去。还不害羞的对我们喊：不要往我们这里看！”

“说实在的，我们平原上，是多么广阔和散心啊！”老温仰头望着高高的、像淘井的时候看见的天空。

“我并不想搬到你们那里去住。”老佃户说，“那里道路太多。我们这里，不管通到哪里，就只有一条路，你就放心大胆奔前走吧！哈哈，我这是说笑话儿了。”

他们蹚着水顺着山谷往前走。山谷里闷热。脚下的烂叶，也在蒸发。天空出现了大块黑云，压下来，像一架大夯一样。老佃户说：

“不好，要变天了。我们赶紧上山。”

老佃户走得很急，像有什么追赶他，跑出山谷，爬上一条山道，他攀着石角猛上。老温还没有穿上鞋袜，跟在后面说：

“你别安心拉扯我吧，就是下雨，这里也不会发水冲房。”

“你没有吃过什么亏，就不知道对什么害怕。”老佃户说，“赶快走，不然我们就会过不了前边的河。”

四面的山峰全叫阴云盖住，雨声就在耳朵里怪叫，可是并没有一滴落在眼前。他们爬过山梁，老佃户带他们急急的过了河。这是滹沱河的前身，现在水还只涨到膝盖以下，可是在过河的时候，老温跌倒了好几次，那水流好像叫什么大力量压下来，一人高的石头，在河身里翻动着。他们过了河，又急急上山。直等爬到山顶，雨也下起来了，老佃户才停下来喘喘气，对老温说：

“往上流看，现在你可以看看山里发水的情形了。”

在大雨里，老温转身看滹沱河。山洪像一堵横泥墙一样，从山谷压下，水昂着头，一直漫到半山腰。水往下行走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声响，可是当水头接近他们站着的山脚，他们觉得这座山也摇动起来。洪水上面载着在山沟潜没多日的树枝树叶，载着整棵的大树，载着大大小小的野兽牲畜。

“多么危险哪！”老温打了一个寒噤说。

“这场水是发大了。”老佃户说，“你们那里也要受灾了。”

“不知道我们那里堤修得怎样？”老温担心的问芒种。

芒种只是直着眼望着那向东方奔溢的洪水，没有回答。

八十

部队爬到了长城岭上的关口。这个古代的关口，它的本身并不高大，像一个小小的城门洞。它的关系重大，成为攻战的焦点，是因为它所处的这极端险要的地位。

古长城沿着山顶的外斜坡筑起来，也并不显得很高大，它的防御的能力，同样表现在它是建筑在这样连绵起伏的高山上，它所凭依的山峰是群山中的突起的脊骨。这山好像不能再高再险了，而在它的上面又筑起了堡垒，守卫了兵士，施展了弓箭。

长城和关口都有些残破，砖石被风雨侵蚀，争战击射，上面有很多斑驳。通过关口的石道，因为人马的践踏，简直成了一道深沟，可以想像，曾经有多少人马的血汗滴落在上面。在洞口石壁上，残存着一些题诗，一些即兴的然而代表征人的想像的断片的绘画，一些烽火熏烤的乌烟。

风从关口外面吹进来，关口外面是应县大川。河床宽阔，布满乱石，河身不定的桑干河水，流在南北相峙的高大的山峰之间。河水很有力，冲击着乱石，在夕阳照射下，翻起滚滚的沙浪。河上有一排刚刚打好的长长的木桩，沿岸的居民正在上面铺搭木板，以备部队通行。

站在关口回望，在关里，除去那挤到一块的一排排的山谷山峰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那些人烟，那些河流，完全隐蔽起来了。太阳还没有落下，圆圆的月亮就出现了，她升起的很快，好像沿着长城滚过来。有一大群山羊，这时还没有下山，黑色的羊群在岩石上跳跃着，沐浴在落日的红光里。那个背着水斗饭袋的中年牧人，抱着牧羊的小铲，向着阳光坐在长城的墩台上。你啊，是回忆着古代的频繁的争战？还是看见新的部队出关，感到你和你的羊群有了巩固的保障？

战士们在关口休息了一下，他们爬上城墙，抚摩着那些大砖石。不知道由于什么，忽然有很多人唱起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来，一时成为全连全队的合唱。他们的心情像长城上的砖石一样沉重，一种不能遏止的力量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鼓荡着，就像桑干的河水。歌声呀，你来自哪里？凌峭的山风把你吹到大川。古代争战的河流在为你击节。歌声呀，唱到夕阳和新

月那里去吧！奔跑在万里的长城上吧！你灌满了无穷无尽的山谷，融化了五台顶上的积雪，掩盖了一切的呼啸，祖国现在就需要你这一种声音！

出关以后，往下去的道路很陡很难走，但部队很快就从一个山谷里走出来，到了宽阔的川里。过了流沙乱石的桑干河，沿着北山坡向西走，远远的前面有一个大村庄，显出一带红色的围墙和一片金色的脊顶，那是一座大寺院。

进村的时候，部队通过一座上面有雕刻得很好的栏杆的石桥，溪水在下面流过，它那清澈的水色和淙淙的声响，很能解除人们的长途行军的疲乏。

在寺院的山门前面有一个大场院，这场院的规模，叫芒种和老温看来，简直不亚于他们当雇工时从事劳动的场所。场院里有几垛莠麦秸和玉米秸，有十几个农民正在那里收拾晒好的粮食，有一个中年的僧人，手里拿着念珠，在那里监视着。

“这都是寺院的佃户。”部队里有个山西人对老温说，“这里的大寺都是地主。”

那个拿念珠的僧人不断的向战士们合掌致敬，含着笑说：

“同志们，辛苦。团部就住在寒寺里，你们也可以休息了。”

部队在这里过夜，上级告诉战士们要尊重佛教

的风俗，保护寺院的文物。那位僧人是大寺的“总务”，临时兼着村庄的粮秣委员。

“我们欢迎抗日的部队。”总务僧人对战士们说，“我们寺里就可以住下一个团。”

这个僧人还分班率领战士们各处参观。战士们并不进到佛殿里去，只是站在庭院中间，看看那些精雕细镂的红油隔扇，和殿顶上光亮耀眼的琉璃。老温问：

“为什么盖房用那样大的瓦块，总有五斤重一个吧？”

“这里好刮大风。”僧人说，“瓦轻了就叫北风卷走了。”

僧人在战士们面前，很像一个村干部。今天的晚饭是：莜麦面荷拉，素炒茴子白。

吃过晚饭，老温看见他们住的偏院里有几匹马，缰绳系在大石碑座上。几个通讯员站在旁边。

“哪个的马？”老温兴致很高。

“地委书记和专员的。”一个通讯员说。

“借你那手电筒照照。”老温说，“我看看你们这牲口。”

通讯员只好给他一个一个照了照。

“喂得很好。这地方草肥。”老温说，“这匹白的一定走得好，就是脑袋长得笨了一些。”

他说完就到屋里睡觉去了。这一条大炕上，还睡着十几个小和尚。那些小孩围着战士们，不肯去睡觉。老温说：

“像你们这样大小的，一共有多少？”

“可多了。”孩子们说，“十五岁到十八岁的就有一百多个。”

“你们愿意当八路军吗？”老温说。

“愿意。”孩子们齐声答应，“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没有办法才当和尚的。我们愿意跟你们走。”

这一晚上，老温想起了童年见过的那些佛事：超度和经棚。他听到了前院佛堂里的诵经声，他忽然想到了他那在子午镇的妻子，好久不能睡着。他想：明天请芒种给家里写封信吧，把在这山地里见到的一些新鲜事由，说给她们听。

八十一

自从门婿高疤叛变八路投降了张荫梧，经常在附近扰乱，俗儿也跟着走了，乡亲们早把他们看做汉奸，老蒋却并不以为耻，那团长老丈人的身份，也不愿下降。他自己想：女婿是“中央军”，这比起过去响马时代，自然是一种明显的高升，就是比起在八路的时候，论官职势力，也不见得就已经低人一头。别人议论是别人议论，最后的胜利，也许说不定就落在老蒋的身上。女儿随夫潜逃，他也不觉得是她的失算，还认作这也是跟着男人走马上任，是他蒋门的无上光荣哩。

在村里，他还是倾向田大瞎子。田大瞎子自从芒种、老温相继参军，老常当选村长，一力向外，这老奸在农业经营上，有了个退一步的策略。他觉得这年月，多用长工，就是自己在家门里多树立对头人，非常不上算。可是不用人，这些田地又怎样收拾？田大

瞎子并不愿意卖地变产，他觉得这份祖业不能从他手里消损丝毫。他屡次从祖先家簿上查考评定，他这一代，还应该算是手头上有几招的人物，绝不能轻易就向这群穷光蛋低头认输。可是近来负担也实在重，八路军的合理负担，非常不合理，不用说了；中央军偷袭，日本侵占县城的时期，村长是由他的手下老蒋担任，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蒋政权了，汉奸日本人对他也并没有放松。因为论起油水，有眼的人就会看到，在子午镇，只有他家的锅里汤肥。村中地亩册上既然登着三顷地，多么有人情，也得出血。

田大瞎子想减轻一点负担。他想了一个既下落败家的声名，也不减实际的收入的办法，左掐右算，觉得万无一失。然后置办了一桌酒饭，找了个晚上的工夫，把老蒋请了来。

“好久不喝你的酒了。”老蒋好像很抱歉的说，“今天为什么这样高兴？”

“高兴什么？”田大瞎子说，“我是找你喝杯愁闷酒。”

老蒋也就装起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以适应主人的心情。并且大箸夹菜，大口喝酒。

“小口着点。”田大瞎子严肃的说，“我们是壶中酒，盘中菜，细水长流，光为的多说说话儿。”

“有话就说吧。”老蒋放下筷子。

“我想卖给你点地。”田大瞎子又把那一只好眼闭起来说。

这对于抱了田家多年粗腿的老蒋来说，简直是完全出乎意料。

“不要开玩笑吧。”他说。

“是实在话。”田大瞎子说，“我不愿意多用人。多用一个人，就多一个出去开会的，田里的庄稼还是收拾不好，生气更是不用提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老蒋首肯。

“因为这样，我想卖地。”田大瞎子说，“我家没有坏地，当年买地的时候，都是左挑右拣，相准了才买的好地。我卖出去，自然也得找个相好知心的主儿，便宜不落外人。现在村里，就是咱两家合适。”

“可是，就是你肯，我也没钱呀！”老蒋说。

“当给你。价钱定低一点。”田大瞎子说。

“我一个钱也没有。”老蒋说。

“那我就不要你的钱。”田大瞎子说，“你只挂个买地的名儿，地让你白种。”

“打的粮食呢？”老蒋说，“负担呢？”

这是个复杂的难以议定的条款，直到半夜，老蒋才自认帮忙，答应下来。走出大门，他觉得田大瞎子，实在不好惹。

达成的协议是：畜力由田大瞎子担负，打下的粮

食，除去支差交公粮，全在夜间背到田家。如果不方便，则由老蒋背到集上出柴，把粮价交来。老蒋想：这真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，只是为了“交情”，他不好反驳。

确定的地块，是老蒋家房后身那三亩。这确是一块好地，原是老蒋的祖业地，那年水灾，老蒋没吃的，又要陪送长女，磨扇压着手，田大瞎子乘人之危，捡便宜强买过去的。现在，他叫老蒋在亲人的骨肉上，挂上虚假的招牌。虽是老蒋，也觉得有些难过。

一切仪式，全像真事那样进行。规定了一天，在老蒋家里摆买地的“割食”，请到了地的四邻，中人很不好找，也算找到了两个。酒饭是老蒋预备，田大瞎子花钱。吃罢饭，写了文书，点了地价，这钱自然也是演戏的道具。

老蒋也有他得意的地方。无论如何，从今天起，村里传出这样一种风声：田大瞎子不行了，现在去了村北的地；买主是老蒋。除去两顿酒饭，这一点虚荣，也够老蒋过几天瘾。

一到开春，老蒋借来田家的牲口，把地耕耙了一下。田大瞎子不放心，站在地头上，问：

“你打算在这块地里种什么？”

“你说哩？”老蒋小声说。他没使过大牲口，只担心骡子惊犁。

“随你种什么吧。”田大瞎子转脸往家里走，“看你耕的地，还不如狗舔的匀实哩！好地也得叫你糟蹋了。”

这块地头起有一条绕村边走的小道，断不了有路过的人。有和老蒋认识的，看见他耕作，觉得新鲜，就停下来问：

“老蒋，给田家做活吗？”

“你怎么看我是给他家做活？”老蒋翻着白眼说，“我自家的活儿，还做不过来哩！有对事儿的人，你给我留点心，我想雇个月工哩。”

“新买的地吗？”行人问。

“对啦，你们村里有去地的户，也给我注意点。地块大小没关系，最好是离我们村边近点，种着方便。”老蒋说。

“大骡子也是新买的吗？”行人笑着问。

“这还没定准。”老蒋说，“先拉来试试。这牲口，碾磨上倒好，拉犁有些瞎仗。你看到有合适的好牲口，也给我注点意。”

老蒋东一犁西一犁的耕完地，又累又饿，把牲口牵还田家，不想回家做饭，就到了西头卖烧饼果子的何寡妇家里。何寡妇正坐在门限里，用手数那卖剩的“货”。见老蒋进来，连头也没抬。

“你说，人就是这样，”老蒋大声说，“没地的时候

候想地，等有了这么几亩啊，可也真够操心受累。”

“听说你要了地。”何寡妇数完货，把那装货的油柜子抱在怀里说，“真的吗？”

“有那么几个闲钱。”老蒋有些抱怨的说，“我本想存在你这里换烧饼吃，可是人家劝我置些产业。现在交完地价，还剩这么个零头，要是换烧饼，就够我吃这么一年二年的。先来一套。”

他过去掀开何寡妇的柜子，挑好一个烧饼一个果子，夹在一起，“蛤蟆吞蜜”的吃起来。

“再来一套。”吃完了说。

“可是要现钱哪！”何寡妇说。

“崩不了你。”老蒋站起来一抹嘴，“明天我一总把钱带来，把钱放在你这里我放心。你最近出去说媒来没有？”

“你问那个干什么？”何寡妇说，“现在可不兴那个了。”

老蒋笑嘻嘻的说：

“你看我种上这么几亩地，顾了外头顾不了家里，做半天活儿，谁还愿意爬锅做饭？有合适的，你给我说个人儿。”

“哪里一下子就有合适的，”何寡妇说，“你有钱就每天到我这儿吃烧饼吧。”

“那也行。”老蒋往外走着说，“可也不是长远办

法。你留点心吧，咱这年纪，大闺女是不好说了，弄个寡妇什么的，我看满行。”

八十二

老蒋的行迹和关于他的风传，引起村中很多人怀疑。有人猜是那汉奸女婿给他捎来的款子，不知道有多少。嚷嚷的厉害了，村治安员也来找老蒋谈了两次话。

起初，老蒋对于那些传闻，暗暗得意，还不断造作一些新的材料，促使那传说更为有声有色。可是一到治安员要和他谈话，他就恐慌起来，甚至想消声敛迹，也觉得来不及了。

在这些村干部里面，老蒋最怕的是治安员。老常虽是主要干部，那原是个老实人，嘴头上不行，心地更良善。春儿虽说兼着小区委员，嘴头上也不让人，可到底是个女孩儿家，好脸热害羞，老蒋也不大怕她。唯独这个治安员，他觉得最难对付。说起来，治安员也是个庄稼人，小的时候在外面学过几天手艺，见了人也不好说话，可是那眼睛总好像是在打量着。

每逢遇到他，老蒋不知道为什么，总不期然而然的，对他表示十二分的客气，从心里又愿意远远离开。

治安员头一次来了，没说什么，屋里院里转转。老蒋说：

“治安员，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没事，闲转转。”治安员说着走了。

第二次又来了，坐在炕沿上抽了好几锅烟。老蒋觉得他那眼把山墙立柜都看穿了。又问：

“治安员，有事吗？”

“听说你要了几亩地。”治安员说。

“是要了几亩。”老蒋对答这个问题，早有几分准备。“我从心里是赞成抗日的，八路军给了我很大教育。这年月，闲人懒人吃不开，谁也得抗日生产。你知道，过去我游手好闲，帮财主家，吃眼角食，现在我要改邪归正，就要了几亩当契地。”

“你哪来的这些钱？”治安员问。

“这几年我省吃俭用，积攒了些。另外，那天在集上，卖了俗儿几件衣服。”

治安员没说什么就又走了。老蒋虽然对答如流，没有漏洞，可也总觉得这是块心病。他很后悔和田大瞎子订立的盟约。他想来想去，总得在这几亩地里找些便宜，不能完全按照田大瞎子那如意算盘去做，干担嫌疑。他决定在这三亩地里栽瓜，为的一来可以零

卖些钱混点账，另外这一夏天，可以闹他个“西瓜饱”。

可是说起栽瓜来，他更是外行。他只知道什么瓜种好吃，究竟瓜籽怎样安法，尖朝上还是朝下就把不定。另外，想到整天蹲在瓜园里松土压蔓，也实在腰痛。他想搭个伙计，自己当个不大不小的东家。想了半天，他想起春儿的爹吴大印。这老头子年上从关外回来，呆在家里没事做，是百里不挑一的种地的好手，为人又忠厚让人。老蒋就找他去商量。非常顺利，吴大印一口答应了。

春儿不大赞成，她说：

“你和谁搭不了伙计，单招惹他？那地是怎么来的，和田家有什么干涉，你弄的清吗？”

吴大印说：

“咱管不了那么多。咱凭力气吃饭，按收成批钱，他搅赖不了我。咱家里地少，又添了你后娘一口人，你经常出去工作，不能纺织，生计上也有些困难。咱家这么点地，够我种的？我闲着就难受。”

“那你还是和老常叔商议商议去。”春儿说。

找到老常，老常说：

“可以办。这地的事，反正有鬼，慢慢咱会看出来。可是和老蒋搭伙，收成了，他不能让咱吃亏。现在政权在咱们手里，不怕他。”

吴大印就到地里栽瓜去了。大印是内行，甜瓜籽净找的谢花甜、铁皮沙、蛤蟆酥、白大碗。西瓜也是找的黑皮、黄瓢、红子儿、又甜又耐旱的好种儿。养出了水芽，班排齐整的种到地里去。

吴大印在瓜园里工作。他种的瓜，像叫着号令一样，一齐生长。它们先钻出土来，迎着阳光张开两片娇嫩的牙瓣儿，像初生的婴儿，闭着眼睛寻找母亲刚刚突起的乳头。然后突然在一个夜晚，展开了头一个叶子。接着，几个叶子，成长着，圆全着，绿团团的罩在发散热气的地面上。又在一个夜晚，瓜秧一同伸出蔓儿，向一个方向舒展，长短是一个尺寸。吴大印在每一棵瓜的前面，一天不知道要转几个遭儿。

子午镇的人们，都把这瓜园叫做吴大印的瓜园，似乎忘记了它的东家。老蒋成了一个甩手掌柜，就是想帮帮忙，吴大印怕他弄坏园子，也就把他支使开了。春天天旱，吴大印浇水勤，瓜秧长得还是很好。四月里谢花坐瓜，那一排排的小西瓜，像站好队形的小学生一样。

他们在瓜园中间，搭起一座高脚的窝棚。五月里，因为地里活儿多，吴大印和老蒋轮流着看园，一个人一晚上。在乡下，瓜园的窝棚里，曾经发生过多少动人的有趣的故事啊。现在，他们的窝棚，却成了子午镇两个对立的政治中心。

每逢吴大印值班的时候，窝棚上就出现了老常和村里别的干部，春儿和那些进步的妇女们。老蒋值班的时候，围在窝棚上的就是他那些朋友相好，田大瞎子有时也在座。

有一天晚上，月亮圆了。田大瞎子喝了几盅酒，到窝棚里来，他忽然想做几句诗，对老蒋说：

“咱两个做诗吧。”

“我哪里会做诗呢？”老蒋说，“平常话我还说不通顺哩。”

“瞎编就行。一人两句。”田大瞎子说，“我先来：长工去开会，水干没人挑。你来。”

“你成心憋我。”老蒋说，“我就来两句：小伙子唱歌喊劈嗓，小媳妇跳秧歌扭断腰。”

“意思不错，就是句子不齐整，”田大瞎子说，“你这叫大鼓词，不叫诗。我接下去吧：提倡三八制，草苗一般高。”

两个人正做诗，有人站在地头上喊：

“今日个谁值班？”

老蒋一听是个村干部，就说：

“今天是我；明天你再来吧。”

那人就不言语，走了。

“你家姑爷有信来吗？”田大瞎子靠近老蒋小声说。

“没有哩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”老蒋叹气说，“要有他在近处，我会受这个洋罪？”

“不远。”田大瞎子说，“你知道吗？中央军的势力，现在可大多了。除去张荫梧总指挥，还有石友三司令，听说过吧，过去和你家姑爷是一道。还有庞炳勋、朱怀冰，还有丁树本、侯汝镛，还有赵云祥。现在这些队伍都集中到一条线上，就要开始了。是这么个阵势：中央军从南往北，日本人从北往南，把八路夹在中间，用力一挤，完蛋。”

“这是准信？”老蒋问。

“耀武打发人来报的信。”田大瞎子兴致很好的回家睡觉去了。

八十三

五月的瓜园，是将近成熟的，丰盛茂密的，虫鸣响遍的，路人垂涎的。甜瓜，最大的一代，皮肉开始松软了，香味在夜间冒得很浓。西瓜已经从叶蔓里露出那鼓鼓的、汪着露水的肚子，懒洋洋的躺在干松的畦背上。而它们那蔓子的尖端，还是高高昂起，开放着香的、充满水份的、挑战性质的花。它们那无忧无虑的、目空一切的、充满自觉的神态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拿在路上遇到的那些昂头走过的少女们来比喻。

今天晚上，坐在瓜园里窝棚上看瓜的是春儿。春儿从部队回来，担任了妇救会的小区委。因为工作的头绪纷杂，是很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坐坐和想想了。今天，父亲有事，她答应替他到这里来。

可是，她刚刚爬到窝棚上，凉风刚刚把她身上的汗吹干，一个女人就到这里找她来了，那是老温的老

婆。

“你的孩子哩？”春儿问她。

“在院里床上睡着了。”那媳妇说着也爬上窝棚来，坐在春儿的身边。不知道为什么她们的脸都望着西边，有一股红云，还在那边天际留恋着。

“你找我有事情吗，嫂子？”春儿问。

“没有事情。”媳妇说，“好几天了，我就想找你在一块这么坐一会，不是你没工夫，就是我没工夫。我们这样在一块坐坐多好啊，你就像我的亲妯娌一样。”

春儿拉过她的手来。

“我们就是姐妹。”那媳妇说，“芒种和老温在外边也就像是兄弟一样，不知道他们现在分开了没有，我就是不愿他们离开。”

“不会离开的。”春儿说。

媳妇说：

“山里不知道离我们这里到底有多远，这样看着是多么近啊，云彩下边就是山，可走起来一定很远。人要是能像鸟儿一样多好啊。我们早该给他们写封信了。”

“我给你写一封。”春儿说。

“我们写在一块。”媳妇说，“话是一样的，末了落上我们两个的名儿就行了。”

然后她们就不说话了，望着西面。月亮在流散的乌云里，急急的穿行着。

媳妇始终很高兴，她觉得和这运命相关、情感接连的人在一块，是很幸福的，她的要求并不多。她对春儿说：

“我近来很愿意学习，每天学几个字，你告诉我：保卫的这个卫字儿怎么讲？”

“保卫和保护差不多。”春儿说，“卫字更有力量。敌人侵略我们的祖国，为了保护它，我们要用一切办法一切力量打击敌人，向敌人进攻，这里面就有卫的意思了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媳妇说，“芒种和老温是保卫祖国去了。打个比方，我们看着瓜园，也可以说是保卫吗？”

“当然也可以。”春儿说，“瓜园的敌人就是那些獾、猪、刺猬，我们就是向它们进攻的战士。”

媳妇说：

“瓜园虽然小，也是你们一家人辛辛苦苦栽种来的，再说，坐在这园子里，心里是多么舒坦哪！我们不要说话了，就这样坐着吧。”

媳妇两手搬着腿，头望着天。月亮钻到一大块黑云彩里，一时露不出来了。

这园子两面叫高粱地夹着，北头是一块谷地，风

从那里吹过来。天气凉快了，草虫们的声音也就疏稀了。媳妇听见，靠东边高粱地那里的瓜叶哗啦响了一下，接着“格巴”一响，那是西瓜断蔓的声音。

“有人爬瓜了。”她轻轻对春儿说。

“也许是一个獾。”春儿小声说，“我们去看看。”

“我不敢去。”媳妇说，“叫它咬一口怎么办？”

春儿轻轻从窝棚上跳下来，小心不踹响瓜蔓，轻轻的推开高粱叶，从高粱地里绕过去。她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爬在地下，半截身子伸到瓜园里，扒着一个大西瓜，从瓜园里蜷伏着退回来。春儿把一只脚踏在那个东西的脊背上，那东西叫了一声。

这声音不像獾，也不像刺猬。可是它只叫了一声，就再也不响。这种情形，倒使春儿有些害怕，她喊叫老温嫂子快来。好久，那媳妇才哆哆嗦嗦来了，月亮也闪出来，春儿看出爬在地下的是一个女人。

这女人把脑袋钻到地里，死也不回头。春儿硬拉她起来，还安慰她：

“你要是饿了渴了，吃个瓜不算什么，就是不该偷。”

那女人转过脸来，裂开嘴一笑。媳妇和春儿都吓得后退一步，原来是高疤的老婆俗儿。

俗儿想逃跑，春儿追上捉住她，说：

“你偷瓜是小事，你得告诉我，你从哪里来，来

干什么？”

“你管得着我从哪里来？”俗儿掸掸身上的土，一本正经的说，“谁偷你的瓜来？你攥住我的手了吗？”

“这还不算捉住你？”春儿说，“今天晚上，你得交代明白。”

“我没什么可以对你交代的。”俗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梳子，悠闲的梳理着她那长长的拖散到肩上的头发。有一股难闻的油香放散出来，春儿打了一个嚏喷。俗儿越说越振振有词，她说，“这是我的家，我愿意什么时候回来，就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“你的家？”春儿气得说话有些不俐落，“你在深县境绑过人家的票。”

“你捉住我了？”俗儿说，“你就是会给我扣帽子，你纯粹是诬赖好人。我不和你说，我们到区上县上去说，我们去找高庆山，我们去找高翔。多么大的头头儿我也见过，他们对我都是嘻嘻哈哈的。走，走，我不含糊！”

春儿不放她，紧跟在她后面。到了街口，正有几个民兵巡逻，春儿交给了他们。俗儿哼哼唧唧，想对那几个小伙子卖俏，民兵不理她，伸过几只老粗的胳膊来，她才着了慌。

“春儿大妹子，你不能这样！”她回过头来说，“你得看点姐妹的情面。想当初，咱两个一同参加抗

日工作，是一正一副，不分彼此。再说，我对你们家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，那一年咱秋分大姐，立志寻夫，是我成全了她，不然你们会打听高庆山的真实下落，一家人接头团聚？人有雨点大的恩情，应该当海水一样称量，谁走的路长远，谁能到西天佛地。春儿妹子，你救救我吧！”

春儿没有说话。民兵们把她带到一所大空屋子里，俗儿一看，一条大炕上，铺着一领烧了几个大窟窿的炕席，就对民兵们小声唧唧的说：

“你们叫我在这里睡觉吗？我一个人胆儿小，你们得有一个人抱铺盖来和我做伴儿，才行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们在外面给你站岗。”民兵们说。

俗儿被捉，老蒋正在田家，陪着田大瞎子说反动落后话儿。田大瞎子的老婆，过去很少出门，现在每逢家里来人，就好站在梢门角，望着大街上，一来巡风，二来听个事儿。她回来给老蒋报信。老蒋正在“感情”上，一跳有多么高，大骂。

田大瞎子拦住他，小声说：

“蒋公，不能这样。我们现在是要低头办事。你先到街上去听听看看，无妨和那些干部们说几句好话，保出俗儿来。我担保，俗儿此来，必负有重大任务，一定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。暗暗告诉她，这回千万不要再坦白。”

“我不能向他们低头！”老蒋大声呼喊，“在家门上截人，这是他妈的什么规程！”

可是，等他跑到民兵队部门口，一看见有人站岗，他的腿就软了，说什么再也跳动不起来，像绷在地上了一样。胡乱问答了两句，他扭回头来去找吴大印。说：

“大印哥，咱弟兄们祖祖辈辈，可一点儿过错也没有。现在又同心合意，经营着一块瓜园。刚才听人们说，春儿叫民兵把你侄女儿捉了起来。大哥，我求求你，叫他们把俗儿放了。”

吴大印正睡得迷迷糊糊，也不知道哪里的事，就问：

“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”

“就为俗儿摘了咱那园子里两个瓜。”老蒋说。

“这还值得。”吴大印穿衣裳起来，“别说两个瓜，就是十个也吃得着呀！”

“你看，他们就是这样，随便捉人。”

“我去看看。”吴大印开门出来。

老蒋顺路又叫起老常来，一同来到民兵队部。

春儿对他们说了俗儿和高疤在深县绑票的事，主张送到区里，详细问问。俗儿坚决不承认，并且说，她因为高疤不正干，已经和他离了婚，自己跑了回来，路上又饥又饿，到了自己村边，想摘个瓜吃，就

闹成这样。

老蒋说：

“送到区上去干什么？自己村里的事，就由你们几个大干部解决了吧。我先保她回去，随传随到行不行？”

吴大印不愿意得罪乡亲，也说：

“那样好，春儿，就那样吧。”

春儿反对。她说：

“爹，你不知道底细的事，你不要管，回家睡觉去吧。老常叔，你说怎么办哩？”

“我同意送到区里。我和民兵们去。”老常说。

俗儿在区里押了几天，河里的水就下来了，区里忙，来信说，问不出什么来，一个浪荡娘儿们，讨保释放吧。放她回来了。

八十四

这一年，冀中区有严重的水灾。一夜的工夫，滹沱河的洪水，经过代县、崞县、定襄、五台、盂县，从平山入冀中，过正定入深泽。一夜之间，五龙堂的河流暴涨了。

高四海家堤坡上的小屋，又被连夜的大雨冲刷着，高四海坐在炕上，守着窗户，抽着烟，倾听着河里的声音。从雨声和河水声里，他又预感到了今年的水灾的严重。

秋分也起得很早。

“看样子等不到天明。”高四海从炕上下来，戴上破草帽，提起放在墙角的那面破铜锣，站到堤坡上敲了起来。

这是习惯的专用的号令。五龙堂的居民，一听到这种锣响，从梦里惊醒，跳下炕来，抓起女人们急急递过的破草帽、破布袋片、铁铲、抬土筐，打开大门，

蜂拥着跑到堤上来了。

人们都集到大堤上，妇女们手里提着玻璃灯笼，灯光在风雨里闪动着。人群的影子，一时伸到堤外河滩，一时又伸到堤里的坑洼。人们抬土培挡堤身，寻找缺口獾洞，踏实填补。

子午镇的居民，也在这一天夜里动员起来，抢修大堤。春儿领着妇女们，冒雨在大堤上工作。

全村各户都出了人工，只有“蒋先生”在这纷乱的时刻，躺在他那小小的世外桃源里。

半夜的时候，原是吴大印看园睡在窝棚里，他听到五龙堂的锣声，吃惊的坐起来，望着这辛苦了几个月的瓜园发怔。瓜园是在接近收获的时候，遇到了灾难。他咳声叹气，可是当老常呼喊他去组织人挡堤的时候，他就背上改畦的铁铲到街上去了。路过老蒋的家门，他把老蒋叫了起来，说：

“我和人们去挡堤。你到园里去看看，水要过来的快，你把那些大个儿的瓜摘摘，还可以腌一冬天咸菜吃。”

起初，老蒋不愿意起来，他不相信河水会下来，他说：

“这又是八路军的故事，造谣！他们总是这样，日本还没来，他们就嚷嚷抗日，结果日本真的过来了；敌人的汽车还没影儿，他们就嚷嚷破路，结果敌人的

汽车真的闯来了。没事儿招灾，这就是他们的法码。我推算，今年还不到发水的年头儿。他们就又在那里号召了，一定得号召的王八领下水来才甘心，你听五龙堂的破锣响的多不吉利！”

当他后来看到不去瓜园，就得去挡堤，才选择了前者，躲到瓜园里去。这时雨下得小些了，天阴得还很沉，老蒋爬上窝棚，想钻到吴大印留下的热被窝里再睡一觉。一下雨，蚊子都集到这里来了，不管鼻子嘴里乱撞，他只好坐着。大堤上，人声铁铲声乱成一个，看样子，水也许会发的，老蒋想。

他从窝棚上跳下去，在瓜园里踩了一趟。他把白天记住的几个快熟的瓜摘到窝棚上来，抹抹泥，接二连三的吃了，算是完成了吴大印交给他的任务。对于瓜园是否被涝，老蒋简直没有任何的烦忧，他认为地既然是田大瞎子的，涝了没收成也是他家的事。至于辛苦劳力的白搭，那又是吴大印的苦痛，与自己冷热无干。

近来，老蒋对吴大印，心怀不满。老蒋这个人物，生平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要死心塌地记住别人的缺点。他未曾认识这个人，就先打听这个人的短处，和人接近、交谈，甚至家庭拜访，也都是为了搜集这方面的材料，记到他那一本小小的心账上。他记取别人的短处，不分大小轻重，方面很多。比如谁的祖先讨过饭，

谁小的时候好顽皮挨打，谁怕老婆，谁不会算账，谁咬字不真，谁好叫错别人的名字，他都记在心里。没准备和这个人相交，就先意想到发生分裂，一遇到和这个人发生纠葛的时候，他首先就把这一段缺点提出来，好使对方低头，达到他的胜利。他曾经有不少次的得意记录。老蒋利用别人的缺点，培养自己的优越感觉，他把别人看低一点，就好像自己高出了一头。为此，就是在集上庙上遇到生人，他也不放过观察探问那个人的过错。他把这个法门叫做抓小辫，是一种战术，机谋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：“你哪一壶不开，我就先给你提出哪一壶来。”

老蒋的作为，如果止于此，那还不失为实事求是，顶多算是尖刻而已。并不是这样。他在这方面的品格是：对于比他强大的人，即使是一壶冷水，他也不敢去动，反而要当众恭维一番，惟恐不及。他那一套谄词媚态，叫当事者听来看来，即使像田大瞎子那样奸伪狂妄的人，也会感到十分肉麻，愧不敢当。对于他认为弱小的人，老蒋的习惯则是：无中生有，造谣中伤。

在世界上，因为有老蒋这样的人物存在，使很多善良的人，不得不相信了“人性恶”的古语。一只苍蝇，在一幅绘画上拉下一滩屎，一只耗子，在夜间撕裂一件绸衣，在它们，只是出于一种习惯，对很多人，

就常常成为不能弥补的损失和伤痛。

关于吴大印，老蒋实在找不出他的什么过错来。虽然问过几个比他们年岁还大的人，也都说大印从小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，简直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儿。老蒋也明白自己所以怀恨他，只因为他是春儿的爹。可是在目前，能把这个做为吴大印不能见人的缺点在大众面前提出来吗？那简直是要自找苦吃了。

这样，他又只好希望有什么飞灾横祸降落到这一家人的身上。他盘算：出气的道儿或者就在这次的奇妙的土地关系上。他可以和田大瞎子合谋，说这地原是死租，不管天旱水涝，一定得交租米。他完全可以从这纠缠里脱身出来，两面儿做好人。

想到这一步，老蒋不无得意之感，一撤身钻进窝棚，蒙头盖上吴大印的被子，那真是不管风声雨声、锣声喊声，也不管蚊虫的骚扰，只乐得这黑甜一梦了。

在梦中，起初他觉得窝棚摇摇欲坠，自己的身体也有凌云腾空的感觉，他翻了一个身，睡得更香了。忽然，他的左脸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，痛得入骨。他翻身坐起来，看见一只黑毛大獾带着一身水，蹲在他的枕头上。他的脚头起有好几只兔子，也像在水里泡过似的，张慌跳跃，它们把头往窝棚下一扎，又哆嗦

着退了回来。至于老蒋的身上，则成了百兽率舞，百虫争趣图：被子上有蚂蚱，有蜚螂，有蝼蛄，有蜈蚣，还有几只田鼠在他的身子两旁，来往穿梭一样跑着，吱吱的叫着。老蒋顿然陷在这样童话一般的世界里，还以为是在梦中，然而脸确实是叫獾咬破了，血滴了下来。他用手一推，那只大獾才跳下去：

“通！”

窝棚下面的水已经齐着木板，就要漫了上来。老蒋四下里一看，大水滔天，他这窝棚已经成了风雨飘摇中的孤岛，成了大水灾中飞禽走兽的避难所，他心里一凉，浑身打起寒颤来。

大水铺天盖地，奔东北流。有几处地方，露出疏疏拉拉的庄稼尖儿，在水里抖颤着。

瓜园早已经不见了，在窝棚上，老蒋啃剩的几片瓜皮，也叫兔儿们吃光了，老蒋一生气，把大大小小的动物，全驱逐到水里去。

大水吼叫着，冲刷着什么地方，淤平着什么地方。坟墓里冲出的残朽的木板，房屋上塌下的檩梁，接连的撞击着窝棚。老蒋蹲在上面，深怕它一旦倾倒，那就是他的末日到来了。

天忽然放晴，太阳出来了。情景更使人可怕。

八十五

老蒋立在窝棚上，在耀眼的阳光下，越过白茫茫的大水，望着村边。他望见子午镇西北角的大堤开了口子。这段口子已经有一个城门洞那样宽，河水在那里排荡着，水面高高的鼓了起来。

村里的人们站在毁坏了的大堤的两端，他们好像已经尽了一切力量，现在只能呆呆的望着这不能收拾的场面。可是，遮过大水的吼叫，老蒋听到了一阵可怕的声音。他看见人群骚动起来，有几个赤着身子的年轻人，抬起一件黑色的物件，远远的投掷到大流里去。

这个黑色的物件，像一只受伤的乌鸦没入黄昏的白云里，飘落到水里不见了。然后它又露了出来，借着水流转弯的力量，靠近了大堤。人群赶到那里去，那几个赤着身子的年轻人，把那黑物件重新抓了起来。

“再扔远些！一定淹死她！”

人们愤怒的急促的呼喊。老蒋看见村长老常在阻拦着，在讲说什么。

“她是个汉奸，谁也不能心痛她！”

他只能听见人群的呼喊，并听不清老常的声音。那个黑色的物件挣扎着，又被抛进水里。

老蒋站立不住，突然坐了下来。他看出那几次被抛到水里的东西，好像就是他的女儿。他记得昨天夜里，风雨正大的时候，俗儿跑到他的屋里来问：

“水下来，咱村要开了口子，能淹多少村子？”

“那可就淹远了，”老蒋当时回答她，“几县的地面哩。”

“什么地方容易开口？”俗儿又问。

“在河南岸，是五龙堂那里最险。”老蒋说，“在河北岸，是我们村的西南角上。五龙堂那里守得紧。我们村的堤厚，轻易不开。听老辈子人说，开了就不得了。”

俗儿低头想了一阵什么就出去了。因为女儿经常是夜晚出去的，老蒋并不留心就睡了。难道是她破坏了大堤？

老蒋再站起来，向着大堤那里拼命的喊叫，没有效果。他用看瓜园的木枪，挑着吴大印的红色破被，在空中摇摆。终于大堤上的人们看到了他，有些人对

着他指划着、说笑着、跳跃着。人们好像忘记了那个黑物件，它又被水流冲靠了堤岸，爬在大堤上不动了。

老蒋继续向堤上的人们呼喊求救，但是人们好像都要回家吃饭，散开了。老蒋这时才注意到了他的村庄。他看见子午镇被水泡了起来，水在大街上汹涌流过。很多房屋倒塌了，还有很多正在摇摆着倒塌。街里到处是大筐箩，这是临时救命的小船，妇女小孩们坐在上面，抱着抢出的粮食和衣物。老蒋跪在窝棚上，他祷告河神能够放过他那几间土房，但是他那窠巢，显然是不存在了。

他想如果是俗儿造的孽，那就叫人们把她抛进水里去吧。

老蒋在瓜园的窝棚里，饿了两天两夜，并没有人来救他。直等到水落了些，吴大印才弄着一只大筐箩把他和铺盖一同拉回村里去。老蒋虽然饿得一丝两气要死的样子，在路上还是关心的问：

“我一时不在，就得出问题。你们怎么这样麻痹，叫堤开了口子？”

“你不要问了。”吴大印说，“是你那好女儿办的事！”

“她一个女流之辈，怎么能通开一丈宽的大堤？你们不要破鼓乱人捶，什么坏事也往她身上推呀！”

老蒋说。

“她是一个女流。”吴大印叹气说，“可有日本和汉奸做她的后台哩！她带领武装特务放开堤，人家都跑了，就捉住了她。”

“俗儿死了吗？”老蒋流着眼泪。

“要不是老常，一准是淹死了。”吴大印说，“老常说应该交到政府，已经又送到区里了。”

原来，那天夜里，大水齐了子午镇大堤，风雨又大。春儿带着一队青年妇女守护着西北角。这段大堤原是很牢靠的，没顾虑到这里会出事，老常才把它交给妇女们。春儿是认真的，她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，晚饭也是就着冷风冷雨吃的。她在堤上来回巡逻，这一段堤高，别处不断喊叫着培土挡堤，这里的水离堤面还有多半尺，堤身上也没发现獾洞鼠穴。这一段堤里面因为多年用土，地势陡洼，春儿对妇女们说：

“我们要各自留心，这里出了事可了不得。”

夜晚守卫大堤的情景是惊恐的、冷凄的。水不停的涨，雨不停的下，只不停的刮。风雨激荡着洪水，冲刷着堤岸。

忽然，春儿在队伍里发现了俗儿。她穿一身黑色丝绸裤褂，打着一把黄油雨伞。

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春儿问她。

“你怎么这样说？”俗儿前走走后站站的说，“你

们敲锣打鼓的号召人们上堤，我自动报名来站岗，你倒不欢迎？”

“人已经不少了。”春儿说。

“抗日的事儿，人人有责任。”俗儿说，“只能嫌人少，不能嫌人多。有钱出钱，无钱出力。这是上级的口号。在抗日上说，我可一贯是积极的，中间犯了一点错误，我现在要悔过改正。”

“以后有别的工作分配给你吧。”春儿说，“现在不是闲谈的时候。”

“怎么是闲谈呢？”俗儿说，“我要重新做人，用行动来证明我的决心，你不能拒绝我！”

春儿整个心情关注在水上，她实在不能分出精神，和这样的人进行辩论。她离开了俗儿，小声告诉一个妇女自卫队员监视这个家伙。俗儿不能工作，反倒分了一个有用的人力去，使春儿非常烦躁。她预感到在这样的时机，俗儿会成事不足，坏事有余。

风雨越来越大，大堤上黑得伸手不见掌。妇女们提来的几只灯笼，被雨淋湿，被风吹熄了，再也点不着。人们都很着急，说：

“这样的天气，有个马灯就好了！”

“想一想咱村谁家有。”春儿说。

“田大瞎子家有一个，谁去借来吧。”一个妇女说。

虽然跑下堤不远就是田家的大门，可是谁也不愿意去。俗儿说：

“你们不去，我去卖个脸。这也是为了大家，我和他可没有联系。”

人们唆掇着她去，俗儿忽的就不见了。她去的时间很长，才慢慢回来。

“借来了没有？”人们喊着问。

“借来了。”俗儿拉长声音说。

“怎么还不点着？”春儿说。

“慌得没顾着。你们来点吧。”俗儿上到堤上来，把马灯放在地下。

“谁带着洋火？”妇女们围了过去。

“你们围好了点。我憋着泡尿，去撒了它。”俗儿说着跑到堤下面高粱地里去了。

洋火潮湿，风雨又大，换了好几个手，还是点不着。春儿急的过去，提起马灯来一摇，说：

“里边没有油？”

“那可不知道。”俗儿从高粱地里钻出来说，“抗日时期哪里找煤油去！这里给你们个火儿吧！”

随着她的话音，在大堤转角地方，发出一声剧烈的爆炸，接连又是几声。春儿赶过去，堤下响起枪来。大堤裂了口，水涌进来，男人们赶来时，破堤的特务们钻高粱地跑了，但终于捉到了俗儿。人们急着挡

堤，已经堵挡不住。群众提议，把她投到水里淹死。

等到大水成灾，房倒屋塌，庄稼淹没，人们更红了眼，天明时，几个青年人把俗儿架到堤上，投到开口的大流里去。

最后是老常把他们拦下了。

老常是属于那样一类人，他惯于相信那些好人好事，在他的思想感情里，人的善良崇高的品质能够毫无限制的发挥到极致。他记下古往今来他能够听到的、给人类增加光辉并给了人类真实广阔的生活信心的典范。这些典范事迹完全占据了他的头脑，以致使他对于坏人，即使是坏到这样程度的人，也往往从宽恕的地方去想。他不大相信，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坏人坏事。等到事实证明真的有了，他又暗暗难过，难过世界上为什么竟会有这样的人！平时，和坏人相值相对，吃亏常常是他，伤痛的自然也就常常是他了。

八十六

变吉哥和张教官过路以后，就服从分配到一家报社去了。

报社住在阜平康家峪附近的一个村庄，名叫三将台。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庄，靠着北山，房屋一部分在山脚下，一部分在山的半腰里。它又是处在一个山沟转弯的地方，山沟里有一条布满石头的小河哗哗的响着，新从平原来的人，夜间常常被这种激动的水声惊醒，就很难再睡了。村庄的前面，有一片芦苇塘，街里长着很多高大的香椿树。

变吉哥和张教官住在山腰上面一座孤立的白色小房子里。张教官做的是编辑工作，他正在和同志们讨论一本写给通讯员的小书。变吉哥做美术装饰工作，他替报纸设计了一套木刻的小栏头。变吉哥一旦对这种新的工作发生兴趣，就把编剧本完全忘记了，他整天和刀子木头打起交道来。

山脚下，在村庄入口的地方，有一家铁匠炉，掌柜的是从枣强县来的，娶了一房妻室，生了一个女儿，就在这里落了户。变吉哥一来就和这家人混得很熟，他自己从小没断在外边跑，对于带着手艺出门谋生的人的生活和心理，知道得很清楚。铁匠用自己多年保存的一些好钢材，替变吉哥打了一副木刻刀，完全按照华北联合大学木刻家们用的样子。

变吉哥还担任着机关的伙食委员，每天要有一部分时间在伙房里工作。那时的伙食是很简单的，每天两顿小米干饭，菜是两顿萝卜干汤。他除去有时帮助买办油粮柴菜，还有时蹲在门前小河中间的踏石上淘米。他从冀中带来一把很好的推子，每月给同志们理一次发，就是那些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，也赞美他的手艺。他闲暇时好坐在院里一个木凳上，叼着自做的烟斗沉思，有时候，请炊事员拉着胡琴，唱两段戏。

他对路东来的人，有一些乡土的情感。他给铁匠的全家画了速写像，还说可以刻成版画，于是那个年老多嗽的铁匠也对美术事业关心起来，成了这方面的热心家。有一天，铁匠从十几里路以外，扛来一根五手粗细的杜木树身子，把变吉哥叫去说。

“到木匠那里借个锯来，你看，这够你一辈子用了。”

“你怎么得来的？”变吉哥高兴的找了大锯来说。

“当柴火买的。”铁匠拉着锯说，“你听听这木头的声音吧，简直像青铜一样！”

一有工夫，两个人就拉大锯。有时铁匠有事，就由他那十七八岁的女儿来拉。把杜树锯成了大大小小的木板，变吉哥把它们搬运到自己的宿舍去，分别排列在后墙根。这是房间里的唯一的装饰，他的丰富的工作的资源。他的小屋没有窗户，原是房东的牛棚。变吉哥在原来的牛槽上搭好自己的睡铺，低矮的屋顶上，悬挂着牛具耕犁，起床的时候，他不能坐直，不然就会顶撞了这些器物。他把屋角的一条半截土炕让给老师了。

需要光线的时候，他就把门打开，这门正冲着山谷，变吉哥不分昼夜的在门前放一只小桌雕刻木板，一直工作到他的两只手颤抖得不能掌握。山谷对面的高山上，有一处通到平阳镇去的小小的隘口，远远望去，蓝天在那个地方特别发白，常常有一队队的驮子从那边爬上来吆喝着下山。夜晚，星星在那个地方显得特别明亮，月亮走到那里，就好像停留下来了。一到清晨，部队在河滩里跑步，枪枝和小碗不断碰在岩石上。大群的山羊像潮水一样从山脚下铺盖到山顶。变吉哥的工作，就是这些伟大的动荡的图画里的小小的点缀。

当他替铁匠的家人刻像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对铁匠的那位女儿，发生了一种深厚的缠扰的感情。当然，这主要是指创作而言。这女孩子在他看来，有一种特殊动人的美丽，是他多年绘画和雕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模写的对象。但是，他仔细观察他的画稿，不断改动着笔划，也还是不能称心如意的把女孩子主要的美点表现出来。眉眼是像了，嘴的轮廓也画得很好，但就是表现不出那支配一切、决定一切的、蕴藏在女孩子内部的那种精神来。这种精神，难道能用文字写在画幅旁边，作为附带的说明吗？

他仔细的观察了，也多次的去速写了，在这一段日子里，他不得不在清晨，去伴着女孩子在河边淘菜，黄昏，不得不站在山的转脚处，等候女孩子背一捆柴草下山来。然而，日子越长，只是加重了他对女孩子的好感，后来竟变成这样一种情况：女孩子一旦在他眼前消失，他就再也描绘不出她的形象来。

艺术啊，你那无往不胜、超众出凡的力量，究竟表现在哪里？通往你的殿堂的道路，为什么也这样曲折迂回？我怎样才能克服你那层层阻力，难攻的堡垒？我应该像作战一样，在战略上要长期经营，也就是精雕细琢；而在战术上采取出奇制胜，大笔一挥吗？

下午休息的时候，他有时一个人爬到东边最高

的山峰上去，那里有一座破落的山神庙，旁边有一堆乱石，上面插一些树枝，据说这也是古代的遗迹。他站在上面，眺望东方，天气晴和的时候，可以望见平原的边缘，然而也不过是一片红色的烟尘。他也怀念家乡，他觉得家乡的一切，现在想来都是天下最可亲爱最可珍贵的东西。

他也习惯了山地的贫苦，他觉得这里的居民，虽然因为地瘠山穷，思想和感情上都受了些限制，但他能了解他们的许多宝贵的品质和长处。他走在山沟里，虽然有时感到脑袋叫什么东西夹了起来一样，但他早就习惯了这里的环境：这些接连的紧紧拥挤着的山，这些曲折的艰险的羊肠小路，这些不断的踏着石头过来过去的小河。走在山沟里，常常见不到太阳，只能听到那哗哗流水使人心烦的声响。这里石头是黑的，道路两旁的花椒树是黑的，水是黑的，踏石上的滑脚的绿苔也是黑色的。

他来的时候妻子塞给了他一些钱，这是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。每当动用的时候，他就想起了她，想起了她那多病的身子，和她那为了他这个无能为的丈夫忍受了长期酸辛折磨的封建痴情。附近康家峪算是个比较大的村庄，那里有一家卖牛羊杂碎的小铺。有时，晚上饿了，他就约请一两个同志，到那里去吃一点。去的时候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像赴什么热

闹丰盛的宴会一样，在黑夜里蹚水过河，也不觉得寒冷，只要到那里多加一点辣椒，吃完在小铺的热炕上多坐一会就好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意见就不同了。有的青年同志就干脆向他提出批评，说他不耐艰苦，影响工作，变吉哥还得笑着做检讨。

八十七

去年缺少冬雪，今春山地觉旱，现在春苗还没有很好的播种。边区各机关动员干部就地帮助群众修田耕种。变吉哥被派到铁匠家里了。分配这些干部的时候，原有许多农民在场，有些手疾眼快的农民，把那些身强力壮的同志们先拉走了，变吉哥站在那里显得文弱而且害羞，就没有人来抢他，最后由晚来一步的铁匠的女儿收用了。变吉哥起初微微有些长工上市的感觉，后来碰到这个户主，他的兴趣就陡然提高了。

他跟着铁匠的女儿来到家里。

姑娘交给变吉哥一把鹤嘴铁镐，自己背上抬筐铲耙，叫母亲替同志做上饭，就说：

“走，到我们的地里去。”

从她家出来，他们沿着一条向上的小路爬山。这条小路只容下一个人行走，两旁是枯草和荆棘。小路

绕着山腰转，越转越高越险，低头一看，村庄已经在很远的下面了。

然后，他们走进一处小小的山坳。山坳里铺着一层厚厚的白沙，散布着几棵枣树。在向阳的山坡上，有几段梯田，这就是铁匠家的地了。

“这几棵枣树也归我们。”姑娘说。

她带着变吉哥工作起来。上午的工作，是拾些石块把叫水冲毁的梯田的边缘垒起来。

这几段梯田，最下面的一块有炕那样大，最上面的一块比锅台还小，然而一层层的边缘都要用石块垒起，上面的土沙才得铺平，才能耕种。

“你们有多少这样的田地？”变吉哥一边工作，一边问那姑娘。

“就有这么多。”姑娘说，“总共也就是六分地。可是同志，这还不是我们自己的地，这是租种的，每年还要交一半租哩。”

姑娘工作得很急迫，她把外面的上衣脱了，扔在沙滩上，只穿着一件破旧的单衫，把那不方不圆的石块砌好。

变吉哥想，这几块土地统统合到一块，也不过像自己家乡的一个地头地角，这一半石一半沙的土地，就是遇到丰收，能有多少出产？难怪这里的人家，就长年依靠那放在院子中间大缸里的酸树叶了。他想

着，这块土地对一家人是如此重要，工作也就加快起来。

“同志！”姑娘笑着说。在这以前变吉哥还很少看见这姑娘笑过，她笑得多么真诚和温柔啊！

“做什么？”变吉哥不知道抓镐好还是抓铲好。

“不叫你做什么。”姑娘说，“我是叫你休息休息。我看你虽然手巧，可是干庄稼活儿并不内行。我们快吃午饭了。”

姑娘站起来，带变吉哥转到山阴，那里有一洼泉水，上面结着薄冰，水在下面流着，姑娘把冰砸开，用手舀着喝了两口。

“你要不能喝冷水，就洗洗手吧。”她站起来说。

回到阳坡，母亲已经把饭送来了。她提着一只篮子，一个黑釉饭罐，还背来了他们下午要用的籽子。在这样艰难曲折的山路上，她能携带这些东西，使变吉哥深为赞服。

他们坐在沙滩上，太阳照得很暖和，姑娘先给变吉哥盛了一碗米汤，然后揭开篮子上的布，里面有几个玉菱饼子，还有一碗白豆腐，上面放些切好洗净的烂酸菜。

“吃吧同志，”母亲说，“别嫌饭食不好，可够我作难的哩，我推了半夜的豆腐。”

说完就笑着看他们垒的石头去了。今天，变吉哥

的胃口大开，他吞吃着玉茭饼子，这东西是多么香甜啊！他感到惭愧，他这一上午的工作，经得起老太太的检查，对得起她操业的饭食吗？

为了补偿，他下午拉耢子的时候，非常卖力。山坡上耢地是这样艰苦，因为地头太短，把耢子插到地那头，走不了几步，他就得跳到石垒外面去，才能把耢子拉到地这头。

把地耢完，天已经黑了。收工的时候，姑娘笑着说：

“同志，我们一家子，长年只给人家打活做工，今天你来帮我们的忙，实在卖了力气。听说八路军先减租，以后就要分田地，真的吗？”

“一定要做的。”变吉哥说。

走在路上，变吉哥向姑娘提出了一个他早就想问问又没有机会问的题目：

“我给你画的像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“我觉得很好。”姑娘笑了笑说。

变吉哥辨别不出这笑里的真实含义。又问：

“怎么好法？”

“我说画得很像，”姑娘比较认真的说了，“不过，我觉得也有些缺点，就是说，我还有点不喜欢。”

“这很重要，你快指出来。”变吉哥在创作上是很虚心的，有时简直可以说是从善如流，“我愿意你不

客气的指出这个缺点，我非常尊重当事人的意见。”

“这就是，”姑娘又笑了，“你画的不好看，不是眉眼不好看，是我的头发，你画得乱了些，你应当等我梳洗一下再画，最好是等我把衣服也换一下。”

“这恐怕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。”变吉哥有点失望，但他不愿意表示出来。他说，“画像这件事也是很难的。”

“有时，我觉得好笑，”姑娘照直说下去，“你们这些同志整天写的写，画的画，占着那么多的人，又都是年轻力壮的，究竟有多大的用处呢？我看现在上级这个决定最好，叫你们帮老乡种地，多打一些粮食，比什么都好，你说对吗？”

“对是对的。”变吉哥沉默了。

回到家里，虽然浑身酸痛，变吉哥还是坐在小油灯下面，把这一天的印象，勾画在他的速写簿上。直到眼睛实在睁不开，他才倒下去睡了。

这些山沟，这些小小的零散的村落里，住满了八路军的机关和部队。部队和机关人员依靠山沟，也带给她很多新鲜的东西，改变着它的原始的面貌。深山里的多年受苦、硬朗坚韧的汉子们组织起来了，他们积极的参军、运输、耕种。那些从来很少见到世面的妇女们，成群结伙，嘻嘻哈哈去上识字班，从八路军人员那里，她们学来多少有趣的生活啊！八路

军帮助这里的老百姓，帮助他们修盖房子，扫清街道，开垦生荒，培植树林。军队把大河滩里的几尺深的沙石翻到下面去，把埋在下面的泥土翻到上面来，种上这里从来没有见过的蔬菜。军队协同老百姓把泛滥的河道修整，开出许多能够灌溉田地的新渠。

阜平，阜平！这一向被人讽做“阜平不富”、号称“穷山恶水”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立业起家的基地。你成了多少远来的人的第二故乡，他们对你发生了多么浑厚的感情啊！在你的身上，一切可以利用的，都利用和发展了。在炭灰铺，煤坑和工人增多了，许多学生去参加煤炭的开采和运输。在金龙洞，纸厂扩充，印报印书都用它的产品。

在温泉，我们建立了一处清洁安静的疗养所。一个学过建筑的干部，新近接受了设计一座利用山地工料的大礼堂的任务。一个农学家来了，他正在研究怎样扑灭边区枣树上的步曲虫。

在这里，一切都在孕育着，发展着，战斗着。它不断的要求能和它蕴藏的无穷力量相称的更为广阔的天地。

八十八

每年冬季，战斗一开始，边区机关就把大部人员派遣到前方去。今年，报社把张教官和变吉哥分配到雁北地区，名义都是记者。把干部派到前方，可以直接迅速的反映前方的情况。干部随着部队活动，可以受到战争的锻炼。上层机关缩小了，行动转移方便，干部跟随武装，工作更有保障。这是万全之策。领导上重视张教官的写作经验和才能，从来，革命的队伍把知识分子看做难得的财富。可是张教官经历的锻炼少，在政治上，还不够积极进步。叫变吉哥同他工作，是叫变吉哥随时向他学习写作，也是为了在生活和在政治上帮助他。

任务分配下来，张教官接受得很高兴。他高兴的是有他这忠心的大弟子作伴，另外在阜平机关里也实在闷坏了，有点到外边疏散疏散心情的意思。战争的紧张和生活的艰苦，他都没有考虑。

起身的那天，张教官很早就打好了被包，打得很整齐。此外带一个灰布挂包，里面除去纸笔和一瓶自制的墨水，还带了一本残缺的唐诗。他总是好随身带着一本书籍。变吉哥办理了粮票、菜金、介绍信，就出发了。

第一天，行六十里，天晚时到达边区通雁北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站。交通站在一条小河的北岸，出勤的民兵集在桥头一排很宽敞的屋子里，地上铺着很厚的秫秸和草，人们围着火取暖。一群毛驴散在河滩上，等候装载。张教官和变吉哥在这里同交通站干部一起吃了饭，躺在草上睡觉。整个夜晚，交通站上紧张的交替着，喧吵着。他们干脆起来，帮助干部们登记柴草粮食，分配人员牲口，一到天明，就又出发了。

交通站的战时的紧张情景，很使张教官感动。大批柴草粮食的堆积，从各地来的民兵的呼喊争吵，毛驴排队走过河滩的叮叮的蹄响，使他看到了一幅塞外抗日的图画。这一天休息下来，在睡觉以前，他坐在老乡炕上，草成了一篇通讯，题名《交通站》，和变吉哥研究了一下，寄回报社去了。

昨天行军路程远，夜晚又写了文章，第二天起来，张教官感到有些疲倦。又遇上下雪，路上很难走。情况有些紧张，他们往北走，遇到的行人很少，看见有的居民往山上逃，打问一下，只说敌人出动了，离

这里到底有多远也说不清。他们决定今天赶到目的地，找到机关，如果错过，那就麻烦了。变吉哥在政治上负的责任更重一些，就更着急。但在路经一个大村庄的时候，老乡们又说没有什么敌情，街上还出现了一家小饭馆，张教官提议吃一点东西再前进。

这几天，他们吃的都是派饭，老乡们供给过往干部的不过是几个糠面窝窝，一盘干辣椒，行军一天，非常干渴，实在吃不饱。他们走进小铺，每人要了一碗汤面。

小屋里很暖和，一条小炕，上面放着一个火盆。张教官放下被包，上到炕上去，脱下湿鞋来，烤在火盆旁边。

掌柜的是个老大娘，动作很慢，还要现合面升火，看来很费时间，变吉哥想提议不吃了，但老大娘已经卷起袖子，把面倒在盆里，又看见张教官那十分疲乏饥饿的样子，只好也坐在炕上等着。

他看着大娘合面。大娘好像从来不洗手，只在替客人做饭的时候，才尽量把她手上的积蓄搓揉到面里去。变吉哥一来着急，二来嫌脏，就说：

“大娘，我来替你合面，你先去升火，好不？”

大娘勉强答应了，变吉哥洗了一下手，插到面里去。张教官背靠着墙，闭上了眼睛。

灶火里刚升起烟来，街上忽然大乱，人群跑过小

铺的门口。张教官一惊醒了，他从小窗里往外一看，对面山头上有一大队人和牲口。

“日本人来了！”大娘喊。

张教官抓起被包和烤得半干的鞋，变吉哥带着两手面，跑了出来。他们翻过右手的山坡，下面是一条冰河，蹚了过去。过了河，棉裤袜子冻冰，成了挺棍，用力砸碎，才能行走。回头望去，村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，老百姓又往回走了。

“这是误会。”张教官说，“但对我这个好吃又不沉着的人，却是一次实际的教训。赶路吧！”

他们已经找不到正路，隔着一条河，也不便回到村里找向导。他们在一条小山沟里穿行，想翻过一个山坡，插到大道上去。山很难上，他们先把东西投了上去，然后变吉哥托上张教官，再由张教官拉上他去。上到山上，筋疲力尽，却再也找不到下山的路，只好在山背上走。天气渐渐晚了，雪又不停。

一直走到天大黑了，也望不到村庄，遇不见行人。他们担心遇到狼群，或是栽下山去，他们身上什么武器也没有。

“我们用笔墨参加了抗日战争。现在看来，会放枪才是最有用的人！”张教官说。

话虽然很慷慨，深知老师性格的变吉哥，却从里面听到了那情绪低落的弦音。

“我年轻流浪的时候，曾经在山里迷过路。”变吉哥像是安慰他说，“那时孤零零就我一个人，现在我们两个人，遇到敌人和狼，拣石头砸它就好了，这个武器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。”

“是那样。”张教官说着，从地下拣起两块石头来，拿着走。走了几步，感觉沉重，就把它丢了。然后又拣起两块来拿着。

“我们总会遇到人家的。”变吉哥说，“雪下得很好，它可以照明前面的路。”

不久，他们望见远处山腰里有闪闪的火光，在风雪中，这像寒星一样的一点点光亮，有时显现有时掩没，他们又振奋又担心的奔着那里跑去，好像这是撑在他们手里的一盏灯烛，唯恐一阵劲风把它吹熄了。

他们欢乐起来，身上有了力气，也暖和了。冷饿、惊慌，不过常常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上的临时的点缀罢了。

这是一间靠着山坡的孤独的小屋，里面挤满了附近村庄逃难来的人。小屋外面拴着一群牲口。经过一番查问，老乡把他俩让进来。小屋的门窗全破了，风和雪不停的扑进来，可是那些妇女们，就紧紧抱着孩子，靠在角落里睡着了。稍微大些的孩子，为了抵御寒冷，把身子紧靠在他们牵来的山羊身上，还有老大娘们抱来的鸡，在寒冷中不安的扑着翅子。

“日本人把我们整个村子都烧光了，要在这里制造无人区。”一个醒着的老年人说，“我们今年冬天就要在这里过。这里很安全，鬼子们到不了这里，同志们走了远路，坐下睡一会儿吧，我这里有张破羊皮，来，盖上你们的脚。”

“谢谢你，大伯。”张教官说，“我们都带着被子。”

他们坐在地下，摸索着把被包打开，匀出一个，盖在那横七竖八躺在地下的妇女和孩子们身上，张教官眼里忽然充满了热泪。他觉得自己刚才在山顶上，感到自己是在受苦受难，十分可耻。在抗日战争里，身受更重更大灾难的，是他身边这些妇女和孩子们。

天明时，老乡们留他们一同吃饭。几家人伙用一个临时搭成的锅灶，小屋活跃起来，靠着它的四面墙壁，都升起烟来。小孩们奔跑在山坡上，拣拾着柴火。张教官和变吉哥，帮助他们到山涧里取来冰块，放进锅里，把他们米袋里的米也倒了一些进去。

吃饭的时候，老乡们围在一起吃。有的拿干的换稀的，有的把饼子放在别人家的灶火里烧热，有的给小孩讨一碗粥汤。大家很亲热，知道互相照顾，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。灾难的生活把人们团结起来，平常在村里分居度日，为一些小事隔着墙争吵，现在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。

吃过饭，老乡们指给他们道路，张教官和变吉哥走下山来，在路上，遇到一支前进的队伍。他们闪在一旁，想找一位负责同志打问一下前边的情况，就看到了芒种和老温。平原的老乡们在山沟里见面，分外亲热高兴。芒种把他们带到团部，团首长叫他们随着队伍前进。

八十九

冀中区的抗日军民，尽力抢救了水灾，排除了积水，及时播种了小麦。政府调剂了小麦种子，使被灾重的、贫苦的农民，也因为明年麦收有望，情绪安定下来。在冀中，每逢水灾以后，第二年的小麦总是丰收的。今年因为时间紧迫和地湿不能耕作，农民们就在那裂成龟背花纹一样的深阔的胶泥缝里，用手撒下麦种。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，参加了这一工作，在晚秋露冷的清晨，无数的农民低扬旋转在广漠的大平原上。

小孩子们还带来用柳条和粗纱布缝制的小网拍，捕打那因为天冷伏在地上的肥大的蝗虫，装在小布袋里，拿回去做菜吃。

因为山地水灾更严重，部队又集中在那里作战，冀中人民虽然被灾，但有些过去的余粮，还是按时交纳了公粮。春儿帮助村干部们，向群众解释：

“我们少吃一口，也要叫山地的人民度过灾荒，叫我们的部队吃饱。”

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每天每人省下一把粮食，集到一块就能养活很多人。我们苦一些，总是可以吃到麦收的。”群众都这样说。

春儿和村干部们都在行动上做了真实的表率。

但是征收到田大瞎子家的时候，田大瞎子提出他的地已经减少三亩的问题。

村干部找到老蒋家去，老蒋知道了田大瞎子不认账，说：

“你们不来，我也得找你们去。这三亩地是我买的田家的，有文契中人在。可是，我把地租给吴大印了，说明是死租，租米他还没交，这公粮也应该由他负担才对。”

村干部们又只好去问吴大印。吴大印一听气得话都说不出来，后来他说：

“根本没有那么回事。原先是老蒋不会种瓜，才找我帮忙，我算个短工的性质。忙了半天，没落一个钱，怎么倒叫我拿公粮？我不管这地是谁的，反正赖不到我头上。”

“就要赖在你头上。”老蒋说，“我是把地租给你了，当面说得很清楚。”

两个人吵了起来，气得吴大印当天晚上没吃饭。

村干部研究了这个问题，认为现在这块地里还没有播种小麦，地在老蒋手里，迟早也得落个半荒。吴大印家中缺地种，就叫他承租下来，根据边区法令，减租减息，好年头地主也不能随便收回，佃户有很多保障。至于公粮的事，这块地确是因为种瓜，寸草没收，可以请求上级减免。

村干部提出这样一个建议，老蒋在火头上答应了。晚上他去报告了田大瞎子，田大瞎子喊：

“你简直是一个老混蛋，你拿着我的地去送人呀！”

“你怎么骂人？”老蒋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竟敢和他顶撞起来，“你设的圈套，你自己去解吧，别想把我勒死在里面。”

“我去解？”田大瞎子说，“我要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你的什么？”老蒋立起来，指着自己的鼻子，“我是你的奴才吗？下人吗？狗腿衙役吗？你这个老奸臣！”

“我的酒饭都喂了狗！”田大瞎子抓起桌上的一把锡酒壶，就掷到老蒋的头上去，一下打破，老蒋血流满面，跑到区上告了。

区上先找人用棉纸和一些草药面，给他糊上伤口。问了情由，同意村里的建议，决定由村里帮助吴大印，赶快在这三亩地里播种小麦，

第二天，田大瞎子听见了，像疯了一样，提着一口大铡刀，站在地头上说：

“看，谁敢种我的地！”

区上派人把他逮捕起来，因为他罪恶累累，决定交付公审。公审地点就在子午镇村边毁坏了的五道庙遗址上，这里是一堆烂砖瓦。这一天，天气很晴朗，没有风。附近村庄的农民都赶来了，凡是租种着或是租种过田家土地的人，凡是给田家当过长工或是打过短工的人都来了，他们挤到人群的前面。农民的怒火在田野里燃烧起来。

会上，由村干部控诉了田大瞎子历年来的罪恶：破坏抗日，勾结汉奸张荫梧，踢伤工人老温，抗拒合理负担，把政府对他的宽大当做软弱可欺。建议政府从严法办！

“不叫汉奸地主抖威风！”群众呼喊着重意了这个提议。

卷在抗日暴风雨里的、反抗封建压迫的高潮大浪涌起来了。一种积压很久的、对农民说来是生死关头的斗争开始了。一种光焰炽烈的、蔓延很快的正义的要求，在广大农民的宽厚的胸膛里觉醒了！

另外一个阶级，在震惊着，颤抖着，收敛着。他们亲眼看见田大瞎子，像插在败土灰堆里的、一面被暴风雨冲击的破旗，倒了下来。

送公粮到边区山地的大车队伍，在腊月初的风雪天气里，绵延不断，浩浩荡荡的前进。细看起来，这队伍并不整齐，而且有时显得纷乱。其中骡马全挂的车辆并不多，最多的是单套牛车，有的多加一匹小毛驴拉着长套。还有的是在车轴上拴一条绳子，车夫一边赶车，一边低着身子往前拉，他是心痛他那力气单薄的牲口，初次走这样长远的道路。然而，如果从头看到尾，看到这一支从冀中腹地，甚至是从津浦线，一直延长到平汉线的、昼夜不息鼓动前进的大车队伍，我们就可以真正认识它的雄壮的气魄和行动的重大意义。

子午镇和五龙堂的车队，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队。高四海是小队长，春儿是指导员，她的任务除去政治工作，还要前后联络这些车辆和照顾那些车夫们，使得行进和休息的时候，人和牲口都能吃饱喝好，找到避避风雪的地方。她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布面羊皮袄，束一条搭包，头上戴一顶新毡帽，剪好的毡帽边缘，紧紧护着她的耳朵，露出的鬓发上，沾着一层厚厚的霜雪。

大车行军，遇到风雪是最大的困难。车夫们宁肯艰难的前进，也不愿意站在风地里停留休息。他们一心一意要赶到铁路边上，交割了任务。而大车前进，也像军人行军一样，前面顶住了，就要停止半天。每

逢这样的時候，車夫們喊叫着，袖着手抱着鞭子站着，有的就在車底下升起火來，烤手和烤化凍結的抹車油瓶。

他們走到定縣境，平漢路上隆隆的、彼伏此起、接連不斷的炮聲和爆破聲，使遠近的大地和樹林都震動起來，拉車的牲口們，豎起耳朵驚跳着。車夫們也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激烈的戰鬥的響聲，炮火的聲音，完全把寒冷趕走了。

這是向敵人進攻的洪大的響聲，是華北抗日戰場，全體軍民出動作戰的聲音。這一年冬季，日本向蔣介石進一步誘降，投降的空氣籠罩着國民黨的整個機構。響應敵人，他們發動了反共高潮。

我們發動了粉碎敵人封鎖的大戰，拔掉敵人據點，破壞敵人的鐵路公路。這是一次強烈的總攻，戰爭在正太、同蒲、北寧、膠濟、平緩，平漢、德石全部鐵路上，同時展開。

芒種所在的部隊調回了平漢線，兩位記者同志也隨同前來。各地民兵、民工，都來參加戰爭和破路工作。炸毀齒斷，兩個人抬起一段鐵軌，一個人扛起三根枕木，一夜的工夫，平漢路北段就只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坑洼。

“把大車趕到山里去吧！”車夫們在路上呼喊著。在鐵路邊緣，一種通過兩道深溝的運糧工作，緊

张的进行着，无数民工扛着公粮口袋，跑过横搭在深沟上的木梯，木梯不断上上下下跳荡着。

在这样紧张的战争情况和紧张的工作里，芒种和春儿，虽然近在咫尺，但也未得相遇，作一次久别后的交谈，那怕是说上几句话，或相对望一眼也好。实际上，此时此刻，他们连这个念头也没有。他们的心，被战争和工作的责任感填满，被激情鼓荡着，已经没有存留任何杂念的余地。

当把粮食平安的运进边区，平原和山地的炮火，还没有停止，而且，听来越响越激烈了。

九十

有一天，变吉哥站在驻地最高的一个山头上，遥望平原，写下一首歌词：

我望着东方的烟霞，
我那远离的亲人的脸的颜色。
你是为敌人加给你的屈辱激怒？
还是被反抗的硝烟炮火所熏蒸？

烟尘飞起，
是敌人的马队在我的村边跑过？
我听到了孩子们的哭声。
我望见你从村庄里冲了出来，
用寨墙掩护，
向侵略者准确的射击。

太阳从你的怀抱里升起了，
它奔着我滚滚而来。
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，
已经把平原和山地的人民联系成血肉一
体。

我们的阵线像滹沱河的流水一样绵长，
也像它的流水那样冲击有力。

亲人啊，
你的影子昨夜来到我的梦中。
我珍重战斗的荣誉，
要像珍重我们十几年无间的爱情！

这是一首简单纯朴的歌词。但是，即使是这样拙笨的并没有多大才华的歌词吧，假使它能幸运的伴同那粗糙的纸张和油印的字迹，遗留下来，使曾经度过这段光荣的岁月的人，在若干年以后，重读起来，也会感到特别的清新亲切，而不得不兴起再一次身临其境的感觉吧。它将在很多地方，超过那些单凭道听途说、臆想猜测而写成的什么巨大的著作！虽然它不一定会被后来的时隔数代的批评者所理解。

历史，究竟是凭借什么东西，才能真实的、完整的保留下来，而传之久远？在当时，我们是把很多诗

文写在残毁的墙壁上，或是刻在路石悬崖上。经过多年风吹雨打，它们还存在吗？河水曾经伴奏我们的歌声，山谷曾经有歌声的回响。是的，河水和山谷是永远存在的。然而，河水也在流逝，山谷的面貌也在改变。歌声和回响，将随时代和人们心情的变化而改易。口头的传说，自然是可靠的碑碣，然而，事过境迁，添添去去，叫它完全保留当时当地和当事者的心情，也会有些困难吧？

这样，在当时当地写下的，真正记录了人的思想和情绪，意志和操守的篇章，虽然幼稚，也就是最可宝贵的了。

当然，你这其貌不扬的篇章，也希望在将来，能遇到那真正的大手笔，当他苦心孤诣的网罗旧闻的时候，你能够幸运的被投入他那智慧的锦囊，成为他那真正的足以流传不朽的巨著里的一砖一石。但是，你或者并不愿意被那些文学上的不称职的人包裹而去。这些人，他们并不想去辛勤的用斧子和凿子剥开石头，从而自己也创造一座雕像。他们惯于在别人雕成的本来朴质的石像上，进行不必要的打扮和堆砌，给它戴上大帽，穿上臃肿的衣服，登上高底靴子。使人们看来，再也不认识那座雕像了，这样，就可称为是他自己的“创作”。或者，客气一点说，是“改编”吧。本来是一支小曲，从来就是用一支笛子吹奏

的，经过他的改编，就必须动员整体的乐队，这确实是复杂化了，但是，声调完全不同了，听众只能无端的陷于嘈杂和热闹之中。

是的，你就带着本来的朴素的面貌存留下来吧！

当然，篇章的或是人的前途和命运，大体上是可以预见到的。时代分别划定了人们前进的路程。只要在康庄大路上行走，就可以每天遇到和你奔赴同一方向的旅客。

我们的整个故事，好像并没有结束。但故事里的人物，将时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，走在我们的身边。你尽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学识和见地、阅历和体会、心性和理想，去判断他们每个人在将来的遭遇和结果！

不过，有些关于李佩钟的事，我想在这里告诉读者一下。李佩钟，在我们的故事里，并不是头等重要的人物。但是，一篇故事的作者，对待他的人物，似乎不应该像旧社会戏班的班主对待他的演员，有什么重视和忽视的分别。有些细心的读者，除去关心芒种和春儿是否已经结婚，也许还关心着她的命运。李佩钟自从那年受伤之后，身体一直衰弱，同年冬季，敌人对冀中区的“扫荡”，非常残酷，一天夜里，地委机关人员被敌人冲散，李佩钟从此失踪，很长时间，杳无消息。后来就有些传言，说她被敌人俘至保定，后来又说她投降了敌人。第二年春天，铁路附近

一个小村庄，在远离村庄的一眼土井里掏水的时候，打捞出一个人的尸体。尸体已经模糊，但在水皮上面一尺多高的地方，有用手扒掘的一个小洞，小洞保存了一包文件。这是一包机密的文件，并从文件证实了死者是李佩钟。这样就可以正式判定：当她们那一队人，被敌人冲散以后，夜晚，李佩钟一个人徘徊在铁路旁边，想通过沟墙到山地里去。据同时失散的人回忆，那一夜狂风吼叫，飞沙走石，烽火遍地。李佩钟或是寻求隐蔽；或是被敌人追逐，不得已寻死；或是在荒野里奔走，失足落到这眼土井里。土井里水并不深，也许是她太疲乏了，太饥饿了，太寒冷了，她既不敢呼喊求救，也无力攀登出险，就冻死在水井里，她的生命，就这样结束了。但在死以前，她努力保存了这包文件。

作者在描述她的时候，不是用了很多讽刺的手法吗？但是，她那苗细的高高的身影，她那长长的白嫩的脸庞，她那一双真挚多情的眼睛，现在还在我脑子里流荡，愿她安息！

现在回想起来：在那样严重的年月里，残酷的环境里，不管她的性格带着多少缺点，内心里带着多少伤痛——别人不容易理解的伤痛，她究竟是决绝的从双重的封建家庭里走了出来，并在几次场合里，对她的公爹和亲生的父亲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这

也是一种难能可贵，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。她参加了神圣的抗日战争，并在战争中牺牲了她的生命。她究竟是属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队伍，是抗日战争中千百万烈士中间的一个。

她的名字已经刻在她们县里的抗战烈士纪念碑上。

——六十节写于一九五〇年七月至一九五二年七月。

六十一——九十节写于一九五三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五月。

一九六二年春季，病稍愈，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。